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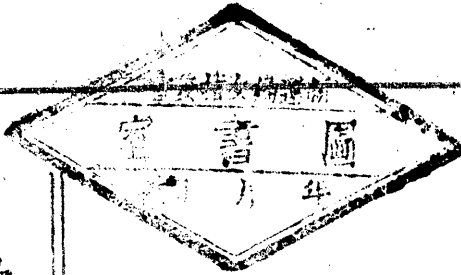
歐洲人物

法 國 · 巴 蒙 著

謝 建 勳 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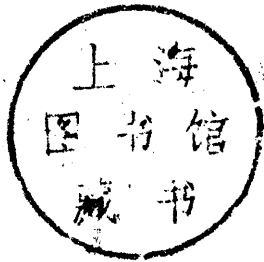
五十年出版發行

1692



歐洲人物

法國·西蒙原著
周進楷 吳梅邨合譯



十五年出版發行

~~77303~~

~~277203~~



A541 212 0022 4376B

目錄

開端：我的自白……………	(一——一七)
一 希特勒的祕密武器……………	(一八——二九)
二 阿道夫·希特勒：主宰還是工具？……………	(三〇——八〇)
三 希特勒的智囊團……………	(八一——一三〇)
四 墨索利尼：希特勒的出色後隨……………	(一三一——一三九)
五 佛郎哥：貝當的門徒，希特勒的傀儡……………	(一四〇——一六五)
六 巴爾幹的君王與遊擊隊員……………	(一六六——一九〇)
七 麥唐納：「被蝗蟲吃了的歲月」……………	(一九一——二〇五)
八 鮑爾溫：「不過丟點面子而已」……………	(二〇六——二三七)
九 張伯倫：「覓取當前的和平」……………	(二三八——二六四)

十一 斯大林的國擊戰.....(二六五—二八七)

十一 溫斯頓·邱吉爾：「血、汗、和淚」.....(二八八—三〇五)

結尾：歐洲的無名人物.....(三〇六—三一六)

開端：我的自白

一九三四年，我險些遭了德國秘密警察的毒手，而自已當時竟一點不知道有什麼危險。那時，爲着決定薩爾區的隸屬問題，正準備舉行公民投票，我便在一個從事這種運動的委員會裏當幹事，工作完全是遊動性的，我忙着往來於巴黎與薩爾布魯根 (Saarbrücken) 之間。我要到各種會議上去演說，我要搜集納粹恐怖的情報，我要隨時和國聯派來的特種委員會接觸，此外，還有許許多多大大小小的事情堆在我頭上。而法國的外交部長賴伐爾，却加重我不少困難，因爲我的工作阻擾了他跟納粹對於這次投票所訂的祕密協定，由於這位陰險政客的搗亂，我的工作境況備受極大影響，大概秘密警察就是想看看我畢竟還能否幹下去，所以他們派了魏思曼 (Hans Weismann) 來找我。

五個月後，魏思曼第一次來拜會我。魏思曼的大名，全世界報紙都得以頭號字排印。因爲後來把一個名叫賈可柏 (Barthold Jacob) 的德國流亡記者，從瑞士巴塞爾城 (Basel) 架回第三帝國的就是他。那時，賈可柏因一個新從德國來的人答應供給他一一些最新穎，最內層的消息，同時列支敦士登 (Liechtenstein) 國王又答應發給他一張護照，所以他在一個酒店裏邀集了一個集會。就在那裏，他碰上了魏思曼，魏思曼和另外兩個秘密警察偷偷地在酒裏下了些麻藥，賈可柏暈了過去，一輛汽車停在外邊，他們把

他拖上汽車，極快地馳去，逃過了瑞士查關人員的盤詢，一直把他載到盧塞拉（Luzern）的祕密警察機關，才叫他下車。但是，後來不知怎麼回事，經過幾個月後，夏可柏又被納粹放了出來。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的一個陰天，魏思曼按着我在巴黎那僅有一個房間的住宅的電話，一個碩長而且漂亮的德國人，皮膚潤澤光滑，頭髮黑黑的，眼睛靈活敏銳，對於這樣一個人，老實說我當時絕沒有懷疑。我只知道他從前是一個德國社會民主黨人，一度與某些不大光明的財政案件有關。數月以來，他從倫敦聯珠般地寫信給我，說他可以把我論納粹重整軍備的文章和描寫納粹內幕的稿件送到倫敦報上去發表。我并没回過他片紙支字，所以他這次之突然來到巴黎，的確有些令人驚奇。

魏思曼給我的第一個印象并不好，他的舉止雖很穩重，但眼光却四處亂溜，他來得太不是時候，我感覺非常討厭，因為我恰好新從柏林來了一個朋友，這個朋友正在講述一些有趣而且重要的故事，他急於需要而且確能効勞的，便是去訪問另一個態度不明的德國人。

我們這房間裏，床鋪用一幅幕布遮住着。電鈴響時，我一面走去開門，一面作手勢叫我的朋友離開床後去，等魏思曼向我作過自我介紹後，我把他讓到我這叫做「書房」的一角，因為我的桌子擺在那裏。坐定了，剛說上幾句話，電話又響了。倫敦來的，一個我絕對信任得過的女朋友打來的。魏思曼聽到我叫她的名字，便輕輕地囑我代他致意。那邊的回答似乎很親切，當然，魏思曼也認識她。這件沒想到的小事，雖使我對他增添幾分好感，但仍不足以掃清我的全部疑慮。

他說他想找幾封介紹信，去見薩爾區政府的要人，和各政黨的領袖。他說他對於這次的公民投票，準備寫幾篇文章。他說說真正可以尋求民意地方，是靠近德國邊境的幾個小村莊和小市鎮。

他說：「假如如那些地方的人民反對納粹，你便可以斷定全薩爾區的人民都反對納粹，因為那些邊區地帶所受到的納粹宣傳，比任何旁的地方都要來得多。當真，你好不好陪我到薩爾市去走一遭呢？」

因為他始終拿不出新聞從業員的證件來，所以我沒應他的請求。約莫半點鐘模樣，他走了，我馬上到水洗手，沒有別的，他的手上汗實在太多了。這些瑣碎的事情，我至今還記得清清楚楚。

此後，我便再沒看見過魏思曼了。五個月後，他捉住了賈可柏，我前面說過的，他成了那裏一種不高明的手法。可是，不到幾天，瑞士警察釘住了他的梢，把他捉住了。這件事成爲轟動一時的名案，而德國祕密警察的作風，也便給予全世界人士一個不可磨滅的印象。

實際上，那時候我還不明瞭魏思曼的全盤任務。一九三五年春，我到瑞士去搜集納粹在某方面活動的情報。由一個蘇黎支城(Nurich)出版家的幫助，我得以會見不少被在瑞士境內的納粹分子公開警告過的人們，其中一個，是巴塞爾的助理地方辯護士，他正在準備魏思曼案件開審時的起訴狀，他隨時隨地提防着被人暗算。其實我看有些是儘可不必，但他堅決認爲承辦魏案的人員隨時都有遭賈可柏同樣危險的可能。

他說：「納粹正預備採取更多像魏思曼那樣的手段，他們對於一般逃亡國外的德國人，是一點不肯放鬆的。我知道我自己時刻在危險中。」

在巴塞爾一條偏僻小街的一家咖啡店裏，我們這麼談着。一具舊式的八音盒，啾啾唧唧地唱出些過時的古老調子，給予這位神經質的助理辯護士無上的寬慰。

我只顧逼着他講這些案子的情形，他突然說道：「你真是個幸運兒，你知不知道，你是魏思曼名單上的第三名呢？」

「你說什麼？」我十二分驚異。

「我說，」他道：「魏思曼供出了一張名單，裏面開列的，都是納粹要綁架的人物，你就是那裏面的第三名。」

歐 洲 人 物

聽到這個消息，我發生了許多繁雜的念頭。不用說，榮膺第三名，我還不够格。在巴黎以及許多旁的地方，還有許許多多的人，工作環境比我壞，經濟狀況比我苦，而他們對於納粹的打擊，却遠非我夢想所能及，並且，較我們這些在外國奔走者尤為重要的，還有德國國內的無數祕密工作者在。

我不過是許多人中間的一個，雖則我們的共同工作看上去每每像是我個人的功勞，其實，我所作的，也還只是整個工作中的一部份而已。

自從希特勒跨進德國國務院那歷史建築物的那天起，我就致全力於揭發納粹過去的種種陰謀，九

以來，我除了睡覺之外，全部時間都用在這上面。我參加了這項秘密工作。我們的第一件重要成績，則是一九三三年八月初版的「希特勒運動褐皮書」。(The Brown Book of The Hitler Terror)

九月，轟動一時的國會縱火案在柏林開審。第一名被告華米特洛夫當庭要一本「褐皮書」，雖則沒有人給他，可是「褐皮書」三個字，在審判期中，却每天都提到了，德國最高法院的首席推事公開發表談話攻擊這本書。這種攻擊自然是必要的，因為萬千冊「褐皮書」已經偷偷地運進德國來了，而且也的確流傳得很廣。這本書後來被譯成二十二國文字出版，爲他日反希特勒運動奠下一個有力的基礎。

有一位沙克博士 (Dr. Saek)，是一個國會縱火案被告雇請的辯護律師，到巴黎來找瑞典參議員布蘭亭 (Georg Branting) 商量有關該案審判的事情。他隨身帶有一本「褐皮書」，書中劃了很多的線，書頁的空白邊緣，也註了很多的字。布蘭亭見客的時候，我也在座，我好奇地把那本書察看了一遍，發覺在第一頁上有一種德國秘密警察的圖記，印着這幾個字：「Geheim Staatspolizei」我們馬上意識到，沙克博士一定是派來偵查我們的情報來源的。接着，我們這種猜想又由兩件事情證明得似乎更近事實了。沙克博士帶來兩個人，坐在他的身旁，其他說的是他的幫辦，但我們看上去，這兩個傢伙，說不定就是秘密警察裏面的人。這位辯護士，不是他們的囚徒，也便是他們的同黨。三小時後，沙克博士不得要領地走了，我和布蘭亭隨即也跟着出衙，我們發覺有兩個人影跟在我們後面。

現在，我們可以談點「褐皮書」裏面的真象了。在納粹縱火焚燒國會以後不久，恐怖空氣瀰漫了全

德國，基於我的建議，一小羣反納粹分子開始了這件工作。那時我正在一個專事救濟納粹殘害者的國際委員會裏任幹事，我們的工作，是在這個掩護之下進行。我和另一位作家被指派編這部書，分到我寫的幾章，是關於後來被納粹殺害的那個可怕的羅比（Vera de Rube）的，以及敘述國會大火經過情形的。

就我們這個工作言，籌措部分並沒有多大問題，困難的是我們須得把自己當做偵探隊或是情報局。我們覺得，我們是受着全世界輿論的委託，來廓清這國會縱火案及其幕後的種種。

若不是那些在德國國內工作的勇敢男女幫助我們，把他們的經驗和見聞告訴我們，我們的工作，永不會有如是之成功。他們大都是共產黨員，他們敢冒極大的危險，許多的材料，用顯微鏡攝成很小的相片，偷運過那些層層密密守着衛的邊疆，有些寫在絲帶子上，緊緊地縛在偷運人身上，外面再罩上衣服。還有的就全靠記憶。有一個二十四歲左右的失業鐵匠，個子高高的，碧眼金髮，經常地每六個星期通過一次邊界。他的記憶力真够驚人，他在一九三五年被捕了，正在薩爾區舉行公民投票以後不久，那時他企圖從瑞士私帶一大批反納粹資料到德國去。他被送到可怕的達覺（Dachau）集中營。但是，雖經過無數的酷刑，他的信念仍沒有打破，我今年（一九四一）年初還聽見有人這麼說。

我在荷蘭停留了幾天，去訪問過羅比的家屬和朋友。受審的時候，這位年青的荷籍放火者始終不開口，就是當是個傻瓜。一些、好些外國記者說他是癡子，我說倒或許是受了麻醉藥的影響。四天的時

光，我到了好幾個荷蘭城市。我找羅比的父親談過，那位鬚髮皆白的老翁在多德勒喜特（Dordrecht）開着一個小店。我也找住在萊丁（Leiden）的羅比的姊姊談過，找他的女房東和他那些無政府主義派的朋友們談過，在這次調查中，我認爲我得到一個寶貴的發現，即羅比是一個同性愛者，據後來事實證明，他最初和納粹的接觸，就是因着這個嗜好。

但是，祕密警察並沒有停止活動。我在荷蘭，就蹲到過他們的滋味。魏思曼的繼起者，正有增無已。一個助我在荷蘭工作的荷籍律師，告訴我一個消息，說是有了一個做祕密運動的人，由德國到了阿姆斯特丹（Amsterdam），據他說，其目的仍在搜集有關羅比的材料。當天晚上，我就見到了這位先生，一個滿頭黑髮的美少年，年紀在二十六歲上下，極自負，似乎還嫌有點過於自大。他自稱名「克特·威白」（Kurt Weber）。

據他看來，問題非常簡單。他說他認識一個住在萊丁的羅比的朋友，這個朋友藏有許多羅比的日記和雜錄。他告訴我，只須把這個朋友的屋子弄破，進去把那些資料偷了出來，向全世界一公佈，事情就成了，這就是他的全盤計劃。他說什麼都預備好了，只等明天晚上動手。最後，他還吐出了他的妙計：他很謙和地對我說，他曉得我爲羅比這案子費了不少氣力，他說只要我肯分担一部份這次偷盜的費用，他願把這些材料讓給我一分。我記不清他向我討多少價了，只記得他給過我一張賬單，上面對於這次的費用，一項一項列舉得非常清楚，他說這些錢已經付出去了。但是我毅然決然的拒絕了他。

自然，所謂全盤計劃，都是一些鬼話。一九三七年，這位「克特·威白」先生在巴黎上了鉤，他被宣布是一個德國的祕密警察。

對於這種反納粹工作，英法政府都未給予同情，而對於我任幹事的這個救濟委員會所組織的對抗審判（Counter-Trial），態度尤為冷淡。我們這個「法庭」，包含九位國籍不同的律師，由英王的顧問，後來的工黨議員勃利特（D.N.Pritt）充當主席。我們的目的，在揭破那事先有佈置的萊比錫（Leipzig）審判的醜劇，並指出真正應被判罪的人來。

對抗審判第一次開庭時，由英國現任駐蘇大使，（一九四二年二月內閣改組時改任掌璽大臣兼下院首領——譯者）前工黨政府時代的副檢察長克利浦斯爵士（Sir Stamford Cripps）蒞臨講演，出庭備訊的人證二十餘個，呈驗的文件數百起。一九三三年九月十三日，即萊比錫審判開庭的前一日，我們的判決書下來了，宣佈季米特洛夫及其他被告均皆無罪，犯罪責任在納粹自身。因此，當這些被告走進萊比錫的公堂時，全世界各地三千多種報紙，早已揭載了對抗審判這個發見。第二次開庭在十二月，比萊比錫宣判略為早一點點。結果，納粹法庭的訴訟進行被人傳為笑柄，我們九月發表的判決書被承認了。

這件事還沒有完全了結，許多別的困難又要克服。法國的內政部長前總理旭丹（Camille Chauvenet），指使他的警察，到我們巴黎的會所來搗毀。我和布蘭亭於是飛往倫敦，去協助對抗審判的事務。當時我心上感覺一陣非楮墨能形容的欣幸滋味。

我們被阻止在飛機場。人家告訴我們，英國政府不歡迎我們到英國來。幸而我們趁的飛機是那天的最後一班，方才得以在飛機場旁邊的旅館裏過一夜。雖則有許多國會議員答應替我們去向政府方面疏通，但我們仍不敢樂觀。在這一個不安的晚上，我把所有帶來的資料，都交給一個英國少年律師，并儘可能地加以說明。第二天早晨，問題還沒有解決。早上八點鐘，有人來告訴我們，說我們不妨搭乘十點鐘開的那班飛機，到了十點鐘，又是同樣的一套，說我們儘可以搭乘十二點鐘開的那班。直到下午三點鐘，英國內閣才因反對黨的攻擊，準許我們入境。然而，不但是委員會的委員們，即使是我們「法庭」中最具深望的律師，也都被警察時時刻刻釘牢。

最勇敢的是那些證人。我永遠忘不了那最後的一個——夏慈(Fred Smith)，一個身材矮小，形容憔悴的女人，穿着一身黑衣。他的丈夫曾任科力斯堡(Koensberg)的國會議員，被納粹捉去活活打死，拖着屍身在科力斯堡街上遊行。夏慈和她的兒子還被強迫加入這個遊行的行列他們親眼看見那個兇手。她站在證人席上，一隻手扶着她的兒子，神態非常緊張，面色慘白，似乎快要哭出來的樣子。她的兒子比她稍許高一點點。當她訴述她丈夫慘死的經過時全場聽衆，莫不氣憤填膺。威爾斯(H.G. Wells)當時坐在旁聽席上的第一排，竟然當衆哭了出來。

第二天，英國政府命令夏慈立刻出境。

爲要洗脫「褐皮書」和對抗審判所判給他們的罪名，戈林和戈培爾也都被迫出庭質訊。他們的申

，在道義的觀點之下，完全失敗。季米特洛夫冷酷地，決絕地向着戈林，把一聯串問題聯珠般地问了出來。這位納粹領袖，神志有些昏迷了，當着這許多旁聽人面前，會沒法逃避一個實際上掌握在他自己手裏的囚犯的攻擊。

一九三四年六月的清黨屠殺以後不久，一個法國駐德大使館的館員告訴我，說是在這件事情發生之先，德國國防軍會向希特勒致送一個備忘錄，請求希特勒立刻停止挺進首領魯姆隊長 (Captain Ernst Roehm) 的一切活動，并控制住那些隊伍。這個文件用了一個藍色封面，後來就被叫作「國防軍藍皮書」(The Blue Book of the Reichswehr) 據謠傳，這裏面還夾有藍色的印刷物，計議着將職業式的國防軍擴充為一個以徵兵制為基礎的軍隊。(就在這事的第二年，希特勒採取了普遍徵兵制)。這位法國館員告訴我，他曾想法子去弄一本，可是沒弄到手。

我也想要一分，自然也是無望，清黨事件剛發生後，我們便決定寫一部「白皮書」敘述這次事件的全盤經過。這本國防軍的備忘錄，不用說是我們無法獲得的一環。我們認為這次清黨，一定是由幾個軍事及工業方面的巨頭鼓動的。其見諸實行，也一定是應他們的請求。對於這個猜想，國防軍的志錄一定可以證實。假如我們能獲得這本備忘錄，我們的工作不就成了？但是，如何才能獲到呢？

我和一個德國流亡出來的人商量這個問題。這個人曾經供給過我許多有價值的情報。他是一個退伍軍官的兒子，希特勒登台以後，還在新成立的航空部裏作過幾個月事，他把那個職務純粹當作一種掩護

，暗地裏仍舊幹他的反納粹活動。不久，被發覺了，虧得一個上司，他父親的一個朋友，適時地給他通一聲風，他才得以免於被捕及送進集中營。

這人答應竭力想辦法。三個禮拜以後，他到了我的屋裏，帶着好消息來了。他說有一個最勇敢的祕密工作者，現在正帶着那備忘錄的縮小照相，向巴黎來。我們等着，一直等得不耐煩了，而那個人還是沒有來。事後，我們得知他在通過由德國到薩爾的邊界時，被那些哨兵查了出來，他們遠遠地給他一槍，他早流血死了。這消息傳來，我們如淋一盆冷水。

我們的希望本來完全沒有了，可是，六天之後，這備忘錄卻又來了。死者的一個朋友送來的，他曾經幫助死者攝取這本備忘錄的照片，他聽見他的朋友被槍斃了，於是毅然決定把那照片的另一分親自送來。他也沒用什麼通行證，却安然地通過了德瑞和法瑞邊境。我們付了多少費用呢？拿錢的數目來說，可真小得令人發笑。因為他只向我們要了一張回去的三等車票價。

有時候，我們的重要工作，就在辨別這些情報的真偽。這裏所遇到的，就是一個典型實例。

清黨以後沒多時，瑞士報上發表了一個名叫柯樂思 (Kesse) 的前德國進隊員的傳記，說這位進隊員曾經當過魯姆隊長的隨從，他對於如何在希特勒的親自監督之下，在威錫 (Wissoc) 地方把魯姆和另外幾個挺進隊高級領袖暗殺的經過，源源本本，說得非常詳細。自然，我想去看看這麼一個人。不久，我接到蘇黎支方面的來信，說是他正和一個叫做康卡 (Konta) 的退職德國電影員住在那邊，康

卡也惹見見我。

在蘇黎支的一家大旅館裏。我和康卡一起吃早餐。他告訴我現在還沒有機會看到柯樂思。可是却又那麼發地，半吞半吐地告訴我，說是報上所發表的，不過是挺進隊內幕的一部分而已，還有極有意思的一大部分，不曾發表過，裏面包括魯姆與希特勒私人來往的信札，只要我肯出五千塊錢，這份材料便可任我處置。我肯出這許多嗎？肯，但却有一宗，不肯出錢買假貨。我約定他三天之內回信。

同時，我也留神察看着他。我發覺他和一個在瑞士的納粹領袖常有秘密會晤。我得悉所有康卡和柯樂思的郵件都被投在一個名叫古斯德 (Kussler) 的人的信箱裏，這個人聽說是到南斯拉夫去了，就算是這麼個人吧！總之，事情的全局，都富有深厚的神祕氣氛。

康卡顯然地逃避了我的偵察，他以後永沒實踐過我的第二次約會。事實上。他早回德國去了，幾個月後，他在德國被處死刑。據傳聞，他一面替德國秘密警察工作，一面同時也替英國情報機關工作。所謂柯樂思也者，根本是他杜撰出來的人物。

「白皮書」於一九三四年晚秋以十五種不同的文字出版。但是，無論在英國或美國，我們都無法以英文出一版。我們和倫敦一位大出版家商洽，他即因此受到外交部的警告，一位紐約的出版人，則說是怕吃官司。其實，國防軍的備忘錄早被歐洲各地報紙轉載過了。而且，證實那次暗鬥的一件有力文獻，也早經報章披露出來。韋爾漢親王 (Crown Prince Friedrich Wilhelm) 由荷蘭旅行到德國，德國查閱人

員檢查他的行李，在一個行囊裏搜出了一束「白皮書」。自然，親王是絕不會有心做祕密工作，他不過是把這些東西帶給他的朋友，供他們消消遣或是長長見識而已。

過了一年，我們的第二部書又已出版，叫做「褐色情報網」(The Brown Network)，是專講德國在國外的偵探業務和「第五縱隊」的活動的。這部書對於納粹派在世界各國的祕密活動，作了一個極詳盡而且附有證件的報告。同時，對於指導這種國外工作的德國國內各納粹組織，也都予以分析。我們把整個納粹情報網用一張圖表解出來。這張圖解，我四年以後還在華納公司 (Warner Brothers) 一張叫做「納粹一間諜」(Confessors of a Nazi spy) 的影片中看見過。

「褐色情報網」中有一張名單，分別列舉着各國的納粹人物。法國名單的第一名，是阿貝茲 (Otto Abetz)。他後來作着巴黎淪陷區的納粹黨務負責人 (Gauleiter)。書出版後，我帶了一本給孟齊 (Anstolde Menzie)。孟齊是一個很有學識的人，但却非常崇拜墨索利尼，他後來以達拉第 (Daladier) 政府的勞工部長資格參與過慕尼黑 (Munich) 會議。孟齊把書中法國納粹份子的名單仔細看了一遍，臉上露出幾分袒護的神色，笑了笑。

他說：「這本書如果全篇都是像這張名單一樣的不正確報告，那麼，便簡直不值一顧。阿貝茲我知得清清楚楚，如果他是納粹份子，你把我的手砍掉。相反地，他才的確是法國之友哩，他之憎恨希特勒，不下你我。」

「褐色情報網」中「反對勢力」(Piece de Résistance)一段，是德國駐法大使的克館納粹宣傳員，來吉男爵 (C. B. Dinklage)，給戈培爾博士那宣傳部的祕密報告。這本報告裏邊，對於法國社會及新聞記者，特別是服務財政經濟界報紙的記者，敘述得極為坦白。丁克萊吉高興得很，他忠告戈培爾道：法國綏靖派「從德國方面得到多少讚譽，就等於從法國人民方面得到多少責罵。」

關於我們怎樣設計獲得這宗文件的經過，說來的確有些像篇神話。丁克萊吉有位法國情婦，我們使點手法，弄了一個反納粹的法國人到她家裏去當車夫。後來經過了克萊吉的准許，這個人也時常出來幫同侍候客人。在丁男爵的某次宴會上，他動手偷了這珍貴的報告。

從某一方面看來，我們的工作還是慘遭失敗。我們後期的各種出版物，雖都沒有「褐皮書」那麼流傳得廣，那麼能够影響人心，但却也因其報道之詳審精確，仍然獲得相當廣大的讀者羣衆。不幸的是，這些書並沒有引起各國政府的注意，照理，他們是應該極端注意的。不僅此，事實上英法兩國的大人先生們還不時故意地和我們爲難哩。直到戰事爆發，他們才突然發覺納粹是在從事一種萬惡的罪行，確係德國主義者的代表，然而，到這時候，讀張伯倫政府攻擊納粹野蠻的白皮官文書，或是倫敦泰晤士報的社論，或是巴黎時報的納粹統治世界計劃，都難令我滿意，反之，倒似乎還約略可引起一些憎惡之感。

這許多年來，我以一個新聞記者的地位，從事反納粹運動，在這種職業中，我對得住我的良心，我獲得了我的靈魂，一九三三和一九三四兩年，我擔任倫敦星期週報 (London Sunday Paper) 的 Editor

議員。西班牙內戰發生後，我受該國外交部長梵雅（Amador de Vayo）之託，創設官營的國外精忠出版所（Loyaler Pressesgesellschaft），分所遍佈歐洲各大國家，我和梵雅很早以前就認識。我主持這個出版所，將近一年。

其後幾年，我又在巴黎一家報館的編輯部工作，後來還作過該報的國外記者。我們的總編輯，是大眾公認法國最有名的大政論家，他對慕尼黑會議的背約行爲，攻擊不遺餘力，他起先會反對法蘇協定，但是，在該約在莫斯科簽字以前，經參謀總長魏剛將軍（G.M. Weygand）向他說明法國參謀本部認爲這個協定是必不可少的後，他就改變了他的態度。可是，撐持這家報紙，確實很給那些出賣法國與納粹的閣員們過不去。慕尼黑會議後，外交部長龐萊（George Bonnet），那位長鼻頭，突眼珠的人物，下了一紙密令，叫市政府將反對慕尼黑會議的報紙一律封閉。後來經幾個反慕尼黑會議的閣員極力抗議，以及我們報上把他這計劃揭穿，才算沒成爲事實。

有一天，我開始登載了一位有名軍事專家論德國參謀本部對紅軍態度問題的第一篇文章。作者根據德國軍事方面出版的材料，判斷無論戈培爾的噱囉們如何向納粹當局宣傳紅軍之不堪一擊，德國參謀本部對紅軍作戰能力的估計，仍舊極高。

這篇文章登出來的第二天，龐萊把我們的總經理找了去，應許送他一大筆錢，叫他停止刊載這篇文章。我們的總經理嚴決地拒絕了。龐萊非常氣忿，於是呈請內閣取締我們的報紙，然而也同樣遭了拒絕。

。他爲報復起見，又叫人來偷我們電話線的電。當天，會有一個外交部的高級職員把龐萊將採取的手段告訴我們，但我們的電話早已被偷電的線改而聽話不清了，所以這嚴重的密告事實上已等於零。

這些事情，發生在希特勒佔領布拉格（Prague）之前兩個禮拜的時候。

現在，我被隔絕在這異域，我想我對於祖國解放前途的最好貢獻，莫過於把那些我所看到的人物與事件記述出來，把那些迄無人知的或是被粉飾過去了的陰私揭佈出來。我們如果希望重獲自由，必須先得研究自由如何會失去的。不久的將來，等這些陰森的日子過去，我們終可得到一個水落石出，黑白分明的概念的。過去的真理，不管他如何的不時髦，如何的不夠稱心，但總是進入光明前途的第一塊基石。可是，真理的看法，往往至少有兩方面，所以我這本書只要能對過去十年間歐洲各種事象的闡明略有貢獻，那也就算是我這將過五十年的一生中的最大滿足了。

在美國人看來，歐洲成了一個那麼的地方，專會發生些令人憎惡和無關痛癢的事情。但在我個人看來歐洲仍舊是我在那兒出生成長，和開始踏入新聞界的那片可愛的大陸。因爲如此，我才有這分個體的特權，得以目覩許多國家在納粹獨裁的襲擊之下，一個一個地喪失了自由。而這納粹的襲擊，實多得力於一班僞稱擁護自由與民主者之幫助與給予方便。我親眼看到許多促成希特勒勝利的重要事件，我認識許多對目前局勢之釀成應負責任的政治家。

現在，還不是每個歐洲作家可以在他的作品上簽署其姓名的時候。握在希特勒魔掌中的抵押品，實

不大了，我出生和上過學的這個城市，早被納粹軍隊佔據。我的父親，在納粹軍隊來到時，受驚死了。遺下我的母親和我兩個兄弟在納粹手裏。我僅有的一個女兒，也還在希特勒統治下的領土上討生活。

讀者閱讀以下諸頁時，我相信一定非常希望我把那些供給情報的某些政界鉅子，權勢要人，以及法國或其他各國的政府中人寫得明白些。從前時候，我連自己的發見都不敢拿到報上發表，現在這些發見雖則印證了許多最近的事實，我可以把它們發表了，可是，這時候，我又不得不略略謹慎，不讓供給情報的這些人的本來面目洩露出去。因為他們這方面的愛國行動，現在已成納粹戰勝者方面的真大叛逆——正維其如是，我這些情報的供給者才顯得更見重要與更加可靠。

創造一個歐洲國家的好夢，已被殘酷的現實粉碎了。戰爭，恐怖，奴役，饑荒，把舊大陸的大部分治為一廢。餘下的邊遠地方，也都被共同痛苦的狂瀾吞噬，他們唯一淒涼的命運，也被同一德國的密警察握著。現在，他們與法國人，荷蘭人，捷克人，塞爾維亞人，以及挪威人，有什麼兩樣？

有史以來，從沒看見過這麼少的人可給這麼多的人以如是之痛苦者。這本書，就獻給那痛苦的多數人吧。

一、希特勒的祕密武器

一九四一年六月廿二日，希特勒向世人揭開了遮蔽他那可怕的「祕密武器」的布幕。善於使用詭辯以消沉敵人士氣的戈培爾博士，有一次這麼寫着：「等我們的祕密武器一旦使用時，全世界必然震駭。」但是，事實上，當這大祕密揭穿的那一霎那，博士的話只應驗了一半：全世界都很詫異，然而全世界都沒有絲恐懼的表示。

好些年來，這「祕密武器」的性質如何，納粹讓全世界拚命去亂猜；是一種可以吸引一切船隻沉到海底的磁礦嗎？是在遙遠地方以科學方法控制飛機的夢想被實現了嗎？還是發明了一種能够浮水的坦克車，可以像一次空前奇妙的賽船般，把進攻的坦克部隊 (Panzer Forces) 載渡過英吉利海峽？這些猜想，是報章雜誌上所見到比較近人情的幾種。

但是，我心目中的所謂祕密武器——不是一種因恐懼而想像出來的怪物，而是接近希特勒的內層人物所計擬的實際行動計劃——即是今年夏季的第一天早晨四點鐘時由希特勒的坦克師團發動的德蘇戰爭。請記住，那天是一個禮拜日。兩年以來，貝德斯伽登 (Berchtesgaden) 的空氣尚未成熟，這位元首始終小心翼翼地這心顛攔置一邊。一九四一年初，他告訴南斯拉夫的保羅親王說：「我現正準備和荷蘭

塞維克作戰，必要時將在今年夏季動手，這戰爭將成爲我一生事業的頂點。這戰爭可以結束我對英國的戰爭，也可以變更美國人的態度。」

保羅親王的左右，大致都是些白俄，他們雖則一致公開憎恨蘇維埃，但其中有一個却認爲他們的故鄉若果變成這麼一個戰場，恐會有些受不了，他把這話和人談論。於是，保羅親王由貝德斯伽登回到他那伯爾格萊德 (Belgrade) 附近的「白宮」(White House) 之後三天，英國政府已得知希特勒和這位南斯拉夫統治者密談的內容了。因此，在這法寶還沒有使用出來之先幾個月的時候，祕密武器對於那些它所要毀滅的人們，早已不祕密了。

又過了五個月，希特勒對保羅所說的話還不兌現。全世界人士什麼地方都注意到了，獨只沒想到這真正的突擊。這裏面，有兩種原因：一是希特勒竭力避免使用他這祕密武器，可能不用時，他總不想用，因此，他正想竭全力促成英國抗戰陣營的內部崩潰。第二，希特勒希望在未來的德蘇戰爭中，可以獲得主動的優勢，因此，他把手藏在背後，要等到那最適於攻擊的一頃間，才肯拿出來。其所以不斷誘惑英國貼服者，就是爲着想同時達成這兩個目的。

保羅親王到貝德斯伽登去過一次之後，不到幾個禮拜，就逃亡到希臘去了。正在這時候，希特勒在他那著名的貝爾哥夫堡 (Bergof Castle) 內與他的智囊團商議着坦克師團下次應該放到什麼地方去的問題。

那一天——一九四一年三月卅日——希特勒元首聽到些極不好的消息，他的全軍總司令，強悍的季特爾 (F. M. W. Keitel) 告訴他的。季特爾說了些什麼，大概不外如此：德國參謀本部對目前局勢，經一度極小心，極努力的審視後，得到一個結論，認為在一九四一年或任何其他預定的日期內攻下英倫三島，沒有絕對把握。

當時希特勒是否因這突如其來的打擊而惹發他那有名的瘋病，或竟栽倒到地下去，傳出這次會議情形的某外交關係方面可并不曾提及。但是，如果希特勒真因這一句話的刺激而竟昏厥了過去時，那麼，使他神志恢復的，一定是里賓特羅甫，他的「俾士麥」。這位德國外交部長在這會談中插入了一段緊要的樂觀註解。他說，據他的情報工作人員報告，英國人民對於德國飛機的襲擊，已經感覺厭倦，他們再支持不了幾時。邱吉爾的人望一天不如一天，他的政府只是一羣不識時務的廢物之結合而已。英國國內，相信這位江河日下的政治家還能撐持幾時的，簡直沒幾個人。他的情報人員還說，沒有人相信戰事可以獲勝。大西洋的海戰，每週要打沉萬千噸船隻，糧食的限制，苦壞了一般婦孺的肚皮，而鄉土觀念之濃厚，復使他們絕沒有進攻大陸的可能。里賓特羅甫告訴他的同僚，英國人祈求一個「協定和平」的聲浪，越來越有力，越來越快要變成一種普遍的要求了。他還說，這個消息，已由佛朗哥的就英大使亞爾巴公爵 (D. of Alba) 向瑪德里所作的報告內完全證實。亞爾巴是一個善於攢營的人物，消息極為靈通。里賓特羅甫引用了亞爾巴的結論，說是我們需要以一次極大的努力尋求一次輝煌的勝利，因為德國將派

又捧上台，好跟他們重來一個慕尼黑會議。

里賓特洛甫說了很久，說得很響。他宣布將勃的會議中佔了上風。再略為經過一些討論，事情便算決定了。作戰計劃早就商酌好了的，於是，犧牲品名單上又添入了巴爾幹諸國。

貝德斯伽會談的消息，透露到一班藉自己地位在柏林商場上活動的外交界與身乘雲去了，第二天，便馬上在柏林的證券交易市場普遍地流行起來。狂熱的買進者和拋出者——並不是那班常因失算或消息不靈而受寒的生手——面上都露出得意的微笑。一般說來，新的攻勢如在海上，那才是他們嘛。這一次，他們重新燃起一線希望，期待着納粹的行動。這是最後的一次，他們真正感覺興趣的唯一的一次。

約莫一個禮拜之後，李斯德 (F. M. V. List) 的精兵突破了南斯拉夫那「圍若金湯」的山地，薩維尼加埠 (Saveljka) 被迫而「歡迎」這些鵝步式步兵的禍已洪流。然而，在納粹的觀望之下，巴爾幹戰爭不過只是為達成某一個目的的一種手段而已，里賓特洛甫又從魏德軍得到一個消息，說是當南斯拉夫軍隊還沒來得及完全撤退，正分成許多小股的時候，英希聯軍早已伏伏以待地被壓迫到歷史上有名的塞木披挪關 (Pass Of Thermopylae) 去了。這個消息，是那位體大不足，而對英行餘的西班牙外交部長孫納 (S. Suner) 發出的，給予納粹另一個可以不使用「秘密武器」的希望。

孫納忠實地報告說，英國一個極重要的大商人最近會到瑪德里來。他慎重地向納粹建議，叫他們在

同時候，一箇同等重要的密使到西班牙首都來，以便商討一切關於和平的重要條件。

對於納許諸領袖間複雜的人事關係，希特勒投以一種有趣的看法。他的選擇落到副總裁赫斯（R. Hess）身上，他相信赫斯對那位英國人所能供給與所要取得的，決不會錦上添花地故意誇大或甚過其辭。他相信赫斯和佛朗哥及孫納談話時，決不會把一些關於他自己的惡意笑話傳播出去。他的其他一般同志，大都喜歡把這些事鬼鬼祟祟地告訴那些愛聽的外國外交官。

於是，赫斯四月裏到瑪德里去。他的行動極端祕密。但是，當他到達那陰森的，百孔千瘡的西班牙首都沒多時，這事情也就根本沒有什麼祕密了。老實說一句，所有法西斯獨裁制度對於那些他們在外表上認為會守祕密的人，簡直絲毫沒有認識清楚。柏林的內層工作不難打聽，羅馬的尤其容易，我有一個朋友，在瑪德里作一家英國報紙的代表人，他寫信給我說：「這裏的問題不在怕得不着材料，材料俯拾即得，問題是這些材料的大部分你都沒有法子發表，因為縱使你敢提到『佛朗哥』三個字，但恐怕你還不會說出口時，你自己早就被趕出境去了。」

希特勒的漂亮代表見到了佛朗哥與孫納，但是沒有見到他們給他約定的那個英國大商人。其中原因為什麼，雖弄不大清白，但事實上千真萬確的，也許是英國政府不肯發給他這趟行程的護照，也許他自己臨時變更了主意赫斯也沒有能夠見到賀爾爵士（Sir S. Hoare）這是他要見的另一目標。外國通訊記者間流行着一種說法，說是孫納想邀集這麼一次祕密談話，但是英國大使拒絕了。

赫斯妙手空空地回來了。他回來正是時候，協同希特勒元首到亞可羅波（Agora）去作了一次儀式上的巡視，并看到戈林如何地着他那大肚子在佔領後的雅典街上擺來擺去。這的確是四月份中納粹軍隊所獲得的一次重大勝利。除絕無僅有的——一個直布羅陀外，英國在大陸上的最後一個立足點也放棄了。又是兩個國家被併進了納粹的「生存空間」并且，墨索利尼以希特勒的原始同盟自任，企圖以極小代價換取極大權利而弄成的一個下不了台的局面，現在也被解救了。

但是英國人民比較固執，難處就在這裏，「他們」對這重大勝利，這里賓特萊甫和亞爾巴公爵所謂的「再來一次」，竟沒有半點表示。英國的輿情，好像很可以從一班廣大的平民身上看得出來，他們認為下次須得慎重將事，慎重多多。而所謂下次，是很少有幾分當然性的，綏靖派也斷乎無力動搖這大眾的公決。

戰事已綿延差不多二十個月之久，就希特勒的願望和德國人民的觀感而言，這實在是太久了。柏林的祝捷遊行——其他許多大都市完全不會作此打算——說也可憐，竟是強迫參加。戈培爾想激起國人的熱情，想到處發動同樣的祝捷遊行，但都無成效。「這戰爭還要多久才會了結？」這壓一個單簡而痛心的問題，戈培爾竟毫無法子回答。在這種情形之下，巴爾幹戰爭得到一個適得其反的結果，即不但沒摧毀得了英國人民的士氣，倒反而巧妙地中傷了德國人民自己士氣。德國軍隊得勝愈多、德國去食這些勝利之果之期愈遠。在大多數德國人民的意思，作戰的主要動機只是爲了怕失敗，怕再來一個凡爾塞和約

，並不是僅僅於一個有聲有色的勝利景象。因此原故，納粹宣傳家喊出了與西方國家結一報復性和約的狂妄口號。

自是，希特勒空前地感到時間鞭撻的痛苦，他在這幾年中居着領先的地位，但是終點在那裏，却還渺不可期。法國出一班無氣節的老頭子手裏斷送，到現在已近一年，戈林聲稱把英國皇家空軍趕出天空，也已九個月了。無疑的，戰爭打得太久了。

這些意外的事件，逼得希特勒非使用他的「秘密武器」不可了。時機已經來到。希特勒的論調是很顯明的：英國人民的精神如不能被接一連二的軍事敗績擊潰，反轉來，必可被一種和緩的姿態擊潰，希特勒決計展緩向英倫三島的進攻，他準備向英國提供一個引兵東向攻蘇的保證。想像中的擊敗紅軍既是一件極其輕而易舉，不需多少時日的事，那麼，這自然只好算是一點小小的讓步，或僅是一個引魚上釣的餌了。希特勒以為英國的領袖們定會裏抓住它的。因為八年以來，根據有紀錄的事實，他從這個國家的統治階級看到那個國家的統治階級，結果發現他們憎恨共產主義的心理比愛國的心理還要來得強烈。因此，他希望這種現象重演。既然一切都已失敗，便只好孤注一擲，使出了這最後的一着棋——「秘密武器」。

納粹領袖們認定，應該讓英國政府知道德國現正爲新戰略上的大轉變向英國打着招呼。但是，要使倫敦眼光中的人士相信他們組合違反其第二十二軍的邊城，須得有一種動人的，出人意外的，冒險的

，或是旁的什麼的行動才好。一方面，從過去的經驗言，尋常的外交方式還是需要。他方面，一種過於平淡無奇的程序又恐引起一種反感來，即以爲一九四一年之納粹與一九三八和一九三九年時同樣不可信任。爲要使英國人吞下與上次慕尼黑會議同一性質的釣餌起見，納粹把這件事故意弄得飄忽不定，離題很遠。結果，他們把它一攪兒拋在蘇俄爾了。

關於赫斯飛到英國去作「和平使者」，同時作爲希特勒的誠意之抵押品這回事，柏林一般證券交易市場大都認爲是出自里賓特洛甫多敏騰動的主意，但我們認爲是出自戈培爾博士那會想的心眼。至少，據一個也可算是我的朋友的瑞典參議員爲信譽訴說，也應該是出自當今歐洲最重要的密議場所斯德哥爾摩(Stockholm)政界內某人物的意思。

當全世界人士聽到五月十二日希特勒元首的副總裁赫斯在蘇格蘭韋爾頓公爵(Duke of Hamilton)田莊上空從一架着火傾覆的米式機雲跳下來的驚人消息時，那種神情果然不出納粹所料。第一個反響是惶恐，德國惶恐，英國惶恐，全世界各地都感到惶恐。假如希特勒的終結目的就在要造成一個最大的惶恐，那嗎，他確已成功了。英國人民最大的惶恐，是不知他們應如何處置這天外飛來的禮物，和這禮物究竟能給他們些什麼。

英國政府立即受到混淆和當的壓迫。但關於這些，報紙上只能看得出極小一部份。因爲隨後幾個禮拜中，新聞檢查工作做得非常出色，非常得力，連新聞記者熱烈的抗議也都被檢查掉了。下面是我一

個朋友，一個非常有力的重要的工黨議員，寫給我的信，告知我赫斯抵英時的初步情況：

「當我接到赫斯抵英的消息時，首先我簡直不敢相信。可是，不多幾時，我們眼見一班緩步慢慢地從他們的洞裏——或者說得時髦一點，從他的空襲避難所裏，爬了出來。你可以看得出那神態比平常分外來得從容不迫。他們把他們最大的大袍對準着政府。有人聽說赫斯建議中所含的善意，遠出我們始料之外。好，不讓你瞎猜了吧。下面是我們本國一位大臣所告訴我的提議內容：希特勒說他保證大英帝國領土及其他各方面的完整，要我們跟他訂一個軍事同盟。交換條件是他答允以蘇聯為對象發動一個戰爭。這可謂是他的大智至勇了，不是嗎？」

「從我們這位大臣那裏，我又得知建議中還有納粹準備在大陸上建立的新秩序之全盤計劃。那裏邊關於各國疆域的調整，是你任做何惡夢都不會想到的。

「對於赫斯此行成功的成分，我全不低估。慕尼黑會議的機器，又在這方面大肆活動了。你認識的那個菲力摩爾勳爵（Lord Phillimore），像時鐘上的指針一樣，在政府要員中不停地兜着圈子，他真不辭辛勞呀，古爾西（K. unath de Courcy）在會議中也同樣忙碌。克拉斯（Ronald Cross）也正是在爲這事竭盡心力。他因爲拚命反對某些與斯大林的妥協，被邱吉爾派到澳洲去了。

「昨天我在議會裏偶然聽到兩個頂令人討厭的保守黨員在談天，他們說，儘管有人隨即跟藉罵他們不對，他們認爲赫斯之飛英畢竟是一種天才的指使。他們相信他必定會成功。其實我倒并不作爲是這

。綏靖派還有一個困難，他何得先想法子去掉邱吉爾。因此，我知道，此時國會舉行總選，一定很危險，所以我們還是預備派一個發言人去出席國會，對這件事情加以說明。

「這裏最好的是士氣，現在還在『上漲』。

後來，倫敦方面的報告說得很明白，說是這顆冒烟的「燃燒彈」——倫敦人士對赫斯此行後來都這麼稱呼——頗不容易撲滅。變本加厲地，納粹統帥部為助成赫斯匹馬單槍的攻擊起見，下令從空中進襲一個島嶼。赫斯降落蘇格蘭之第八天，克里特島（Crete）戰事發生。又是一次，僅為達到某種目的的一個手段而已。這個目的就是英國人民的士氣。

無疑的，這個發生革命與反革命事件之多世罕其匹的克里特古島，在戰略上是有其極端重要性的。它是進攻塞浦路斯（Cyprus）的跳板。距利比亞戰場僅二百五十英里，距亞力山大利亞大海軍根據地三百四十英里距蘇伊士運河五百五十英里。一言以蔽之，它是東地中海作戰時一個極重要的基地。雖然，儘管克里特島在戰略上之地位有如此之重要，但我以為納粹統帥部下令攻下它來的主要目的却不在此，而在以下兩點：一是證明進攻一個島嶼是德國武力之所能及。二是看這個表演是否能使另一個島嶼——英格蘭——軟化。赫斯的提議是這種作風的一面，德國飛機之證明一個島嶼可被摧毀是又其一方面。這一來，就到了一種「禍福唯君自擇」的局面。

那一天，納粹統帥部大概在克里特島展出了它最高的本領。五月二十日，數百架飛機從平靜的藍空

橋下，對英布守軍爲防禦海空襲擊而築的壕塹大施狂炸。四小時的時間，這些斯脫卡式俯衝轟炸機把壕中的守軍一砲吞進了它們的肚子。同時，鉅大的容克式運輸機，把他們那些死人般的活貨色卸了下來。容克機一來就是三架，每架降落三十名傘兵。用降落傘落下來官兵，都有着特殊的標記，好讓他們自己己的人知道怎樣接近。

着陸後三分鐘，這些降落傘部隊便已在戰鬥地位。就在進攻之第一天一日之內，納粹軍隊在克羅斯島着陸者達五千人。及至第十二日，該島已全歸納粹所有，英國地中海艦隊損失甚重，載運着一萬六千皇家軍隊敗退埃及，又一個戰爭失敗了，「成功的撤退」第三度成爲英國用以解嘲的字眼。

我曾經說過，這是一個深刻的表演。可是，美中不足，它還是沒有達成他的真正目的：摧毀英國的士氣。自然怨謗是在所不免，但都平靜地對付過去了。英國政府決計花上幾個不快樂的鐘頭，去應付下議院的辯論。這是首相主張的，他認爲這是給那嚴重的公憤一個發洩的機會把他把他的全部的口才拿了出來，誠爲溫特敦伯爵（Earl Winchester）所云，他這強口才是一「熱帶林莽般的豐富而漂亮的野合」。但是，政府始終不會遭遇任何嚴重的危機。

羅斯福總統的憶述聞話，不僅祇解了邱吉爾政府的危。聞話的結論說，「以必需的物資供給英國，是我們義不容辭的責任。這種責任，可以做到，必須做到，而且馬上就會做到。」這比赫斯提出的允可還要來得強而有力。五月二十九日，這句談話發表後，納粹知道他們在里克特之戰得了一次很重要的勝

，在計算取安協之戰却失了一次更重要的戰。

六月一日，克里特三個字加入了業已够長的納粹佔領土地表。全世界又一度驚異。會接濟進攻埃及嗎？從里比亞那邊去？還是經過敘利亞（Syria）與勒巴隆（Lebanon）呢？莫不是那等候已久的進攻英倫三島吧？不然，是什麼呢？

一個都不對。希特勒宣佈了他的「祕密武器」。兩百多萬德軍於六月二十二日開始向蘇聯作違背道義的攻擊。這是希特勒為求獲得一個比慕尼黑會議更大的收獲所付的更大價格。全世界惴惴不安地問道：希特勒的祕密武器會成功嗎？

二、阿道夫·希特勒：主宰還是工具？

一九二二年十月，我在哥堡（Coburg）目親過一次「德國日」（German Day）的慶祝典禮。哥堡位於德國南部的中央，是一個中古式的城市。當我跨下火車時，驀地一具死屍觸入我的眼簾——這慘像在我確係第一遭看見。那死屍被安放在一架舂床上，四週靜寂地環繞着人羣，一個年青的女孩子在哭叫着；這是我第一次接觸到納粹瘴惡的面目。

一小時以前，幾千個納粹黨徒由希特勒率領着乘坐特備的專車蒞臨哥堡，來參加他們所謂的「德國日」。他們全副武裝，所攜武器，係由希特勒的侍衛長，慕尼黑國防軍指揮部參謀官魯姆隊長特別自陸軍軍需庫撥發的。當整隊入城時，他們先擊散了社會主義派及共產主義派工人所聯合組成的反示威運動。這些工人並未武裝，經過一場激烈衝突後，即為暴力所懾服，傷亡甚重。

我第一次聽希特勒演講，即是在哥堡。他走在一羣制服整齊，跨着鵝步，面容冷肅的褐衫黨徒前面，威風凜凜地邁入會場。然而，歡迎的掌聲卻並不熱烈，原因是在場的聽衆多半屬於德國其他國家主義的黨派，同情納粹的，顯僅佔極少數。

但是當希特勒開始演說時，聽衆原有的態度突為之一變。你立即可以感覺到一般中層階級的聽衆業

已爲他抓住。幾分鐘後，聽衆愈趨緊張，心神貫注地聆取希特勒滔滔不絕一再重覆的演說。希特勒對於在場的聽衆，好像有一種特殊的懾服魔力，聽衆都不禁甘願任其支配。當希特勒對德國上次戰敗表示哀悼時，聽衆也深深地感覺得無限的傷痛；當希特勒咒恨和議條款時，聽衆對凡爾賽和約的忿火，亦驟然湧上心頭。希特勒咆哮着說：「在那光榮的戰場上，德國的軍隊是並未被敵人打敗的，完全是受了後方布爾塞維克黨人及猶太人的中傷！」聽衆立即報以春雷般的彩聲。

他攻擊左派時，依舊用那麼一套陳腐得發霉的技倆，硬用直接的口吻攻擊對方，一若本人真個已在台上一般。接着，又爲對方自作答案。他允許對方也可提出答辯，這一點頗予聽衆以良好印象。

大多數聽衆都是已到了山窮水盡之境的，通貨膨脹吞噬了他們小額的存款，前途愈顯着黯淡，他們都想從絕望中尋出解脫苦難的途徑。希特勒告訴他們說，僅有一條路可走，那就是德意志國家的榮譽必須恢復。所有「十一月罪犯」(November Criminals)即一九一八年的革命者)概須驅逐出境。要這麼幹，德國的權勢，秩序與紀律，方可望重振，德國必須再成爲一個強國。國家的準備金，亦須穩定。他把德國的將來，描繪成一幅美麗絕倫的理想圖畫。聽衆聞之，都覺得確與「舊日的黃金時代」無異。希特勒就這樣地安慰了他們的懷舊病。因爲他們差不多都有一個瘋狂的感覺，即認爲過去是光榮的，而目前不像話的局勢必須立即採用某種激烈手段，以資挽救。在他們看來，過去同將來簡直是一回事。希特勒的所謂「民族革命」，很像他們擺在抽屜裏的一本舊家庭貼照簿一樣，翻開來看看以前的，他們會想

着他們是在向前進展。

希特勒演說時，措辭極爲簡單明瞭，他們都很容易聽懂。緊靠在我身旁的一位，會這樣地向我說：「好一個演說家呀，他是一個代表我們說話的，你有此感覺嗎？」

希特勒在從事爭取政權的那些年頭，所不斷遇到的聽衆，大多都是這些中層階級。我後來又聽過他的演說好幾次，但每次參加時，聽衆當中的工人，從未佔過較爲優越的數字。就我個人的觀察，以及目後由各方可靠的報告中所得，希特勒在中層階級中所鼓起的熱情，迄至今日，仍未能在德國工人階級中鼓起一絲一毫。

我感覺得有點茫然。瞧着希特勒，那一個約莫五呎五吋光景高的矮小個兒，我真感覺被刺激得很利害，的確有幾分惱怒。他的一舉一動，處處令人感覺不快，他的姿態，要算是人類中最醜惡的一種了。兩旁所蓄的短髭，活像一個土老。面孔異常粗鄙不堪，薄薄的兩片嘴唇，顯露着毒辣。手足常不知所措，老想掩飾他那笨拙隔膜，令人嗤笑的手勢。粗厲的吼聲，逼得我的神經漲痛。這般模樣，活像一隻大火腿。這樣的人物，還能有所作爲嗎？我不敢斷言，決不會的。

會開畢後，我同那身材肥矮，鼻子很高，雙目眼瞶的保加利亞遜二非迪南(BORIS FIDIN)談話，他正坐在那裏坐着，很起勁的在聆取希特勒的演詞，他很客氣的告訴我：「這是我生平所見的一次最精彩的演說，這種演說在當時，見於柏林，我可不敢斷言了！」

當我靜聽希特勒演說時，回憶漸漸湧上了心頭，好像以前曾經一度見過這景像似的。似乎是好久以前的事了，究竟在那裏呢？會畢好幾個鐘頭以後，這問題依然縈迴在我的腦際，百思莫解。最後，我終於恍然憶起了——「喬治勳爵」(Knight George)，是的，「喬治勳爵」！

奧大利的喬治。夏勒納(George Ritter Yoh Schaenerer)勳爵，無疑地是希特勒在政治上的老祖宗。夏勒納的父親是一個著名的工程師，會督奧大利建築了一條爬山鐵道，為奧國鉅觀，奧皇因此封他為勳爵。喬治後來因領導搗亂毀壞維也納的一家大報館——新維也納日報(Neue Wiener Presse)——的緣故，致被褫奪爵位。這些暴徒甚至連辦事的女職員也不饒放。夏勒納後來且公然在法庭上對女人大肆詆毀謂：「猶太女人所犯的罪惡，並不亞於猶太男子！」

他組織一個奧國「大日耳曼黨」(Pan German Party)，並自任領袖。其主要目的在將奧大利各省「歸返」德國。這個黨的性質完全是反猶太，反社會主義，反天主教，和反哈布斯堡(Habsburg)皇族的。夏勒納對天主教異常憎恨，他卒致毅然脫離羅馬教會，甘願作一新教徒。他無論參加任何議會，或發表演說，各報章一定以首頁刊出消息。他的部下將所有社會主義派舉辦的報紙和勞工協會辦事處的門窗搗毀殆盡。在大街上專和猶太人尋釁，甚至將之毆辱。好幾年來，各報章關於夏勒納集會的登載，均係以「受傷人數，刻尚未悉」等字樣作為結語。

夏勒納的幹部，完全係由中下層階級中選拔出來的。奧大利一般小市民皆受平民，對社會主義勃起

的高潮，異常驚畏，都紛紛向德國尋求庇護。俾士麥是他們最理想的崇拜者，發揚德國的武功，是他們多年所做的迷夢。他們輕蔑奧匈帝國的斯拉夫人種，盲目地追隨他們的領袖。一個現代作家曾這樣地寫著：「像這樣一個教育程度，稟賦德性均不較常人為高的人，除掉怪僻的性格外，一點政治才幹也沒有，居然也能號召羣衆，儼然基督教世主一般地在社會上充當重要角色，這儘可算是一件奇蹟！」

夏勒納所妄倡的若干口號，納粹後來一概竊為己有，並藉之以大肆狂吠。「不論受了浸禮沒有，反正他們的種族是够恥辱的。」（OB. Getauft oder Ungetauft ist Einnahme in Der Rasse Liegt die Schweienerei）夏勒納認為他這句話是天經地義的。他毀謗猶太人，痛罵他們為「卑污的剝削平民之人」，且更把促成社會上一切不平等現象的罪過都推諉到他們身上去。他說：「猶太人的血統、種族、遺傳、民族道德等，都與我們不同，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他對天主教徒也肆口痛罵：「羅馬教會真是暗無天日，教士慣用麻醉欺騙手段！條頓民族會看不清嗎？」他甚至大聲疾呼：「脫離羅馬吧！」

夏勒納這種運動裏面，也有其戈培爾式的人物，那就是那位天賦甚厚，多感易怒的奧大利代表華爾夫（Karl Hermann Woll）。華爾夫和希特勒的宣傳部長一般。有良好的演說天才，可惜有一樣不好，就是太過於沉溺情場，豔遇太多了。這人身體上有一個大缺憾，即兩隻腿一長一短。

一件醜事結果了華爾夫的政治生活。那就是在一個「大日耳曼」黨代表的婚典上，他發表了一篇演說，其中肆無忌憚地痛斥猶太人及社會黨人的罪惡，並且將一條頓民族的清白及新娘如何貞潔一筆與猶

夫人比照。可是，就在當晚，那新郎即把新婦休了，原因是他發覺新娘的「一條頤族美德」早在結婚之前喪失在另一個男子手裏了，其人非他，即正是這位華爾夫先生。這件醜事馬上影揚全奧大利，一時傳為笑柄，就樣一來，華爾夫就被擯出了政治舞台。

希特勒第一次聽夏勒納的演說，大約在十四歲時。他聽畢回家，興奮到了極點，他的母親還以為他是喝醉了酒，事後還趕着向隣居說道：「我先還害怕他會像他父親一樣，要變成一個酒鬼，後來待發覺原來是因聽演說受刺激過度，纔如釋重負，放下心上一塊石頭！」

從夏勒納那兒，希特勒聽到了一些關於他自己家庭的模糊往事。他的父親阿洛亞，希特勒（Alois Hitler），早年是一個補鞋匠，後來靠了妻子的幫助，在海關當一名關員。阿洛亞當差曉得補鞋是一種下賤的職業，所以一經做了關員，在搜查頭等旅客行李時，也就自然而然的感覺得自己有無限威風，儼然有若何大權在握一般。因此他深恐自己社會地位失去，卒致弄得朝夕惶懼，惴惴不安。希特勒後來在他那本「我的奮鬥」中，也曾這麼寫過：「剛剛能由血汗生活上這樣一個社會階層，自然害怕重返原況，因原來階級太容易被人賤視，故即被人誤列入那一流，也是極不願意的」。他父親這種恐懼心理，早就深入了他的腦中。因此他對夏勒納的猛烈攻擊勞動階級，自然是非常感激的。他常常說：那些勞動階級，「除想在禮拜六痛飲一場外，其餘什麼也不要了。」

他父親告訴他，他的家庭是出身貴族。因為依那時一般奧大利小布爾喬亞的想法，奧匈帝國的新拉

夫人種，是最卑劣的民族，捷克人也只够充當看門人或廚子；波蘭人，大半是醉醺醺的酒徒；哥羅西亞（Croat）族的牧人，受了塞爾維亞叛徒的煽惑，奧匈帝國自然會有與這些叛徒算總帳的一日。夏勒納肆無忌憚地這樣狂吠着，他認爲「大日耳曼主義」非粉碎「大斯拉夫主義不可」。我認爲希特勒現在對斯拉夫人種的態度，較之舊日自己少年時代受夏勒納的麻醉時並沒有多大變異。

他父親很願意這孩子將來做做政府官吏，可是希特勒却醉心要學油畫，他毅然違背了他父親的期望，表面上假意和緩，骨子裏態度却極倔強。從他青年時代看，希特勒對於掌握時機確具超羣不凡的才力，他無時不在追求個人的理想。

希特勒的母親頭腦很簡單，是一個居心仁厚的女人。她的臉長長的，兩眼明慧，非常富於表情，頭髮棕黃色，和她的兒子一樣。她比她丈夫小二十三歲，一切都是受他丈夫的支配。納粹從來對女人所喊的「KK口號（Kinder, Küche, Kirche），即「孩子，廚房，教堂」，老早就在他家裏實行起來了。

希特勒十三歲時，他的父親因酗酒過甚而與世長辭了。

卡爾梅（Kar. May）這個人雖會寫了六十二部關於旅行及冒險的書籍，可是實際上他在不講德語的民族中，並不有名。可是近五六十年來，他对于煽惑萬千德國青年的着迷，確具有很大的力量，而希特勒也是其中一個。這些青年，上課時偷偷地避開教師的眼光，在抽桌下將卡爾梅所寫的小說分散傳觀，

所以自入本世紀以來，他的聲譽就一直有目前這麼大。

給小孩子們冒險的心理，帶着他的讀者走遍了半個世界，從美洲草原起，經過南美各熱帶國家，小亞細亞各沙漠區域，一直到巴爾幹半島各國。自然事實上並沒有一個這麼的真正世界，這不過是一種無甚價值的臆想世界罷了。但在這個世界中，有行動，有戰爭，有戲曲，有悲劇，有道德，也有罪惡。其中當現的主角，是一個英雄，當然，那英雄是一個日耳曼。那英雄的騎術，鎗法，與拳技，都舉世無敵。他是一位閃擊戰士，他攻擊他的敵人時，有如閃電，他能取得最後的勝利。他有一種「祕密武器」，那是一枝精巧的來福槍。他的儀表，很魁偉，顯示着高貴的氣態。書中每過五十面的樣子，即把他描寫得瀕於死地，但又說他幸而利用自己的機智敏捷，逃出敵人手掌。他是一個秀外慧中，引人愛慕的敵人。

這位英雄在敵人營壘中密佈着第五縱隊，他們在敵人各階層中製造恐慌，並刺探祕密計劃。這英雄在美洲大陸上被叫做「老搗亂者」(Old Shatterhand)，他毫無忌憚地以全力搗亂他的敵人，他保護着印第安人，以防其受狂暴的美國人及油滑的英國人的侵害。英勇的印第安酋長溫列社(Winnatca)，是他的盟友。在南美洲，他也幫助土人抵抗外族。

在阿拉伯，英雄的名字叫做克拉彭。奈姆賽(Karalen Nemsi)意謂日耳曼後裔查理士(Charles the Son of the German)阿拉伯人都以這個名字稱呼我們書中的英雄，作者解釋着說，因為對於他們，日耳曼的一切都是美麗的。這位英雄在那兒幫助阿拉伯人抵抗英國壓迫者，英國暴政的代表們，都

永遠攜着一把雨傘。他有一個阿拉伯人幫手，名叫哈吉·哈萊夫·俄瑪，彭·哈吉·亞伯德·亞巴斯，伊本·哈吉·戴澤德·俄爾·嘉撒拉（Izzidin Hafet Omar, ben Hadji Abdul Abas, Izz Hadji Da'ud el Gossari）——這是多麼長的一個名字，可是德國青年欲認為不將這個名字完全記牢是一件可羞恥的事。這個小夥子，年紀很輕，但身體頗肥胖。罪惡滔天的猶太人，則以一個「腐爛了的」猶太女人來代表，這女人名叫「鬼怪般的猶地斯·賽帕斯婷」（Judith Siberstein）。

卡爾梅對於少年德帝國主義在光天化日之下所做的迷夢，諸如領土的力圖擴張，對巴爾幹半島的莫大野心，及謀建一條柏林至巴格達（Berlin）的鐵道等等，都繪聲繪影地描寫得極為詳細。他的小說深入德國少年的心坎，鼓動他們垂涎其他各洲，因為廣漠的世界上，正有無數的寶藏在期待着人們去掠奪。

年青的希特勒，也受這些小說很大的影響。他自己曾這麼說過：「當我讀梅氏的書時，我對日耳曼族在世界上的使命，更深切的了解了，德意志對整個宇宙究應有何貢獻，恐沒有人比梅氏更能向德國青年指點得再明白的了。」

有人拿卡爾·梅去比擬麥思·格雷（Zane Grey）和汎里摩·古柏（James Fenimore Cooper），可是均不甚得體。梅那些光榮的生動的作品，其背景大都是德國以外的地方。他曾一度這麼說過：「我們的祖國領土確不狹小，我非要跑向廣闊的世界中，去寫一部冒險紀實不可。」

梅於一九一零年逝世，他死後不久，在慕尼黑某審判案中，他過去的假面具被戳穿了：他原是一個大騙子，過去曾犯過很多案。據他說他寫作之步確曾冒過他自己書中所述那種危險，但事實上則恰恰相反，他之去到美洲、非洲、及小亞細亞，係在他的小說業已享受盛名，獲得大量酬金，足夠他在旅途中狂花亂用之後的事情，梅氏年青時曾因盜案而被捕入獄，被罰作苦役。他又曾冒充哲學博士，事實上他從未獲得過這種學位。他在開始從事文字生涯時，不過寫些毫無意識的猥褻東西罷了。他在德雷斯登（Dresden）附近住宅中所滿貯着由旅行中擄來的「光榮勝利紀念品」，也都是自珠寶店裏偷來的。

梅氏自己和他的朋友，都說他是遭受猶太人迫害的犧牲者。因此無怪希特勒在戰後得知這個消息時，決心將他捧成德國最受愛戴的作家。他馬上請人搜集梅氏的作品。時至今日，梅氏遺作的洋洋五編，還赫然擺在希特勒貝科夫（Berghof）堡內一間名叫「老揭亂者的聖所」的小房子裏，希特勒每次演說論及德國藝術，總是將梅極力頌揚一番，並且將他崇為納粹萬聖堂（Valhalla）（納粹供奉烈士之所）——譯註）中一般精通文學之神祇的先導。

在希特勒尚未對梅氏表示愛戴以前，搜集梅的作品最完備的是漢諾威（Hannover）的大暗殺家哈爾曼（Kaarmann），這種情形說來真有點奇怪。哈爾曼數十年來一直是德國著名的暗殺家，把他所殺女人的肉製成臘腸，拿出來售賣。哈爾曼於二十年代的中期被捕，警察發覺他的室內充滿梅氏作品的各種不同版本。

希特勒二三歲時，在林茲(Linz)得見華格納(Wagner 1813-1883)所著的「天鵝武士」(Lothengrin)。

印象極深。他在「我的奮鬥」中也說：「閱後不禁心為嚮往！」所以自後他對華格納簡直佩服得五體投地。

華格納書中所意識的古代日耳曼社會及其神祕色彩，大大地影響了希特勒，他認為那時的天神、英雄等，雖係「古代日耳曼人生活，鬥爭，及創造的方式」的表徵。國家至上主義 (Hypernationalism) 的種子，至是也在他的心中逐漸萌芽。從華格納書中所寫的英雄事業中，他茁長了無限的熱情與力量。所以當後來爬上政治舞台時，每遇演說，輒引證華格納的歌劇，以自圓其說。

華格納書中所描寫的人物中有個齊格菲 (Siegfried) 是齊格孟 (Sigmund) 的兒子，曾與其妹齊格琳 (Sieglinde) 犯私通亂倫之罪。希特勒謂這可為日耳曼族的象徵。還有個亞爾伯里克 (Alberich)，身材極矮，曾沉金於萊茵河。希特勒亦謂這可作猶太人牟利主義的象徵。還有海琴 (Hagen) 是一個叛徒，他刺殺了齊格菲。希特勒說這可象徵布爾塞維克主義。希特勒本人，欲自命為「現代的巴西法」。(Parsifal)。巴西法在歌劇中儼然「救世主」一般，所以希特勒亦自尊為「救世主」。巴西法是一個「極天真無邪的人」(Durch unsculd Wissend der reine)，所以希特勒也極飾自己，結果弄成像「瞎着」走路的人」一般。他的一切決定純出自直覺的觀點，即所謂一向使正路成為錯路的「上帝的工具」，和「清教徒」那種永不接近女人、烟、酒、和肉類的生活。他除具有巴西法的各種優點外，還有着「老搗亂者」那一手閃擊戰術。德國官方傳記編纂員現正預備把希特勒全部神話式的專斷公之

於全德國人。

有了夏勒納的大目身曼主義，反赤運動，和反猶太運動等等，再加上路倫格博士（Dr. Karl Lueger）希特勒少年時代的維也納市長——與基督教社會黨領袖狡詐奸詐的「社會煽動論」，於是便形成了今日納粹黨的全套把戲。

個體風範的路倫格，比夏勒納還要聰明，他知道如就社會煽動論而言鬥爭，社會主義必比反赤運動易於湊効。因此，他有一次說：「要想阻遏社會主義者，我們必須儘量把社會主義者的要求全部歸納到我們的計劃中去，可是不要真正去為這計劃去心焦，因為我們惟一的目的只在利用它助成我們的競選。」

「路倫格的確不會為此心焦，因為基督教社會黨徒早已遍佈於奧大利的農民與維也納一般小布爾喬亞間。路氏尤有德意志帝國法庭（Imperial Court）及政府所攻擊，但後來因得教會的維護，卒致成了哈布斯堡君主政體的主要支撐堅強的台柱。到十九世紀末葉，且被稱為奧大利最有權勢的政治家。路氏是一個極端的人道主義者，曾在各種會議席上作攻擊猶太人及社會主義者的猛烈演說。但是，他那種反猶太人的部分的機會主義，腐化心理，以及其自身出自奧國貴族階級的缘故而被殺。他說過這麼句話：『各人究竟誰是猶太人。』」

在路倫格的計劃中，這位德國元首學會了運用社會煽動論的技巧，且將其發揮到至善之境，在「我的奮鬥」中，他將提到路倫格，他作如是的論斷：「路倫格的政治活動，專注在戰勝那些生命難於延續

之各階層，並不惜多方使用一切現有暴力為工具，以求獲得各有權階層之青睞。「這短短的幾句話很能描寫出納粹大部活動的歷史。

一九三八年，希特勒的母親逝世。此後十年，他醞釀盡艱辛飽嘗過苦痛的經驗。可是困境並不足以被擯於維也納藝術專科學校，自後，即住在一間風吹雨打的破敝屋裏，度着窮困生活。在「我的奮鬥」中，他曾說：「飢餓是我的伴侶」。但這時他腦中依然縈迴着幼年時他父親所施予的教育，和夏勒納及路偉格勒等他做一個良好國民的想頭。他把他的貧困歸咎於，猶太人，勞動階級，和奧大利之離棄俾士麥的大日耳曼帝國。因此，他對於各種勞工組合，皆極痛恨。他如隨意加入一個勞工組織，原很可幫助他維持一種較好的生活，但據他那敝屋裏的那羣窮朋友屢咒發誓地說，他寧可白在工夫完成一捲捲無人過問的圖畫，然誓不加入工會。一九一二年的維也納警局檔案中，曾有希特勒犯竊盜案的紀錄，據說他當時因圖避免拘捕，遂徙居慕尼黑。（奧大利總理陶爾斐斯(Chancellor Dollfus)守護這宗希特勒犯案的紀錄，猶如至寶，他日後喪生，其原因或即在此亦未可知。一九三四年五月，我看見法國駐維也納公使關於他和陶爾斐斯談話的報告，據說陶爾斐斯大罵希特勒手下的鷹犬，說那班東西因他不肯把希特勒的案卷交出去，因而終日追蹤他。幾星期後，我又在法國外交部某高級官吏處看見一份報告，裏面說陶爾斐斯為維也納的祕密行動人員所刺殺，此事係由希特勒的副領袖赫斯(Hitler)以下道緊急命令所指使。

希特勒一事無成，非常苦惱。適值世界大戰爆發，他於非常感謝地接受了這機會，與高策烈地跑到德國南部巴維利亞（Bavaria）去投軍。在巴維利亞共和國充當聯絡兵，瘋狂地經過了四年屠殺生活，簡直昏天黑地，像夢中患離魂病一般，恍惚間胡作了一番，他回來時還這麼想着：「戰爭確是男兒最偉大的職業呀！」德國喫了敗仗，他卻一股腦推咎在勞動階層及猶太人身上。

一九一九年，他正中下懷地在慕尼黑碰上了一位招引他上政治舞台的人。在那為宣傳而寫的「我的奮鬥」裏，他說他之所以成爲一個政客，原是因為他有他自己的政見。其實事實上并非如此，他之從事政治生涯，確係由魯姆隊長的引荐。那時魯姆還在慕尼黑國防軍指揮部任蝶報官，把希特勒造成一個政治人物的就是他。

希特勒那時也不過三十歲光景，既無朋友，更無家庭，他在慕尼黑國防軍一個兵團中充當蝶報人員，其任務是專門偵察勞工階級的活動。他計算在軍中服務十二年，然後或有升爲額外軍官的希望，期終時，也許還可以要求一個文職工作幹幹，那麼一來，他父親生前所熱望於他的，不就可如願以償了嗎？可是魯姆隊長爲他計劃的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在短短三年之內，他把希特勒捧成了一個在巴維利亞及德國南部其他各地有相當黨羽的政黨的領袖，這個政黨，與德國南部其他一般所謂全國性的黨派大不相同。

在一個由魯姆講授蝶報技術的課堂裏，這兩位先生碰上了。班上有約莫九十個人的樣子，都是自募

尼黑區各兵團中抽調來的。課程內容包括政治——自然不是替拿薪水給魯姆的羣馬共和國鼓吹——與公開演講的指導。希特勒那優越的公開演說的本領，博得了魯姆的注意，極受他那人歡迎與極爲動人的表現自己的方法，與其在壇上辯論時無情的擊破其對方理論，皆使魯姆驚賞之至，而其對於凡爾賽和約，布爾塞維克主義，以及週佈全球的猶太人之痛切詆毀，尤給予這位隊長一個深刻的印象。魯姆容或沒有預料到希特勒有日後之驚人的發展，但至少對於這位微賤的羣報兵的潛能是看出的。他向指揮官愛普將軍 (General von Epp) 報告說：「我認爲已經找出了一個軍中需用的人才」。幾天後，魯姆領着特勒去見愛將軍。

以後，魯姆就專心訓練這位羣報兵。他們兩人夜夜各就所見討論德國的過去與未來，且大都是由希特勒講，而由魯姆去想。希特勒從夏勒納及路偉格那兒所接受的含糊思想，及其本身荒誕怪異的觀念，魯姆一一爲之整理，並完成其形式。他極端滿意地瞧着這個傀儡漸漸長成。

幾個月後，希特勒被派遣出外，準備將受訓中所得的知識實地施展一番。當時已有一個六人組成的團體出現，叫作「德國工人黨」(German Workers Party) 希特勒馬上加入，爲其中之第七人。那時德國中下層階級對於通貨膨脹的怨憤正極端高漲，加之共和政府當局因不能，或竟不願，讓人民享受他們事先所預言的各種生活，正大大遭怨謗。希特勒就利用這個機會，在魯姆的指導之下，採用極新穎而且極動人的宣傳方法，使一德國工人黨一獲得意外的成功。該黨在一九二一年時的一次集會，竟能吸引到八

千人參加，這在慕尼黑黨中，確是不可多得的一種成功。

這政黨後來改名「國家社會主義德國工人黨」，一方面採取攻擊凡爾賽和約，布爾塞維克主義，及猶太人的政綱。另一方面並加訂所謂「反資本主義」綱領若干條，如廢除百貨公司，及戰時利得與大地主的產業之充公等。然而，實際上，這些項目從未付諸實施。因為其原意本不過訂來作為騙騙德國工人的香餌而已。

一九二一年十一月，該黨揭示中，首次稱希特勒為「元首」（Fuehrer）。當然，希特勒早已冷酷無情地把該黨原有創始人剷到一邊去了。他創辦一家報紙，先名「慕尼黑日報」（Muenchener Beobachter），後又改為「人民觀察報」（Volkischer Beobachter）。經費由一個大實業家與國防軍共同負擔，而實則以魯姆為其後台老板。這麼一來，巴維利亞首府各河龍都可以讓希特勒參加了，他被認為政治圈中有力的人物，可直接與各部部长交談。前次世界大戰中以軍事天才著稱的魯登道夫將軍，都成了他的助手。黨員人數這時也擴充到三萬之多了。魯姆這時自認得人，深幸不會枉費他一番挾揀的苦心。可是，他大概不會想到這個成功的傀儡，將來竟會青出藍而勝于藍，而從他的手掌中滑脫。

金錢因各種不同的原因，從各種不同的來源大批地流入這個黨的財庫。顯然的，慕尼黑國防軍協助這個黨的創立，實為要挾仗它來做槍刺，來與討厭的共和政府與凡爾賽和約鬥爭。若干巴維利亞實業家之補助大宗金錢，是因為他以承認納粹是抵制布爾塞維克主義的一層堅實壁壘。慕尼黑一位狂忘厭

世的鋼琴製造廠商，會這麼問我說：「能援助資本主義者，唯有勞工，我之所以接濟希特勒的工人黨，其原因也正在此。」

在德國一切政黨中，希特勒這個黨的國家主義色彩最為濃厚，然而，却還有不少外國從旁供給它金錢。譬如法國政府，即認為納粹是一個地方性政黨，可以利用它，來僵化巴維利亞與柏林當局間的關係，因而不吝捐助。法國人並希望有那麼一天，這種情形可促使德國南部與柏林分離。油商區蒙戴特丁，(Srhauri Dering) 也因垂涎巴庫油田，乘機混入。好些美國資本家，也甘願津助納粹活動，他們希望將來在納粹的領導之下，德國可以成爲一個撲滅布爾塞維克主義的俄國的工具。迨墨索里尼在意大利，秉政後，戈林又從他那兒領得了黨的補助費。

這些由外國政府及資本家所捐助的款項，據說希特勒本人對之竟毫無所悉，這話當然很難置信。那位高個子，極漂亮的法國將軍里歇，(Richter) 戰後之初幾年中，曾在慕尼黑任上校軍官的，有一次告訴我，說法國祕密情報機關，也會以鉅額款項交付希特勒的親信心腹。一九三二年，一位法國議員在國會中提供證件，謂法國斯柯達 (Skoda) 兵工廠——其股份之大部爲席雷德，克羅梭 (Schneider-Crest) 所有——廠長亦曾以大宗捐款送交納粹主計長什華滋 (Schwarz)。是不是希特勒的左右故意把捐款的各種來源隱匿不報呢，不報於他們有什麼好處呢？

這是頗爲有趣的一件事：希特勒的事業初起之時，一方面雖被德國各報章加以嘲笑，諷罵及瓜否認

他是一個政客，但另一方面却獲得各軍事將領、國內外實業家、及各列強的關注與協助。共和黨報紙向喜喊他做「慕尼黑黑霧索里尼」。然而這「慕尼黑黑霧索里尼」却果然很快地成爲一種雖全世界最有力的人亦不能不予以相當估量的力量。魯姆花了三年心力，把這位「軍中的人才」塑成了一個全球反動勢力的總領袖人物。

魯姆是個矮胖個子，牯牛般的面孔，有一個深紅色的大疤痕。他在德國戰後歷史中，無疑地是一個有聲有色的人物。戰爭結束以後，他腦中唯一的想頭，就是爲德國的慘敗復仇。「歐洲與全世界，縱烈欲橫飛，那我們不管，我們所要的是德國的生存與自由！」這幾句話，是在他的自傳，「一個叛徒的歷史」(The Story of A Traitor)中所說的，很足以表示他一生的領導力量，他首先不過在慕尼黑作一員諜報官而已，隨後因組織企圖拯救德國的所謂「軍官團」，而在新德國陸軍中網羅「黨羽」。到一九一九年年底，他的黨羽已達一千五百以上。

他喜歡從多方面隱身幕後，操縱指使，使自己只成爲一個幕後的勢力，他有一次說：「戲弄人類是我所知道的一種最有味的玩意，但是我却不是來搗頭陣的，我願意成爲新德國的「葛蕾、伊曼倫斯(Grey Eminence) 他曾把這一套說教告訴他一個最具有好感的少年軍官，因爲魯姆原是一個犯同性愛病者。

早在一九二二年，我在慕尼黑一個出版人家中，偶然遇見過他。當時我一見就看出他是一個氣魄精

力均極強悍的人，且享受慾極高。他雖終日胡喫亂喝，但酒並不會絲毫麻醉他的思想。事實上，飲得他愈似乎多，反愈能表現他自己。他說話時所表現的聰穎多智以及詭譎多詐，適與其粗浮的外表成一絕然兩端的對比。

主人對於魯姆相當感覺興趣。魯姆走後，他又和我談起他，並且談得相當詳細。這次談話的筆錄，我最近剛剛重閱過一遍。我不禁爲魯姆之於一九一二年即能預卜到今日希特勒所謂「新秩序」的種種而驚佩。主人並告訴我，說魯姆癡寐以求的就是德國的復興，爲達成這個目的，他老要說應採取一種空前的流血革命。他所理想中的未來德國，完全是一個軍國主義的國家，其人民的工作與生活，悉聽上級的命令決定。他以爲一個武備甚強的德國，定能扭開凡爾賽條約的鎖鍊，並重新征服那些它有正當理由可以要求的土地。

魯姆相信德國的專門技能的天才遠在世界任何民族之上。因此德國在現世紀這工業時代，亦應在歐洲各民族中大大地顯一下身手。依魯姆的看法，德國應爲歐洲各國的領導國家。他認爲舊大陸各國都正很快地趨向無政府主義，惟有德國起來領導才可以極救他們。但是，魯姆又說德國爲要極救歐洲，必先征服歐洲。

魯姆所謂的「未來革命」就他本人的觀點而言，並非一個羣衆革命，而只是一個少數國家的「中產份子」(middle)的革命，三數堅決果決，可以召致廣大羣衆肯綮的少數人物之革命而言。

主人一再重複告訴我的「許多腦袋要搬家」一語，為魯姆所改變的警句，我在日記中特地在那句話旁邊劃上一條線。十年以後，希特勒在萊比錫最高法院中也說，「在未來的民族革命中，許多腦袋必須搬家」，這話驚動了整個德國。當一九三四年魯姆的腦袋真個因他的傀儡希特勒一道命令而搬了家時，我又想起了這句話。

一九二三年十一月，魯姆和希特勒認為發動「民族革命」的時機業已成熟。不幸他們努力的結果卻只造成了慕尼黑「啤酒黨的暴動」(Beer Cellar Putsch)。那是欺騙，叛逆，悲劇與喜劇的混合物。魯姆率眾進攻國防軍的營房，希特勒則與魯登道夫在慕尼黑街上領導一個宣傳遊行。結果犧牲了十六條性命。為了「國家社會主義工人黨」，五個商人，三個工程師，三個銀行僱員，一個茶房頭，一個鎖匠，一個僕役，一個退伍的騎兵上尉，和一個地方法院的辯護士，犧牲了他們的性命。裏面一個工人也沒有。因為納粹黨純然係以中上層階級組成，絕未參雜其他份子。德國工人階級，不但不參加這個黨，而且要打擊它。

死去的地方法院辯護士名叫博爾登(Theodor Vonder Florften)。在他那屍身的口袋中，有人發現了一張用藍顏色印制的納粹德國的基本大法，其中所有各特點都是後來第三帝國所有的，例如言論自由，出版自由，集會自由之廢除，強迫勞役之實行，建立囚禁猶太人及布爾塞維克黨人的集中營等等，無不一一早經羅列。這還是第三帝國成立以前九年多的事哩。

慕尼黑暴動既已失敗，於是希特勒的敵人羣起而說他是一個什麼都完了的人。許多文章都記載着：當警察向遊行伍開槍時，希特勒是如何地立即伏在地下。他們說希特勒沒有作政治領袖的胆識。

但這次的的事情却證實希特勒確有相當堅忍和相當發諷，同時也證明政治上的各種卑污到極點的手段他都會使用。經過這回事後，他個人的威望既已喪失殆盡，所領導的政黨亦已瀕於瓦解，這不得已，只好逃匿。他溜到他的總督部下，那些陸軍低級軍官那兒去了——其中最出色的，是精力過人的斯特拉塞 (Gregor Strasser)——藉圖收拾殘局。同時並經由許多官吏與實業家之關係中間，而與塞克特將軍 (General Von Seeckt) 進行談判。塞克特為德國社會主義派總統埃伯爾 (Friedrich Ebert) 授予獨裁大權之人。

希特勒從這次慘敗中脫逃出來後，更虛張聲勢，謂曾獲得若干軍事將領的協助。曾與若干內閣閣員談判，及某些實業家會對其作某種諾言等等。他說如果塞克特將軍有心要運棋推翻德國，也未嘗不可做到。可是塞氏並未作此打算，而共和政府的國防軍務部長民主黨員格斯特勒 (Otho Gessler) 也並未與納粹作何秘密談判。因此，只要希特勒這方面在過堂受訊時不供出牽涉軍隊的事來，法院方面對他的感望是不致有更如何進一步的損害的，不問判決書究竟如何措辭，希特勒是被應許了在數月之內即將赦免的。這樣一來，希特勒不就可以把法院的公堂當做自己及納粹主義的宣傳論壇了麼。不錯的，過堂時確有許多關於他本人的不愉快的詳細陳述。諸如其活動經費係由外國資本家供給等等。但這些都被所謂國

家主義派的報紙略去了。結果，他被告判為被險毒陰謀所愚弄的人，而非自己發弄陰謀，為一個堅決保衛國家榮譽的人，而非出賣國家榮譽與外國的人。

希特勒的敵人滿希望他在公堂上遭受人家的譏笑，不料結果他出法院時反獲得一個為國家犧牲的英名。他被判處徒刑五年，移押蘭斯堡（Landsberg）監禁。在那裏，他居的一間小監房不久即成了慕尼黑社會有名的集會場所。德國作家托勒（Ernst Toller），曾在蘭斯堡住過多年，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前數月在紐約自殺的，曾告訴我，說是希特勒在蘭斯堡簡直和政府領袖一般，經常接待許多訪客。因為要緊的軍事當局，確是這般優待他。六個月後，他被赦免，下赦罪命令，是司法部長巴維利亞人屈厄雷（Grewer），八年之後屈厄雷又在希特勒手下仍然做着司法部的部長。

希特勒的自傳「我的奮鬥」之一部分，就是在蘭斯堡寫的。

「我的奮鬥」一書最大成功之處，就是凡被敘及的各有關人物，其本人均未讀過此書。一九三九年時，一位英國團員告訴我：「最大的難處就是我的同事大多沒有讀過「我的奮鬥」。即那些已讀過的，也都認為這不過只是一種宣傳文字而已，大概連作者自己都不會如何重視的。」

「我的奮鬥」並非希特勒一人的作品，事實上此書之大部分，都不是他寫的。不過其概念係由他從人宗所介紹的書中，談話中，和討論中拼湊成功而已。全部原稿也都是他的友人與同僚執筆。因此一來，阿道夫·希特勒這個名字，竟進而成了許多思想家的聯合簽名。

「我的新門」中幾乎很長一段段地隻字不易抄自夏勒納及路偉格的講演詞。許多冗長的註解，則是從威柏（Max Weber），挪卡德（Lagarde），及「德國社會主義」前輩之一的布洛克（Moeller van den Bruck）和「西方的沒落」（The decline of the West）作者斯賓格勒（Oswald Spengler）人的作品抄襲而來。其中講種族問題的幾章，完全與浩斯東·司圖亞特·張伯倫（Houston Stewart Chamberlain）所講的相同。張氏原是英國人，後來改德籍，是一個很早就讚賞希特勒的人。談宣傳問題的幾頁，則係剽竊自法國反動派心理學家黎彭（Guillaume Binet）的著述，黎彭曾著有「羣衆心理學」一書，在此書中，希特勒找出了侮辱一般人民的正當理由，他說他們有三種劣根性，即：懶惰，蠢笨和沉緬酒色。

至於談外交政策的一部份，尤其關於對蘇聯方面者，則純係由一個執迷的波羅的海德國人，希特勒的凜然可畏的御用哲學家羅森堡（Alfred Rosenberg）主稿。關於軍事及戰略方面之諸問題，則由德國裏一位名叫希爾（Konstantin Hierl）的上校執筆。關於經濟理論方面的材料，則由著着牙刷式短鬚的文秀工程師斐德博士（Dr. Gottfried Feder）供給。而其污穢猶太人的一切鬼話，則全部出自紐倫堡那慣喜寫反猶太猥褻作品作家斯特萊撒（Julius Streicher）之手。

赫斯那時正做着希特勒的祕書，他在把這些雜湊材料彙集成書的工作上，很下了一番研究工夫。他除編纂之外，並將字數極力刪削，使得全書篇幅縮小。因此之故，赫斯對此書出力之多，實遠在希特勒

本人之上。這事在納粹內層圈內今日已無何祕密可言。

許多人這樣懷疑着：希特勒自己是否真正相信他在「我的奮鬥」中所說的一切呢。我想他會的。因為傅士麥說過：「只有不善於扯謊的人才知道他自己在扯謊。會說謊的人是會一邊扯着謊，一邊自己也跟着去相信這些說的。」

「啤酒宮暴動」的流產，暫時擾亂了納粹的活動，因而結束了他們那可以名之為地方性時期的一個階段。納粹力圖克服這個難關，結果他們認清了欲征服德國，非先克服柏林不可。因此之故，希特勒把他的第五縱隊佈置在柏林的各個軍事據點上。同時極力爭取巴維利亞以外的富商巨賈，名流政客，以及一般高級官吏，為之後盾，納粹在德國取得政權的方式，與其後來向外國侵略的方式，一般無二。德國當權各派，無論為社會民主黨的莫愛勒（Hermann Mueller）所領導，或斯雷哲將軍（General Kurt Von Schleicher）所領導，或天主教的布魯林博士（D. Heinrich Brüning）所領導，其所予納粹之抵抗，都不在後來德國的達拉第，龐萊，雷諾，波蘭的培克上校，奧大利的舒斯尼格或捷克的貝尼斯博士（Dr. Eduard Benes）與賽路維將軍（General Sivov）諸人之上。

在奪取政權的進程中，自然免不了要遭受許多打擊。一九二四年馬克價值之穩定，與其後幾年市場情況之更形好轉，對於納粹計劃均極不利，因之，納粹黨陷入艱難陰霾的日子者乃重數年之久。

希特勒對於勞工的態度看得極為清楚，他曾有一次向斯特拉塞說：「爭取工人一事，我們勝利的破

會極少。一因此納粹黨毫無選擇餘地毅然倒入德國其他右派各種組織方面去了。在德意志共和國的歷次選舉中，希特勒絲毫不能從社會黨人及共產黨人方面叨到便宜，他的票數悉自其他反動黨派方面得來。

一九二七年納粹獲得空前大勝，其原因是一八十多歲的鋼鐵煤礦界的領袖人物克爾杜夫（Emil Kirdorf）參加了他們的陣線。這次選舉雖沒有發生何種有意義的決定作用，但對於保守黨及德國國家人民黨的傳統優勢之攻擊，却完全成功。納粹因此得以重整旗鼓，又獲些許地位。希特勒告訴他的部下說：「克爾杜夫的力量，比一百個國會議員的還要來得大。」

在德國，大商人之參與政治雖是初次，但克爾杜夫個人却並非如此。克爾杜夫先本支持胡根堡（Alfred Hugenberg）的國家主義黨，後來才轉而支持希特勒的納粹黨的。克爾杜夫的公司（普法戰爭後，乘機散布流言，使證券市場發生騷亂，同時並以賤價收買小本煤商所把握不住的存貨，結果贏此獲了大財。克爾杜夫把他財產的千萬分之一作為政治的投資。他是大德意志同盟（Pan German League）與德國拓殖社（German Colonial Society）的最大捐款人之一。這兩個團體都是納粹的先驅，在帝德時代，即以少年德帝國主義的最大宣傳機關著稱。

希特勒因克爾杜夫的建議，把納粹的政綱修改了好些條，例如將沒收大地主財產一條取消，即是其中之一。隨後克爾杜夫又於許多委員會中介紹希特勒與各實業界領袖認識，因而遂有煤礦業主聯合會正式聯合其各會員，每條煤一噸動捐助納粹五十芬尼（Penny，德國小銅幣，原值馬克百分之二）一

者)之舉。

不久之後，另有一個名叫榮森 (Erich Thyssen) 的鋼鐵商巨擘，亦步克爾杜夫の後塵，加入了納粹黨。榮森為資本八萬萬馬克之斯達威克公司 (Vereinigte Stahlwerke) 的董事長，雖年已五十，然人猶以「青年榮森」呼之。這人在德國政治上，亦非弱者。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德國一般實業家向德皇呈遞備忘錄，要求併吞法國龍威 (Longwy) 及布利厄 (Briey) 兩處的礦產，榮氏當時也是簽字人之一。榮氏並且也是大德意志聯盟的支持者。一九三二年，榮氏在杜塞道夫實業俱樂部 (Ivesseldorf Industrialists Club) 邀集一個有歷史意義的會議，會中希特勒曾在掌聲雷動中向這些德國極有權威的人物作了一篇演說。

這是德帝國主義各代表對納粹黨予以正式承認，亦即表示希特勒大勝其競爭者胡根堡的國家主義黨。這次勝利，前任航空隊長戈林之功居多，因為戈林是最先結識榮森的一個人。這些大商人雖聽希特勒演說的粗枝大葉，但細微末節卻總是與戈林去談。從那時候起，大商業界開始做了納粹的後盾，一般大商業家都把戈林——這位前任高級殖民官的兒子，當作了信託人。

同時戈林又向柏林國防軍務部的各將領分別獻計。最先抓住納粹潛勢力的是德國將領中最聰明的那位雷希諾將軍 (Walter von Reichenau)。雷氏那時在部中還只居於次要地位。早在一九三〇年，這位置戴單眼鏡，愛好運動的將軍，就已秘密召集過一次會議，使各高級長官得聆希特勒及戈林對納粹黨目

的的講解，參加此會的軍官，日後由德國最高統帥部公報明令發表為陸軍指揮官者，不下三十人之多。其中有一個是希特勒以前供職的那個兵團的前任指揮官，這就是那面容粗野，直率敢言的李斯特將軍（General Siegmund Wilhelm Walther List），後來曾在波蘭、法國、及巴爾幹等地統率德軍作戰的。其中還有希特勒未來的國防部長，那滿面縐紋的白倫堡將軍（General Werner von Blomberg）。從巴維利亞趕來的赫爾德中校（Lieutenant-Colonel Franz Halder），極留心地从他那夾鼻眼鏡中注視着演者，不措鬆懈，且後希特勒派他作了參謀總長。在一個角落裏，坐着另一位中校，靜穆穆地，面如惡魔，模糊不清，這號季特爾（Wilhelm Keitel），八年之後，他做了希特勒的軍事總參謀官。這會中所邀的老百姓，僅有一個面如滿月的矮小人物，他夾在許多武裝同志中間，非常忸怩不安。這人叫做米爾其（Eduard Milch）是路罕沙公司（Luft Hansa Corporation）的總經理。路罕沙公司後來會發號大批飛行人員，以為納粹將來建立空軍之用。

戈林後來會向一個外交家說，那次集會的結果極為圓滿。白倫堡將軍用這麼一句話總結道：「希特勒閣下。我們相信你。」

其他的人也部相信希特勒。一九二九年，那位愛穿高領衣裳，脾氣暴躁的沙赫特（Hjalmar Hoerl）（Hansley Schmitt），因為反對楊格計劃而辭去德國國家銀行總裁的職務，轉而傾向納粹。在沙赫特家中，希特勒與戈林會見了德國最大金融機構的德意志銀行（Deutsche Bank）的首要董事史托斯博士

(Dr. von Stauser)，及瑞哈拉董特 (Director Reinhardt)。瑞氏為德國私家商業銀行中極有權威之人物。此外，希特勒之認識科羅涅 (Caldene) 地方的華爾夫 (Otto Wolf)，也是在沙赫特的別墅裏。華爾夫為德國實業界中最足智多謀的人物，他表面上雖仍擁護共和政府，而且不斷地接濟天主教中心黨 (Catholic Center Party)，但實際上他除自己對納粹活動在錢財上作極大的幫助外，並且向其友人為納粹募獲大宗鉅款。

德國一般貴族階級，也都跟着來這麼一套。大約在一九二九年的時候，他們經德國慶皇的認可，一致支持納粹。一九三〇年廢皇嫡嗣威爾姆親王 (Prince August Wilhelm) 即為德國國會一百零七個納粹議員中之一人。擁有二萬五千畝地產之沙柯哥公爵 (Guke of Sachsen-Koburg-Gotha) 也加入了納粹黨。另一大地主之子，戈林好友海森親王魏爾漢 (Prince Wilhelm of Hesse) 也繼之加入。在希特勒出任國務總理以前，其精銳心腹部隊中，充斥着親王，伯爵與男爵之流的人物，統由戴眼鏡的矮小的希姆萊 (Heinrich Himmler) 指揮。

一九三〇年，選舉獲得空前勝利以後，納粹接着很快地在公務機關各緊要位置樹立有力的第五縱隊。而普魯士內政部長社會主義黨員塞維林 (Hart Severing) 視若左右手的戴爾士 (Rolf Diehs)，更把這種第五縱隊佈置在普魯士的各軍事據點上。後來到一九三三年時，戴爾士做到了德國秘密警察的第一任首領。興登堡總統府的秘書長梅斯雷 (Otto Meisner)，智略過人，過去在社會主義派總統埃伯

爾 (President Friedrich Ebert) 手下亦曾供任此職的，亦於一九三一年變成了納粹一的個情報供給員，卒使與登堡及德國政府的各種計劃，納粹無一不知。

因之，納粹準備在次年那具有決定性的年頭中攫取政權的一切，都佈置好了。

德意志共和國之末期，與法蘭西第三共和國之末期的情形極為相似，這確是一件極其巧妙的事情。

譬如說，二者的政治家，雖都效忠於共和政體，但民主大權却一一先後屈服於法西斯的高壓之下，可是這班政治家雖說已被催眠，然對左翼的共產黨却仍一再打擊。因之右翼法西斯高潮洶湧，更日甚一日。

一九二八年，德國社會主義派因競選大獲勝利，得以上台領導政府，可是不久以後又被擠下了台。

說也奇怪，他們對那些擠他們下台的人所持的政策，仍舊繼續支持。(八年以後法國所發生的情形完全與此相同。) 國務總理布魯寧 (Heinrich Brüning)，是一個虔敬而抱出世觀念的天主教徒，他根據緊急法令施政，只知力求預算的平衡，而不知力求共和國內各種惡勢力的平衡。此種作風，即是後來法國達拉第作風的前驅。布魯寧把全國文官薪俸一律縮減，對一般弱小人民科以種種新增的重稅，却把大宗津貼和補助去塞入一般大商人的荷包。他極力壓迫共產黨報紙，而對於納粹報紙之痛肆詆毀民主政治與共和政府，視若無睹。他刪削議會與民主憲法的大權，並宣稱這是他們最好的一勞永逸之防禦。

在布魯寧政府之下，舉行了一次總統大選，其時社會民主黨與天主教徒喊出一句口號，叫做「投與登堡一票，即是投希特勒一反對票」，但共產黨的口號却是「投與登堡一票，即等於投希特勒一票。」

這是奧登堡當選後，授希特勒以大權前僅二十九個月的事。這些痛苦的總統選舉，造成了一個結果，即：一九三二年時真正民主候選人原可望當選的，亦卒被錯過了機會。當希特勒獲得一三、〇〇〇、〇〇〇票時，共和派各黨仍在極力攻擊左派。奧登堡感激布魯寧使他得獲連任的這次選舉的報酬，就是突然地把他免了職。繼任者是一個莫明其妙的前參謀總長巴本上尉（Captain Franz Von Papen）。巴本是奧登堡的兒子阿斯卡（Oskar）的好友，軍方發言人斯萊徹將軍（General Kurt Von Schleicher）的門客。

這個政治角逐的悲劇，很快地演變到了極頂點。許多共和派人罵巴本為納粹的「從犯」，因此這位新國務總理準備給共和政府一個重大打擊。他以一紙諭令將社會民黨人與天主教黨合組的普魯士聯合內閣解散。聯合內閣的內政部長塞維林，在事前數日還說過只有暴力才能使他屈服，結果，竟果真屈服在這在他自己指揮之下的一個柏林警察局的警長與兩個警士之手。在最末一次選舉中，社會民主黨共獲得八百萬票，因此其領袖韋爾士（Otto Wels）曾誇口道：「如果必須實行獨裁政制，那麼，也一定是由我們來獨裁。」共產黨為維護普魯士內閣，抵抗巴本的突擊，倡導一個總罷工，但社會民主黨及勞工協會拒絕參加，⁽²⁾雖則他們的黨員已有不少人在為反抗瘋狂無恥的反動而呼號。有一個後來在邱吉爾內閣充任閣員的英國工黨議員，會親眼在柏林目睹此事發生，據他告訴我，舊德國的社會民主黨工人，因他們的黨對巴本的攻擊不採取報復手段，而曾號啕痛哭。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的選舉中，納粹高潮一落千丈，僅得兩百萬票，加之其黨內各階層亦日趨腐化，這原本是世界歷史轉捩的第三個機會，可是也被縱失了。當初共和派各黨倘能重擊旗鼓，集中力量，以迅雷不及掩耳手段，予新的納粹的打擊，局勢自必改觀。可是事實上，那時的國務總理斯萊撒將軍，雖為德國軍隊所擁戴的一位強項人物，然而日後的事實證明他早已無兵權在手了。因為他部下的軍官，已大半背棄他，而向未來英雄希特勒賣身投靠去了。斯萊撒將軍多年來掌管國防軍務部的實權，為一善使詭計之人，各部部长及內閣閣員之任免，他實主其事，然而一旦需要比詭計更強有力的公開勇敢行動時，他終於不幸地失敗了。

天主教黨，勞工協會，及社會民主黨的領袖們，都寄重望於斯萊撒將軍。結果因他們自己未能統率手下，與得寸進尺，野心永無止境的敵人作殊死戰，而徒然只知虛擲寶貴的時間，去與這位將軍去作些無底止，無結局的會商，坐令納粹得有時間重組其勢力。而德國大多數勞動羣衆，因見他們的領袖，不採取行動，遂皆心灰意懶，垂頭喪氣。於是擊敗納粹活動的最後一個機會，也就此消失了。

一九三三年一月七日，希特勒在科羅渥一位名叫斯路德男爵（Baron Kurt Von Schroeder）的銀行家中與興登堡的信託人，那短小精悍的巴本見了面。這三位先生會談的結果，同意於是月底正式組成希特勒內閣。至是希特勒暴政開始，同時並以新德意志帝國主義的恣態出現於世界政治的舞台。

當希特勒進辦公室的第一晚，正目不轉睛地注意觀看納粹火炬遊行行列穿過威廉街，（德國外交部

所在地……譯者），而歡喜欲狂時，興登堡元帥也正倦態迷糊地凝望着出神，他說了一聲「我當初不知道他們有這麼多呀」，隨即安閒地睡去了。這時，埃森（Essen）附近一個布置得富麗堂皇的海格爾別墅（Villa Huegel）中，正在舉行一個歡樂的宴會，主人為德國實業界首屈一指的克盧伯博士（Dr. Gustav Krupp von Bohlen und Halbach），來賓十餘人，均為德國有名的實業家，賓主一同慶祝他們的傀儡上台。到今日為止，納粹執政已有九年，一般人無不盡知並堅決相信這事早已無慶祝的價值了。因為事實告訴我們，納粹獨裁者早已把德國的資本主義掃除殆盡，資本與勞力同樣在納粹的鐵路下被踐踏，這使德國的大商業界深深地懊悔，當日不該替希特勒把國務院的大門打開。

讓我們看看這種說法究竟有無事實的根據。

納粹把德國的勞工階級看作奴隸一般，他們認罷工為犯法行為，嚴禁工資談判的制度，並取消工人集體論價的權利，工人們以民主方式選舉出來的工廠會議，納粹也另行指定各實業界領袖組織所謂「信託會議」來代替這班領袖，自然都是雇主。此外，並訂立規章，強迫工人非得工廠當局許可，不許擅離其傭工處所，因此遂把一個工人完全送入雇主的掌握裏了。工作時間也由八小時增至十小時，甚至十二小時，物價高漲百分之二十五，而工資在納粹暴政之下却反減少百分之七、六！

德國工人經過數十年時間，遭受無限犧牲而建立的勞工協會，筆尖兒一揮，馬上便毀滅了。代之者為德國勞工陣綫（German Labor Front）之組合。這陣綫可謂是一個世界規模最大的公司聯盟，以狂

暴的雷博士 (Dr. Robert Ley) 爲其首領。雷氏在德意志共和國時代，曾因酗酒犯案，警局至今有案可稽，這勞工陣線遺負有一種納粹所謂的教育任務，此任務即係雷氏設計的。雷氏說：「我們從三歲孩童做起：當這孩童會思想了時，我們把一面小旗插在他手裏。待他進學校了，再授之以希特勒的幼年生活，挺進隊的史實。並使之服兵役。我們一刻也不放鬆他，這階段完畢，然後叫他參加勞工陣線，並極力掌握他，不論其願意與否，至死也不讓他脫離。」

爲了實施各種勞工法，全德國境內共派了十六個所謂勞工信託人 (Labor Trustees)。但其中無一人爲工人，十六人全係商人，退休官吏，或僱主階級以高薪聘來的專門顧問。在這十六個信託人的背後，有祕密警察的勢力爲之後盾。這些祕密警察在各大小經濟企業中活動，搜捕常發怨謗言論的人及散布反納粹標語與小冊者。所以德國工人中現時流行着一句這麼的話，叫作「由工廠到集中營，中間只一步路。」

這些措施是否會引起德國大商家的不滿呢？這或許就是納粹政綱中所謂反資本主義各條款已經掃除了資本主義的表徵吧？

是的，這些事情好久以前就已沉入違約的血海深淵。早在一九三三年，希特勒的副領袖赫斯就曾下令禁止黨員採取「反對大百貨公司或其他類似商店之行爲」。但這些大商店，黨綱中是業已應允廢除的。納粹黨各下層階級對實行廢除大百貨公司，及其餘各點如托辣斯之社會化等，態度甚爲堅決，可是戈

林却以一道命令禁止援引黨綱與黨在過去所作一切允諾。那些在戈林命令頒布後仍繼續要求實施以上諸點的，其對元首信賴的熱忱，結果就祇換得拚拋生命與被關進集中營了。

一九三四年六月三十日的一次清黨屠殺案。把那些主張所謂「二次革命」的人物概行送進了墳墓與牢監。「希特勒的創造者」魯姆隊長及其最親信的從屬數人，也在其中。魯姆的眼光着重在軍隊的指揮權上，他和他的朋友都想使得軍隊受挺進隊的統率。然而屠殺案却反應大商家及軍隊的要求而發生了，因大商業界希望納粹黨的一切激烈行動從此停止，各將領則因挺進隊領袖不肯承認軍隊有高於一切的大權而想把他們一起去掉。

採取流血清黨方式，最後的決定是在海格爾別墅一次會議上。參加那次會議的有克虜伯博士，希特勒，戈林，及當時的國防部長白倫堡將軍。克虜伯與白倫堡屢託希特勒繼承臥床垂危的奧登堡總統的位子，只要他肯與黨中的激烈份子脫離。誰知這位「古日身並忠信之象徵」(Symbol of Old German Faithfulness) 德國某傳記家稱呼希特勒者的) 竟答應了這個交換條件。他終於犧牲了他歷史最深的老友，與許多忠實的黨徒。那些人的最大罪過，就希特勒方面講，就是他們不該太相信了他的話。

戈林抓住這個機會，把前任國務總理斯泰徹，希特勒前任副領袖特拉塞，及右派各潛在敵人一律處死。此事在許多工業家看來，只是一個「癡瘋」，一個美中不足之點。因為他們之中有一人會如此對法大使說：最主要的是「二次革命」的呼聲已隨幾個倡率者之死而壽終正寢了。

納粹繼一九三四年十一月的清黨屠殺之後，又宣布所謂「德國經濟之新的機構之法治(Law Gasming of the Organic Structure of German Economy)」辦法。這是否又會引起德國大商業界的不滿呢？

經濟部長沙赫特博士經與各最上層的實業家及銀行家作過長時間傾談之後，起草一種法律，將所謂「元首原則」(Fuhrer Principle)應用於國家的經濟生活，依據此法，各工廠廠主及顧問局主席都變成了絕對的「廠屋之主」，與「雇工之主」，他們有沖正工作時間，工資，單件價格，罰款及作緊急辭歇等之權。此外，廠主且有超羣股東之最高權力。據國務院秘書長斯雷吉柏格(Schlegelberg)說，股東大會有如「廢君」，僅能應公司董事會之請而採取有關財政及法律機構之決議案。尤有進者，合股公司董事會之主席竟有權作與其他董事意見旨趣完全相反之決定。

各公司商店所付股息與抵押出售之價格均有暴漲趨勢，一般大商業家是否會因此而再有怨憤呢？

在希特勒上台以前不久，德國有百分之四十以上的公司無力付給股息，但在希特勒上台三年以後，這些公司有股息可付了。希特勒上台前，公司股票在柏林證券交易所，平均只付百分之二、八的股息，但到一九四〇年，已付至百分之六、四之多，較前增加一倍以上。克虜伯眼見着他自己那龐大企業的收入在四年內差不多增多了三倍——一九三三年還不過一一八、〇〇〇、〇〇〇馬克，到一九三六年就成爲三一六、〇〇〇、〇〇〇馬克了。在希特勒上台以前，三千個合股公司的赤字數字，共計在兩千兆馬克以上，而到一九三七年時，那些公司的盈餘却已超過一，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馬克。

鋼鉄托辣斯的名譽主席克爾杜夫，爲維護希特勒之第一個大商業家。他眼看著自己那龐大企業在一九三八年之內，爲把公司現代化，並添置機器，即已費去一一、〇〇〇、〇〇〇馬克。此外，更提出準備金一三一、〇〇〇、〇〇〇馬克，以爲對付跌價之用。即此準備金一項，其數自即已超過該公司最初創立時所下資本之總額。同年，該托辣斯所付股息達百分之五。因此無怪「德意志人民報」(Deutsche Volkswirtschaft) 要說「在審議各大商業公司報告時，要想從所宣布之股息中去推斷出一個結論來，實較往歲爲難」了。

在這大上漲期中，各董事及經理部職員之酬金，當然也不會落後。在一年之中，德國最大財政機關之一的馱斯登銀行(Dresdner Bank)九位董事的薪俸由八三〇、〇〇〇馬克變成一、一〇〇、〇〇〇馬克，增加百分之二十有奇。而該行有四位重要董事，並同時在其他九十幾個公司的董事部領取薪俸。格霍舒公司(Gute Hoffnung Hütte)的四個董事，他們的收入由四一六、〇〇〇馬克增至一、〇八八、〇〇〇馬克，加多了一倍以上。

德國大商業界對希特勒重整軍備的狂熱自然不能有所怨懟。但是這種情形，是可能由一九三八年十一月間的反猶太運動傾覆嗎？

是的，反猶太運動在一般大商業家及銀行家看來，確即等於他們的一種新的意外利潤。他們以極微少的代價，把猶太人所經營的銀行及工業收買了。布萊克路得銀行(Bleichroeder's Bank)，當年俾士

麥也是一個股東，現在以實值百分之十二的代價賣給了威斯登銀行（Bank of A. n. Old Brothers），經過一種津貼的形式，也被威斯登銀行以實值百分之十六的價格收買。據專家估計，在這種強迫收買中，沒有一家猶太莊號脫手時會獲得實值百分之二十以上的代價的。因此，銀行家與實業家如不高興那班猶太企業家時，他們從不躊躇地立即把他們的財產掠奪過來。

威斯登銀行有一位董事，在此反猶太狂潮中，曾讓一個名叫瑞里支（Fritz Redlich）的猶太銀行家在他家裏藏躲了三晚，但隨即提出以實值百分之十一的價格收買瑞里支那家銀行的要求，幾經磋商之後，才肯加到百分之十三。據瑞里支後來在巴黎告訴我，這三晚上的藏躲，竟費去他一百多萬馬克。

德國大商業是否抱怨希特勒的外交政策呢？

一九三八年一月二十日，德國四家頂大的煤礦公司向元首呈遞備忘錄，要求強迫奧國購買他們的煤，使由原購五十萬噸者增加與購買兩百萬噸，並且警告奧國，如不肯進這筆貨，就請他死！幾天以後，外長牛賴特（Baron Von Neurath）向法國大使暗示，講德國正在準備併吞奧大利，六星期後，這句話兌了現。

納粹政府之併吞奧大利，我雖不相信全係這一紙備忘錄所策動，但我卻知道德國的大商人之聚集維也納，確比納粹坦克車之轟轟開進奧大利的古都還要快。他們忙着攫取奧國的銀行，工商企業，出口貿易公司，礦產等等。舉例來說，威斯登銀行，就把捷克齊弗諾銀行（Zivno Bank）及萊恩得銀行

(Laender bank) 駐奧各分行一起併吞，厥斯登銀行不顧席雷德·克魯梭公司 (Schneider Cressot) 的反對，硬把自己的代表插入奧大利鐵礦公司 (Anstias Co Magnesite Company) 的董事部。該公司為歐洲第二大產鐵地點。

克威銀行 (The Creditanstalt-Wiener Bankverein) 為奧國最大的一家銀行，分行遍布全世界，在巴爾幹各國的業務尤稱發達。結果被德意志銀行與克虜伯博士攫取過來。奧大利極重要的兩家火車頭製造廠，落到了漢克爾 (Her Oskar Hanschel) 的手裏，漢氏為加塞爾城 (Kassel) 的火車頭與飛機製造商，係電氣工業巨擘西門子男爵 (Baron von Siemens) 的女婿。此外，斯丁兄弟 (Stinne Brothers) 也把奧大利的油產弄了一部分到手裏。

掠奪了奧大利還不會消化，德國的大商業又先坦克車而侵入了布拉格 (Prague)。皮耳遜 (Pilsen Breweries)，也為柏林斯帕公司 (Schulzess-Patzenhofer) 所霸佔。以造英軍使用的布倫機槍 (Bren Machine guns) 著稱的布羅城 (Brunn) 的普羅納廠 (Zbrojovna) 也被德國鋼鐵托辣斯克魯克納工廠 (Kloeckner Works) 及郝奇公司 (Hoesch Company) 共同佔領。捷克最大的財政機構與慕爾多共和國 (Moravia Republic) 的綏靖派首腦齊弗諾銀行，也到了德意志銀行與厥斯登銀行的羽翼之下。厥斯登銀行還把彼傑克 (Petscher) 在蘇台德蘭 (Sudetenland) 的褐煤礦收買了。一個布拉商人後來

在巴黎告訴我道：「他們像蝗虫一般湧向我們。」

捷克之征服，立即解決了捷克廉價貨物與德國外銷公司競爭的危險，因為捷克出口商馬上被迫要將其貨價提高到和德貨一般價格的緣故。

然則，德國的大商業界是否反對戰爭呢？

德國因為幾乎佔領而且統治了整個歐洲大陸，故為其本國實業家及銀行家掠獲了龐大無朋的贖物。柏林現在成了舊大陸的銀行中心，德國工業托辣斯實際上支配着在佔領區與統治區的工業生產情形及其一般工作。

德國全國年產煤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噸，現更加上波蘭、荷蘭、比利時、及法國等諸國煤礦，年約增產一二五、〇〇〇、〇〇〇噸，所以德國的焦煤工業很想左右歐洲的煤業政策。德國自煤業管理委員華爾特（Paul Walther）卸職後，所謂戰時國家統制的辦法亦隨之壽終正寢，於是另設一煤業卡特爾（Cartel），以替代其任。煤業卡特爾的功能，在設法供應德國實業及一般日常消費所需用之煤，意大利及歐洲大陸各佔領區域的一般重要工業企業，也包括在供給範圍之內。卡特爾的主持人由一個曾經主持戈林公司（Hermann Goering's works）的商人名叫內吉（Paul Pleiger）者擔任。「德意志大眾報」（Deutsche Allgemeine Zeitung）對此辦法大為讚賞，因為這樣一來，私營煤業的利潤遂可脫離統制的束縛。聽是之故，德國基本工業乃得在大戰方酣時爭回「自由企業」的權利，然亦因適

在大學方面，她竟藉此，騙取學額之信價，予德國私費演業以莫大的利益。它們組織一個煤油開採公司，以開發德國國外的油井，並管理歐陸的油類貿易與煉油工業。其實，在此租地開採公司尚未成立以前，此公司創立人之一的德國溫特沙爾公司（The German Wintershall Co.）早已在匈牙利獲得開掘新油井的全權了。

比王里阿波（King Leopold）投降以後不久，德比兩國實業家間馬上有了合作的準備。例如奧馬鋼鐵托萊斯（Ougrienarhave Steeltrust）所有的出口貨即交由華爾夫鋼鐵公司（Otto Wolf Steel Company）獨家承銷。同時德國的航業利潤也已侵入荷蘭，例如鹿特丹的船塢，即已入於漢堡撲瓦船塢公司（Blohm and Voss Dock Company）掌握之中，在德國軍侵入南斯拉夫之前一月，極重要的波爾鋼礦（Bor Copper mines）即由法國人手裏轉讓到德國人手裏。貝當政府且「勸告」這個南斯拉夫企業的法籍股東，叫他們把股份出售給德國以格斯孚勒電力公司（Gesfuerel Electric Company）為首的一羣企業家。

但是，最富足的搶掠還在法國期待着德國的商人。一位朋友從巴黎寫信給我道：「我們死亡的人還不會掩埋，旅行兜售商原已充塞巴黎，滿坑滿谷，到處張羅生意。」

維琪那裏傢伙所謂對德經濟合作，實際上即係對於法國重要工業資產及銀行資產出賣與德國一事予以同意而已。溫德爾為一老練談話派分子，過去巴黎人向以法語「Monsieur de Wendel」呼之者，現

在擄改以德語稱之爲 (Herr Von Wendel)。還有一位電力業巨擘麥西爾 (Mercier)，他是一向支持法西斯「火十字團」(Croix de Jen) 不遺餘力的。這二人都已確信德國彰計將來定可爲來一大贊助。翁諾亞信託公司 (Credic Lyonnais) 與洛貝銀行 (Banque du Nordt des Pays Bas) 現時亦受德國三家大銀行的代表監督。席雷德魯克梭爲法國最大的軍火製造廠，法國每次反動運動這個廠都有份的，并且我早已說過，這個廠還對納粹運動捐助過款項，現在，它已有與克虜伯托辣斯 (Krupp trust) 合作的準備，任德國工業家掌有法國公司股本之百分之二十五。西屈安 (Citroen) 及雷羅特 (Renault) 的汽車工廠亦已在一羣德國企業家的「監督」之下，而以墨朋公司 (Merceder-Benz) 爲其首領。

德國大商業之得以突破法國工業及銀行的堅壘，所靠的還是法國人民的金錢。例如法國淪陷後十個月內貝當政府所付與納粹的四千兆圓，納粹即從中取出一小部分，以爲購買法國實業股票之用。其目的在創立法德合組之公司等等，藉圖控制法國的工業與財政。而德國大商人口裏所說的法德合組公司，實即由德國統治之謂。

要想綜結德國大商業界對希特勒執政的態度，我想最好引用我與德國某大托辣斯主席的一段談話。談話時間是在一九三九年最初的幾個月中，地點在瑞士一個風光明媚的避寒地。那時尼慕黑的幻影雖仍瀰漫空際，但關於戰爭的談話，仍不停地在流傳着。我對於這次會談懷着極大的興趣，因爲就我早在許多年前即已認識這個人了。在希特勒還沒上台以前，我即已在他的私邸中登過一個極歡欣的短時間，和

他討論過藝術。這人受過高等教育，對於音樂有濃厚的興趣，並珍藏着一部在德國要算最名貴的藝集。在希特勒上台之前，一般人即相信他持見相當守舊。他早年並未接濟納粹，事實上，我想他之給予納粹以金錢，大概只是納粹取得政權以前不久的事情。

在這次談話中，對於我們所談到的各種問題，他都說得非常坦白。唯對下面這麼個問題，則似乎的確不願置答。這問題是：大商業家在納粹德國究有好大的勢力，其勢力又究如何行使？

談話結束後，我會馬上作一筆錄。這兒所引述的，全係照錄該項原稿。我們互相打過招呼，並略為閑談後，即談到最近殺戮猶太人的流血案情，以及納粹其他一般暴行。以下是這位實業家的談片。

他說：「我對於這次殺戮猶太人的流血案並不感到高興。縱如你們所說，猶太人在共和政府時期，雖人口只佔一個很小的比率，却高踞着統治的地位。對德國所遭遇的一切或德國所受各方的影響應負極大責任。在納粹統治下另有一些別的現象也是我所不喜歡的。我一走到德國人民遭挺進痛苦飛拷打與殺戮時，我感覺得非常可恨。對不起，我在儘我的力量制止這種事態發生。現在，他們是已相萬貼伏了。但是這種不一而足的情形，也只是這次偉大民族革命的副產物而已。這些都是無法避免的，雖說人們儘管對之抱憾。」

他接着道：「但是他們決不能使一幅新德意志光明燦爛的圖繪變成陰暗，德國現在業已重新得到它的靈魂，且已恢復從前的民族驕冷與民族尊榮。共產主義的災害業已剷除殆盡，我們都可自在的吁着一

口氣了。當我偶一想起當初在共和時期中與那些工人及共產黨店員所發生的一切糾纏不清的麻繁時，我不禁感覺得確如有釋重負，因為那些都已成爲過去了。這樣看來，民族革命確已產生了一樁偉大的奇蹟。

我問他現在其他的工人之間是否還有什麼麻繁。

他道：「有的，好些可疑的份子，有時也想從中挑起糾紛，但有秘密警察注意着這件事。」

「勞工陣線那些代表如何呢？」我問。

「我同他們相處得很好。」他這樣答覆我。

「那些工商業界的小納粹元首呢，他們不要求取得他們那一份嗎？」我簡直帶着諷刺的口吻問他。

他微笑着，把談鋒轉移到另一個問題上去，但不久我們仍然觸到了這問題的難解之處。

我說：「聽說德國商人爲壓制共產主義與勞工協會，付錢之多，到了損及他們獨立的程度，政府是否真有一方面以諷刺的形式把錢揮取出去，而另一方面又把這些錢花在軍火的定單上呢？」

他說：「我們確付很高的稅，我想恐怕在目前是歐洲最高的了。不過，淨餘下來的依然還多着呢。」

他得意洋洋地告訴我他的生意是如何發達起來的。他繼續說下去道：「在旁的國家，所徵得的稅全是虛糜掉了，我們並不然，我們的賦稅所得是一筆極可靠的投資。請看我們新德意志的建設的成績如何。我們有全世界最優良的陸軍，全世界最偉大的空軍。這些都足使任何人在攻擊我們之先要多加思

考，一池又加重語氣說：「我們有今日的強盛，故必能以和平方式取得與我們生產力最相配合的世界商業領導地位。如果沒有充分的出口貿易，我們必會感受窒息。如果德國的馬克沒有購買原料的可能，那麼，我的經濟等於被宣告死刑。」

我接口道：「這是否說你們一定要有殖民地？」

他粗率的答道：「是的，我們需要殖民地，而且我們定可以得到手。」

「你們是否預備以戰爭的方式去取得殖民地呢？」

「我想這不是一個很好的問題。」他答覆道，隨即，又引用希特勒的宣言道：「我們雖要求獲得殖民地，但那無須以戰爭方式出之。我想英國人對於我們此種需要，必定十分了解，我們有與英國人同等享有殖民地的權利，他們必須分給我們些兒。」

談到納粹統治商業的問題，我又問道：「據說你們已不能算你們自己那些廠子的老闆了，因為你們的一舉一動，都要由政府撥縱指揮，究竟是不是呢？」

他道：「那倒確是一樁討厭的事，這些規定，有的時候最使你感覺得憎恨。可是那大部分都是必需的呀，而且其中比較難於執行的，我們都把它加以修改了。看吧，我們現在是正在塑造德國前途的決定年頭中過日子了，我們必須準備一切偶然事物之來臨。假若在一九一四年上次大戰以前，我們就準備了這點時，則結局必不是那回事。」

這樣一來，就談到每個人心目中都關懷戰爭的問題上面來了。他暴否以為戰爭即將來臨呢？不！還並不這麼想。我從各方面向他發問。最後，他才很嚴重地說道：「原料與出口市場兩大問題是我們生死存亡之所繫，遇必要時，我們當然不惜以戰爭去取得它們。一個擁有七千萬人口的國家（如德國在一九三九年初的情形），斷不能讓別國的面子而解決自己生命攸關的問題。」接着他馬上又向我解釋，說他並不以為戰爭將要來臨或必須來臨。他說：「你曉得的，我們現在正與英國的實業家進行談判，我相信結果必可成立一個協定，因為我們雙方都極有此需要。並且我們給把布爾塞維克主義的危害驅除了，英國人所應報答我們的才够多哩，可不是嗎？」

我說：「談到布爾塞維克主義的危害，那你對希特勒上次演說（一九三九年一月卅日）之毫不提及俄國又作何解說呢？」

「希特勒停止攻擊俄國是對的，俄國人一向是我們最好的主顧，我們決不拋棄它。」

我插口道：「這樣說來，那不是一個矛盾麼？你們一方面口口聲聲是布爾塞維克的主義的危害。另一方面，你們却又與俄國成立諒解。」

他答道：「這並不矛盾，我們固然不讓布爾塞維克主義滋蔓，但在我們強盛時期，我們還是敢和俄國保持很好的關係，但若一朝布爾塞維克主義的威脅太利害了時，那我們就要不客氣了。」

當我揚到商人在納粹德國究有若何勢力這一有趣的問題時，他總如我前面說過的一樣，表示着極不

顯著的神氣。他承認實業界的代表可以出席開議，也承認許多重要大計之決定，大商業界可得過問，此外他便一句話不肯說了。

至於一切重要決議有無違反實業家的意志的，則他也守口如瓶。因此我不得不仔細逐項地問他一番了。我問他是否反對普遍徵兵制？是否反對重新估領萊茵蘭？是否反對干涉西班牙內戰？是否反對其協定？是否反對併吞奧地利？對於納粹一手釀成，幾乎引起戰爭的蘇台德問題，是否站在反對立場？他都十分坦白地承認說不。

我最後說：「那麼，你是一個納粹囉？」

他道：「爲什麼？我不是。我雖同意他們的外交政策，但那並不是說我就同意他們的辦法呀。」

「然則如果他們的計劃錯誤呢？如果德國竟因採行此種政策而召覆亡呢，你也不反對嗎？」我又問他。

他道：「那決不會的。且即令一朝有此種情形發生，從長計議的時間也還多着哩。」

我們說到這裏，就分手了。我想他一定和我一樣，不甚希望我們有再碰頭的一天。

我覺得這次會晤極有意義。他是一個親自管理着一個小小「工業帝國」的人，我一向知道他有着高尚的興趣，受過很好的教育。我從不希望他代納粹暴政認過錯，也不希望他對納粹政策以予贊助，然而在我們這次談話中，他却兩項事情都做了。我覺得他雖處處有所保留，然而却都確有此地無銀三十兩之

概。

從這次談話中，我推斷外傳德國大商業界與納粹失和一說實毫無根據。縱他們彼此之間偶有意見相左情事，必決非有關重要問題者。我所會談的位這先生，極足以代表全體德國大商人的態度。德國大商人極方支持納粹，其原因是他們均認識納粹是他們的唯一救星。

實際上，希特勒之與德國大商業界聯絡，並非給予每個商人以優渥待遇之謂。一般小商人自然更談不到為欲使大商業得以併吞其較小的同業，希特勒頒布了許多叫小公司無法自活的政令，因此在某一年之內，合股公司數目竟由六千零九十四家減至五千五百家。同年，有九千家有限責任的公司倒閉了。一般小資本企業的情形是如此。此外，一年之內，小商人之被迫脫離他們的公司，改入工廠作工者，亦達四萬人之多。

一九三三年以前，希特勒是受人譏笑與被人估計過低的。但自己他當權以後，尤其是自德國在軍事上一獲得幾次大勝以後，人們對他的估計又有嫌過高的趨勢。第一個為希特勒作宣傳的海登氏 (Konrad Heiden)，遠在這次世界大戰以前，即稱希特勒為「獨抗全歐之人物。」託立斯哲 (Otto D. Tollstedt) 曾任紐約時報駐德通訊記者多年，在他所著的「他們需要戰爭」(They wanted war) 一書內描寫所謂「官樣希特勒」(Official Hitler) 道：「他簡直不復有人性了，只是一種觀念的化身而已。」前泰晤士報柏林通訊員裴爾斯 (William D. Peltier) 也在其所著「跨着鵝步的凱撒」(Caesar's in Goose Step)

一書中說希特勒自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起，已成為「生存於現世界之最要的一人個，其與今日幾個大羣之關係，實比莎士比亞，凱撒(Caesar)成吉思汗，富姆布朗特(Rembrandt)，孔子，林肯，愛因斯坦，賽比留斯(Sibyllus)，及甘地諸人相加起來還要密切得多。」

對希特勒的看法與以上諸人恰恰相反的，是約翰·根寧(John Gaudier)。他在他那本法國潰敗以前出版的「歐洲内幕」(Inside Europe)戰時版內，說希特勒「對於外交的知識可謂不及尼克巴克(H. R. Knicker bocker)，巴特萊(Vernon Bartlett)，阿墨斯壯(Hamilton Fish Armstrong)，湯姆生(Dorothy Thompson)或艾登諸人的十分之一。」

設如我們所見，一般對希特勒所作的詮釋實汗牛充棟，多至無數。但在這許多故事之中，究竟那些是眞話，那些是假話，那些是半眞半假的話，那些是戈培爾博士刻正向全世界普遍傳播的宣傳與反宣傳的鬼話呢？

爲徹底了解希特勒這個人的眞貌起見，我以爲我們首先把希特勒賴以成名的一切因素和由希特勒享名的那些作品的眞正作者撇開不論才行。我已經說過，阿道夫，希特勒這個名字原已成了許多人共用的——一個名字——一個所有站在德國方面作戰的大商業家，軍隊科學家及組織家的共同雅號。在阿道夫，希特勒這個名字的後面，隱匿着德國工業的潛勢力，及其軍事機構，軍事傳統，與強大的組織天才，最後，但不能算最不重要的，還有那壓迫反對派的空前絕後的恐怖手段。同時希特勒這個名字也是民主國家

的弱點與罪惡的一種掩飾物。民主國家的大商業利益方面，不惜把許多軍事要地一個個斷送到希特勒手裏去，並期望納粹打擊蘇聯，這種自私自利的企圖，也都藉希特勒的大名以爲掩飾。的確的。假如我們說德國的工業科學，以及參謀本部的一切成就都是希特勒的功勞，那麼，對於希特勒自然只有這麼一個解釋，即他是一個非常之人，而且具有一種超乎自然的非常權力。

納粹宣傳的目的無疑的是想把希特勒描繪成爲一個非常的人。大凡一個集權主義的國家，當然需要一個神一樣的元首，在以各種黨派與各種黨派的黨徒之上，藉其超自然的眼光，純從人民利益的立場上來決定一切。至於幕後與元首背後的「一般真正統治者，則自然更有種種理由來扶植這套理論。譬如說吧，這種制度就可以使他們掩蔽民衆的耳目，就可以使大商業家與軍隊不担負納粹政策的責任，並使他們的名字不與納粹統治下的種種劣跡發生若何關係。

另一方面，德國以外的各種資本主義勢力亦無意說德國也是一個資本主義統治的國家。他們把希特勒主義形容成一種無中生有的黑暗罪惡勢力。他們說，倘能將之驅除，則一切均無問題了。他們都不會留心資本主義政制，正在一個法西斯國家流行，法西斯主義即是資本主義制度的一種政治形態。因此那些援引「我的奮鬥」以證實「惟有說大謊才可得人相信」一語的人們，都成了傳播希特勒業已解除德國資本主義及豪強政治之危機這一大謊的最誠懇之人。

可是，如果我們能自關於希特勒的傳說上把一切宣傳成分撇開，進而認清他那背後的勢力的真貌，以

及他談話的羽翼之間的分工情形，則我們對希特勒這人的本質，必能獲得一個較近真理的觀念。到那時候，他也不再是什麼神人了，我們也可以直截了當地分析他，再也毋須假藉種種神話了。

他雖不是個神人，但也絕不致於是笨貨。他是一個狡譎無比，工於心計的人物。他的事業之得以成功，實由於他之運用德國各種勢力得宜。他當初之取寄命運於「與各生存遭受威脅之階層共患難，并謀取政權方面之擁護」，即是徵其爲一富有天才的政治家，

爲維持現行社會制度的存在起見，他相信對社會必拼命表示反對，而不可絲毫表示滿意。對這點，他從未鬆懈，無論在工作上，在給予人民的諾言上，他都充分表示這種態度，甚且還不惜借用敵人有效口號。他明白資本主義制度需要一個「擊鼓手」，一個對他自己毫無心意去實行的事件力加鼓吹的政治領袖。

當希特勒策劃着「啤酒窖暴動」時，他即已準備來充當「擊鼓手」這一角，而他被喚上德國政治舞台以後所作的，也還是這麼一套。他雖有極端的虛榮心，與狂妄囂張的氣餒，但都還不會使他越過他應充演的範圍。他那有名的暴躁脾氣，一臨到利益關頭，馬上便收斂得一乾二淨。他那副獨裁者的架子，也都保藏着留待對他自己的同志及到公開集會裏去使用。在會議室裏與會議席上，他完全聽從商業家與軍隊的意見，而向他們低頭，那一方面呢，他們給他一切榮譽，作爲報答，他們得到了他們所要得的東

假若德國的大商業家軍隊當真反對納粹政權，他們盡可以推翻它。假若他們是上了希特勒的當，他們也儘可如其所說，有很多機會把他去掉。然而他們終不如此。據我想，最大的理由是希特勒是他們的人。希特勒雖扮演着主宰一角，可是却還沒有法子掩飾他終歸還是一個工具。德帝國主義的各種勢力對希特勒所犯的罪惡，應分担一部分責任，同時，對於他未來的惡運，也同樣地要分承一分。

二、希特勒的智囊團

希特勒的繼承人戈林

有四種文獻可以證明戈林過去吸食嗎啡，並會因此花費相當長久的時間在瑞典各醫院診治。

戰爭爆發後，作者親眼看見此四種文獻轉載在英美各大報上。但當一九三三年八月，此類文獻首先在《揭皮書》上發表時，英美各權威報紙，對之都不感興趣。法國時報主持人夏斯當（Jacques Chastenet），後來法國敗亡後，曾出任貝當政府閣員的，他曾這麼告訴我：「這是一樁私人的事情。」英國某大報主筆也說，轉載此類文獻「太不道德」。究竟此項確切證據如何獲得的呢？關於這點，作者不願有所洩露，因為瑞典或也終有一日不免淪入納粹的魔手，而與其他各淪陷國家遭受同樣的不幸。那些文獻本是得自兩個大胆反對納粹的瑞典人之手，倘經過情形不慎洩露，他們定將招致天大的橫禍。

在《揭皮書》刊行不滿兩星期之後，匈牙利共和國的前任總統卡羅列伯許（Cunnt Michael Karolyi）在一個深夜突然來到我家裏，要我和他盤桓幾天。法國外交部一個高級官員，請他代為警告我，說德國秘密警察預備肅清巴黎市內的大批反納粹份子，且說我也是包括在被肅清名單之列的。戈林那時正做秘密警察的領袖，他當然有理由痛恨洩漏秘密的舉動。對於此種舉動，他從未饒恕過一次。

戈林最初是在瑞典京城斯德哥爾摩的卡塔利納醫院（Katarina Hospital），就診那項文獻中，有他

一張就診券。身患嚴重病情的蘭布羅精神病院 (Langhirs Psychopothie Hospital)，也會為戈林診視，且會保留他的病狀登記表。戈林經他的私人醫生隆柏格 (A. L. Lungburg) 診斷，認為他確患嚴重的嗎啡中毒，係由於家庭教育「不良」所致。最後蘭布羅精神病院院長也於一九二六年五月八日正式出具病狀書，證明戈林上尉食麻醉品中毒極深，應即開始治療。

戈林患病非常嚴重，他幾乎常在瘋狂狀態中時竟至非加以約束狂人的緊衣 (Straght Jacket) 不可。其後不到七年，希特勒給戈林兩個要職，戈林即轉而以此「緊衣」加諸於德國的人民。戈林既為普魯士的內政部長，故握有德國最大一省的警權；戈林既為航空部長，故握有德國最可怕的戰爭武器。戈林剛上任四個星期，即為德國開闢了一條「一黨專政」的途徑。他命令他所統轄的警察，凡遇有反抗德國國民政府 (National Government) 者，概予格殺。他同時為第三帝國製造了一種極可怕的武器，即秘密警察。他與戈培爾同謀擾亂德國國會，以為掃除反對派及鞏固納粹政權的先聲。那時褐色恐怖瀰漫德意志全國，納粹政權於專堅固奠定。

戈林具有極狂烈的野心，於是開始慢慢的爬上政治的階梯。他謀推翻狡諂的巴本 (Franz von Papen)，首先奪取了他那普魯士總理的位置，到希特勒清黨屠殺時期，又強奪了他的第三帝國副國務總理的職位，那是德國第二個重要的位置。巴本那次薩頓軍隊方面的迅速而堅決的干涉，始得倖免喪生，可是也就的確够危險的了。巴本自是以後，始終善在國外為第三帝國服務，而不肯回國，在那次清黨屠殺中，戈林以高壓手段壓服了左派的反抗，同時納粹黨內的急進份子，也被他剷除殆盡，以此之故，德國的

軍隊及大商業家對他都表示極端好感。爲酬功起見，他們相與發動，登舉把戈林由上尉升成了一個將軍。戈林是德屬西南非洲總督的兒子，自幼即受着帝國主義，國家主義，及權力主義的薰陶。自德軍上次大戰慘遭挫敗以後，戈林即感無窮的傷痛，決心向戰勝國復仇。戈林對勞工及自由主義一直懷着無窮的痛恨，他把德國戰敗的責任完全歸咎於他們。戈林因爲贊成納粹超國家主義的黨綱，并欽佩其不斷反抗凡爾賽條約與反抗布爾塞維克主義的精神，因而加入了納粹黨，可是他從不重視納粹政綱中的社會主義部分。他是否會費神去讀過政綱，還是個疑問。他從未讀過「我的奮鬥」，也是事實。設爲在慕尼黑會議不久以前，法國航空部長曾訪晤戈林，並談起「我的奮鬥」中之反法國的幾章，戈林答覆他說「不必管它吧，那些謊話我從未讀過。」

由於所受教育及個人思想傾向的關係，戈林是站在德國的保守派這邊的。保守派包括軍隊，大商業家，及大地主等人在爭奪權勢時期，戈林會代賽納粹，與這批人發生接觸，并獲得好評。清黨屠殺後，他利用這種後盾，開始作更大的掠奪。兩年之內，他把「四年計劃部長」這一重要職位弄到了手，遂成爲大商業家在政府中唯一的發言人。此時與戈林爲難的，僅有德國經濟部長兼德國國家銀行總裁沙赫特博士（Dr. Hjalmar Schacht）沙赫特博士是一個極難對付的人，因爲他也有大商業家及軍隊爲之撐腰。戈林花了四年的時間，才得把他去掉。

戈林究如何獲充「四年計劃部長」，以及他究如何去掉沙赫特博士的，一個旅居巴黎的德國實業家

對我講得很詳細。據說德國國防部認為德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所以戰敗的主因，係由於被封鎖，因此，他們無時不在研究避免被封鎖的方法，俾第二次大戰時不至再蹈覆轍。他們以四個人組織一個委員會，數年來專事研究如何增加原料及代用品產量的計劃。那個委員會的主任委員是季特爾將軍。當時他在德國國防部中算是第二個重要人物。委員為韓芮肯(Hanneman)上校，湯姆斯(Thomson)上校及路勃上校(Fritz Loeb)。一九三六年，四年計劃完成，全部草案送給戈林審核，戈林抓住這個機會，在那委員會中安插了兩個人，即國務院秘書柯爾勒(Paul Koerner)和後來任戈林公司(Hermann Goering Werke)總經理的大商人卜內吉(Paul Pleiger)。同時並向沙赫特博士敷衍，謂該項計劃將由他的經濟部監督制定，而事實上呢，後來他在那奢侈富麗的私宅中，大張筵宴，遍邀實業家及銀行家聚會。當場把那項計劃拿了出來，因為無人反對，於是就此通過。這些實業家，銀行家并且以為德國的經濟應建築在戰爭原則上，德國要想勝過將來的敵人，非有實質上的優越不可，因此他們僅提出一個條件，即四年計劃的執行應由一般有經驗的商界經理與陸軍官佐來主持，而不能由政府隨意任命人員。

我們當不難想像沙赫特博士發覺被欺騙時的憤懣暴燥情景。一九三六年九月，希特本在紐倫堡(Nürnberg)納粹黨會議中公佈四年計劃，並發表戈林為四年計劃的部長。沙赫特博士與戈林發生一陣激烈的爭執後，就以傲慢態度昂然退出會場。不到十八個月之後，沙赫特博士的經濟部長宣告塌台，他個人且因此被踢出德國國家銀行以外，這缺由戈林的傀儡馮克博士(Dr. Walter Funk)繼任。

「四年計劃執行人的作風，係完全嚴格地遵照大商業家的要求做事。在它那巍峨的大廈中，竟然一個納粹黨員也尋不出。有一天大廈的牆上被人塗了「納粹黨員嚴禁入內」幾個大字，大概係希特勒的信徒因失望過大，故不惜以其生命作孤注一擲，憤而為之。」

戈林既任命為四年計劃部長，在職務上於是居了德國的第二把統制交椅。這是他事業上的一個嶄新階段，此後也儘可不必爭權奪利，為職位而忐忑不安了。戈林往日很喜歡時常到珠寶店，或美術陳列所等類處所去走走，每次去時，店主心感覺戰慄，現在，他去光顧的次數也漸減少了。這時，他很想博得人家的「尊敬」。四年計劃叫他建立德國航空工業，但此刻他已把這件事看得無足輕重了。因為前面還有更大的掠奪在等候着他。他現在正要設法插足德國的統制階級，所以他不肯再與德國工商界一班頑固守舊派（Bourbons）去爭一日之短長了。

戈林公司毫不費事地接收了莎爾吉特（Salzgitter）鐵礦。那鐵礦所產鐵砂質料非常低劣，由私人經營，成本太大，不能獲利，故爾不得不出讓。後來，戈林公司又併吞了幾家，并且與捷兩國及羅馬尼亞等佔領國家內掠奪得更多的礦山和工廠，於是組成了一個以戈林為其牌號的鞏固工業帝國。

但是，德國的大商業家對此並不感覺懊喪，他們都認為戈林之所獲，實是他應得的報酬。戈林曾為他們的利益盡過像看狗一像的責任，所以這種報酬雖然很大，確也還是值得的。戈林所制定的規章與法令完全不合。他所代表的制度的基本原則。他所主持的經濟結構已經不是自由的資本主義了，但大多

數德國商業家還相信法西斯是拯救他們脫離社會主義羈絆的唯一制度。他們且相信這種制度能使德國多上勝利之路，能使德國的工業及銀行在歐洲和全世界居於領導地位。為求達到這個目的，他們願付出很高的代價。因為他們一任戈林擁有其工業帝國，同時，也准許其他納粹重要角色得以分肥。雖經此分割，大商業家所得的仍然很豐富。我們只須將德國各工商企業的董事會主席及副主席一類人物略加研究，即可看出其中百分之九十是在一九三三年以前即營區一商業的入物，百分之八是那些人的嗣子及後裔，僅百分之二是在商業界尚未出名的納粹份子。

戈林的勢力日趨增長，雖各民主國的政治家，也對他拭目相看。他們也認為戈林是安定秩序的砥柱，抑制社會的長城。前英國駐德大使韓德森爵士（Sir Neville Henderson），曾在其所著「柏林回憶錄」（*Failure of a Mission*）一書中說：「一九三三年德國國會縱火案，戈林或應負大部分責任。希特勒對他極為信任，故在一九三四年殺害魯姆的糟黨屠殺時，即毅然授他以肅清柏林城的大權。戈林在事實上固然是一個典型的殘酷劊子手，可是他有若干動人的特點，坦白言之，我對他頗有好感。」

即在戰爭爆發之後，戈林的「動人特點」在西方各民主國政治家心目中保持未衰。一般人總認為戈林是反對德蘇公約的，甚且說他有推翻希特勒，「領導德國重新加入歐洲集團」的可能。此外，也常有人傳播戈林與希特勒日趨不睦的故事。我記得有一天看見一個哈瓦斯社的通訊，裏面說希特勒與戈林曾作四小時的長談，幾分鐘後，又接到一份倫敦「每日前驅報」（*Daily Herald*）上面說戈林已不許參與政

治會商。達拉第內閣的總督率員（Chief Whip）希欽里（Chichey），是一個急進社會主義派議員。他為實業家，他在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也對我說，總理業已接到可靠的情報，得悉戈林正在準備推翻希特勒。他並且說戈林的密使現正在瑞士與英國發言，磋商議和條件。後來充任邱吉爾內閣情報部長的特夫古柏（Alfred Duff Cooper），在戰爭初期，曾旅居美國，他也說希特勒一但下台，民主國家就有和戈林成立協定的可能。

正如一個英國商人所云，他們「都以為戈林能阻止德國與蘇聯相交往，能使德國不為社會主義的愚蠢思想所播弄」。我不知道這種幻想最後是否已埋葬在戈林轟炸大不列顛後的灰燼裏面。

在戰爭初期間，曾經有過兩次關於戈林失寵及被捕的傳言。第一次是在一九四〇年九月，另一次則在德蘇戰爭剛爆發之後不久，這兩個傳言恰好與戈林的空軍兩次失敗互相呼應，可謂有趣之至。一九四〇年九月，納粹空軍防制英機來襲失敗，這是一次，在德蘇戰爭中，納粹空軍不能打擊蘇聯空軍，這是其第二次。事實勝於雄辯，一切事態適與希特勒統帥部所發出的鼓吹報導相反，蘇聯空軍依舊佈滿德國的領空。在戰前，戈林曾誇稱任何敵機不能進入柏林，那知英國皇家空軍及蘇聯的機羣屢次大舉轟炸柏林，均告成功，因此他那狂妄的誇張乃不攻自破。

這位前任空軍上尉，身高五尺五寸，體重二百五十餘磅，現居德國第二把交椅的戈林，其所轄空軍：飛遍了歐洲，非洲及近東的空際。歐洲全境幾乎每一首都有的炸彈創痕。他偶爾高興時，也跨上飛

林，目前正在視察其部下所作的毀滅戰蹟。

戈林以與希特勒絕然不同而出名。希特勒被稱為極峻刻的制慾者，而戈林則被稱為樂觀主義者（Heoptimist）。戈林的特點是愛好浮華。他所穿的制服。不下數千百種，這種事情，我們固然認為只是一種談笑的資料而已，可是在另一方面，一般凡夫俗子却無不十分羨慕。

凡上等階級所有一切享受，戈林莫不應有盡有。他性極喜奢侈，貪口腹酒食，有珠玩癖，衣履不惜耗費巨額金錢。此外，並且歡喜打獵，歡喜參加集會。戈林認為凡此種種癖性，均可以沾名釣譽。他曾對法國大使說：德國人民若把希特勒尊為聖人，則必把我喊做「快樂的罪人」。

這話就納粹黨員而言，也許是真實的。且就德國大多數人民及德國勞工而言，則戈林的大名與德國秘密警察，國會縱火案，納粹恐怖等均有連帶關係。就納粹黨而言，戈林是一個曬衣架（Coffing）。

就大多數德國人民而言，戈林是一個謀殺犯。

二 跛足魔鬼戈培爾

在納粹領袖中，其最易失寵，不為希特勒所齒，且常頻於被捕的危險者，當首推戈培爾博士。但每到危險過後，戈培爾即在集會中，或演習器中，把希特勒大捧一陣，而對其他諸人，則痛施譴責。所以在波蘭被匪報後，各將領忍無可忍，一再要這位跛足博士的腦袋，可是希特勒拒絕加害於這位聰明幹練

的顧問，這位最好的替人受過的替身。戈培爾之所以迄今仍能苟延殘喘者就是因為還有這兩個用處。

一九二八年冬天，我見到了戈培爾，那時他是困敝之至。他那時正做納粹黨的柏林支部負責人，並創辦一個報紙，名叫「前鋒報」(Der Angriff)，忙碌得很。當時納粹正在倒臺期間，在隨後的大選中，僅能以恰够的票數把十二個議員塞進國會，戈培爾就是其中之一。

有一次我在柏林一個劇院的包廂中，看見戈培爾在那裏看一個反戰的戲劇。柏林人都曉得那劇院是戈培爾常光顧的，那天的戲，是以奧匈帝國為背景的一個諷刺劇，哈斯克(Jaroslav Hasek)所著名「戰士什威克歷險記」(The Adventures of the good Sol Svar Schweik)。戈培爾博士雖是初次看這齣戲，可是他早已在各報上發表文章對之加以抨擊了，他說這戲「有損德意志的榮譽。這種褻瀆劇本，不應出現於柏林的舞台。」劇的主角是德國最負盛名的演員巴蘭堡(Max Pallenburg)巴蘭堡曾設希特勒的外貌像一個「蠢魚」(Civ Slieler)，所以戈培爾常拿他做攻擊的目標。

戈培爾蒞臨這種地方，當然是一個很重要的新聞，戲剛開演後，就有好些新聞記者擁進來。隨後跟着又有一隊柏林的警察進來。因為在數星期以前，正當演「西線無戰事」(All quiet on the western Front)的時候，突有戈培爾的挺進隊員在場中放出無數白鼠，大搗其亂，致使觀眾為之吃驚不小。因此每逢知道戈培爾在座時，總以為必有同樣的惡作劇發生，空氣極為緊張。

我決定和他談一談，因乘休息時間之便，走進他所定的包廂。剛一進去，座上突然躍起兩個嗚嗚着

的少壯保鏢，其體格的結實，相形之下，益使這位尖嘴猴腮的瘦弱博士比平常更顯得渺小與羸瘦。戈培爾坐在角落裏，藉以避免大眾的注意，他以懷疑的目光釘住我，並詢問我的來意，我就先作過自我介紹，然後請他發表對這劇的印象。他答覆得很含糊，僅謂「你不久就會知道的」。我再追問時，就說：「容後再行奉告吧」。

這次會談可算是我平生訪問名人時所作最短的一次會談。戈培爾所答覆的僅此直截了當的兩句話，他拒絕多談。就是這兩句話出口時，也都還多少帶點恫嚇意味。我當即離開他的包廂。這時候夜已深了。我的預料錯誤了，因為當晚並沒有什麼亂子。戈培爾一直到全劇將告終時，才離開劇院。新聞記者都很失望地回家。警察也都回去了。「前鋒報」也不見攻擊劇本，或演員的文章。

但，到第二天晚上，當沒有新聞記者和警察在場的時候，突然有人投擲臭氣彈，於是戲沒有演成。其實那是一個被檳除的捧客，於氣忿之餘，把硫酸酒在他所捧那個主角的臉上。

戈培爾對戲劇和文學都很愛好，且自己對此二者均會涉獵，但終無所造詣。他用自傳體裁所寫的一篇小說「密歇爾」（Michael），就沒有成功。他還有兩個劇本從未出版，但他不肯承認他的內容不好，他只知責備旁人。那時戈培爾業已加入納粹，納粹黨員認為給他們洩忿的就是猶太人和共產黨人。

戈培爾之所以對文學發生興趣，完全是受猶太籍學者貢陀夫教授（Professor Friedrich Gundolf）的影響。貢陀夫教授一向在海德堡大學（Heidelberg universität）教書，十餘年來，為研究文學史的權

威。戈培爾博士受了他的教益，故不肯把納粹的「血與領土」文學一口吞下去。戈培爾也和貢教授的其
他學生一隊，很欽佩他的老師。很用心地跟着學下去。這位矮小博士，是處在一種矛盾的境地，他一方
面憎恨社會主義者，自由主義者，猶太人和天主教徒，但在另一方面，他却又仰慕他們在藝術上。文學
上和科學上的成就，而且鄙視納粹在精神文明方面的產物。

戈培爾以納粹的方式去解決他自己的矛盾。他下令把那些從前使他不能成爲作家的人所著的書，分
別予以禁售或焚毀。可是在他自己住宅的藏書室內，卻又保存着幾千種違禁的文學書籍。現任駐戰敗法
國的納粹大使阿貝茲(Otto Abetz)，曾在巴黎某次宴會上對來賓說：「戈培爾這一類的藏書極多，他最
喜歡把這些書翻來覆去的讀，」又說：「凡流亡作家(Emigré writer)的重要作品出版時，戈培爾必立
即買了來讀。」據阿貝茲說，戈培爾最喜讀的作品是湯曼斯曼(Thomas Mann)的「魔山記」(Moby
Maun-tain)，海列克·曼(Heinrichs Mann)的「忠烈傳」(Der Untertan)。薩哈德·佛蘭克
(Leonhard Frank)的「盜黨」(Rauberbände)。這三部書，其實都是戈培爾在一九三三年下令焚燒
的，被焚燒的罪狀是「這些書可以危害國家民族。因爲染有猶太人及馬克斯主義色彩的作品，必使德國
永陷於萬劫不復之境。」

戈培爾對德國報紙、無線電、文學、科學、戲劇、及美術等所加的摧殘，筆難盡述，他自任宣傳部
長以來，即接收納粹文化，一手包辦，故在德國境內，迄今未有偉大書籍或劇本出版，偉大的影片也沒

有了。

戈培爾與希特勒之間的關係非常複雜。凡人類可能有的差異，他們都有；戈培爾是道地的聰密，希特勒恰與之相反。他們互相輕視各人所愛好的東西，他們互相憎恨，戈培爾恐終有一日會因此送掉性命。然而他們雖然互相憎恨，却又還是像還魂的琴生子一般維持着下去，因為他們彼此都知道，兩人一旦分離。就都會有生命的危險。戈培爾與希特勒互相忌避，也互相利用。戈培爾知道自己與納粹或希特勒間有着利害的關係，因為刀柄操在人家手裏，希特勒也雖不敢公然承認，但未嘗不知道一切宣傳及政治思想均得力於這位矮小的博士。在德國，戈培爾的聲名狼籍，最爲人所憎恨，但願他能永久作一個替罪人，否則，攻擊的目標也許會轉移到希特勒本身上來。外國外交家會告訴我：「外間所傳戈培爾的罪行，都是出自希特勒的直接慫恿。」

戈培爾博士在納粹上台的初期，曾倡導舉辦「冬賑」，這把戲鎮壓了人民對納粹的不滿。戈培爾想出了「由愉快而得的力量」(Strength Through Joy)這一口號，因此有一部份勞工運動也認此爲納粹有意改良社會的證明，在第三帝國。出些新奇的思想，往往容易招致大禍。但戈培爾卻能以這些東西巧妙地去獲得希特勒的信任，或且使希特勒假意承認這是他自己的思想。

戈培爾是德波公約的牽線人，幾年以來，希特勒都在忙着準備對西方的敵人作戰，全靠有這個公約才保障了德國東部邊境的安甯，戈培爾如何使得希特勒願意訂立該項公約的，法國駐德大使龍賽 (Comte

cois Poincaré) 知之甚詳。

一九三三年夏，畢爾蘇斯基元帥 (Marshal Pilsudski) 曾兩次向法國建議主張進攻德國，以免它東山再起。消息傳出後，納粹大起恐慌，戈培爾當時認為要逃避法國的進攻，最妥善的方法莫若與波蘭成立協定，以離間波蘭人及法國人。希特勒那時正對這些「下賤的波蘭人」(Lousy Poles) 不大高興，故須多方設法，才能使他接受這個意見。

那時候，希特勒是戈培爾家中的常客。有一夜希特勒又到了戈培爾的家裏，戈培爾夫人替他倒茶並且奏了幾個鐘頭的鋼琴。希特勒聽着催眠的音樂，現出一種和藹可親的態度。鋼琴奏畢，戈培爾告訴希特勒，說他常想起希特勒在取得國務總理以前數月所作的言論，說當時希特勒業已預備許多要便全世界人士震驚的舉動，並已準備於取得政權後立即發動，訂立德波協定也是這些驚人舉動之一。戈培爾最後還說，希特勒徒然如先弄一番玄虛，適足以爲德國樹敵。

據龐賽說，希特勒並沒有作過如此誇言論，但當時他聽了戈培爾的話，立即接受。當晚就與戈培爾作了數小時的磋商，討論德波公約的可能性及其應有的條款。第二天，希特勒叫外交部長牛頓特 (Baron von Neurath) 窺探訂約的機會。六個月後，公約成立了。這當然是炸彈威脅的結果。

戈培爾自從充當希特勒的「擴聲器」以後，外間流傳關於他的漁色情事極多。他置身各女伶之間，時因醋意和她們的丈夫或其他有身份的捧客發生衝突。此外，外間還謠傳他刮了很多的錢存了好幾百萬

在國外。他在溫塞 (Wanuse) 的席萬勒威德島 (Schwanenwerder Islee) 置有大批產業，在裕隆瓦德 (Granwald) 也築有奢侈華麗的別墅。話雖如此，但我們若只承認他是猶安 (Douguan) 一類的騙子，而忘記他是希特勒幕後的操縱人物之一，那就錯了。希特勒使全世界震驚的一切政治及外交策略，差不多無一不是出自戈培爾的籌劃。希特勒的那些親信，如果都只是一羣罪犯與飯桶，那倒很易對付，可是他們雖則粗俗橫暴，不懼恐怖，暗殺及戰爭等等，但在軍事及外交兩方面，確仍不失為極幹練的戰略家。據我看來，其中最出眾者，還是戈培爾博士。所以在新德意志帝國主義中，戈培爾是一個極重要的幫手。新德意志帝國主義帶給了德國和全世界一種極惡的運命，戈培爾對此應負極大的責任，是無可否認的。

三 不可思議的戲法家里賓特羅甫

在土龍到巴黎 (Toulouse Paris) 的火車上，我看到了里賓特羅甫被任為駐英大使的消息。那時我正由巴薩隆納帶了許多祕密文件回來，我在巴薩隆納曾目睹佛朗哥叛變的初次被壓服——那些祕密文件，是在加泰隆尼亞 (Cataluña) 首府的納粹總部搜獲的 (參閱第五章)。有些文件中提到所謂「里賓特羅甫局」 (Bino Ribentrop) 者在法屬及西屬摩洛哥 (Morocco) 早已從事煽惑反猶太暴動，並在阿拉伯各國鼓動騷動的事。

幾天以後，我在巴黎聽說英國駐德大使韓德森爵士會對他的同僚說里賓特羅甫被任爲駐英大使「是一個好消息，因爲他是英國的友人。」可是，現在韓德森業已改變他往日的見解，他形容里賓特羅甫是希特勒幕後的魔鬼，專門抹煞英國政府的真正態度，不把英國的真正意旨報告給希特勒，以致逼迫希特勒走向戰爭。韓德森爵士在某次演說中且說，他手中如果有二顆子彈，一定將第一顆射入里賓特羅甫的腦袋。可惜事實上沒有這麼簡單。

里賓特羅甫在初進外交界時，僅充巴本的助手。巴本在第一次大戰時被迫離美後，即任駐君士坦丁堡的武官。里賓特羅甫的第二次外交經驗是得自凡爾賽和會，他那時充當德意志共和的翻譯員。此外，他還花費了大部份時間在巴黎各社交場中從事宣傳，他說：爲法國資本主義的利益計，應力求德國強盛，使其成爲抵抗布爾塞維克主義的長城。十五年後，里賓特羅甫第一次赴巴黎就任希特勒的流動大使時，仍持着同樣的論調。當時他曾受賴伐爾的款待，並由那位長鼻的布林隆男爵（Count Fernand de Brinon）介紹與各實業家及銀行家晤面。布林隆後來做了貝當的駐納粹大使。

里賓特羅甫是一個退伍軍官的兒子。在一九一四年以前，曾居法國美國及加拿大多年。外傳他是當時在格林蘭諾伯（Grenoble）任史學教授的達拉第（Edouard Daladier）的學生，殊不足置信。

德國戰敗後，里賓特羅甫一方面要賣香檳酒，另一方面又要常到巴本所主持的保守派組織裏去工作，故不得不將時間好好分配。里賓特羅甫娶了德國最有名的亨克爾香檳酒廠（Hinchle & Co.）廠

主的女兒，藉此關係，提高了他的社會地位不少。他直到一九三〇年以前不久，才與納粹發生接觸。起初，他不過只是納粹的一個捐助人，後來又變成了納粹黨和一些實業界銀行家朋友們的聯絡人。一九三二年，巴本出任德國國務總理，里賓特羅甫的身價也隨着增高。一九三三年一月希特勒與巴本在銀行家希羅德 (Schroeder) 家中所作的那次晤談，產生了希特勒政府。而那次晤談即是里賓特羅甫籌備的。

里賓特羅甫後來又負責組設一個非官方的外交機關，即名之為「里賓特羅甫局」，據在巴薩隆納所搜獲的文件證實，那個局實是非洲納粹第五縱隊的重要中樞。其實那些文件所載的，還僅是事實的一部分而已，因為「里賓特羅甫局」還負有一個更重大的任務，就是：把納粹主義向民主國家的大商業家及上層社會兜售。

里賓特羅甫并不在納粹黨裏面選擇他的助手，他看中了德國的貴族，退休軍官，及屬於保守派方面的青年國家主義等一類人物。他的第一個助手是杜克漢伯爵 (Count Dworkheim)，杜氏的家庭，具有極悠久的外交傳統。他如佛朗哥未叛變以前他的駐西工作人柯布洛克 (Kindles von Knoblock) 就是一位退休的海軍軍官，可見他有心拉攏退休軍官。

「里賓特羅甫局」的經費極其充裕，據統計，他的工作人員之一的前任，圖畫教員阿貝茲，即為法國報界及政客花費了二萬萬法郎以上。

「里賓特羅甫局」的工作進行極為順利，非但其首領為倫敦各應接室的「寵兒」，就是其他工作人

員也很快的結識了一些大商家，貴族及各重要政界的人物，這些人物對於納粹政府都是很有裨益的。舉凡英國的貴族，實業家，銀行家，法國的各部長，報章雜誌的編輯，高級政界人物的女眷，西班牙的謀叛各將領等，莫不與希特勒的第五縱隊有密切聯繫。

里賓特羅甫的部屬所探獲的情報，對於納粹各種重大運動都極有利。納粹各將領那時都猜想德國如發動攻勢，西歐各強國一定會抵抗，但納粹政府得了「里賓特羅甫局」關於英法兩國態度的報告，於是決定不採納各將領的意見，毅然進攻奧大利及捷克。

里賓特羅甫所建立的功勞，既重要，又有價值，所以他很快的就爬上了納粹的高級階層。一九三八年二月，他乃得以出任德國外交部長，並一躍而為經希特勒挑選的智囊團內層親信人物之一。

里賓特羅甫到德國外交部視事時，其大刀闊斧的作法，簡直比前任外長牛頓特還要利害得多。他把部內的舊有納粹職員一概裁撤。我們只須把在里賓特羅甫手下任職的德國外交人員略予攷奪，即可看出從未有知名的納粹黨員能博得他的賞識，得到類似大使或特使一類的重要職位。

任第三帝國駐日代表的奧多少將 (Major General Eugen Otto)，出身於一個在軍界有悠久歷史的家庭。駐意大使馬更生男爵 (Baron Von Mookensee)，是一個著名大元帥的兒子。被稱為德國半個貴族的蘇穆埃伯爵 (Count Friedrich weass von Schulenburg)，是駐蘇大使。駐西班牙大使則由斯托勒 (Ebdeshard von Stohres) 充任，斯氏服務德國外交界，已有二十五年以上的歷史。希賓 (Vithos von

Heeren) 爲前駐南斯拉夫的公使，在德國外交界也服務很久。前駐希臘公使亨伯 (Viktor Ping Zu Friedrich Schoenberg)，是出身於德國最負盛望的貴族家庭。

里賓特羅甫的第一個助手，是國務部長魏查克 (State Secretary Baron von Weizsäcker)。此人是因家庭傳統關係而進外交部服務的。國務部次長高斯博士 (Wundersecretary of State Dr. Gauss)，爲國際法的權威。斯特拉斯曼 (Stüsemann) 特之爲左右手，羅加洛公約即係由他起草。

萊赫 (Gaulleiter Ernst Wilhelm Bohle) 在牛頓特任內曾充外交部常務次長，里賓特羅甫對於此人多方限制，只允許他在國外負指揮納粹的責，不准他本人及其手下人員干預德國外交事務。里賓特羅甫曾得有希特勒的命令，准其作如此禁制。

這位納粹外交部長體格瘦長，相貌漂亮。他時常目空一切。他喜說諷刺人的話。他自以爲他說的英國話帶有牛津音調，他的法語也很好。他是一位風趣橫生的健談者。他對納粹政治，敢作大胆的談話批評。常假裝富於倫理情感，而把他自己和妻子子女五個的照片送到納粹各報紙去登載。

他和賴伐爾·哈里法克斯一樣，痛恨社會主義，也和他們一樣地深信納粹主義爲抵制社會主義的良藥。所不同的，是他認爲納粹黨也是德意志帝國主義的武器，德意志帝國主義將來總不免要與英法兩帝國主義發生衝突。他個人的中心工作，就是力求使納粹臻於有利之境。在肩負這種工作的過程中，他時常由一般擊其殼中的英法人士那裏獲得極其有利的幫助。

邱吉爾會說里賓特羅甫是一個「不可思議的戲法家」(A Pictious Conjuror)的稱，里賓特羅甫的外交政策，確是像戲法一般。在他那和藹的態度後面，掩藏着毫無忌憚的殘暴。他以賤價收買各工商企業的股份，因此發了一筆大財。他和其他各納粹領袖一般，認為納粹政權現在正在火山頂上，危險極了。有一次，他很誠懇地告訴一個外國外交家，說「這種迷人的生活，究能維持多久，除上帝之外，誰都不知道。我有時想它恐將陷入悲慘的結局！」他之作預言，這是第一次。

四 希特勒的戰略家季特爾元帥

一九三八年二月，德國最高統帥部大舉調整，季特爾被任為德軍總司令。幾天以後，我在西班牙牙使館一次午宴中，與當時法國的軍政部長達拉第見了面，他告訴我，法國駐德武官把季特爾形容為一毫無實際經驗的「坐辦公廳的將軍」，不能視為一個足當大任的軍事統領。法國的軍事情報素易發生錯誤，而尤以這次為最。實則季特爾確是德國驚人的作戰機構的重要創始人和重要指揮官。

季特爾是一個砲兵軍官，同時也是一個勤於研究的數學家。他認為組織超於一切。在他服務期間，大部參謀工作都是他親自經手。塞克特將軍(Georg von Saeck)和佛里齊區將軍(Georg von Frisch)，是他的兩位業師。塞克特將軍為德國國防軍的創始人，他主張德國未來的陸軍應力求其職業化，人數可以不必多，但須具備有訓練精良的突擊隊(Shock-troops)，專家，和機械化武器的裝

備。佛里齊區亦曾在德國陸軍由職業化的國防軍改組為普通徵兵制度時，曾任陸軍總司令。能很善講普魯士的閃擊戰術理論。遠在一九三五年季特爾重進德國國防軍軍務部（Reichswehr Ministry），在白倫堡大元帥手下担任副元帥時，他就在以迅速的手腕，大規模地促進德國陸軍的機械化與摩托化。季特爾此舉，眼光之遠，手法之高，雖納粹重整軍備的專家，也無不為之驚嘆。

季特爾與佛里齊區不同，他具有政治思想，知道近代戰爭的勝負完全操諸政治家之手。他認為納粹政治在準備發動，戰爭的過程中，佔有極重要的地位。至於宣傳工作，他也認為是極重要的利器，所以在他指導之下，德國國防部即把他們那所謂「心理實驗室」（Psychological Laboratory）者擴充為一最重要的部門，選撥陸軍中的優秀青年軍官去担任其中的工作。這個實驗室很像一個研究輿論的機關，他們研究納粹在國內外宣傳所得的結果，也研究別國在德國境內所作的反納粹宣傳。戈培爾雖對他們表示輕視，但他們所作關於德國軍事的周密報告，都能經由季特爾直接轉呈希特勒。所以這位矮小的宣傳部長，受他們麻煩的時候很是不少。

「心理實驗室」的工作，完全照布羅上校（Colorel Blan）所著「宣傳為一種武器」（Propaganda as weapon）一書所說的去做。布羅上校原本在德國國防軍部任少校，素不為人注意，自本書出版後，才驟然騰起。現在，他是德國陸軍中一位特出的宣傳專家。在他所著的書內，對宣傳所下的定義是：宣傳為一極切合實際的戰爭工具，其目的乃在戰爭中解決各項奇異問題，俾德國能處於有利的地位。

陸軍宣傳處處長菲爾吉貝中將 (Lieutenant-General Fellgiebel)，也負有指導「經驗室」的

責任。在他的主持下，德國陸海空軍共同出版有五種所謂大眾化的報紙，三十幾種雜誌、週刊、及純屬專門軍事性質的雜誌。陸軍宣傳處並印有多數小冊子及書籍，都是由一些領受津貼的印刷公司承印。

陸軍宣傳處的連絡員爲烏羅欽 (Wrochem) 上校。他也發表過不少關於宣傳問題的重要論文，可是，他並沒有戈培爾那麼有名。

陸軍部的宣傳經費究竟規定多少，雖無從探悉，然據外國駐德武官的估計，單是內部消費，每年就在七百萬元以上。

季特爾就任最高統帥部的最高長官後，解決了陸軍與納粹黨之間困難複雜的問題。他的前任俾里齊區將軍，即以未能解決此項困難問題而被免職的，甚至還有在華沙城門前喪命的可能。季特爾的解決方法，是力求與納粹各領袖人物保持密切合作，特別是與希特勒合作。此希特勒也給他一種保護，禁止納粹干擾。季特爾事實上雖不能真使納粹黨與陸軍合而爲一，但在表面上已使兩者好像是一個單位了。

季特爾把德國獲得勝利的一切功勞都讓給希特勒。以此緣故，得邀准自由指揮陸軍，不受干預。所有重要職位，他盡給了那些舊有的參謀人員。那位毫無主見的貴族黨員 (Junker) 布魯齊區元帥 (Field Marshall von Brauchitsch)，也是塞克特將軍的門生，他在第一次大戰時，就會服務於參謀本部，季特爾叫他作了軍團長。那位巴維利亞精銳營連長的參謀長軒德爾上將 (Colonel General Franz Halder)

過去也會與季特爾及其助手約德爾將軍 (General Jodl) 等合作，舉凡德國各勝利戰役，莫不出自彼等的計劃，現在也作了軍團長。此外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在德國參謀本部任職的，還有李斯德元帥 (F. von Marsial Sied)，他是希特勒當兵時的團長，為德國陸軍領袖中最出色而詭詐的一位人物，也出任軍團長。

希特勒的十四個元帥中，只有一「運動家」端希諾 (Walter Von Reichenau) 是納粹未當權以前的黨密黨員。但納粹得勢後，他與希特勒的關係并不甚好。

這位極沉默寡言的季特爾元帥，很想使陸軍成爲一個獨立的單位，不與政治發生密切關係。他這一計劃如在平時獲得的成功，則在戰事進行的時候，就非失敗不可。因爲戰爭，把更多的政治工作加在陸軍肩上。它使各將領成爲千萬士兵的極權主人，同時使舉國上下的視線集中於各將領身上。民衆已開始知道德國的運命將取決於他們的戰勝或戰敗。陸軍與納粹黨之間的均勢，到那時不得不被推翻。在平時，各將領如不過問納粹黨的政策，尙可希望在希特勒場合時不受人民的譴責，但在現時，決難再作如是的希望，因戰事中的任何失敗，他們與希特勒將同受責難。同時德國人民所受的一切戰時限制，將歸咎於納粹，也將歸咎於陸軍。

戰爭愈延長，則德國人民對領導德國走向戰爭一條路的人，必更怨恨。假若在法國及巴爾幹所獲的勝利不能引起人民的興奮，則大部份德國民衆對德蘇戰爭一定會果敢不滿。陸軍很願意利用希特勒的機

構，但却不願替希特勒負失敗的責任。陸軍現在才明白自己的命運完全是以希特勒為轉移。但在那一方面，希特勒却希望陸軍能够打勝仗，俾能提高他的聲望。所以季特爾與希特勒這位「擊鼓手」之間，已形成了一種禍福與共的聯繫關係，這一個失敗，那一個也將淪於無底的深淵。

戰爭漸使陸軍領導者和納粹黨的領導者同時遭受非難與攻擊。季特爾雖然多才多藝，其政治手腕的圓滑與其在戰略上的敢作敢為，雖並足稱道，但他所日夕焦慮者終難避免。陸軍本來希望由納粹去担負政治方面的責任，但結果却還是不得不由自己去負責。這些幕後牽線的將領，到現在才看清楚。他們急切需要戰爭，然而德國人民已認清了他們對戰爭應負的任務，他們不能再說自己與納粹的罪惡無關，他們的惡夢已經實現，他們須與納粹同進退。希特勒本是他們的工具，現在却變成了他們的累贅，將來也許還會使他們絕望。在平時，他們可以任意把希特勒拋入大海，只要他們有此意思，機會很多，可是在現在，却不能這樣了，因為現在他們如果要將希特勒拋入大海，他們自己也難免同歸於盡。

五 希特勒的理論家盧森堡

在希特勒的所有顧問當中，沒有一個像納粹主義的官方走狗盧森堡那樣富有神祕性的，盧森堡與希特勒一樣，是在德國境外出生。他於一八九三年生於愛沙尼亞靠近波羅的海的雷瓦爾港（Reval），（後稱塔林 Tallinn）。那地方當時還屬於帝俄。盧森堡幼時也像希特勒一樣，希望成爲一個油畫家或建

築家。但他比希特勒幸運一點，能在莫斯科的工藝學校（*Priv. techn. Institut*）讀書，並獲得了一張文憑。他在未出而向德國人民講述納粹理論之前，曾在雷瓦爾的格斯塔夫·阿道夫高等學校（*Gustav-Adolf-Gymnasium*）任作圖教員。

他在第一次大戰的末年，和在這戰爭結束後的最初數月中，所作的各項活動，永遠不會有人完全明瞭。布魯賽總理（*Chancellor Bruning*）有一次會這麼罵他，說他「一直到一九一八年，還是一個俄國的愛國份子。」在希特勒未上台以前，德國流行一種小冊子，揭發盧森堡在大戰將告終時，還在替法國情報部工作，說他在一九一九年「看到無法開展工作之後」，才毅然離開法國。

是年年底，他突然出現於慕尼黑。先僅為人民觀察家（*Zoelischer Beobachter*）撰稿，繼則任該報的主筆。他已得到希特勒的寵信，並非由於希特勒喜歡他的笨拙社評，而是因為希特勒賞識他的「白色保衛論」（*White Guardist Doctrine*）。盧森堡以沙皇的「黑色黨」（*the Black Hundreds*）那一套的理論納入納粹綱領，此外更以杜撰的反猶太的「基督教長老始末記」（*Protocols of the Elders of Zion*）作為納粹理論的基石。我們若把盧森堡所著各書，特別是「廿世紀的神祕」（*The Myth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與俄國白俄所印行的小冊子兩相比較，必發現二者極相類似，且有些地方連文字和標題都完全一樣。舉凡盧森堡所宣傳的種種言論，如攻擊托爾斯泰主義（*Tolstainism*）、攻擊互助團團員（*The Freemasons*），攻擊猶太人，及號召「歐洲全體亞利安青年起來反對世界上的猶太人及

守財奴」，呼籲「同盟黨聯的神聖戰爭」等等，都是竊自「白色保衛論」者耶可列夫（Yakovlev）的話。耶可列夫是暗殺法國總理杜魯門（Daurier）的哥格羅夫（Gorgulov）的好友。

從此「白色保衛論者」對蘇聯所抱的憎恨遂載入了納粹的黨綱，「白衛軍」中的亡命之徒和傭傭兵等，構成了希特勒的挺進隊，和精銳衛隊的基本幹部，所謂挺進隊等，在第二帝國尚未成立以前，即曾殺害了一百多個反納粹的工人。

希特勒攬得政權以後，這位被稱為「大裁判官」的幕後人物盧森堡，僅僅有過一次跳進國際政治圈子的企圖。那就是他那次去訪問英國。那次訪問，以他在倫敦無名將士墓前致獻花圈始，可是却以倫敦街上貼滿了「打倒盧森堡的標語」，使他不得不抱頭鼠竄而還終。

在盧森堡將離倫敦之前，他招待新聞記者，在那次會上，他想向英國新聞記者說明希特勒之為人誠懇，那時我恰好也與一個英國記者在座。我眼見着從未見過的可憐景象。這位瘦弱，帶波羅的海口音甚重，且喜自負的極權主義代表，被各記者穿相詰問，竟至目瞪口呆，無法置答。各記者離席後，盧森堡塔然若失。麥唐納政府雖多方維護，也終難使盧森堡不為民衆所輕蔑。英國人民認為盧森堡在納粹恐怖高潮達於頂點的時候，訪問英倫，顯係一種侮辱，故將他驅逐出境。

盧森堡原想出任駐英大使或外交部長，俾可負些國際使命，此番失敗，惟一的收穫就是希特勒對他較前更加親密而已。他替納粹宣傳加上一些必需的神祕成分，藉以掩飾納粹各種重要活動和納粹的真

目的。他又給德國帝國主義的幻夢一種似是而非的理論基礎，使納粹擴充領土的慾望能從德國古代歷史中找到根據。凡歷史上的先例，不論其為真為偽，希特勒都喜歡用作支持納粹目的的根據，在這方面，盧森堡確可供給他許多資料。盧森堡因此之故，遂能左右希特勒，同時，也因此而成爲納粹的第一號作家和宣傳家。納粹主義和納粹外交人員的訓練，也都由他監督執行。

盧森堡一身兼兩大重要職務：一個是教育部，一個是所謂「納粹黨外事處」(Ausßenpolitisches Amt der NSDAP)。外事處附設有一納粹外交人員特別訓練學校，訓練一班舊德國的貴族黨員的子弟，高級陸軍官員的子弟，和少數納粹黨所保送的人員，然後派赴國外工作。

那學校在形式及管理方面，極像一個訓練軍官的兵營。考生在未經取錄以前，須受嚴格的體格檢驗。在兩年訓練期間，他們須受嚴格的軍事訓練，射槍，擊劍，騎術，游泳，拳鬥及飛行訓練——尤以最後一項最爲注重——佔課程的大部份。盧森堡在其所定納粹外交人員十大信條中說：「每一個外交人員均須爲一個優良的航空員」。

學校的四周，防範極嚴，因爲該校與其說是訓練外交人員的學府，毋寧說是祕密工作人員的養成所。所以不得不嚴加戒備。該校學員由第一流的教師教授，外國語的程度特別好。關於間諜技術，由軍隊裏最優良的專家擔任教授。里賓特羅甫的部下，則向他們灌輸第五縱隊活動的原則。盧森堡本人親自教授納粹的理論，使他們的頭腦堅定，不爲反納粹宣傳所動搖。

學生對於將來擬派往工作的國家之特性，及其政治經濟的機構，都須明白無餘。關於那些國家的政治及商業方面的重要人物，他們也都有很詳細的資料，可供參攷。他們熟悉各大人物過去的歷史、產業、弱點、及社會關係。一九三九年我探悉在該校任教的美國人，至少有四個，他們指示未來的納粹外交人員如何去到美國活動。

關於那學校情形，其唯一透出消息者，是該校畢業致試落第的一個學生。他在柏林告訴法國某外交官，說該校學生所受體格和精神的訓練，慘無人道，非常可怕，告發及恫嚇，均為常見的事，據他的估計，學生中願畢業的不及半數，後來這種情形被發覺了，希特勒馬上跑來對他們訓話，盧森堡同時也向他們重申「永遠效忠被愛戴的元首」的誓言。

在希特勒進攻蘇聯之前，外間謠傳盧森堡的權勢已被削減，可是並沒有確實的根據可資證明。反之，據納粹德國所傳出來可靠的消息，盧森堡雖在德蘇不侵犯條約簽訂之後，仍在繼續作反蘇活動，他在每月招待外交人員的宴會上，從未放棄對布爾塞維克主義的攻擊。法國淪陷後，他突然對天主教表示好感，據說他的工作人員曾在法國及西班牙鼓吹這兩個天主教國家與納粹德國合力打擊布爾塞維克主義。

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盧森堡的夢想成了事實，德蘇戰爭由他一手造成了。在德蘇協定簽定後盧森堡鋪囊中所儲存的各種悠久計劃及活動，這時都一齊再度搬了出來。他想把德國避皇的舊友斯柯羅巴茲基(Helmut Skoropedaki)捧出來，使其再度成爲誘致烏克蘭一班「主張收復領土者」(In Irrede

Hitler) 的中心人物，可是結果不會成功。盧森堡手下還有一位烏克蘭通，叫做塞利克 (Alexandru Serix)，正忙着編製宣傳小冊，但蘇維埃的烏克蘭人始終不為所動。那位素以「老頑固」見稱的哥薩克將軍格納伯伯爵 (Count Michael Grabbe)，在柏林集合少數外交人員，對他們宣稱，說哥薩克人極盼望他快些回去。盧森堡在戰前所貯藏的一些。前任外交官及法西斯將領更組成了所謂立陶宛，拉脫維亞，愛沙尼亞的「民族」委員會。

這些人都在等待着，盧森堡自己也在等待着。希特勒本已允許佔領俄國後，任盧森堡為總督的，可是，盧森堡却想推翻里賓特羅甫，去繼任外交部長。然而，事實上，他只得了一張前途渺茫不知何時兌現的空頭支票。

六 希特勒的劊子手希姆萊

希特勒的祕密武器中，有一種叫做「索引卡片」。無論什麼人都不能像薄小矮唇，獐頭鼠面的祕密警察首領希姆萊那樣知道這些索引卡片的重要。我們與其說希姆萊是一個富有智力的怪物，毋寧說他是一架有組織力的機器。因為祕密警察之所以獲得優異的效果，並非由於它的領袖有過人的機智，而是因為它的組織健全，能在特務工作方面與納粹黨及陸軍取得聯絡，且其所幹工作，也全都具有恐怖性質之故。納粹各領袖很知道如何来控制德國人民，他們一點也不放鬆，在德國境內各處遍佈着祕密警察，情

級員，及密探等。

希姆萊也是一位這樣的納粹領袖。他在祕密中工作着，人家只知道他那恐怖機構的成績，而不是它失敗的事實，所以他的聲譽日起，大有執無上威權，無所不悉之概。但他實際上何嘗是如此？他既不是祕密警察的創始人，也不是祕密警察的初次組織人。祕密警察實由戈林創設，而由戴爾士（Rolf Dietrich）繼起組織的。戴爾士是一個和雷而有胆識的官吏，在共和政府時期，為社會主義派的普魯士內政部長塞維林（Karl Severing）的親信助手。那時候他早已做了幾年納粹黨的祕密黨員。他是普魯士的第一任祕密警察長，後來祕密警察的幹部，就是由他那裏產生。

希姆萊初入警察界的時候，是任慕尼黑警察局長。隨後又在巴維利亞組織祕密警察，并在德國其他較小各省主管同樣職務。戈林把普魯士的祕密警察交給他負責，但附帶有兩個條件：第一，要求任命他最親信的一個助手。另一普魯士文官戴魯基（Daluge）為祕密警察的督察長（Inspector）第二，要求任命會充海軍軍官的赫德利克（Herdich）為祕密警察的副首領，俾其能在祕密警察會議中代表武裝部隊的意見。希姆萊之恫嚇德國平民，雖無所不用其極，但我們却可想像得到，希姆萊在祕密警察總部為戈林一派的人所包圍，為戴魯基及赫德利克二人所左右，也實無法行使他們大權。

此外，希姆萊又是希特勒精銳警衛隊的統領。那種警衛隊成立的目的，乃在防範挺進隊及納粹黨員中的過激傾向，為救共有數個團體，大多由貴族或可靠的納粹份子負責指揮。隊員不時予以調動，不使

其久駐一地，免得與當地人民過於熟悉，致有沾染反納粹思想的事情發生。由此也可見納粹政權對其內部的親信份子，也都不敢十分相信賴。

七 跳傘外交家赫斯

希特勒的智囊團叫做 Oernaz 或 Verbindungstaf (即連絡部) 好多年來都是由赫斯主持。赫斯是希特勒最信任的部下，與希特勒私交甚篤。除戈林之外，能為希特勒的繼承人者，就要算他了。一九四一年五月的月初，這位連絡部首領把他的總部從慕尼黑由空中搬到了蘇格蘭——他駕着一架米式機，作了一次很驚人的飛行。且在降落以前把飛機焚燬。

赫斯在這次飛英之前二十年，曾寫過一篇文章，題為「領導德國強者究應為何種人物？」(What sort of man Will He be who Will Lead Germany to greatness?) 其中最動人的有如下兩句：「為領袖的應具有大膽開創的精神，則後來者方敢繼起。」此文一出，博得不少的讚譽。一九四一年五月，他想得到更高的獎譽，於是，自願出充遊說英國再來一次新慕尼黑會議的說客。他果真具有開創精神，敢於發動冒險，期望英國投誠。但他究竟太胆大忘為了，要想有人繼起，怎麼可能呢？

赫斯那次飛英，可說完全是為了效忠希特勒，抱定了犧牲決心的表現。他之飛英，全世界人士都為之震驚，一向猜不透其真意之所在。其實。赫斯其所以願留居英倫，而以己身充當担保希特勒誠懇的人

贊，究竟所爲何事。他本人心裏當然明白。關於此事，他若失敗，則自非飽受攻擊不可，可是，他若一旦成功，則他年與戈林鬥爭時，就必可得一有利的解決，并可望由此從第三把交椅爬到第二把交椅，那時候，全世界對他，均將另眼相看。可憐他屈居在第三把交椅上，時常有被不妥協和不可靠的戈林出去的危險。

事實上，像黑斯這種辦法，並不能算是一種效忠，因爲那決不能獲得世人的好評，更談不上有什麼作用。赫斯的所謂效忠很有些像盜匪藐視法律的一種效忠，不過，從他犯罪累累，他也還是不會有自承罪惡的一天。

赫斯是納黨的副領袖。勞工營的拷打地室（Torture Cellars）與集中營的種種暗殺與刑罰，都由他負責主持。納粹虐待猶太人的恐怖歷史中，赫斯的大名是永遠逃不掉的。他是希特勒清黨屠殺的重要創子手。他是納粹「外藉德人運動」（Auslands-deutsche Bewegung）的主持人。奧國總理陶爾斐斯（Engelbert Dollfuss）的死刑宣佈書，也是他簽署的。在他的許多罪狀中還有一樁就是以受納粹指使的鐵衛軍（Jim Guard）刺殺羅馬尼亞首相屠加（Dica）。

德國新聞界以及一般爲赫斯作傳記者，均對赫斯效忠希特勒的事大書特書，並不抨擊他的犯罪行爲，這真是奇怪極了。這或許是赫斯在獲得希特勒的寵信之後，善自僞飾所致。赫斯具有與衆不同的野心，他希望希特勒在世時，他永爲他的暗影，希特勒去世後，他能爲他的嫡系繼承人。

此外，赫斯所受的教育及其條表，也和其他納粹領袖迥異。法國大使龐賽初次和他相見後，即作報告說：「赫斯爲希特勒最全才的助手。他的野心，不似多數納粹領袖一般易於暴露於外。他是一個很漂亮的青年，濃眉直壓鼻樑，兩頰豐滿，顯示着個性非常堅強。他的眼睛小而溫和。他在外貌及行動方面極像一個正派紳士。他說他畢生的野心，就是希望將來能親見德法兩國密切合作。我相信他這種期望是很誠懇的」

龐賽顯然從不知道這位「誠懇」的赫斯曾在一九二四年寫過一首詩，這首詩並曾在一九三三年希特勒當權之後重印過一次，其最末一節，有這麼幾句道：

「喂，法蘭西小子呀，我現在向你們打一個對不起的招呼：

你們這些人必須死去，然後我們

我們自己，和我們所有的貧苦人民，才可以生存。」

赫斯確曾受過紳士式的教育。他於一八九四年生於亞歷山大里亞，是一個百萬富翁的兒子，母親是瑞士人。赫斯小時候，在埃及由一位英國保姆撫養成人。當時國外日耳曼主義的空氣已很濃厚，其程度較國內的國家至上主義，還要國家主義化。因此英國保姆終難左右他的思想。國家至上主義在國內及國外所喊口號是：「惟有日耳曼主義可以拯救全世界」（*Am deutschen Wesen muss die Welt*

Gemein）。

赫斯在十五歲的時候才回到德國。他父親送他進萊茵河畔哥德斯堡 (Ludwig-Goslar) 城的一間高等學校去讀書。哥德斯堡就在慕尼黑危機時張伯倫與希特勒第二次晤談的地方。赫斯後來在大學讀書時，又常聽他的先生斯班 (Othmar Spann) 的講授，於是，他在兒童時代就已種下國家主義的種子。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時，赫斯的精神極為振奮。他加入了義勇隊，後來又在霍夏菲將軍 (General Karl Haushofer) 所統率的旅團中充任軍佐。據納粹上層圈內謠傳，他和霍夏菲兩人因為同性戀愛，才結識成朋友。

大戰將結束時，赫斯獲得了他的飛行執照。自此以後他就嗜飛成癖。約摸十八年後，他已任納粹德國的部長了，還會在一次飛行競賽中獲得優勝。

大戰將結束後，許多納粹領袖的傳記都差不多是一個典型，真是奇怪之至。其何以致此的原因，頗難索解，赫斯和他的同僚一樣，也是帶祕密反動性的「德意志同盟」(Bund and Treips) 的會員，這個同盟所處死的共產黨社會主義者，及民主黨人為數極多。赫斯自告奮勇，加入慕尼黑的萊布兵團 (Munich Leibregiment) 而與巴維利亞的蘇維埃共和國 (Bavarian Soviet Republic) 為敵。此外赫斯又為指使暗殺第一任巴維利亞共和國首相艾斯勒 (Kurt Eisner) 的人。

在這一不安定的時期中，赫斯的生活完全靠着為霍夏菲將軍充當私人祕書來維持。霍將軍從前本任旅長，此時則已改任大學教授，為「地緣政治學院」(Institute of Geopolitics) 的主持人。

霍夏菲將軍常被指爲納粹主義的「葛雷·伊曼倫斯」(Guy Immanuel)。據德希特勒在政治上及軍事上的一切措施，都是出於他的策劃。在拉丁美洲活動的納粹間諜，也是由他指揮。甚至納粹的軍事行動，也都由他觀察氣象來決定。希特勒之所以敢於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毅然發動侵攻波蘭，據一個蔡霍氏作傳的說。是因爲霍氏曾判斷屆時不會下雨，而當時勃魯齊區將軍則以爲屆時定會是一個雨季。

這種誇耀，對於這位蓄有濃鬚的霍夏菲教授，未免言過其實。他固然是希特勒的顧問之一，但是並沒有這樣大的實際勢力。他的任務，只事供給納粹行動的理論。希特勒爲求達到這個目的，曾耗盡了無數僑充科學家的人心血，而霍氏也就是其中之一。但納粹主義的措施及計劃並未在他的理論爲根據，他只不過提供一種適合於納粹帝國主義征服世界的妄念的理論而已。

有些人說納粹與蘇聯訂立德蘇互不侵犯條約，最初動機就是出自這位七十多歲的老將之建議，可是也另有些人謂他會德惠希特勒進攻蘇聯，他們說他是希特勒的俄國間諜專家。其實不然，霍夏菲所研究的是日本，他最諳悉日本的國情。在第一次大戰以前，他是巴維利亞參謀本部派赴日軍中的代表。一九一三年，他以研究日本士兵的精神所得，寫成一本書，題名「大日本」。這書是討論太平洋地理及政治的一種重要著作。自從凡爾賽和約訂立之後，霍氏就時常撰文鼓吹德日間的密切合作。

赫斯辭去霍夏菲的祕書後，就轉任希特勒的私人祕書。自後即成爲希特勒與霍夏菲之間的連絡員。

霍夏菲的談調頗為獨特，富於發揮，喜作神祕模糊之語，希特勒看了很受感動。霍氏常到希特勒在蘭堡的別墅（Lanesherg Fortress）所築的別墅去，指導希特勒和赫斯如何寫「我的奮鬥」。所以自後一般人稱這三個人做「納粹主義的三巨」。後來希姆萊在納粹黨中嶄露頭角時，外間流行一個笑話，謂四巨決定納粹德國的一切：霍夏菲出主意，赫斯設法要領袖接受，希特勒設法要人民接受，希姆萊站在旁邊監督，如果霍夏菲的計劃失當，就要將他吞噬。

希斯最初在納粹黨中，以領導街頭及會場的格鬥出名。所以希特勒在「我的奮鬥」一書中對他備極讚揚。在希特勒爭奪納粹領袖權時，赫斯是站在希特勒方面的，納粹黨在過去及目前，內部均醞釀有陰謀，但赫斯從未參與。

赫斯因霍夏菲將軍及其家庭的關係，有時也充當希特勒與德國各大商人之間的媒介。他那虛偽謙恭的態度與舉止，常能博得他們的歡心。所以各大商人對赫斯的信任，也並不亞於他們對戈林的信任。

赫斯的確沒有使他們失望。在他任納粹副領袖不久之後，納粹黨內的急進派正把「二次革命」的口號高唱入雲時，他即出來制止。此外，歷服挺進隊員中之反資本主義情緒。赫斯也是一個重要角色。在滑鐵盧戰中，他與戈林同為希特勒的重要劊子手。

德國各大商家很知道赫斯的長處。一九三六年，希特勒病得很利害，大商業家們都恐怕他就會如此突然死去，因此在一次秘密會議中討論繼承人的問題，結果一般重要的大商人和陸軍將領等一致決定：

希特勒死後應由戈林，當時的國防部長白倫姆元帥，及赫斯三人來共同繼承。那時赫斯業已四十歲了。其後，希特勒剛一發動戰事時，赫斯就一躍成爲納粹德國的「天子之驕子」了。

希特勒蒙難這位納粹副領袖已經很久了。他把赫斯造成一個很合他的理想的人物。赫斯在德國人前面，是一個對於人間一切享樂絲毫不感興趣，一心只爲社會福利着想的人，確是德國官吏的模範，恰與情奢奢侈浪蕩的戈林相反。

希特勒爲爾赫斯與人發生同性戀愛的謠言，於是早在他還未上台以前。就叫赫斯結婚。那時戈林正生了一個女孩，赫斯乃奉命以此爲模範。一般無識者遂謂赫斯是世界上第一個由「小姐」而變成父親的人。戰爭爆發後，赫斯做了一篇文章，自稱頭做納粹德國境內任何私生子的教父，赫斯飛蘇格蘭之後，「柏林人」報 (Berliner) 且謂他的出走，是爲逃避無敵未婚而實際上已作人母的德國婦女。

當赫斯駕米式飛機飛越北海時，可說是他生命史上的一個創舉，但是，這也是他最後的一次機會了。

八 親嘗囹圄滋味的獄史雷博士

雷博士在納粹黨中，曾一度成爲赫斯的勁敵。他於一九三三年十二月繼斯特拉塞 (Graf Helldorf) 之後，

出長納粹的所謂「組織部」。他很有資格希望繼希特勒之後，做納粹黨最重要的人物。但在希特勒當政之時，他卒爲赫斯壓倒，以後希特勒竟成了納粹的副領袖。雷博士是一個不能忘記舊仇，不能原

讓人家的角色，所以後來對這位希特勒的「親色耗子」，實還懷着無窮的憤恨。

赫斯飛抵蘇格蘭後，納粹副領袖遺缺又為波爾曼 (Martin Bormann) 攫去，雷博士乃再度失望。希特勒對雷博士的估價似乎沒有雷博士自己的估價那樣高。

雷博士是一個化學家，一九二四年才加入納粹。次年，他以自勒佛克森 (Lehrkusch) 的華本工廠 (L. S. Farben Factory)，勒索得一萬馬克運動萊茵蘭區的領袖權，居然貪緣到手。此後。他又從工商界獲得津貼，創辦一個名叫「西德觀察報」(Westdeutscher) 的納粹報紙。

從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三二年：雷博士曾屢次因擅自挪用公款而被人控告，他把在勞工隊員集會中所收的款項，盡花在科羅涅城 (Cologne) 的妓院裏。納粹黨員遺族存在他那裏的款項，也被他挪用淨盡。此外他又由亨堡親王 (Prince Christian Friedrich von Schaumburg) 處騙得一萬五千馬克。在此六年之中，雷博士曾五次被判入獄。有一次他喝醉了酒，幾乎將社會主義領袖維爾斯 (Otto Wels) 和科羅涅城的警察局長包奈克 (Baumlöcher) 殺死。

有了這些本領，不能沒有酬報。一九三一年年底，雷博士遂被任為「納粹黨組織部」的副部長。次年，升任部長。

一九三三年五月二日，雷博士的槍手把勞工協會的辦事處強行佔領，他得意時期於焉開始，勞工協會被解散了，雷博士被任為世界上最大的公司聯盟——「德意志勞工陣線」(German Labour Front)

的領袖。這是納粹黨最重要的職務之一，因納粹黨通過「勞工陣線」中的暗探，就可刺探出德國勞工階級的真實情形。

德國物價高增，工資都按一九二八年時的指數少了百分之二十五，所以德國勞工所想像的社會主義思想，根本與希特勒的社會主義思想相差甚遠。勞工每月所得的工資，須以百分之二十五繳付納粹黨和勞工陣線的賦稅。至於其他各種苛捐雜稅。更多至不可勝數，雷博士所負的任務，就在說服德國工人，要他們相信這就是社會主義。或如希特勒某次所說的，要「繼續以巧妙手段。盡量宣傳，務使他們認為地獄就是天堂」。截至目前為止，我們尚不能說雷博士在此方面已有了成就。

雷博士對於他所負的任務，確已絞盡腦汁。最初，他向勞工階級担保，說在不久的將來，他們的工資必將趨於合理化，想藉以緩和他們惴惴不安的心理。可是，到後來工人在勞工陣線集會中一再提起他前此所作的担保。至於其餘的事，則一律交給秘密警察去負責處理。

雷博士的第二個步驟，就是組織「由愉快而產生的力量」那一套機構。這并不是他的主意，這是戈培爾想出來的辦法。許多勞工和外國人都為這東西所愚。那個機構中自己設有戲院，自己備有遊艇，全國都有假期旅行，野遊，或划船等組織。假使納粹黨能拿出一點津貼，使工人能以低廉的代價，得到旅行的樂趣，那倒確是一件很好的事。所可惜的，是工人尚須自己掏腰包，納粹黨及德國財庫根本分文不手津貼。納粹工人一方面尚須付出價款，另一方面勞工陣線又還不斷地向他們榨取，那可就不是一件好

雷博士自以爲德國的勞工就已自行集會建立一個「人民劇院」(Revier's Theater) 賀費特 (Gerhart Hauptmann) 的名劇「織工」(Weavers)，即是在那個劇院上演而博得全世界的稱譽的。早在雷博士尚未出名以前，德國勞工協會也已建築有極安適的自備房屋，每逢節日，也作團體旅行，當時組織的規模雖不及雷博士的宏大，然而參加的人員却無須出錢去聽納粹的宣傳演說，那時候的德國勞工，並不受雷博士勞工陣線的榨取，也不受雷博士手下劊子手的刺探，更沒有神祕警察的恐怖。這隻手給他，那一隻手奪去，這本是納粹的慣技。

以過去的成績，據爲己有，也是納粹的慣技，而雷博士則特別喜歡來這麼一手。一九三八年，溫莎公爵 (Duke of Windsor) 來慕尼黑，這位勞工陣線領袖的雷博士引導他參觀巴維利亞工人區的模範建築，並說這是納粹專爲德國勞工階層建築的，公爵當時所得印象的確很好，因爲那些建築物確是不錯，不過事實上，那些建築物却無一不是納粹上台以前的東西。

一九三三年六月，雷博士出席日內瓦的第十七次國際勞工會議，就在國際勞工局大爲宣傳其納粹政黨的宣傳，結果撿了一鼻子的灰：他非常憤怒，在日內瓦招待德國記者席上大發雷霆說：「試想古巴。

島境內，及波利維亞這些愚竇國家也要和德國及意大利有同樣的選舉權，及其他的權利，豈非胡鬧之至？南美派這一類國家，我連它們的名字都不知道，住在那些地方的名族叫什麼名字，我也毫不知道，那樣的家伙，怎能與文化水準很高的德意志民族放在同一的水平線上？」次日，雷博士就被召返國，據說

希特勒對他極爲不滿。

雷博士除却頒佈各種戰時禁例之外，還在德國勞工肩上增加了不少負擔，所以他的工作更不容易展開。希特勒剛發動戰爭的最初幾月中，雷氏就承認他的初步失敗，希特勒在戰爭初期，即規定工人每日須工作十二小時，並廢除工作時間以外的額外工資，勞工階級迫不得已，只好以怠工來報復，他們在工廠牆壁上潑貼諷刺圖畫，並散發傳單，要求取消此項法令。雷博士派他的幹訓宣傳家勸告工人說：「本爲祖國犧牲之旨」，不應再有反對，結果毫無效力。於是他們召開勞工陣線的集會，冗長的演說因而滔滔不絕。雷博士且親自出馬，其所召集的第一次集會，是在漢堡的布盧姆（Blum）及瓦斯（Wass）兩碼頭上舉行，開會時間之久，罕有其匹，開會時，魯爾的軍火工人，西勒西亞（Silesia）的礦工，以及柏林維也納，和慕尼黑黑的勞工，情緒都不很好，一九三九年十一月，雷博士勸告希特勒取消那些法令。據說當時會發生一幕很可怕的景象。但這些法令終於還是被廢除了。

雷博士是德國勞工銀行的行長，該行數萬萬馬克的資金（一九三九年達六萬萬馬克以上）完全在他人的掌握中，故雷氏無時不爲他自己的私囊打算。他在格隆瓦德（Gronwald）購買了一所極富麗的別墅，所置的產業也很多，至於擁有德國各大商業托辣斯的股份，更是不用說了。德國佔領比，荷，及法國的一部分後，雷博士也費效戈林，開始搜括佔領區的財富，因而德國勞工銀行現在在布魯塞爾，巴黎，阿爾及爾，丹麥與斯德等處都設有分行。

一九三〇年的大選，爲納粹初次的大成功。在那次大選期中，我曾目擊雷博士在科羅涅一個黨大會中演說，他走上講台時，兩隻腳搖搖不穩，因爲他喝醉了酒。但他對於醉酒，顯然很有訓練，所以他仍能維持到散會。開會最後，我看見他又在柯尼克酒店（Koenigliche Weinhaus）喝醉了，由兩個人將他扶出去，其時他已在昏迷狀態中了。這就是希特勒授以虐待德國勞工之責的人物。我每次談到關於德國勞工陣線或「從愉快中所得的力量」一類文字時，就不禁要聯想到這位面貌兇惡，無時不在醉酒中的雷博士，尤以他那次在科羅涅城喝醉了酒，由他的兩個嘍囉扶出酒店之一幕，更不時縈迴在我的腦海中。

九 歐洲的飢民達雷

在歐洲大陸上，大多數人從未聽到過這位「統制糧食者」的大名，這確是一件幸事。但是，如果這位先生的眼睛一旦看中了羅馬尼亞及匈牙利的谷米。塞爾維亞的豬肉，保加利亞的煙草，法國的水菓和酒，西班牙的橘子，丹麥的牛油，以及荷蘭的乾酪，那就除了交給他之外，再沒有別的法子，因爲在他這一注視的後面，還有納粹軍隊的刺刀爲之後盾。

他的名字叫達雷，他是希特勒的糧食部長。自法國崩潰後，他就一手操縱蘇聯以西的整個歐洲的糧食政策。

達雷在八年任職期中，在全世界各地遍組農業情報網，其秘密的程度並不亞於其他間諜工作。糧食

都歸用大批工作人員，記載世界各國的糧食產量，其調查的精確，甚至各國自己的政府也深愧不如。丹在波納洋估價以前幾個月時候，其首相斯托林（Stouring）曾憤憤地對一個外國外交官說「納粹對我們所產牛油和牛乳的數量，比我們自己還調查得清楚。」

達雷所統轄的糧食間諜，名叫「達雷仔」（Dart Boys）他們密佈歐洲各處。無論在淪陷或未淪陷的國家內，都有他們的蹤跡。他們來時，都掛着簽訂農業協定官方代表的招牌。其所作統計，常極可靠。他們在外交掩護之下進行工作，有的充當德國公使館農業隨員，有的充當領事，副領事。有些人還以食物用包裹給住在德國的親友去，因之獲得雙倍的額外收入。此外，納粹在國外的各團體中，也都設有農業專家。這類人物常被任為糧食間諜的負責人。在這些國家中，凡達雷大名所至之處，飢荒必隨之俱來。

達雷因職務關係，很少與外國外交官及新聞記者發生接觸。在納粹德國以外，很少有認為德國領導人物者。但事實上他對於納粹的政務，有極重要的發言權。若干年來，他在私人方面很能左右希特勒，雖在今日，也還是這樣。

達雷對於種族主義鼓吹甚力。他能得到希特勒寵信，其原因也就在此。他不但是德國的糧食大王，而且是希特勒的德國「種族純一」理論的衛士。他的「糧食戰」現象雖然大功尚未告成，但他對希特勒日耳曼族的血統，確已煞費苦心，很賣力地幹了一番。

達雷雷已經看了好幾本書，發表他對於種族問題的意見。我會把這些書耐心閱讀過一遍。那是很多年前的事，當時我即認為他那「血和土交配成的新貴族」(A New Nobility From Blood and Soil)及「猶為日耳曼人之模範」(The big as criterion of Nordic)兩書中所寫的理论決難實現，但今日那些東西竟然實現了，至少是有一部分已經實現了。

希特勒會說：「世界上凡是出身於不良種族的，實與糟糠無異」。達雷深信標準的日耳曼族應該是

他所讀「較為進步的社會集團」的產物。他同時相信日耳曼社會的形式必定高於任何其他種族的社會。他想撥轉時鐘，重建那種古代社會的形式。他認基督教破壞了典型的日耳曼社會形式，日耳曼人的生活所以羅馬化，完全是受了基督教的影響。基督教還帶來了猶太主義，資本主義，自由主義，及布爾塞維克主義，所謂「羅馬化的四位啓示騎士」。據達雷說，德國人民是十足的農民血統，要有這種農人血統的純質。才可談得到澄清民族血統。但最重要的是德國農民必先「廢止羅馬化」(De Romanized)。

於是達雷在德國各鄉村中着手實行生物適應化，種族純一化，及種族系統化等措施。他的機關調查每個農戶的家世，遠至一八〇〇年時。若發現有血統稍不純粹者，即宣佈他不宜於在德國務農，沒有執掌產業的資格。達雷辦公室內所彙集的索引卡片，共包括之廣，全世界無有其匹，那裏面包括有數百萬食政策農人及其家屬等的詳細履歷。

達雷主張自由戀愛，但事實上在他統治下的德國農民並不能自由去愛他所愛的人。因為達雷並不認

爲每個德國婦女都適於爲農人的妻。達雷把所有婦女分爲四大類：第一類是離具有結婚資格的，第二類是結婚不應速受義議的，第三類是可以結婚，但因其缺乏勇猛性的遺傳，不准生育子女的，第四類是不准結婚及不准生育兒女的。那些不幸屬於第三類或第四類的婦女，若不幸而生育子女，則其父母皆須受嚴厲的處分。達雷總算還沒有仿效古代斯巴達的先例而棄置幼孩，但將來他也許會這樣幹的。

這些禁例還沒有仿照降低猶太種族的身分之辦法正式採用法律的形式。但每個農民都已深切了解，倘不服從這種種禁例，他們的田地就會被奪去。他們無時不在所謂「地方農民領袖」(Local Peasant Leader) 的監視之下。這位小官吏，達雷稱之爲「保育專家」(Zuchtward)，他是達雷的耳目，專替他辦理「澄清血統」的工作。舉凡農村中的穀牛及孩童等。這位「保育專家」都有精確的統計。

達雷所著的書裏面，還有所謂「生殖助手」(Assistant Generator) 的一種謬說，不過現在還沒有付諸法律實施就是了。所謂「生殖助手」，即是一代替因疾病或其他原因不能生育的丈夫製造後嗣之謂。一九四〇年初，法國情報機關的報導若果正確，則達雷尚有另一種狂妄的觀念，即主張德國人民的出生應和山羊的出生一樣。

好多年前，達雷及其助手，一直高唱建立「人類畜牧場」(Heredofield) 的辦法，以培植最純粹的日耳曼血統。秘密警察的機關報會說：「以一千個具有最純潔的日耳曼血統的少女置於人類畜牧場中，使之與一百個最高貴種族的男子相交合，那麼，一年以後就可得到一千個純粹真種」。現在據法國情報機

獨的報告，東普魯士已設有兩個這樣的「人類畜牧場」。不過地點極爲偏僻，戒備之嚴，彷彿和一個軍事地區一樣。其所挑選男女的方法，也祕密的很，外間無從獲悉。

實行這種製造新人種的辦法，在歷史上早已有了先例。古時候，替都斯（Tiro）攻下耶路撒冷時，其部下殺戮猶太人動以萬計。替都斯下令選送面目姣好的青年男女各四百人，用船運送回羅馬，其用意是在培植一個最美麗的奴隸種族。但，在一天夜裏，這一羣青年男女突然全體跳海自殺了。他們寧願到海裏去尋快樂，而不願被俘至羅馬。

如果達雷知道這個故事，我相信他一定不管這個故事在納粹德國將如何流行。

達雷過去藉藉無聞，嚴格說來，他並無充任現職的特殊資格。他和希特勒許多別的親信一樣，是出生於國外。他於一八九五年七月十四日生於市魯·愛里（Buenos Aires）。他的父親並不務農，而只是在阿根廷開設一個大商號，推銷德國所製的貨物而已。

達雷也和其他在國外出生的納粹領袖一樣，幼時就崇拜國家至上主義。他認爲第一次世界大戰是「診治病態世界的良藥」。他當時在後備軍中服役，大戰告終後。他一無所得，學識既無，過平民生活又感不慣，無已乃投奔納粹。

他父親有一位老友，供給他學習農科。他於略受訓練之後，就被任爲一個模範農場的經理。但結果他失敗了，他把失敗的原因遷怒於猶太人。不久，他任職於柯林斯堡（Koenigsberg）的東普魯士農業

局 (East Prussian Chancellor of Agriculture) 薪金優厚，怒氣才漸消除。

東普魯士因有波蘭走廊與德國其他各部隔絕，這一帶居民四週為「劣等種族」所包圍，故他們早已傾心於特主義。一般德國貴族黨員的財產，雖與小農無毗連。但他們還是不能救助這些過勞的場主，因為在希特勒活動的背後，還有德國堅強的國防軍。起先，這班貴族黨待達雷很好，不時在他們的別墅中招待達雷，並津貼達雷所辦的「國家社珍主義」週刊 (National sozialistis che Lan Post)。

達雷在農業局任職期間，其帳簿突然被人發覺有舞弊情事，因之遂被免職。他在柯林斯堡所享受的優裕生活，從此也隨之告終。其實，納粹領袖犯這類情事者，並不僅達雷一人。達雷這次又遷怒猶太人，說是受了他們的影響。

大約是這這時候，納粹極想研究出一個極動人的農業計劃來。因為一九二八年德國國會改選時，四百六十五個議席中納粹僅獲得十二席，遭了一次大失敗，希特勒的總部因而決定展開廣大的運動，以爭取德國的農民。

達雷最初是由一個長期資助納粹的德國大地主的介紹而得見希特勒的。當時，希特勒即會與這位未來的第三帝國生育專家交談至兩小時以上，談話時，希特勒聽得多而講得少，這在希特勒可說是稀有的事。結果，希特勒令他負責從事農民運動。當日晤談時，希特勒的哲學家恩森堡也在場，事後恩森堡向人說希特勒對於達雷的種族理論極為賞識，對於他的舉動表示贊同。幾年之後，達雷果在三

十八歲到少齡，一躍而為希特勒最年輕的部長。

我曾聽他連續好幾次演說。他的腔調略帶外國重音，講話時頭常偏向一方，兩手互合，極像傳教師作禮拜時的姿勢，不過所說的不是那一套道德話而已。一言以蔽之，他的態度演說并不高明。

他「羅馬化」的程度似乎還甚於「日耳曼化」的程度。他的身材很高，喜歡騎馬，愛聽神話故事。他是威希警察首領希姆萊的多年好友，在希姆萊所統轄的精銳衛隊中佔有一個極高的位置。他也時常穿着精銳精隊的黑色制服。

達雷任職八年期中，藉口種族改良，極力限制德國人民的食物，以致德國的兒童患軟骨病者增加了百分之七五以上，成餓殍者有兩百萬人，而染花柳病者也較希特勒上台時增加百分之四十。

戰爭爆發後，達雷規定每一德國人每星期得肉一磅，每月得牛油一磅。豬油及肉類的消費。較戰前也減少了百分之四十。在一九四〇年九月以前，法國人每天可以吃四個雞蛋，現在，只能吃一個雞蛋了。德國人的糧食雖受嚴格的分配，然而較之其他在達雷糧食獨裁統治之下的二萬萬歐洲人所得分量，已覺豐富得多了。蘇聯以西的歐洲各國人民的消費量，即較德國人民少百分之二十五至百分之六十。達雷雖不能誇口說德國人民營養充足，但至少可以誇口說德國人民營養不致如其他歐洲人民的營養那麼不良。

達雷對德國農民的施政，雷厲風行。他頒布了遺產法，禁止農民出售，或抵押其產業，因此大多數

地主雖欲榨取，也無從下手。致於一般與納粹黨勞工隊或「糧食庫」有關係的倖運兒，到無可奈何時，尙可向糧食庫借款，但須繳納不少佣金，因爲有勢力的納粹黨員是不願做沒有報酬的事情的。

在達雷還沒有當權以前，農人莫勒（Hans Mueller）可以自由把他的農產品隨便賣給他所願賣的人，可是沒有多時，他便再不能如此做了。因爲農村已被「從萬惡的猶太經紀手中洗刷了出來。」其實，好久以前，莫勒就曉得早已另有一個經紀人起來代替了，那就是國家糧食庫。這個經紀人在種族上雖很純潔，可是使他花錢却更要多。他限制着莫勒窮年勞苦的成品一定要賣給什麼人，且一定要賣什麼樣價錢。他規定了稻子應該下什麼種，收藏要用什麼方法。他還注意着莫勒的政治教育。據說，要做一個好的德國農民，先懂得管理農場是不夠的，必須每人買一本「我的奮鬥」。而最嚴厲的，是人人都還必須去讀它。

許多的手伸了出來，向莫勒索取「樂捐」。黨，他不敢拒絕，而希姆萊的鄉村「黑衛隊」，他更不敢拒絕。「冬賑」徵集番薯，穀米，牛酪，奶油等，都找着了莫勒，好像他從來不曾捐助過似的！

達雷原會應許將農民因借債度日而致形成奴隸生活的情形加以革除。可是現在在糧食庫執政之下，對於農村負債，他們毫無半點憐恤了，他們只知一味地以增加他們自身的收入爲前提。

達雷也曾允許減低躉稅，但今日的稅捐，還是有所得稅，人頭稅，軍稅，戰稅等，名目繁多，而且稅額都由百分之十陡增到百分之十五。

待所有一切稅捐及債款利息通通付過後，莫勒發現自己所剩的已不足他的全部收入之半了。

如果莫勒所有的田產不是十四畝，而是二百五十畝時，那情形將是何等的不同！他如有了二百五十畝地，他就是達雷所應許創造的所謂「血與土交塑而成的新農村貴族」階級了，他便可以得到把他的產品賣給任何他高興賣與的人特許執照，那麼一來，他將可以獲得較高的價格，再也不會有借債一類事情來麻煩他了。

達雷在舊德貴族黨員和大地主方面，發現了他的「農村貴族」。二十五位「地方農村領袖」中，有十五個是個勢於屬他的指揮。有人說達雷的糧食部與舊日普魯士的上議院的情形極相類似。

普魯士上議院將傾覆之前，德意志共和國曾以十億馬克津貼普魯士的一般貴族黨員。可惜據後來證明，有些貴族黨員把所得的津貼盡花在黨地·加羅（Monte Carlo）的賭場中，還有的則用以購置產業去了。當時德國總理斯萊徹將軍（General von Schleicher）提出恫嚇，說要揭發這個賄賂案時，與登堡總統因當不住東普魯士貴族黨的要挾，卒將斯萊徹免職，而以希特勒繼任。由此可知希特勒與達雷對待舊日貴族之優厚，實更甚於韋馬共和國時代。納粹黨綱內雖載有允許將各大產業分配給小農民的條文，但這不過只是一紙具文而已，希特勒對貴族黨員所許的諾言，仍舊照常履行，不但他們的產業未受損失，且據專家估計，達雷在直接或間接方面對一般貴族黨員的津貼，較舊日韋馬共和國時還增加了百分之五十。

一九三七年，巴黎世界博覽會開幕。不少貴族黨員出現於巴黎交際社會場所，他們都紛紛向人誇示納粹政權的好處。於是有人問那其中的一個，謂集中營的情形究竟如何的呢？他答覆道：「那自然壞透了，但有什麼辦法呢？不過，不管他如何，我的豬仔總算賣了高價。」

達雷常到希特勒的貝科夫堡去，但從未到近在咫尺的戈林寓所去過。因為他曾持有希特勒為之撐腰，而屢次違反戈林的命令。戈林亦不會記這些事，他叫達雷做「營養不良的部長」，他根本不相信達雷那種種族理論。有一個銀行家會問戈林為什麼不滿意達雷，戈林氣沖沖的答道：「有什麼嗎，這蠢貨總要我與他同流合污！」關於達雷生活的醜聞，自戈林方面傳出者頗多，尤以關於他實施「生育新計劃」方面的為最多。

希特勒若一日在台上，則戈林一日不敢奈何達雷，但是假若這位第二號納粹領袖一旦變成第一號納粹領袖時，那願……

四·墨索利尼·希特勒的出色後隨

一九三八年年底，法西斯的代表們在張嘴瘡笑的墨相面前狂吼，要求擷取科西加（Corsica），突尼西亞（Tunisia）和尼斯（Nice），那時候，有一個法國的部長告訴我說他曾主張把墨索利尼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寫給法國部長與官吏們的許多信件拿出來發表。那些信件如若真是果真發表了，則將是墨索利尼收受法國津貼，作為由反戰社會主義者轉向而為激烈干涉主義者的部分條件的首次官方證實。

據我的情報員告訴我，打斷那位部長的主張的，是國務總理達拉第，達拉第說，「凡受了法國津貼的人，總會要替法國政府着想一下的，否則，「那不久就將再沒有什麼大政客可以去賄賂的了」。這麼一來，那些價值無比的文獻，便仍只好在法國外交部的保險箱裏睡覺了。

自墨索利尼登台以後，那些東西始終是他所夢寐以求的。他曾三番五次地想方法把它們弄回來，可是都不曾成功。一九三五年賴伐爾到羅馬時，曾和墨索利尼開過一次談判。那次談判開關了法西斯侵略阿比西尼亞的大路。墨氏在那次談判所提的要求中，有一個就是收回當日那些往返商洽的信件。賴伐爾雖答應了，可是始終不曾把他的貨色交出來。據他對一個副官說，那些東西有一天會比那些阿比西尼亞的沙漠還要值錢得多的。

直到納粹軍隊和維琪政府（Vichy）那班人把法國打敗後，墨索利尼所夢寐以求的那些信札，才完

全得到了手，一個不成文的停戰協定就是這些東西所換得的代價。不過，賴伐爾並不是一個比墨索利尼還不如的馬販子，我相信他一定另在一個安全處所保藏有若干影響下來的副本。

墨索利尼從法國得來的金錢，奠定了他那迅速而驚人的事業的基石。白里安 (Aristide Briand) 在還沒有反對社會主義者以前，曾這麼說過：「凡因轉向而反對來攻擊社會主義的社會主義者，在統治階級看來，是極有用的。」就憑着這麼一個道理，墨索利尼於短短的八年之內，由一個為鄰國効勞的人，一躍而成了意大利的首相與法西斯主義的首領。他達到這個地位時，年齡還不過三十九歲，不過，他所有的一切學識，野心，演說天才，以及相當程度的運籌才幹與宣揚意識等等均非其所以致此儼起的原因。對於這問題，墨索利尼自意大利與全世界反動勢力方面所得到的撐持倒是可以解答大部分。

墨索利尼爬起來的史實。造成了今日建立法西斯獨裁政制的正統典型。他的成功，是基於一般從上次歐戰戰場上回來的老練員兵之極度不滿的心裏，那時候，意國雖戰勝了，可是分贓極少，國人皆致不滿，同時中產階級破產，勞動階級飽受失業的痛苦，最後，其尤要緊者，是一般法西斯主義的敵人們彼此之間正弄得四分五裂。

這位後來的法西斯黨領袖，也和希特勒一樣，不會得到真正勞工階級的擁護，反之，倒是獲得了全國大商業協會 (Confederazione dell'Industria) 和許多有勢力的軍事將領的贊助。「他的啤酒窖暴動」，是一次短命的阜姆 (Fiume) 叛變，但是，在這種場合，他比希特勒聰明得多，他把那件事完畢

交給那決心謀叛的鄧倫齊 (Girolamo Amunzio) 去做，自己只坐享其名，而且實際上早與爲早姆遠征募捐的完全脫離了關係。

墨索利尼雖說如此小心，可是那次事件的可恥結果仍幾乎把整個的活動給摔碎了。在這種危急的時候，大商業家與軍隊挺身而出來拯救了他們未來的「救世主」。一九二〇年十月全國實業界公會總書記阿里維蒂 (Sig. Olivetti) 和墨索利尼訂立了一個協定，保證在財政與政治上予墨氏以實地的援助，但須以法西斯黨負責保衛他們那正受威脅的利益爲交換條件。

從那一天起，墨索利尼在財政上的困難便完全消滅了，金錢不斷地流入法西斯黨的財庫，及具各省的省黨部。他們因之建立了很大的武備，墨索利尼的突擊隊名叫「斯奎德里斯基」(Squadristi)，他們把工會的建築物 and 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的報館加以搜查，并放火焚燒，他們把反法西斯的領袖加以毆辱，拷打，割去手足，甚至於殺死，他們把市區的勞工職員趕走，在警察和軍隊不聞不問的情形之下，他們把全國各省都造成了恐怖狀態。無論羅馬政府怎樣自稱他們是崇奉自由主義的，或是崇奉國家主義的，他們對於這些罪行的態度，總是和十年以後德國布魯賓 (Brünning) 內閣與巴本內閣對於納粹主義的態度一樣。他們認爲法西斯俾人搗亂，是勢所不免的，他們說這是「肅清」全國及鎮壓「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的恐怖」，我會和意國前首相尼蒂氏 (Francesco Nitti) 爭論過墨索利尼登台以前的意國歷屆內閣的政治，爭論得聲嘶力竭，仍是毫無結果，譬如說，他就告訴我，說意大利的政界老手居里蒂

(Giellini) 曾經說過：法西斯的殺害與突擊，只是爲意大利恢復秩序作預備工作。等到布爾塞維克的危險消滅以後，居里蒂又說，他將控制墨索利尼及其法西斯運動。

事實上不然，兩年以後，墨索利尼與實業家簽訂之條約，橫踞在副里納 (Durina) 山嶺的政府門前，他又做了意國的首相。這是一個絲毫未經戰鬥而得來的勝利，進兵羅馬的趣劇，和政府與國王之忍辱含羞，受制於大商業家與軍隊的高壓之下，表示第一個法西斯政權業已打入了一個歐洲大國。

墨索利尼的政權在開頭幾年，非常飄搖不穩，有好幾次業已瀕於傾覆的邊緣，有好幾次是由他那些在皇宮中，軍隊中，及商業圈中的後台老闆和西歐民主國政府把他救助起來的。而替墨索利尼披上一身獅皮，墨索利尼應該感激到萬分的外國政治家，就是那時英國的財相邱吉爾。

一九二七年一月，邱吉爾鎮壓英倫罷工獲勝之後，馬上去觀光法西斯統治下的意大利。據他當時所發表的言論而言，他確可算是法西斯政權的一個最忠誠的擁護者，和一個非常佩服墨索利尼的人。

他當時對報館記者發表談話道：「假如我是一個意大利人，我必定一德一心，自始至終贊助法西斯反對列寧獸慾與妄念的必護鬥爭」。他又特別提出法西斯主義的國際化一問題來，說那是「解除共產主義毒性的必需解毒藥」。

可是，他那最有力的字句，還須留贈那個向法西斯一切陰毒事業負責的個人，即墨索利尼本人。他說，「我不能不和許多其他的人一樣，深深佩服在負担如許的重任之下，經過如許的危險之役，仍能保

持他那文雅淳樸的態度，恬靜脫俗的姿勢。誰都可以看得出來，他除一心思索所認定的意大利人民的至善之境外，任何事皆所不問，反之，雖與他自己漠不相干的事情，他却也具有很大的興趣。

邱吉爾花了十三年功夫，才認識了這位令人折服的宰相，原來還是一匹「被鞭策的走狗」。

邱吉爾這種態度，與十年以後張伯倫和哈里法克斯所採取態度沒有什麼不同，在這種態度後面，還藏匿有一種信念，即相信墨索利尼的法西斯主義是反對共產主義的堡壘。爲維持這座堡壘不使被打破，英國保守黨的領袖們準備了許多犧牲品，其中還包括他們本國的自尊。爲了這種態度，阿比西尼亞喪失了獨立，亞爾巴尼亞併入了墨索利尼的羅馬帝國，西班牙掀起了一場內戰，內戰結束後，佛朗哥將軍在西萬提斯（Carthago）的故國建立了他那暴虐的獨裁政治。

英國保守黨的大臣們拋給羅馬這獅子如許塊塊大肉，原是希望把墨索利尼拉到西歐民主國家這邊，使法西斯意大利成爲德國後門口的潛在威脅。這種計算的根據；是相信意大利爲他本國的利益着想，決不會容許勃倫納關（Brenner Pass）的那一面有一個過於強盛的德國。可是，保守黨人却忽略了一點，即無論希特勒與墨索利尼兩人彼此之間如何不歡喜，然而他們的命運總是被制定了要患難相共的。假如一旦希特勒倒台了，墨索利尼也必很少機會可以倖存。而墨相又是一向把自己的利益放在意大利國家的利益上面的，因此，他必然寧願做希特勒駐意大利的納粹黨負責人，而在反法西斯的意大利佔據一間囚房。

關於兩大獨裁者之間關係惡化的事，曾經孕育出無數的幻想，曾經流傳出無數的「內幕」祕聞。我記得那個觸霉頭的法國駐意代辦布隆德爾（M. Brunel）到巴黎時，曾警告當時法國外交部的老闖，那野心勃勃的龐萊，設軸心國家決沒有拆夥的時候，墨索利尼會說那是「鋼鉄般的條約」。龐萊聽了這話，大發雷霆，在一幕很可怕的情景之下，他罵布隆德爾的判斷是爲他自己憎恨墨索利尼的心理所左右，而非出自冷靜的理性觀點。這場吵鬧過後兩小時，龐萊向各報的外交記者報告，說他得到可靠的消息，墨索利尼與希特勒之間業已發生嚴重的裂痕。當一九三九年五月德意兩國簽訂軍事同盟時，那執迷不悟的法國外長還說墨相的女婿齊亞諾伯爵（Count Galeazzo Ciano）曾告訴他，說那不值得大驚小怪。

一九三九年八月，就在大戰爆發以前不久，達拉第內閣的一個閣員，德孟齊（Anatole de Menthis），很得意地告訴我，說齊亞諾伯爵在貝科夫堡與德國元首商談時，突抽起烟來了。德孟齊笑得頭都仰到腦後去了，細細描述那些烟雲如何偏把一個向不抽烟的希特勒趕入失望境界的詳情。這位法國部長堅謂齊亞諾伯爵好些年以前就戒烟了，這次把香烟前拿出來，分明是爲的要困擾那位元首。

戰爭爆發以後沒有多時，從龐萊那裏流傳出來很多故事，說意大利的兵工廠正以極高的速率在加緊爲法國工作，事實上，我們自然從未看見有意國武器或飛機運到國法過。另一方面，倫敦也傳出一個報導，說墨索利尼決計置身戰外。聽說他會這麼說過：「他們可以把我拉進戰渦，但那要他們抓住我的頭髮拖着走才行」。因爲墨索利尼是個禿頂，所以這故事一時被認爲是一個很好的笑話，同時也被認爲是

意大利守中立的有力保證。

這些甚於香烟雲霧和光頭禿頂的希望，不到十個月的時間，便完全消滅了。一九四〇年六月十日，墨索利尼違背人民的意旨，把意大利拉進了戰渦，這匹狗，趕忙追隨在獲勝的希特勒背後，去拾取掠奪品。

墨索利尼政權的許多內在弱點，多年來原還隱瞞着的，迨意大利一參戰，於是幕幔揭開，顯出一副駭人的景像。演悲劇和受苦難是意大利軍隊註定了的命運。魏菲爾將軍追趕着抱頭鼠竄的格拉齊亞尼元帥 (Marshal Graziani) 幾個師團越過利比亞，尼羅河畔的英軍從阿斯達公爵 (Duke of Aosta) 的軍隊手中奪去了英屬索馬利蘭，意屬索馬利蘭和阿比西尼亞。希臘戰場更是一個絕大的悲局，竟連墨索利尼自己的衛隊都要增援，否則怕有新的企圖會要危及他的生命。哈，這獅子簡直不敢走出他的囚籠。

雖則隆美爾將軍 (General Rommel) 的非洲軍隊解了利比亞的圍，李斯德元帥的師團把墨索利尼從阿爾巴尼亞決戰的慘敗中救了出來，然而納粹盟邦總無法把墨相在上述各戰役中所喪失的威嚴重建起來。同時，達爾馬提亞海岸 (Dalmatian coast) 與希臘某些地段的獲得，及由希特勒因講客氣而留給墨索利尼的哥羅西亞 (Croatia) 與門第內哥羅 (Montenegro) 兩個傀儡保護國，也都不足以使意大利人忘記羅馬已經是由德國祕密警察在統治着。

羅馬，這永恒的都市 (Eternal city)，已是納粹佔領下的土地了。一切事情，威內薩皇宮 (Palazzo

Venezia) 再無權作最後決定，凡百政令，都出自聖母路 (Via Sirtica) 上的西達大飯店 (Hotel della Citta)，一般遊客，人人個個都曉得，在那設備舒適的建築裏，納粹業已設置了他們的總部。

方頭而面帶斧形的人物，遍佈意大利各部的辦公廳，法西斯官吏的重要決定，必須先經他們核准，納粹太上皇已在法西斯政府機構裏面安置了守望狗。同時，意大利的經濟，也是由希特勒的一個流動經濟大使名克羅蒂斯博士 (Do. Clodius) 者在指揮。

墨索利尼是一個痛苦萬狀，日趨淒涼的病人，他整天坐在他那有名的書房裏的那隻有名的寫字枱旁邊，簡直度日如年。現在所傳聞的，是他在一九三九年春天時，曾遭遇一個極嚴重的打擊，經過無限艱難，才算把它克服過去，同時，他也感受自己時有神慮錯亂現象的痛苦。他現在和往常一樣，每天早起的第一件事便是繼續接見他的祕密警察隊長。假如那人是勇敢的，他必定告訴首相意大利人民如何極端不敬地在談論着他，他可以把外面流傳得很廣的，小冊子拿些樣本來給他看。小冊子中，有一種罵墨索利尼把國家出賣給納粹了，另有一種，則把墨索利尼過去反「日耳曼野蠻主義」與反「猶太主義」的言論拿出來和他現在的工業相比照。還有的呢？就摘錄墨索利尼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當軍曹長的時候，他的幾個在第五先鋒連 (Fifth Pioneer Company) 的朋友寫給他的信，那裏面說墨索利尼「聽得了壯烈犧牲的比利時與被侵略的法國西兩國那冒出炮火的廢墟上發出的呼聲」。當時墨索利尼自己還很引此以自驕。把這封信在他們的「戰時日記」(War Diary) 裏發表了。還有一種小冊子則從他的「戰時日記

「裏面摘出來兩句這整的話：『跟德國講和？那永遠不幹！』」

這就是意大利人民在法西斯統治之下過了十九年以後的形象。他們恨墨索利尼。墨索利尼給他們帶來了戰爭，飢荒，和納粹的佔據。如果法西斯警察隊長當真是勇敢的，他必定報告墨索利尼，趁首相檢閱了那師預備開赴俄國前線協助他的朋友希特勒作戰的部隊後，不過三天，羅馬街頭的牆上已發現了警告的標語，上面寫着：「Meno ma na tchel upharsini」這句話，用粗淺的意大利反法西斯語言來解釋，意思是：「如果希特勒勝了，墨索利尼勝了，意大利就敗了。如果希特勒敗了，墨索利尼敗了，意大利就勝了。」

五、佛朗哥：貝當的門徒，希特勒的傀儡

作訪員的最應具備的一個條件，就是對於晤談的人，無論其有名無名，都應盡量觀察，因為恐怕日後或者會有關於他的消息發生，但我於一九三四年十月間在瑪德里晤見佛朗哥將軍時，並未能達到此項條件，實則因以前確未曾聞有此人。當西班牙軍政部招待員告知我，說我們此去會要見到佛朗哥將軍時，我本以向他探詢佛朗哥將軍是否就是那個橫渡大洋的飛行家拉孟·佛朗哥（Ramón Franco）的弟兄，但卒因時間倉猝，沒有時間問起這些。我被引入一間陳設極富麗的辦公室。佛朗哥坐在一張似乎極整潔的寫字檯後面。

佛朗哥的身材矮而肥，鬚髮微淡，並無其他特點。他所談的，也沒有什麼可記的事。他若不着制服，恐極易被認為是一個店員或一個坐享餘年的退休商人。

會晤時，談話都是用法國話。他的法國話雖然說得相當慢，但却說得很好，大概是他肄業法國軍官學校（French Military Academy），做法國陸軍上校貝當（Henri Philippe Pétain）的門生時，從法國人前面學得來的。

我毫不感覺所會晤的是一個具有非常實質的人物，更不感覺他終有一日會自命為二千五百萬西班牙人民的領袖。

那次暗談的時間，約經半小時之久。我在作此報告之先，擬將那次去西班牙的原因及如何得晤佛朗哥的經過情形作一敘述。

在我抵達西班牙以前兩星期的時候，阿所託里亞（Asturias）省煤礦區的山地已發生過內戰。緣因是勞工協會爲反對勃路（Senor Leroux）內閣中的兩個法西斯黨員，發動總罷工，軍事當局自摩洛哥調兵來作武裝彈壓。這在西班牙近代史上，實在是一種未之前聞的作風。這次戰鬥，一般將官們後來都稱之爲「一九三六年的預演」，摩洛哥人參加這次作戰時極爲殘酷，就是婦孺也不免，遭其蹂躪。到戰鬥結束時，阿所託里亞首府俄維多（Oviedo）業已毀滅了一半。西班牙平民死傷以數萬計。其他隱匿深山的，也有數萬人，這些人一直到一九三六年二月人民陣線獲勝時，才敢回家。

此次事件的結果，西班牙全國有三萬平民被連入獄，擁擠其中，遭受非常可怕的虐待。其中有前總理亞查納（Mourel Arana），他被囚禁在一個監獄船上。此外還有加泰隆內閣（Catalan Government）時的總統，及自由主義派，社會主義派與共產主義派的議員數人。

大戰鬥結束以後，一切尙在混亂局勢中，逃往巴黎的難民，都紛紛敘述那恐怖殘酷的慘狀。於是國際人趕忙組織了一個委員會，以救濟災民。英國工黨議員威金森（Winkless）與上議院的青年工黨代表里斯道維伯爵（Earl of Lisowal）決計親赴西班牙調查這次事件的實際情形，並要求我陪從。這是我往西班牙去的第一次旅行。

我們到達瑪德里的時候，已經是深夜了。全城空着無人燈火暗淡，向來活躍而負有盛名的咖啡店，這時也一個都不見了。我們住在巴黎飯店（Hotel de Paris）。那飯店的接待室，簡直和殯儀館一樣。總之瑪德里的一切，都陷在悲慘的命運中。

當時瑪德里盛傳英國調查團（British Commission）行將抵達。替我搬行李的一個小孩子，當他以為不會被人聽見時，用破碎不全的英語對我說：「你來得好，慘呀！」

第二天早晨，第一個觸入我們眼簾的，是一個號稱模範監獄的「摩德羅監獄」（Carcel Modelo）。獄外送牢飯的婦人，站得滿滿地，排成一列長綫。一個美國新聞記者詭稱我們是罪犯的親屬，想到裏面去探視探視，這才得替我們弄到了一張准入證。我們到裏面後，看見罪犯都分開禁閉在兩個囚房裏，兩間囚房的中間，隔着一個「應接室」（Visitors Room），數百人內探視的人，都擁在這兩個囚房之間呼亂喧嘩。因為政府把許多共和派領袖囚禁在這裏，這個監獄就成了瑪德里最優秀人民的集會之所。其中有好些人，後來我會看見他們在政府和軍隊裏担任極重要的職務。

那時候已經是嚴冬了，天氣極冷。勞工協會的首領卡巴勒羅（Caballero），雖沒有穿外衣，也在囚房中擠出一副修道士的枯瘦面孔來，兩年後我和他再度相晤時，他已經出任國務總理了。

當時有一個眼睛很漂亮，面帶綠色的美貌青年，叫我們過去。他自稱是「監獄團結委員會」（Solidarity Committee）的領袖。那個委員會是在他被捕的第二天成立的，由西班牙「勞工自衛團」（Sp

會成績甚好的報告，威金遜曾由巴黎救濟委員會帶來不少款項；於是分發了給那些青年。我第二次看見那個青年時，他已在瑪德里大學區的戰壕裏充任連長了。

次日總理勒路接見我們。這位七十餘歲的白髮老翁，極多疑心。他是西班牙政治界的老手爲急進黨（Radical party）的領袖。不過他那個黨名雖爲急進，實際上却是與反動派合作的。據說他藉政治的力量發了財。他與實業金融界有關係。他且在瓦倫西亞（Valencia）和巴薩隆納開設了不少妓院。我們和一個翻譯員一同走進他那極寬闊的辦公室。這翻譯員以前在外國兵團當職員，是一社會主義派議員向我們推荐的。

在未被接見時，我們已準備好了一大串問題。因此，在會見時，我們多詰問一些爲勒路既不能推諉，又不能避開的題目，里斯道維伯爵更堅持着要他作答。我們要求將最近判處死刑的五個海員釋放，勒路當即允許了。我們告訴他，擬赴阿斯特里亞首府俄維多一行，請他予以方便。他起初還很躊躇，過了好一會，才寫了一封介紹信給阿省駐軍司令奧恰亞將軍（General Lopez Ochoa）叫他「在各方面予里斯道維的使命以便利。」

阿斯特里亞戰鬥發生時，有一位教士被殺。據說那教士被殺後，屍首如殺豬一樣，被切成一塊塊，懸掛在市立劇院前面。巴黎各報及倫敦泰晤士報都抨擊此種暴行爲「阿斯特里亞的布維維克黨人所作

獸性行爲。「我們以這事向勒路追詢，他說這消息毫無根據，不足置信，並應許給諾斯道社爵士一個正式否認。但事實上這否認始終未作。

那時候阿斯特里亞業已宣布戒嚴，所以我們須向軍政部請求發給特別許可證。勒路的祕書先以電話通知軍政部把許可證預備好，說我們將親來領取。因此機會，我們於是與佛朗哥會晤了。首先我預料出來接見我們的必是一個小軍官，出乎意料之外地，不知竟然是一個將軍。據一個社會主義派議員告訴我，佛朗哥是不久前才從巴勒灣克羣島（Balearic Islands）放逐地點召回的，這時或許已經做了參謀總長。那位社會主義議員並且說，召調摩洛哥軍隊與轟炸俄維多。吉雅（Gijón）兩城，都是佛朗哥的主意。

這次和佛朗哥談話，似乎有些奇特，因為我不久就發覺他有阻止我們赴阿斯特里亞之意。他說去俄維多極為困難，且說我們能看見的事情，軍政部也並不能作何解釋。他勸我們打消此行企圖，他說阿斯特里亞經總罷工後，秩序尚未恢復，食物都感缺乏。并且因當日摩洛哥部隊沒有趕到以前。居民早已備受礦工的荼毒，故現時居民的態度猶極惡劣，很不願我們去冒這一個險。

關於英國人對西班牙局勢的情緒如何，他似乎很願意知道。他說兩政府對於布爾塞維克煽惑工人的事，業已採取緊急處置。他又說總罷工的後面，有莫斯科的資金為之撐持。

佛朗哥的虛偽客氣態度，總不能隱藏他對於我們這次拜訪之不高興，他顯然誤認我為英國人，他說

假如西班牙派考察團到英國去，察視倫敦的僻街陋巷，則我將作何感想。我曾訪過納粹的議事報「人民觀察報」，也遇到這種同樣的說法。

我們告訴他，我們的旅行決不能中止。他於是突然極嚴肅地向我們道：「我不相信各位能在俄維多發見什麼，」這句話，遲至好久以後，我才領會其真意。

佛朗哥不久以後必將很忙，因為下午羅博爾（Senor Gil Robles）在國會中大肆咆哮，詆毀英國查調團。羅博爾當時是法西斯的候補獨裁者，為最有獲選希望的一個人。他說英國最好注意自己的事，對倫敦的僻街陋巷多關些心，不要干預他人的事。而會替我們寫介紹信給奧恰亞將軍的勒路，對於此種批評也竟表示贊同，並謂他已通知在境旅行的英國人從速離境。當時左派議員已拒絕出席，故國會中出席的僅有右派議員，於是一致喝采如雷。

上述一切情形，我們數小時後，即從晚報上看到。正當羅博爾在國會席上向眾痛罵我們的時候。我們也恰在國會大廈裏面，與態度兇惡的議長阿爾巴（Senor Santiago Alba）在一個辦公室裏接談。阿爾巴對我們的任務予表示責難，他只知要我們從速離境，去管我們自己的事，并且警告我們，說若赴俄維多，必將遭遇不幸的事。

回到飯店以後，我們遇到一位神經過敏的經理，他極怕有向我們作示威運動的事體發生。直到聽說我們當晚就啓程赴俄維多時，才鬆一口氣放下了心。

當晚我們趁火車往俄維多。

西班牙政府得悉我們業已起程時。邁阿斯特里亞的警察署長杜瓦爾司令(Doval)也在瑪德里，他於是開着汽車來追趕我們。這位被人稱爲「俄維多的屠夫」的杜司令，在上午三點鐘時趕上了我們，在一個小村落中也搭上了我們的火車。他是那車上除我們而外的唯一赴阿省首府的客人。

我們抵達俄維多的情形很有意思。我們連翻譯員一共是四個人，一清早下車，隨即感覺一切都似乎對我們懷有敵意的模樣。四周腳夫雖多，然無一人肯上前來爲我們接取行李。好些官員來迎接，杜瓦爾司令，其中有一人手持報紙，大聲宣讀一個標題道：「驅逐英國調查團。」

我們把行李存放在行李保管處後，隨即走入市區。我們覺得似乎是置身鬼域。市區虛空，大有死陰的氣象。毀壞的房屋很多。在一所房屋的半毀的牆頭上，掛着一塊攝影師的廣告，語氣很狂妄，另一所房子的窗口，有只鸚鵡在叫。街上連我們喫早餐的咖啡店都找不到一家。翻譯員向我們提起攻擊我們的報紙的事，我覺察他眼光中也有無限的隱憂。正在進食的時候，突然有三個裝束華麗的人，闖了進來，首先嚴斥我們的翻譯員，說是西班牙人不應爲外國人服務，然後，才對我們說話。其中有一人就是那漂亮而有鬍鬚的波林(Pollin)，現充瑪德里某日報的記者。此人兩年後做了佛朗哥的情報處長。

波林說他是來警告我們的。他說我們將有生命危險，因爲此地居民痛恨「赤俄」的殘暴，以爲我們此來是同情左派，故極爲忿怒。他又說他是英國的朋友，曾作過多年記者，願保我們平安離開。

俄軍多。然而我們拒絕了他的建議。

最後的一刻鐘內，我們毫不動搖。當我們在赴政府公署訪晤奧特加將軍途中時，突然有一隊人尾隨我們約莫有二三十個人的樣子，這顯然是命令而來。其中數人開始誇張地擺弄他的手槍，態度非常倨傲，我感覺脊背中有些微微發冷。

在政府公署中，更有驚人的事在期待著我們。有人告訴我們須先見杜瓦爾司令，於是我們在樓梯頂端旁邊的一間大廳中等候他，他害我們等了三小時之久。正當我們在那裏坐候的時候，那兒隨我們的一隊人也走了進來，在我們前面走去走來，像放步哨一樣。其中有一個人，且不時擦過翻譯員身旁，故意把手槍顯了出來。

我想我們那翻譯員是西班牙人，可真有些危險。但他却似毫不介意地仍舊看着報紙，態度極為自然，可是面容早已失色。

波林忽然又開口堅欲護送我們出城。威金遜說，如果他願意幫忙，惟一的辦法，最好請他代為設法弄一盞咖啡來，因為天氣實在太冷了。里斯道維來的口袋裏本帶有一本華格納（Wagner）傳，於是拿了出來讀。沒多時，忽聽得街上人聲嘈雜，向窗外一看，只見二百多人聚集外面，聲勢洶湧，要求立即逐英國觀察團。

杜瓦爾終於接見了我們。他說他已接得政府的訓令，叫他馬上護送我們到隣省去。並且說在阿斯特

里他不能保障我們的生命安全，他對我們的抗議不甚理會，僅略一點頭而已。至是，我們已知道不能不走了。

我們等了一小時之久，汽車才來，於是走下石階。石階長得很，好像沒有終點的一般，很不容易走完。那時羣衆叫罵得更加利害了。翻譯員說：「我們慢些走吧」，我個人雖則恨不得火速離開這裏，但大家還是答應了他，真個慢慢地走着。

外面不會看見警察，也不見人民保衛隊（Civil Guard），我們在車上坐了五分鐘，眼見着四周猙獰憤怒的面孔，耳中不斷聽得「混蛋」的呼聲。

最後，一個青年上尉帶着兩個人民保衛隊員上來了。於是開車。車子轉過兩個灣後，距政府大廈約百碼了，那些處所毫無對我們表示敵視的模樣，很多過路的人都對我們揮手。可見這次的示威運動完全是由警察唆使的。他們預先召集許多流氓地痞，棍徒與便衣浪人，叫他們聚成一羣，聲言要圍攻這裏來侵犯了他們的尊嚴。

在城郊附近，汽車經過了一段缺牆，那上面寫着「打倒法西斯主義」，黑色還是新的。這是我在離此被蹂躪的俄維多城最後所見的一個印象。

我們的汽車在西班牙各省奔馳，從那天正午到深夜，始終風馳電掣地開着飛跑，除了給我們一點喫飯的時間外，絕不停車。直開到羣法國邊境的伊倫（Irun），第二天一清早，到了亨達基（Hondakis）。

這是我們最先抵達的一個海濱城市。我們這裏，才獲得這次抵達的線索，是西班牙內閣會議決議軍隊的迫與羅博爾的「天主教行爲」的影響而決定的。

我把西班牙總理勒路給奧哈亞將軍的介紹信影印出來，在倫敦及巴黎各報上刊登，勒氏頗感不安。波林爲報復計，也在它的報紙上撰一長文，對我們加以污蔑。他說「英國視察團與代表西班牙最高倫的情緒之羣衆遇見時」，其所表現的卑怯態度爲他所未見。

我在正常狀況之下，從未到過西班牙。一九三六年六月，當希特勒正擬依照俾士麥的建議，把「西班牙蒼蠅放在法國頸上」(The Spanish Fly on The neck of France)時，我和我的妻子又到西班牙去了一次。

西班牙內閣當時由身材矮小的，劇洛加(Cascaes Quiroga)領導，社會主義者及共產黨人對之極爲擁護，但因閣員幾乎全係亞查納的共和黨人，所以內閣實際上無異立在火藥桶上。瑪德里全城諸傳武裝暴動迫在眉睫，街頭巷尾，處處感覺風聲鶴淚，甚或還有人認爲這事的確無法避免。可是，內閣閣員都好像沒有這回事一樣，他們認爲軍隊永遠是忠於政府的。

西班牙共和國總統亞查納，面色帶黑，體格極強，是一個受過陶冶的作家，可是賦性多疑。他曾告訴我說：武裝暴動迫在旦夕之說，絕無根據。共和黨的國會領袖，前任農業部長，身軀瘦弱的多明哥(Marcos Domingo)，也持同樣論調。我於是直截了當地問他，是否相信軍隊仍舊效忠政府，他說

自然來忠。那一天，君主政體派領袖所德羅（Ochoa Sotol）被八綁架，作為法國刺殺衛國軍某軍官的報復。因此瑪德里全城陷於極端興奮激昂的狀態，警察與亞沙多衛隊（Guardia de Asalto）往來巡行各大街道，政府機關一律戒備森嚴。多明哥本人私宅，也似煞有介事者，我問他：「既無危險，爲什麼要如此張惶？他微笑着答道：『我們西班牙人素喜鋪張。』」

那天晚上，我看見一個反法西斯的集會，參加的人擠不堪，情緒非常激昂，衆情法西斯主義者必將予以打擊。會中以西班牙婦女界領袖社會主義議員奈琴（Margarina Nalzen）爲主要發言人。奈琴我在巴黎時時已認識了的。我很佩服她的演說本領與口才。一九三六年時，她是社會主義黨的左派，該黨的領袖是卡巴勒維利和後來任西國外長的梵雅。梵雅曾告訴我。說他相信軍隊必將叛變，他並且怕政府或將有猝不及防之慮，因此，左派社會主義者所持的意見，恰與在那位體肥多詐的勃列就（Unioe cio Prieto），所領導下的右派的意見完全相反。因爲右派始終相信事態並不嚴重。

共產黨人預期將有暴動。我會向國會女議員巴辛娜利亞（La Pasionaria）探詢關於領袖的陰謀，她概洞悉無餘。她說西政府若不早作處置，結果必將弄得全盤焚燬。我與她會見時，是在國會廳裏室內，自我看來，凡西班牙民族的特色，如西班牙民族可怕的自尊心，酷愛自己的熱烈性格，及當八權遭受脅迫時的那種不顧任何犧牲的犧牲，均無不畢露。巴辛娜利亞身材修長，體格強健，面容甚爲美麗，口才極優勸人。一九三三至一九三五間以老遭受迫的兩年期中，她爲西班牙反法西斯主義的代表象徵。

一級推崇敬佩的記錄，日有增多。她生了兩個孩子，鐘交得很，可是法西的報紙還抨詆她，說她是一隻極惡毒的母狼，只知吸人的血。在西班牙內戰期內，她曾請一口號，叫喊「寧願死在人家牆上，不願生在人家膝下」，這口號迄今，猶深印在人們的腦中。

七月十四日，我被西總理蒯洛加接見。從前我第一次來西時，業已見過蒯氏，當時他曾拿了亞查納總統在監獄船上受難始末的筆錄來找我。我回巴黎後，曾摘錄其中數段在英德各報紙上發表。

蒯洛加此時已經當權。我們晤談的地點仍在他的前任勸路接見英國觀察團的那間小屋子裏，他自謂極抱樂觀，並且解釋說西政府業已採取一切必要步驟，準備應付任何事變。據我推測，這次的預防步驟，或就是把有嫌疑的某些將領和軍官予以調動，因為西政府認為這麼就足以使暴動不致發生了。蒯總理又向我說：「我相信暴動決難成爲事實，西班牙現正同改進之途邁進，請你就這麼寫吧。」

不幸我所寫關於此次和蒯總理晤談情形的通信稿還未寄到巴黎，佛朗哥的叛變即已發生，當晚蒯氏大受刺激，立即宣佈辭職。

我早在七月十五日，星期三那天，到達了巴塞隆納，故曾目擊佛朗哥叛變的爆發。星期六日，消息傳來，謂佛朗哥將軍在巴屬摩洛哥高舉戰旗，反對共和政府。我當即往訪將軍府長官龔潘涅(Don Luis Comnans)。將軍府設在一個壯麗的大王宮內，龔氏告訴我，說業已採取防禦措施，準備鎮壓任何叛變企圖。當天晚上，我參觀各處的防禦設施，見所謂防禦措置者，實不過將各巡邏隊予以充實，並在

政府官署與警察廳旁架設幾架機關槍而已。

七月十八日夜間，是我平生情緒最爲緊張的一個時候。那晚左翼各派及勞工協會等早已令其徒會員們準備，因此巴塞隆納最大的雷布拉街（Rambles）及其他各重要通衢，均已擁滿羣衆。播音機向人民一再放送消息，謂瑪德里政府應付局勢甚爲順利，每次報告完畢，并播送西班牙國歌（The Hymn of Riego）。羣衆因之都歡欣鼓舞，興奮若狂，其情景之熱烈，殆與大西期的情形有過之無不及，實不像一個大戰的前夕。僅少數平民攜帶來福槍，暗示似有惡劣情事將要發生。

當晚卒安然無事渡過。次日破曉，一般人都相信迫在眉睫的危險當不致再發生了。不久傳來消息，說是步兵團已由德拉拉巴兵營（Pataliba Barracks）開赴市中心區。羣衆於是蜂擁而出前往迎迓。

起先，這兵團似乎是爲反佛朗哥叛變而出來示威者，各軍官都高呼着「擁護共和政府。」羣衆熱烈歡迎，並隨着隊伍至巴塞隆納最大的加太路納廣場（Plaza Catalunya）。但當兵團團長抵達廣場郵政總局門前時，突然下令放槍，羣衆驚惶不知所措，相率後退。可是廣場上死傷的人數已很多了，有一個懷着孕的女人，倒在廣場中心附近，在槍聲中，她那呻吟的微聲還隱約可聞。

這時，攜有來福槍或手槍的人，都掩在門後，向叛兵還射。叛兵隨即散開，於是展開一場惡戰。一隊親兵衝入高臨廣場的柯隆大飯店（Hotel Colon）把那驚魂未定的旅客都趕到地下室去。

開火達數小時之久，才見人民保衛隊出現。他們在騷擾中見有軍隊，結果，大多數都願擁護共和。

府。於是一般備戰工人羣起向他們歡呼，迎候。兩小時後，叛兵投了降。事後，經證實這些叛兵大都是一些擁護法西斯的人，爲便於發動此次暴亂，故意穿上制服來蒙混的，至於大部分的正規軍，都早已拒絕參加叛變。

同時，駐紫海口附近的另一個砲兵團，也開火放砲，砲聲隆隆，巴薩隆納市區的房屋都爲之震撼。那裏的叛兵一直支持到星期一。其中最後一次攻擊，我會親眼目擊，是由許多工人以拳頭和少數手槍作英勇的搏鬥。至七月二十一日，星期二，巴薩隆納叛變卒經當地民衆的勇武努力而被壓潰。

那天下午，我又見到龔潘涅。我向他建議，叫他派人去搜查納粹總部，因爲巴薩隆納是納粹在西班牙活動的中心機關所在地。龔潘涅怕德國出來爲難，不敢出此，僅暗示這事最好由新組成的民團來辦。於是我就跑到柯隆飯店去。

柯隆大飯店已遭大變，四天以前，巴薩隆納的上流社會人物，及一般有身份的外國人，還紛紛前往跳舞。盡情享受風流的爵士音樂，可是現在却變成了加泰隆的統一社會主義黨（United Socialist Party）的總部。變遷之快，確是驚人。那飯店遍體彈痕疊疊，所有鋪椅等，都陳設在各通道中，使人感覺一切都已完成了。幾千民兵駐在這裏，在那極大的餐廳裏吃着簡單的飯食。駐紮在這飯店裏面的這個機關，訓練出來大批士卒，組成幾個兵團，後來西班牙的人民軍（Spanish People's Army）即是由此改編而成。

我把我的意見告訴一個官吏，他立即表示同意，叫了一個反納粹的德國人來，並指派兩個民兵隨他前往。數小時後，他們空手回來，一無所得。我又建議不妨再試一試，於是親陪他們前去，作第二次搜查。到了晚上，我們仍隨帶兩個民兵，趕到海勒曼，菲利比貿易公司（Hollmann & Philippai）。那公司在納粹總部的前面，佔定四間房子。是在巴薩隆利全亞芬諾（Calle Arino）的一座新式建築物裏，那地方同時也是海勒曼（Hans Hellemann）的住宅。海為納粹在西班牙的領袖，事先早已逃逸。

正房間貯滿了各種德國工業出品的貨樣，好像一個展覽室一樣。窗子對面的壁上，掛着一幅極大的希特勒照片，民兵走上前去，以開玩笑的態度，把它撕破。在一個大櫃中，放着幾百本摺疊，都是按字母順序排列的，各有紙條標明着內容。我隨手揭開一本一看，即發覺那並非普通商業函件，而盡是些與負指揮國外納粹活動的柏林外事局（Auslands Organization）往來的信札文件，及秘密情報。

這次發現極為重要，我們搜獲的信札及文件等，共有四萬多件，由這些東西裏面，我們完全明瞭了德國在西班牙活動的真象。一年以前，我曾寫過一本「褐色情報網」，因此自對於納粹在國外活動尚屬知道得相當詳細，但將此項文件略一加審視，頓覺從前對納粹活動的收獲價值甚低。自希特勒上台後，可靠的內幕情報從未大批地落入敵人手裏，這次實在是第一次。不過，我們這次的收穫，也實在是

前所未行。

我們出來時，街上燈光黯淡的，突然有兩顆子彈飛出來，依那聲音辨去，顯係是拿我們做目標的。隨即看見對面有一個人急急奔逃，但那人到路邊時，恰與一隊巡邏兵撞上了，於是束手被捕。據那人說，他名叫拉梅雷 (Lambert)，爲海勒德·菲利比公司的僱員，並係西班牙法爾吉命 (Falange) 會員之一。他承認開槍射擊確是想射殺我們。

隨後我們又到納粹領袖非利比的住室裏去搜查。他開門時，面容因恐怖而變成了慘白。我們尙未開言，他就把所著的褲子污毀，作爲先發制人之計。納粹在這種情形之下，往往因過於恐怖，對它的敵人做如此的醜態。我們在他的住室裏並未查獲什麼非常的东西來，僅發現一包裸體女人的像片，像片背後都記着這各人的姓名，住址，及傾倒非利比的時期，全用德文書寫得清清楚楚。民兵把菲利比解到巴薩隆納警察局監禁六天後，仍舊把他釋放了。

我們把所搜獲的文件帶回柯隆大飯店，日夜加以防護，並由我逐一細細檢閱。但我現在已不能將其一一報告出來，甚至即作一簡單敘述也不可能了。僅能略述其重要部份而已。

我們把所獲各件整理就緒，一一爲之分類，各重要函件，用不同的顏色的紙張抄寫兩三次之多。我還記得所有祕密警察的這信：當時都是打在玫瑰色紙張上的。

納粹在外國的機噐，大家都叫它作蘭德格魯布 (Ländersuppe)。這些機噐都聽命於柏林，

外事局指揮，首領爲波爾（Gau-aier Ernst Wilhelm Bohle），直到現在還是由他在主持。他同時也任德國外交部當秘書，波爾現年三十七歲，生於英國的布拉德福（Bradford），於南非洲的開普敦（Cape Town），爲希特勒手下最青年的納粹黨支部負責人。曾在柏林與科羅溫兩大學讀過經濟學，且曾有一個短時間從事汽車事業。一九三四年被任爲漢堡的納粹黨國外部部長，他把納粹機關設置至電報界，在第二次大戰未爆發以前，爲數已近千所。

納粹的基層組織叫做「地方組」（Local Group），西班牙有五十個這樣的組，其中這半各由退出的陸軍軍官領導。這類組織，都集中在西屬地中海附近與沿大西洋各港，及西屬摩洛哥等地的各大重要城市中。納粹「地方組」在西屬摩洛哥的特吐安（Tangier）地方，且利用地道辦法屬摩洛哥境內的工廠。

每一「地方組」都安置有秘密警察，藉港埠服務處處長（Hafen dienstleiter）一類無關重要的名義以掩護其活動。我看過那些文件後，遂信一般人一向認這類機構爲殘酷野蠻組織之不錯，在那裏面，暗殺綁架等等，都是司空見慣的事。

這些文件裏面所包括的種種，簡直異於一個黑暗地獄，一切罪惡都在裏面了。有一件文件報告一個反納粹學生在國外被騙上一隻德國船，加上腳鍊手銬，押解回德國。那報告的最後一句是：「他已在漢堡照例被接待了。」

此外，我又從另一文件中得悉一兩名叫雷什特（Herbert Reiff）的猶太流亡者暴死的原因。他確是因所駕汽車顛覆而死在汽車下面的，以前他的朋友都怕他是因計謀其他不測事故死掉的。現在從這項文件中真相大白了。緣雷什特有一個僱員是替納粹做秘密工作的，被他發覺了。就在那一天，納粹派一個黨徒駕輛卡車把雷什特的車子逼得駛過堤岸，車子就翻了。

西班牙和德國的著名反納粹份子，被暗殺者有十多個，而且暗殺的情節都很離奇。西班牙警察局多年來在力求破獲這些案件，但始終無結果。現在有了這些文件，一切都在其中了。

據說有一個在農業部長達雷手下任法律顧問的青年秘密警察，會被人指摘與一個柏林勞工隊員有同性戀愛之嫌，因此被關在柏林秘密警察那最可怕的哥倫比亞大廈（Columbia House）內，不斷加以拷打，受苦達四個月之久。後來秘密警察提議把他加以短期訓練後，派往西班牙工作。他到西班牙後，雖竭力搜捕一般反納粹份子，可是他自已却也無日不在恐懼中，因為他的母親還留在德國作爲人質。

事實上，秘密警察的工作人員大多是德國大商業公司的僱員，而且大多是造船與航空公司。在西班牙的秘密警察首領柯爾滋（Carl cords），他的薪金就是在賽哈公司（Siemens & Halske）的瑪德里分號領取。賽哈公司是德國最大一家電氣公司。在巴薩隆納，瓦倫西里，和瑪拉加（Malaga）等處的工作人員，則向巴略（Baquer & Kusche），航業公司領取薪金。駐大西洋岸比爾博（Bilbao）與撒坦德（Sanander）兩口岸的工作人員的薪金，則由烏爾曼航業公司（Wormann Line）支付。後來

爲納粹裝運大批軍火供給佛朗哥的，就是這個公司。

此外，每一「地方組」還有一個經濟專家，專門負責蒐集關於經濟方面的情報。在他的轄境以內，傳遞德國各商業公司的命令及注意工業產量 and 進出口的情形等，都是他的責任。如果他所作的報告不可靠，或是不完全，他將受到嚴厲的處分。

有些地方的納粹「地方組」，其領袖由駐在地的德國領事充任。但自一九三四年後，德國領事變爲須受「地方組組長」(Grand Leader)的管轄了。即是大使和他的隨員，也莫不如此。這個組長的正式官銜是「最高特任代表」(Hochst. Statthalter) 凡任用領事，非得他的同意不可。因此之故，領事絕沒有敢違犯他的意旨的。一九三四年，所有德國的外交人員都奉命申請加入納粹黨，自後任命領事的大權就完全操在這些組長手裏。只有少數個性剛強而在柏林有後台的外交人員，才敢對他們不敬。俾士麥說過：個性倔強並不是德國外交人員的第一個特性。因此多方已給這些最高特任代表的外交人員，還是佔大多數。

納粹胡亂利用外交特權，從事宣傳工作，這種事實，我們從這些文件中可以得到很多的證據。那裏面記載納粹各領事從輪船上偷運宣傳品上岸的情形很多。且有一項文件告訴我們，說後來調駐巴黎的傑克大使 (Ambassador Comte Weizsäcker) 曾如何地協助散發大細的傳單。

納粹「地方組」的新聞主任 (Press chief) 有很多的錢，可以隨時取之去改買報紙，或賄賂新聞記

者。在佛朗哥叛變以前不久，納粹已在西班牙十一種以上的西班牙重要報紙，聽其指使，西班牙及動派各報，受納粹「地方組」津貼的已有五十多種。

納粹與西班牙賣國首領合作的情形，這些文件也把它揭露無餘。據說有五個將領曾經領受納粹情報部的津貼，叛變剛發生後即被處以死刑的巴薩隆納區司令官哥底將軍（Genial Godped）也是其中之一。甚至西班牙軍政部都有納粹情報部的人員混跡其間。

一九三六年二月，西班牙人民陣線選舉獲得勝利後，納粹藉巴薩隆納一個風力發電廠作為掩護機關，用船祕密裝運軍火到西班牙，企圖早日促成西國叛變的發生。如此偷運進瑪德里的軍火，前後計有來福槍三萬八千枝，連發手槍一萬八千枝，火藥不計其數。箱子上都貼着「新鮮蕃薯」的紙條。瑪德里叛變被解決後，這些存貯的軍火，大部分都落到了共和政府警察的手裏。

以上所述，都是根據巴薩隆納獲得的納粹文件所作的一種簡略報導，那批文件，實在值得重視。我們因想避免引起戰爭，所以把它帶到巴黎。加泰隆政府贊成我們這辦法，並允許派兩個人同來。有一個到西班牙來參與這次西國爭取自由的戰爭的青年英國人，答應把汽車送我們到法國的邊境。

時候已是八月初間，我們分乘兩部大卡車，正午時分動身，隨身帶有將軍府，警察局，及勞工協會所發給的證明文件。這段旅程，在平時只要兩個鐘頭便够了，但我們這次却費了十六小時，途中停車達五十次以上。

在距邊境還差一半行程的吉羅納（Gerna）地方，我們攜帶的文件險些都失掉了。事情是這樣的：有一個加泰隆北派團覆的武裝巡邏隊（Pumn The Catalan Trotskyite Organ gation），突然攔阻我們，一定要檢查車子和裝這些文件的四個袋子。我們向他們解釋，說這些文件確實具有特殊價值，真不便打開，但那些武裝巡邏隊兵不信，一定要把它焚毀。我真幾乎忍無可忍了。經過一番激烈爭辯後，我們要求他們帶我們去見警察局長，恰好那局長認識我們這些代表中的一個，於是他派了一個武裝衛兵護送我們到法國邊境。我們因為得到一個新聞界同業和一個法國邊境的市長幫忙，卒把那些文件偷帶進了法境。為避免法國警察把這些東西充公起見。我們走時都把那些袋子親自背在身上，在漆黑的夜晚摸了五個鐘頭，才抵達一個安全地點。

兩天後我到了倫敦，我從那些文件中拿出一部分來，給幾個國會議員們看。有一個議員想把這些東西拿給艾登去看，藉以喚起他的注意，但是，也無結果，因為那時艾登始終抱着不干預西班牙共和國內政的態度。

新聞紀事報與曼徹斯特導報，同時目願發表這些文件。曼徹斯特導報的外交記者與新聞紀事報的駐德訪員特地趕到巴黎來搜取材料，他們把所得的結果寫成一萬五千字左右的長文。用很大的標題刊載在報上。

但是巴黎時報，巴黎晚報（Paris Soir），和小巴黎人報（La Petit Parisien），及其他法國各大

報紙都重絕刊載，黨參運社會主義派的中樞報（L Ocuors），國家主義派的秩序報（L Orits）和共產主義派的人類報（L Humante）摘錄了一部分刊載出來。至於右翼與納粹的報紙，則詆毀這些文件，謂根本是捏造出來的。因此緣故，納粹秘密援助佛朗哥叛變的真正根據，終未能感動英法兩國的任何官員，使之變更其對於西班牙事變所持的不干涉政策。

西班牙戰爭的全史，還有待日後來寫，因為許多史料現在還藏在軸心國和英法政府的機要場所，話雖如此，可是即以我們現在已經曉得的，也足夠證明下面這件無庸置疑的事實了，那就是：西班牙共和國的毀滅，由於遭受軸心的攻擊，而軸心國的攻擊，又實由於西歐各民主國家的助成。因此一個人如不願其國家受此種的用心，則必認爲此種同謀的唯一目的便是無可奈何的自取滅亡。

當軸心國家用機關槍在前線屠殺西班牙共和軍時，西歐各民主國家也曾力予協助。我們可以舉一個實例來證明：萊翁勃倫內閣曾把幾萬共和政府的軍火，阻在亨達萊（Huelva），不許由巴薩隆納通過法境運往伊倫，因此伊倫就在軍火距到達差幾里路時被叛軍攻下了，還有一次，龐萊把蘇聯經法運西的軍火扣留，使其遲到。還有一次，是一九三七年夏天，艾登外相故意把由捷克買來的軍火阻住，不讓它運到巴斯格（Bastive-Artelle），雖明知那裏抵禦意軍的戰爭已達決定階段，亦所不顧。

當艾登「干涉」西戰時，我在布拉格。捷克參謀本部的S上校（Colonel S.）認爲西戰已使捷克

的獨立處於危境，於是毅然出而為西班牙共和軍購得大批軍火。當奈斯總統在拉斯薩斯(Salas de Salas)召見S上校時，已有一列火車滿裝着軍火，準備開動了。可是總統告訴他，說艾登為這批軍火運往西班牙的事，已向捷克駐英公使提出嚴重抗議。艾登且大感惱，說這批軍火如果運到西班牙，則他必定把這事向國聯提出來。S上校很鎮靜地報告總統，說這批軍火已經運走了一部分，實屬無法停止。

S上校出宮後，馬上就來找我。這位真正的捷克愛國志士，對於各民主國家對西班牙共和政府所持的態度非常憂慮。我們談了很久，他說捷克必早已列入了希特勒所要侵略的名單，假若西班牙被征服，捷克必接着遭受同樣的命運，他滿夜忙着裝運軍火的事情，軍火到時，較預定的時間還早兩天。所可惜者，僅能運了一小部分去，其餘一切軍需品如機關槍，重砲，來福槍，彈藥等，都沒有來得運去。因為艾登事前已由英國情報機關得到了消息，不斷地對捷克駐英公使一再威嚇，結果遂使這些急需的軍火延遲了幾個星期，軸心國因此得有充分時間去消滅巴斯格的抵抗。

S上校更加激怒了，他建議最好趁機出而來把這堆剩下的軍火買了去，然後再運到西班牙。這建議後來真正實現了，可是法國反動派的報紙還是武斷地說蘇聯拋棄了西班牙。

西班牙人民所最希望的，就是跳出法西斯主義的束縛。領導西班牙政府近兩年的奈格林博士(D. Negrín)，也有如斯感覺。奈氏頗為極端，兩眼顯出和藹可親的光彩，他是一個很有學識

現在，西班牙的兩千三百萬人口（有一百萬左右的共和黨員被關在牢裏，都陷在飢餓中，他們所得的食物由仿效警察特技的法倫吉會之安排，每人僅得其最低限度需要的百分之二十五。五年以來，伊伯利安半島年年鬧着飢荒，西班牙人民餐棹上早已不見牛奶，牛油，肉類，雞蛋，乾酪等一類東西了。每人每天所得的僅是四分之一鎊，至多半鎊的麵包。西班牙食物中最重要的油類，也都僅能給予些許。

可是西班牙人民的精神並不因此稍挫。一個曾在國際聯隊服役過的法國醫生告訴我，說他曾在一九四一年年初時經過西班牙。當時他們怕貝當的警察捉他。加之他又沒有法國的出境護照，也沒有西班牙的入境護照，因此在一天晚上偷過比利牛斯山（Pyrenees）。他總是夜行日藏，吃着在法國帶來的食物。到了第三夜，經過一個村落，突然有一個人向他借火柴。火柴一劃燃，亮光照在兩個人的臉上，兩人彼此都似乎認得對方的面孔，彼此都記得早在戰爭中即已相識，可是彼此都懷疑着對方的態度，深恐被其告發。但那個西班牙人說他的態度始終未變。

那個法國醫生繼續說道：「自此以後，我就到了安全境內。穿過西班牙時，我和一個郵寄的包裹一般，由這個隱藏地點又溜到了另一個隱藏地點，結果終於偷過了西葡邊境。西班牙人民組織的工作簡直和錢一樣，真不少解。我每次和一般人民談話時，他們總告訴我，說他們如何憎恨佛朗哥的法西斯統治，如何痛恨軸心國的侵略。並且說人民的憤恨，現在正一天天高漲，他們相信佛朗哥不能久存。我曾看見許多小冊子，大部是共產黨印發的，裏面主張人民起來推翻法西斯主義。我知道這類小冊子流行西班

牙全備的極多，而且都是定期出版的，」

因此，目前佛郎哥將軍實是坐在彈藥桶上。他知道將來只有兩個必然的趨勢，但這兩個趨勢都於他絕對無利。因爲：如果希特勒獲勝，希特勒必定把他信任的西班牙外交部長孫納（Serrano Suñer）拿出來代替佛郎哥，如果希特勒失敗，則所有小獨裁者自必同下苦海。佛郎哥將軍唯一聊以自慰的，就是他的老師貝當，現在的處境也恰與他一樣，替希特勒做傀儡的命中都註定只有這麼一個下場：即無論希特勒也好，敗也好，他們總一無所得。

六、巴爾幹的君王與遊擊隊員

一九四一年三月二十八日那天，是星期五，雅與街上有人歡欣得沿街亂舞。好些播音機隨街報告南斯拉夫政變的消息。謂政變係由西薩維支將軍（General Dushan Simovitch）倡導，以兵力出之，現已將親軸心國之政府推翻，並將攝政親王保羅（Regent prince Paul）逐出國境。

到四月六日，街上已不再有人亂舞了。在這個黯淡的星期六的下午夜，李斯德（Field Marshal Siegmund Wilhelm Walter List）的摩托化部隊進窺希臘的色雷斯（Thrace）防線與南斯拉夫靠近保加利亞邊界的幾個據點。到第三天，南斯拉夫與希臘之間已被切斷了，同時，十字旗已在愛琴海（Aegean）邊的薩羅尼加港口（Salonika）高懸。二十五年以前，薩羅尼加是協約國聯軍在巴爾幹方面的大本營，然而現在，其一切重要建築物都由着灰色衣服的德國軍隊把守着。抗戰到十二天，南斯拉夫的殘軍解除了武裝。到第十六天，伊庇那斯（Ipsinos）方面的希臘軍隊也接着解除了武裝。自這次屠殺開始以來，確有三個禮拜，希特勒的警衛師即已鵝步着穿過雅典的大小街道。隨後不久，德國元首及其將領希特勒可羅波利（Acropolis）的新圖片映遍全世界。

這次勝利把英國除直布羅陀以外的歐洲大陸唯一立足點也給奪去了。這是英國從征在斯將卡爾

並和約的激擾之下於一年內所作的第三次海上撤退，第一次是在挪威，第二次是在敦刻爾克，現在，第三次，是在希臘。

德國軍隊獲勝如此之快，當然又可歸功於他們那機械化武器之居於壓倒的優勢，與夫其軍險組織之效率強大與素質精銳。但雖有如斯優點，而我以為納粹在巴爾幹一役淒慘之主因，仍遠遜在戰事爆發以前。這次南希兩國措手不及的悲劇，將使兩國堅毅勇敢之民族蒙受無窮痛苦。關於此次事件之發生，縱不遠溯往古，然其背景亦當涉及納粹處心積慮的七年重要準備。作者曾得機會旁察希特勒進攻雅典的某些前鋒動作，且曾與此糾纏甚久的衝突中之某些主要人物分別接談，故以下所述，即係巴爾幹戰爭之此一部分。

我手邊現尙有關於巴爾幹戰爭首次衝突的材料。其事發生於日內瓦古老的國聯會舍內，時爲一九三四年之秋天。在國聯這高貴的機構內，很少見如此次之擾鬧者，而自納粹向縮軍會議猛力登上大門以後，尤屬完全未有之事。蓋南斯拉夫人決意把南王亞歷山大（King Alexander）於數週前在馬賽街頭與法國外交部長路易·巴都（Louis Barthou）一詞被刺之事提出國聯。

兇手喬琪夫（Vlada Georgiev）、爲一名「烏斯塔什」（Ustasht）之恐怖組織之一份子。烏斯

塔什爲法西斯意大利與匈牙利所發養訓練的一個團體，有經費的支持，也有武裝的配備，其領袖爲哥羅西亞分離派（Croatian Separatist）首領伯夫利支博士（Dr. Ante Pavelitch），伯氏即日後擊斃意大利

保護下之哥羅西亞「元首」的人。

南斯拉夫人懷着滿腔怨憤，他們認定意匈兩國政府對於此次事件縱非實際主使，也必早已事先得悉其企圖。他們有衆多而詳盡的材料，有確鑿的證據，他們想把這腔怨憤發洩一番。可是，他們這些準備却絲毫不會在國聯前面陳述出來。在赫里歐所謂英法外交的「無恥壓迫」之下，南斯拉夫人放棄了他們的計劃。國聯僅允許他們投遞一個專對匈牙利的微弱抗議，而即此微弱抗議，也一入委員會之門即如石沉大海，杳無音訊。這個巴爾幹王國所敗於由西門，艾登與賴伐爾三人所代表的它自己從前與國之手者，實極慘重。反之，意大利出席國聯的代表與納粹一般當場目擊者則皆大歡喜。

後來，南斯拉夫的外交部長葉夫底契（Bogoljub Yevitch）告訴我，說當時南人除屈服外，別無他路可走，因為法國人和英國人事先就告訴了他們，說他們如果執迷不悟，定要實行他們原定的計劃，那麼，就請他們自己單獨去對付這個局面，休要想得到西歐民主國家任何支持。

同時，那位有雄略的，生就一副蒙古人面孔的羅馬尼亞外長替圖斯庫（Nicolas Titulescu）也對我說：「巴爾幹的大門已向希特勒打開了。」

然而，賴伐爾對他自己的成功，却非常感覺滿足，他對他的一個同志說道：「我可未打算爲着幾個卑鄙的南斯拉夫人而夫斷送與意大利取得諒解的機會。」

這次會議的悲慘結局，不久使他們自己也明白了。不到一年的時光，小協約國（Little Entente）

的聖決持持人與英法的盟友。英法意認為保羅攪此親王罷黜，代之以極端傾向軸心國的不法商人史多雅爾（Milen Stoyanovich）同時，羅王卡羅爾（King Carol）也一反替圖斯庫的措置，放棄羅馬尼亞一向與國聯保持密切合作的傳統政策，而將西歐民主國家與小協約國一個個趕將出去。希臘國王喬治（King George），也於流亡十二年之後得以回國，任命親納粹的麥塔薩斯將軍（General John Metaxas）為副國務總理，不久之後，小麥復一躍而成希臘王國的獨裁者。

希特勒登台以後幾個月的時候，我遇到麥塔薩斯將軍，地點是在離尼斯（Nice）城數哩的一個英國退休商人的別墅裏。他已經六十餘歲了，但他一點不感覺到年齡的重担難於負荷。他談笑風生，狡黠的眼光在眼鏡後面奕奕有神。頸上束着一條可笑的白色闊邊硬領，使我極易想起我在大學唸書時的一位教授來。他不停地以手去摸弄他的領帶。

麥塔薩斯是一個聰智與淳樸，坦白與狡，高貴與卑鄙的奇怪結合物，尤其可怪的，是他竟相信希特勒能把希臘從它那最危險的敵人手中拯救出來。他會說過一些這麼的話：「墨索利尼刻正垂涎科府島（Corfu），他從未忘懷意大利人曾經一度被從那裏趕了出去。他的眼光早已注視在我們那些愛琴海中的島嶼與大陸的商輪上面。他是一個冒險家，他會攻擊我們。唯一能阻擋他的就是希特勒。」

我反對他這種見解，我說當日納粹爭取政權時墨索利尼曾予以援助。麥將軍却說奧大利與巴爾幹的利益衝突，將永使墨索利尼與希特勒爭吵不休，對於這點，他說他毫不置疑。隨即他又把納粹主義大加

讚揚一番。主人見我頗爲激昂，深恐引起激烈爭論，乃故意把談鋒引到一些比較無可爭議的主題上去。可是麥氏却偏又仍把他拉回納粹這件事上來。他相信納粹的命星業已升出地平綫之上，他顯見把他自己的前途寄託在這上面。他說：「德國現正力圖於最近的將來將它應有的富強地位爭取回來，它是希臘唯一可靠的盟邦。我們過去與德國毫無過意不去之處。」

麥塔薩斯一生都是親德的。他進過德國軍官學校 (German military Academy)，那學校裏的聰明教職員給他取一個好綽號，叫作「小毛奇」(Little Moltke)。在第一次大戰時，他即是同情德皇的。他和君士坦丁王 (King Constantine) 一同出亡，到世界大戰以後，又和他一同回到希臘。待士蔑那 (Smyrna) 的悲劇發生，君士坦丁王被廢，麥氏才決定親自出馬在政治裏演上一角。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他自己演出了一個小場面的暴動，結果失敗，他又逃亡去國。此後十年，他半在國外逃亡，半在充任希臘的國會議員。

「小毛奇」做了希臘的獨裁者後，一切措施幾乎全仿效德國。國會被解散，反對他的人之被拘捕監禁者達數千人，此外，并創立了一個青年的組織，其一切情形完全與希特勒的青年團相同。又樹立了一種嚴峻的檢察制度，警察掌握着人民生死禍福的大權。

麥塔薩斯把門向「特洛亞的馬」(Trojan Horse) 開得大大的。納粹的「遊藝家」，宣傳家，與秘密警察，遍佈希臘全國。正如法國駐希公使所一再報告的，沒有一個政府機關沒有秘密警察混在裏邊。

戈林，戈培爾和赫斯，都是麥氏的上賓，納粹的將領們，也都常來拜會他們。昔日在軍官學校時的舊夥伴，他一高興，什麼都指露給他們看了，於是這班納粹將軍們對希臘所有的重要軍事秘密，悉皆洞悉無餘。其他麥氏不會告訴他們的，他們也悉能從他們的偵探身上得知。一九三七年戈培爾曾向一個外國外交人員誇口，謂納粹對於希臘的軍事計劃，知道得比希臘參謀本部自身還要清楚些。

任憑麥塔薩斯將軍如何推崇希特勒，然仍不足以使他在西戰時期不以武裝和軍火向西班牙共和政府輸運。因為他之重視金錢，一如納粹。他瞞着他那親英的國王與德國祕密警察的耳目，把上項軍火偷運出國。他有一次對一個西班牙的傳表說道：「假如我們國王知道了你我的買賣英國公使必設法置我於死地，如果祕密警察聽到了這個消息，德國公使也必加我的生命以不利。」

麥氏不喜歡西班牙的代表到雅典來，大部分的買賣都是在巴黎喬治五世大飯店 (Hotel George V) 成交的。麥氏這方面，由他的一個女友代表，那女人身材修長，面容美麗，年約三十五六，膚色略帶櫻黑，眼睛烏黑，大而深凹。在她與西班牙代表的首次談話中，她即不會絲毫浪費她「做中」的寶貴時間。她問道：「我要減少幾多呢？」結果，他得到百分之十的佣金。

我在她第二次或第三次到巴黎的時候遇見了她，那時她心中非常煩亂。因為在她從雅典動身以前不久，希臘的祕密警察首領衛茲霍甫 (Erich von Wiesenhof) 去找過她，并告訴她納粹已經曉得她和西班牙共和政府間的種種買賣了，「如果這筆生意不趕緊停止，即將來結果恐不堪言狀。」衛茲霍甫并沒

有十分加重他的恐嚇，可是這女人已經感覺到她的生命發生危險了。其他在希臘爲祕密警察所不喜歡的人，早已一個個失蹤了。麥塔薩斯爲此替她特置兩名隨身保鏢。

慕尼黑會議以後，希臘進往西班牙共和國方面的軍火也停止了。這位「小姐」對西班牙的代表說：英國與納粹兩面夾攻的壓迫實在來得太厲害了。

巴爾幹諸國的統治者曉得他們自己的國家也被在慕尼黑投向豺狼的口中了。然而，或許也還有人作意外之想，仍懷一絲妄念，可是，這個念頭也讓張伯倫在慕尼黑會議以後不久發表的一篇演說給粉碎了，在那篇演說裏，張氏公開承認「德國在巴爾幹的優越地位。」

大約就在這個時候，我遇到了甯斯拉夫的攝政保羅親王。

我想那不會是慕尼黑協定以後兩個月後的事，保羅親王到英國去了一次，自稱此行爲「告別的訪問」（Farewell visit），便道并在巴黎停留了一二天。我在他的一個朋友家中遇到了他。這個朋友和親王的友誼，是當第一次世界大戰時他替塞爾維亞軍隊（Serbian Army）充當諜報官時建立的。當我被引到保羅親王的跟前時，我很想惹起他的注意，可是不會成功，後來我才曉得過去能引起他注意的人也確實沒有幾個。他看上去活似一個有鬼魂繞身的人，青綠色的眼睛，旁邊圍着陰暗的黑圈。總之，他的週身，有一股災難的氣氛。

他的朋友和我，腦子裏都只有一個問題，就是：親王是否確已下決心把他的國家讓在軸心國家尾巴上

走了？親王顯然地想逃避這個題目，他設法把話題弄得離政治遠去的，可是後來一個直率的問題把他釘住了，他也明白過來對於一個有二十年以上歷史的朋友，應該有一個明確的答覆與解說，因此，他態度一變，立刻坦坦白白，痛痛快快地說了個淋漓盡致。這種神情，與他那羞澀的儀態，柔軟的聲調，和文雅的舉止，形成一種尖銳的對照。

他說，慕尼黑會議是歐洲歷史上的一個轉捩之點。西歐列強把東南歐洲一筆勾銷了。他還引述張伯倫承認德國在舊大陸這一角落有優越地位的演說。他說南斯拉夫政府會再三詢問英國，問其是否確可助反軸心侵略或壓迫運動一臂之力，然所得的只是口頭的同情，不見有實際的援助。攝政王重複了好幾次道：「同情并不足以抗拒希特勒的魔掌呀。」

親王又說，法國已經崩潰了。由於國際間的互相猜忌，不能一致合作，法國任希特勒取得了中歐與伊伯利安半島 (Iberian Peninsula) 的許多有決定性的優勢。現在，法國是不能望其再來對抗希特勒的了。

保羅又說，從經濟的觀點上看來，南斯拉夫幾乎全在納粹掌握之中。南斯拉夫的出口貨物，大部運銷德國。他補上一句道：「對於這點，我們也很感激，因為否則我們目下這般困難的經濟狀況便會根本崩潰。」說到這裏，這個冷靜而有涵養的人物，也幾乎變得暴躁了。他說：「拋開這許多問題不講，最要緊的，還有一個蘇維埃問題。布爾塞維主義發展得很快，所以這個問題倘不是幾個月的事，倘不克有

何動靜，至多也不過是幾年間的事罷了。請看法國與蘇聯吧。」他說了許多布爾塞維主義如何危險如何危險的話，然後極端鄭重地說出了他的結論道：「希特勒是我們唯一的希望。」

他並不是喜歡希特勒，他沒有理由去喜歡他，他希望他的朋友不要往這邊想。他說他對英國極其同情。他說他在英倫三島過了幾年極舒適的日子，他永遠忘不了在牛津時與威爾斯親王 (Prince of Wales 即今之溫莎公爵 (Duke of Windsor)) 在一起的可愛生活。但是毫無第二條路可走。「我向我必需的物低頭，」他說。躊躇，他又帶上一絲諷刺的口吻，結束道：「我是一個現實主義者呀。」

過了一個鐘頭，他走了，去看一個美術展覽會去了。

保羅親王一生，自很年青的時候起，即已被籠罩在悲劇裏。一九〇三年，那時他還是一個小兒，一羣官吏在一個清晨衝進伯爾格萊德 (Belgrade) 的皇宮，把國王阿布倫諾維支 (Alexander Obrenovitch) 殺了，把王后瑪琴 (Draga Mashin) 從床底下拖出來，一槍結果了性命，就讓她一絲不掛地那屍體在一邊。經過了這一幕之後，他的叔父就做了塞爾維亞的國王彼得一世 (Peter I)。從此卡拉喬治維支氏系 (Karageorgewitchas) 又一度爬上國王寶座。

彼得王的江山還沒有十分坐穩，就有一羣官吏朋黨為奸，宣佈他的兒子皇儲喬治 (Crown Prince George) 是一個神經錯亂的人，而把他送到一個僻靜的處所去了。喬治究竟是真正神經錯亂，抑或是假

一般反對此身的人所說，是爲黨派傾軋作了犧牲品呢？這一個謎，須待他爾格萊德擄奪皇位的那天，才可以解答。然而，任憑怎樣，他的兄弟亞歷山大是做了王位的繼承人。

一九一二年，一九一三年間巴爾幹的幾次戰爭，塞爾維亞雖然獲得勝利，可是却也把個國家弄得幾乎精疲力竭了。這些戰爭，大都爲保羅親王在軍隊司令部中兩目親睹，一年之後，亞馬吉敦 (Arragedon) (重臨塞爾維亞人民。馬肯遜元帥 (Field Marshal von Mackensen) 的奧德聯隊在國內奔馳。塞爾維亞的殘軍及政府與王室等，皆忍辛茹苦，爬過白雪掩蓋着的巴爾幹山脈，流亡異域。保羅當時也就夾在這裏面。他的叔父再也不能掌握塞國的大好江山了，彼得一世心中漸漸起了陰鬱。據說，從那時候起。保羅親王便像有鬼魂附體似的，終日害怕他自己將來恐也有一日要背上一卡拉喬治維支氏系的罪過，一而成爲所謂神經錯亂的人。

其後，保加利亞與奧大利的軍隊潰敗，流亡政府得以還都伯爾格萊德。奧匈帝國前設哥羅西亞，斯羅伐尼亞 (Slovenia) 達爾馬提亞 (Dalmatia)，波斯尼亞 (Bosnia) 及黑塞哥維那 (Herzegovina) 各省，與前門第內哥羅 (Montenegro) 王國，悉皆併入塞爾維亞，而成南斯拉夫王國。此王國由保羅親王的大堂兄弟歷山大統治者凡十二年。亞歷山大首先係以攝政王名義秉政，迨其父王死後，始正式登大寶，稱號國王。

在這個新王國裏面，塞爾維亞人只有七百萬，其餘的，有五百萬哥羅西亞人 (Croats) 與斯羅芬人。

(Slovenes) 一百五十萬國人，和將近一百萬的日耳曼人與匈牙利人。因此，南斯拉夫承領了奧國多民族間題這筆遺產，這問題過去會成爲「哈布斯堡氏系 (Habsburgs) 的罪過。」現在，又像蟻行的毒物一樣，慢慢地把這新興王國的機構一一啃嚼，南斯拉夫的命運，正和許多旁的繼承這個古老杜納河君主國 (Danube Monarchy) 的國家一樣。死亡，「歐洲的病人」把他的疾病留給了他的後繼者。

塞爾維亞人信奉希臘正教，用賽列里文字 (Cyrillic script)。哥羅亞人信奉羅馬天主教，用拉丁字母。哥羅亞人在未加入南斯拉夫國以前，塞爾維亞人即曾許其將來自治，但後來伯爾格萊德的統治黨堅不肯履行這個諾言。於是十年以來，伯爾格萊德與亞歷山大王始終不肯一臨的哥羅西亞首都薩格勒布 (Zagreb) 之間，便不停的鬥爭着。迨一九二八年，爲哥羅西亞農民所愛戴的領袖拉底希 (Raditch) 在伯爾格萊德國會中被害，於是內戰便一觸即發了。從那時候起，亞歷山大王便毫不客氣地以獨裁大權統治着全國。而一九〇三年時把王宮大門開向一羣叛黨的齊夫柯維支將軍 (General Zivkovich)，也做了總揆。

迨後德國勢力伸張，南斯拉夫於是又成了列強的賭注。多年以來，西歐各民主國家與德國之間，爲奪取南斯拉夫的經濟政治掌握權，一直在暗地進行一種無影無形的戰爭，結果，德國勢力得勝了，雖說勝得很慢，然而却十分可靠。

彼得一世皇帝爲喬治薩瓦氏系帝王中惟一死在床上的。一九三四年十月，德國又臨到這個皇室，

即亞歷山大王在騎馬場過馬賽會場時，被哥羅西威的暴亂分子行刺身死。當保羅親王聽到他暴死時，據聞他曾這麼說道：「哈布斯堡氏系殺死了他，我將來知道是如何的呢？」

這幕悲劇，把保羅親王送到了世界政治的最前綫，根據亞歷山大的大遺囑，他是三個可以攝政的人物中之第一個，他須治理這個國家，一直到亞歷山大的兒子彼得成年。

在巴爾幹各國王室之中，羅馬尼亞的卡羅爾王是以敢於冒險著稱，保加利亞的波利王是以最精明狡黠著稱，而保羅親王則是以巴爾幹的神祕人物著稱。保羅的統治，到一九四一年九月幼王彼得得的十八歲生辰時終結，但是他是否肯把他掌運了七年的大權交還出來？所謂「卡羅喬治維支氏系的罪過」不會終臨到幼王彼得身上嗎？幼王尚未登基以前，不可以有另一次朋黨之亂使他重蹈他多數先人的覆轍嗎？幼王對保羅親王這種計謀無從確定，故不得不仍以大權交付與他。

亞歷山大臨終時，有遺囑說他的外交政策必須貫徹，這政策的第一傑作（*Chef-d'oeuvre*）即是組織小協約國，即聯合南斯拉夫，羅馬尼亞與捷克，共同反抗匈牙利捲土重來的企圖。這政策并主張與西歐各國維持密切政治合作，且對國聯與集體安全予擁護，蓋亞歷山大以此作為阻遏納粹擴張計劃的藩籬。

亞歷山大的遺囑未被重視，保羅親王自掌權之日始，即堅決執行其自己的一套政策，他這套政策與他那波刺的堂兄的完全一個南轅，一個北轍。剛開始時，外國觀察家幾乎還看不出來，到後來漸次公開

了。他與小協約國，法國及國際聯盟的聯繫放鬆，他瞞着國務總理葉夫底契與軸心國家進行秘密談判。待他認為時機業已成熟時，他把葉夫底契免職，因為葉在世界人士眼光中，是代表先王亞歷山大的政治傳統的。

葉夫底契把他被免職之事歸咎於受攝政王之妻娥爾珈王妃 (Princess Olga) 的影響。他有一次告訴我說王妃之攻擊他是因為他主張與蘇俄恢復外交關係，這本是全國大多數農民一致贊成的辦法。因為娥爾珈王妃為希臘某親王之女，與坎特公爵夫人 (Duchess of Kent) 為親生姊妹，正為她自己某次所表示的，她覺得她總是俄國末一代沙皇的甥女。她由她的母親赫勒王妃 (Princess Helena) 撫養成人，她認為她有替羅曼諾夫氏系 (Romanovs) 復仇的使命。當娥爾珈王后嫁入伯爾格萊德宮庭後，她的宮裏不久就成了一個俄國貴族與高級官吏的集中之所，這班人曾在吳爾吉爾將軍 (General Wrangel) 所統率的白軍裏面服務過，自在克里米亞 (Crimea) 被紅軍打敗後，就到南斯拉夫來發現了這片天地。帝俄派赴伯爾格萊德的最後一任大使，兩國政府至一九四〇年時還予承認，而且這大使也成了攝政親王夫婦的密友。法國駐南武官有一回對我說，當他第一次在保羅親王的白宮受招待時，他立刻覺得他似置身荷俄，因為大多數客人都是穿的從前帝俄軍隊制服。

保羅親王與希特勒的駐奧大使巴本間之首次秘密會見，即是由一個白俄將軍策劃的。據法國駐南公使報告，這次會見是在一九三五年五月裏舉行的。後來，納粹部長官員們便變了白宮常來之客。肥胖的

戈林元帥，在納粹中的地位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和容易着迷的保羅親王一同打過兩次獵。法國海軍部長甘班希（Cesar Campinchi）曾說：「坎特公爵夫人把巴爾幹的時尚帶到了倫敦，而娥爾珈王妃却把希特勒的密使帶進了白宮。」

保羅親王任命史多雅第諾維支擔任葉夫底契之職，這一次他找中了一個自願執行他的政策，改親西歐國家為親納粹德國的人了。史多雅第諾維支曾經說過，他把政治當做商業一般看待，這裏面同樣地充滿了風險與利潤。法國外交部會得到極可靠的報告，說這位南國總揆是軸心國家用錢收買了的，可是，這并不足以使他不在巴黎經由密使之手，把一列車一列車的飛機上用的炸彈供給西班牙共和政府。以換取高額佣金。當南斯拉夫封存美國商業信用款項時，有一個美國代表前來交涉，請求免封這筆款子，史多雅第諾維支竟向這位代表敲索一筆高得駭人聽聞的贖款。曾經有一羣軍事將領——西摩維支也在其中——向保羅親王呈遞過史多雅第諾維支貪污不法的種種證據，但這控訴結果還是被娥爾珈王妃斥退了。有一位法國的史學教授，在他和保羅親王談話時，曾責備史多雅第諾維支不該違背先王亞歷山大的遺言，誰知這位攝政王却粗率地回答他道：「你這責備找錯了人，他所執行的原是我的政策呀。」

保羅親王之與意大利簽立協定，隨後又與梵蒂岡教廷（Vatican）訂立合約，引起國中塞爾維亞部分極端的忿懣。希臘正教自傳教士起，對與羅馬教廷所訂的合約展開一個熱烈的反對運動。禮拜堂成了反對派集會的場所。柏爾格萊德及其他城市都有軍火的示威遊行，警察野蠻地彈壓着，有時甚至發生流

血情事。有兩個部長在街上被羣衆用石頭幾乎打個半死。而教長在一種不明不白的情形之下死去，政府，尤其是史多雅第諾維支，更有下毒將他毒死之嫌。整個塞爾維亞都近似叛變了。

就在這時候，一九三七年的秋天，葉夫底契到了巴黎。他謾稱害嚴重胃病，必須赴巴黎覓專家療治。憑此藉口，他獲得了一紙旅行護照，實則，他希望在這次旅行中能取得法國的支持，以便發動一個反史多雅第諾維支統治的運動。這位堅強的，留着黑鬚的前任總揆返留法京時，我常看到他。

葉夫底契曾向法國幾個內閣閣員遞過一個八頁長的備忘錄，其中的某些部分我還會錄來在我的報紙上發表過。在那裏面，葉夫底契有一個很詳細的報告，說是納粹如何的侵入了南斯拉夫的經濟利益，其用於宣傳的費用，是如何的浩大。他堅謂推翻史多雅第諾維支的情勢業已成熟。據他說，大多數軍事將領都站在反史的方面，故這種情勢，尤屬顯然。備忘錄的最後一句道：「將南斯拉夫爭回親法的傳統政策的時機業已來到。」然而，當他和優柔寡斷的法國外長台爾伯（Yvon Delbos）談論時，所得的結果只是一句冷酷而帶客氣的回答，說法國正在嚴密注視南斯拉夫事態之發展。

葉夫底契甚爲惱怒，遂致向法國參謀本部求援。他和參謀總長甘末林將軍作過一次會談，這次會談是由一位現尙淪在納粹鐵蹄下的國家的貴婦夫佈署的。談話在摩里斯飯店（Hotel Menrice）這位貴婦人的臥室裏舉行，我應葉氏之邀，當時也參加了這次談話。

巴黎人所見具有高級重要政治性之會議，無出在摩里斯飯店舉行之右者。這飯店離門對突列里

(Tabor) 然而當他與來遊巴黎的團氣兵團人仍如潮水般地湧了進來。惟其開向孟德波路 (Mendel Tabor) 的小小側門，則是純爲一般官僚政客需要避人耳目時出進的。

我以前從未看見過甘末林，因此對這次會晤懷着極大的興趣。甘氏進房子的時候，穿着一套高級軍官的便服，明亮的眼光很快地地在場諸人都打量了一番。他似乎非常安閒，他給人一種和藹的恬靜與勻稱的印象。不多一會，他這種悠閒的態度傳達到了葉夫底契身上，因葉在談話剛開始時是非常暴躁的。隨即，談到了問題的主題，甘叫葉把他的意思說出來，葉於是說，他之所以到巴黎來，爲的是覓取一種外援，以便展開反史多雅第諾維支運動，并說這不只是南斯拉夫一國的利益，同時也實是法國的利益所關。他說史氏的政策只有一部分人和少數軍事將領擁護。他說「尼希 (Nish) 和克拉格威池 (Kragujevac) 兩地的駐軍都是在我們這邊的。」空軍由西摩維支將軍統率，更完全是我們這運動的後盾。現在僅有伯爾格萊德駐軍的司令尙飄搖未定，我們如有把握取得法國的援助，他也會加入我們。

他要求法國將駐南法使撤回，因爲那人是完全受史多雅第諾維支支配的，他要求法國報紙起來指導攻擊史氏之舉，最後，然非最次要者，他要求一筆借款，以作從事是項反史運動之用，并允許於史氏倒台後歸還。

甘末林很用心地聽着這些話，偶爾也插上幾個問題。但他對於這個建議絲毫不表示意見。最後，他很客氣地說了一聲葉夫底契的法語講得極好，就此把這次會見結束了。

幾天以後，葉夫底契又看到了甘末林。他告訴我，甘末林不十分起勁。據甘末林說，財政部長龐堅決反對對葉夫的計劃予以任何支持，而內閣中大部分閣員也都和他一般見解。甘末林答應葉夫底契允許將他的意見詳加考慮，并應允在數週以後再和他見一次面。

不久之後，台爾伯準備去訪問伯爾格萊德一次。葉夫底契馬上趕回南斯拉夫，準備等這位法國外長到達時，發動一個大規模的示威運動，據他說，藉此可使法國政府知道他所報告的完全是根據極可靠的事實。果然，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台爾伯到達伯爾格萊德古城時，數萬人民給他一個熱烈的歡迎，當台氏的汽車開過時，熱情的羣衆高呼着「法蘭西萬歲，民主政治萬歲」等口號。警察出來干涉示威的羣衆，結果死了一人，重傷數人。法國的領袖報紙時報（Le Temps）評論這次示威運動，謂其「不合時宜」，蓋應龐萊之請作此論調也。

一九三八年一月，葉夫底契的黑髮美貌祕書馬可微支（Radole Marcovitch）祕密地到了巴黎，這次葉本人未能得到政府准可其再行出國。馬氏見甘末林時，我又參與了那次談話。結果，甘末林以一語把馬可微支對法國援助的一切希望給斬斷了。他說：「可惜參謀本部絲毫無能為力，達拉第（那時的法國軍政部長）數週前還極力贊成葉夫底契的計劃，現在都倒到龐萊那邊去了，對法國一切舉動皆表示反對。」於是此處就此終結。他還重複一句道：「法國參謀本部根本沒有政治權力。」

葉夫底契後來一直等到保羅羅格王即位，才掃盡人際障礙，在南斯拉夫府軍內閣，任巡警部長。

在與哥布林軍隊鏖戰之間，我與帝尼琪上校（Colonel Dinich）爲塞爾維亞有名遊學隊所請「柯米大奇」（Kenita）者的領袖之一。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柯米大奇」誓言一息尚存，決抗戰到底，結果卒能予德

奧侵略軍隊以嚴重打擊。他們隱匿深山，時出劫奪糧食與軍械，其行動之迅速，有如流星。這批眼光敏銳的殘漢，在敵軍進行的隊伍中散佈着驚人的流言，謂他們將把敵人捉來用繩網在樹上，然後再用火來把他們活活燒死。他們縱火焚燒軍需倉庫，并設法使火車出軌。當塞爾維亞殘軍在科府烏登編就緒，開赴薩羅尼加前線參加作戰時，「柯米大奇」在後方弄得所有守軍無日安寧。敵方歷重賞賈帝尼琪上校首級，然而他的事業聲名却暗地在塞爾維亞一般鄉村與市鎮的竊竊私議聲中流傳。戰事結束後，伯爾格萊德的國家博物院中特闢一室，專門供奉「柯米大奇」與帝尼琪上校的勳績。

帝尼琪上校也反對史多雅第諾維支的政策，因之遂被禁逐在南斯拉夫領土以外，不許回國。可是政府尚不敢把這位民族英雄逮捕判罪或竟加以暗殺。當帝氏逃亡在外時，許許多多的羣衆，爲向政府抗議起見，成羣結隊地去朝謁國家博物院的「柯米大奇」室。

當我在布拉格見到他時，上校正住在城外一座小樓上。他是一個中等身材的人。鬍子剃得很光，面帶憂鬱，眼呈藍色，深深凹入，有一隻耳朵下面有一個紅疤，他用我殘斷不全的法語解釋道：「這是一顆真國子彈打的。」他的住室由他的幾個極親信從衛護着，房子雖那麼小，然而却熙熙攘攘，極爲活

離。在他遷開屋子與南斯拉夫之間，川流不息地常有許多祕密信息往來。帝尼琪上校與之保持密接接觸的，是西摩維支將軍。他拿出許多西將軍的信來給我，那上面有着很令人興奮的報告，說是反奧多雅第諾維支運動在軍隊裏進展極速。

西摩維支參加黨爭這并不是第一次，當他還是一個年青的陸軍中尉時，他即已站在一九〇三年的叛黨一邊，不過這一次（一九三七年終）的黨爭却是對付當年由他自己一手扶回王座的下拉喬治維支氏系的一員的

我與帝尼琪上校晤談時，情勢尚未至成熟時期。首先，希特勒之掠奪奧大利，因得西歐國家之默許，延擱了下去，其後，慕尼黑協定又傷了這批揭竿而起的黨人志士之心。他們決計等候他們的時機，卒致等了兩年多，西摩維支將軍經過長期準備的改變，終於一九四一年三月發動，帝尼琪上校率三數百兵，逼保羅親王退位。

在南斯拉夫的保羅親王之前沒多時候，保加利亞的波利王也到英國去作了一次告別訪問，那正是奧尼黑會議以前不久的辰光。波利王不會被一般對任錫曼勳爵（Lord Runciman）赴捷任務所作熱情的樂觀解釋所惑，也不會被一般報紙所謂張伯倫與龐萊萊已突然強硬起來，準備阻止希特勒佔領蘇台德區的報道所惑。八月，當他和捷克駐保公使談到任錫曼勳爵的任務時，他說，「你們恐怕會要退讓些兒。

一後來，爆發的狂波震蕩全歐，到處撲殺猶太人，波利王適於此時辭職。他在議會席上肯定地說這

，一不會有戰爭的。」

他之訪英，英法兩國政府派報紙均認爲是波利王同情西歐民主國家的一種新的表示。然而轉機羅斯（Poincaré）却在秩序報（L'Ordre）上下着警告，說保王是一隻孤獨的狼，絕不可信，他懷疑他與希特勒之間有祕密勾結。但是，這種有正確資料可憑的法國政論家的呼聲，終歸在龐萊所領導的樂觀論調報紙的大合唱之中消失了。

天下無人比波利王再不可信任的了。在他那單純的行爲，彬彬有禮的態度，和不可抹殺的吸引力後面，却隱藏着一個冷靜的，精於盤算的腦經。自第一次世界大戰保加利亞慘遭大敗後，他即繼其父菲迪南（Ferdinand）而登大寶，從那時起，他心中即一直孕育着烈焰般復仇的欲念。保加利亞的代表米特洛夫（Dimitroff）——這是一個逃亡在巴黎的人，請勿與曾任共產黨總書記的那個季米特洛夫（Georgie Dimitroff）混淆——曾經告訴過我，說波利在性格上有一個最大的特點，即爲人非常殘酷。當一九二三年贊可夫教授（Tsankoff）狂暴地壓迫農民運動時，曾有一次將鎖壓經逼情形向王報告，王問道：「爲什麼死人這麼少？你必須讓他們多流點血，使之永誌勿忘。」

一九二三年後，波利幾乎成了保加利亞的絕對專制君主，但他在表面上却很聰明地給各外來訪客與會見之人一種那麼的印象，以爲他總是虛心地接受他那些部長們的忠告的。巴爾幹諸國的統治者沒有一個能像波利那麼以技術化的手腕掌握他的政府者，同時，也沒有人像他一樣更知道在人民氣態羶看時把

責任推在部長們身上者。霍可夫教授把一個國家弄在白色恐怖中者其三年之久，波利保障他，而英債社會還趕着波利叫「一個可親的人物。」他統治着這個國家，其沒有國會的時候學歐洲任何其他國家為多。但是，那些實行議會制度甚久的先進國家的統治者，却認為他還是「穩定巴爾幹秩序的砥柱」。

在巴爾幹各國統治者中，波利是唯一沒有出亡過的人。在巴爾幹諸王國中，保加利亞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唯一有損失的國家。它的領土被割讓給希臘，南斯拉夫和羅馬尼亞。自一九三四年起，視為鐵環的巴爾幹協約國（Balkan Entente）——即土耳其，希臘，南斯拉夫與羅馬尼亞——也包括了波利這個王國，然而這個鐵環畢竟還是在綏靖政策與納粹勢力擴張的壓迫之下給軋碎了。一九三七年以後，波利王自己知道，即使他願意再做西歐民主國家的盟邦，也沒人要他了。

從保加利亞一個消息最靈通，勢力最大的人那裏，我聽到了波利王與納粹這段糾纏不休的關係之經過。我和這人交談是在一九三八年。這人為保國軍政部長根雷福（Konner）之妻弟，根雷福一般人均認之為波利的密友。實際上，這人那時候正替根雷福負荷了一個重大使命到巴黎來。可是，除此以外，他還是保加利亞一個極大的煙草商人，這煙草商人的地位，就比一個部長的妻弟來得高，因為煙草等於保加利亞的黃金。

以下是我聽到的經過。紐伊列和約（Peace Treaty of Neuilly）為戰敗的保國所簽訂者，這和約對保國的軍隊數量與軍備狀況限制得極為嚴格。保國在其鄰國虎視眈眈之下者十五年餘，仍無法打破

這東線的鎖鑰。這希特勒重整軍備之舉，遠為其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有損失之國家樹一先例，於是保加利亞在奧巴爾幹協約國幾度激烈的長談之後，終於也獲得了整軍至一個相當程度的許可。

這個協定成功後，捷克各大軍火廠的兜售，一齊湧向索非亞（Sofia），希圖獨攬保加利亞重整軍備的這筆大買賣。他們這種作法，是得了捷克政府的許可的，捷克政府可算是有禮極了，事先還曾向倫敦和巴黎揚言，待這兩處答許了，捷克內閣方才向布洛（Bluno）的斯柯達和齊布羅爵夫那（Zbrojovna）兩家公司作正式的首肯。

捷克人並不會真正撈得這批生意的定單。希特勒的流動兜售人比他們還要尖巧。吳爾哈特博士（Dr. Helmuth Wohlthat）給保方一個極有利的物物交易條件，對於保方最重要的一點，是德國輸出的軍火可以保國煙草以外的其他產品償付，這麼一來，這小巴爾幹王國就無須以他的黃金去換取軍械了。

而這只還是這故事的商業方面，至於政治的方面，還有待加以說明。

在接受德國提出的辦法以前，波利王問過英法兩國，問他們對這辦法是否贊成，兩國回答說贊成，於是，實際上，他們就等於把保加利亞給了德國人。因為，據我的情報員解釋，一個小國家，有了德國的武器，德國的飛機，和德國人代為建築的飛機場，要塞，與砲位，自然不能望其抵擋納粹的鐵騎。保加利亞重整軍備與建設要塞的計劃，全是德國參謀本部給弄的，德國參謀本部自然知道如何迅速便易地去摧毀它。英法之應允保國接受德國所提辦法，只缺少一個正式承認保加利亞屬於納粹軌道的手續而已。

命運寄託在納粹身上。

毋庸置疑的，波利王是傾向納粹德國了。他想推翻陳案，誠如他那在意大利出生的妻子姝愛娜王后（Queen Jeanne）所說，他相信「保加利亞的機會完全在想翻陳案的納粹德國與法西斯意國身上。」他憑理相信，只有德意兩國可以替他保加利亞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喪失的領土奪回。那些領土是他無一日不在哀悼的。他也相信，只有德意兩國才能把他救出布爾塞維主義的威脅，這威脅他想來是千真萬確的。

他有一次對德國公使說道：「我的農民愛俄國比愛我還利害，你不知道嗎？他們在一九二三年差點兒把我捉去了，假如他們再猖獗起來時，你是不預備挺身出來保護我，反對他們呢？」

輕快可愛的塔大拉斯庫（George Tatarescu）曾數任羅馬尼亞國務總理，有一回告訴我，說「巴爾幹的政治，僅只是世界政治的一個反映，沒一個巴爾幹國家有他自己的政策。最幸運的是遇到兩大不相容的國家或一羣集結的強國之競相攫取。但我們總是被迫着面面周旋的。」

那時是一九三九年，他正做着駐法大使。他做過卡羅爾王多年的第一流疑難解決者（「國王如有什麼事情弄不清，我可以叫他弄清」）他一樣地主持過「自由」政府與集權政府，名目上雖大有殊異，實質政治上可沒有這差許多。

塔氏在羅馬尼亞是彼視為親法的。我知道有一次他曾幫法國政府一個大忙。時候是在一九三九年。他得到風聲，說是卡羅爾王與納粹之間有差恥密談判。據報告，卡羅爾應允於一旦德國與波蘭之間發生武裝衝突時，雖羅波間會訂有軍事同盟，羅馬尼亞仍保守中立。那時候，德波的關係還非常密切，綏靖政策正如如火如荼，報紙上的樂觀論調，有英法兩國政府爲之保證，說歐洲可望得到和平歲月，他們還提到慕尼黑協定，說那是初步的効果。總之，黃金時代將臨了。

到了這一當兒，塔大拉斯庫的情報確有極端的重要性了，他覺得他有義務把他們國王的秘密談判告知法國政府，因此，他跑去見外交部長龐萊。

塔大拉斯庫原滿擬龐萊定會感激他，誰知結果大謬不然。據他告訴我，他被冷落地接待着。龐萊正在作一張表示歐洲情勢的淡紅色圖畫，塔氏帶來的消息與這圖畫并不相合，因此龐萊聲稱這情報與他自布撒斯特（Bucharest）和華沙（Warsaw）得來的一切消息均相違背，且即令其是真的，他個人也并不反對羅馬尼亞與德國之間有比較密切的關係。

塔大拉斯庫也不會錯過把他這發現告訴英國大使的機會。他在英國大使館中所得到的是怎樣一種接待，我不知道，我只知道過了幾個禮拜以後，羅馬尼亞大部分油產歸於納粹的規定，由羅德兩國簽字了。

這是德軍佔領布拉格以後的事。英法兩國雖早已曉得德羅之間有所談判，然一直不會有過任何措置。

，到這時，兩國突然起來發言了，波多時以後，英法共同宣誓保護羅馬尼亞。

這件事發生之後一個禮拜的光景，我遇到塔大拉斯庫，我滿以為他會喜氣洋溢，誰知不然，他說：「我怕這已經太遲了，我相信卡羅爾定會履行他與納粹所訂的協定，公開的或祕密的，全都在內。」他的話不錯，卡羅爾把他的國家一步一步引上了納粹的軌道。

這個辦法並不會救了卡羅爾。卡羅爾的反塞米提族法律的集權政制，在納粹看來還是不夠美好。約莫在法國之役快將結束時以前，納粹的傀儡安多雷斯哥將軍 (General Ion Antonescu) 先把國王趕出國境，然後把德軍引了進來。於是，國際權勢政治中一注賭本的羅馬尼亞，又一度看見外國軍隊降臨他們的國土。

英國的保證不能挽救羅馬尼亞不被納粹佔領，新的納粹保證也不能挽救羅馬尼亞不發生流血事件。鐵衛隊 (Iron Guard) 叛變，縱火焚燒布撒斯特城蓋陀 (Getto) 區的店舖與猶太教堂，把猶太人一羣羣像牛羊般地趕到屠宰場去殺斃，這事實經過一番激烈的戰鬥才被安多雷斯哥將軍鎮壓下來。總計死傷，為數之多，在第二次世界大戰若干戰役之上。

納粹軍隊從蘇聯穿透保邊界，垂涎那些地方者，且數月之久，結果於一九四一年二月末梢開了進去，又帶回一羣無血流的俘虜。而李斯德元帥所予兩斯拉夫與希臘的致命襲擊，也即是發自保加利亞。

七、麥唐納：「被蝗蟲吃了的歲月」

當一九三三年一月三十日西門爵士打電話給麥唐納首相，報告他德國發表了一個新國務總理時，麥氏正在和一個朋友討論他預備向裁軍會議提出的新議案。電話聽不大明晰，首先麥唐納還沒弄得清楚，他問道：「是誰呀？」等他把名字聽清以後，他說過一會再打電話過去。似乎並沒有什麼打擾，他繼續談他的話，又談了一個鐘頭。直到他的朋友向他告辭，他才偶然提起，「噫，阿道夫·希特勒做了德國的國務總理。」

在這個晦氣的日子以前不久一些時候，一個德國實業家到了倫敦，想探測倫敦市上和英國政府對希特勒組閣的可能反響將為如何。這位赫特伍德的亞倫勳爵（Lord Allan of Hurtwood）稱之為「方頭禿頂的德國密使」，在某次席間，見到了麥唐納，鮑爾溫，和其他許許多多內閣閣員。

差不多在同時，狡誦敏銳的里賓特羅甫也到了倫敦，在倫敦社會上鬼混着。——那時候他還做着香檳酒生意。這是他第一次被派到外國做重要工作。這項派遣，當時很遭燥脾氣的國會議長戈林不以為然，他說這個賣酒的沒有什麼用。

里賓特羅甫這次觀風色之行所帶回去的印象是些什麼，從一九三三年一月八日戈培爾爵士對

高級官吏的演說裏可以得知。這位日後的宣傳部長說：「英國人不會妨礙我們，至少現在還不會。」兩年以內我們還可以牽着他們的鼻子走。」

這兩個非官派使節之到倫敦，其實只不過是一大羣德國訪客的先驅而已。自希特勒秉政以後，德人更絡繹來英，遊說英人，謂納粹政府的作法，最能顧及大英帝國的利益。這羣人來得恰是時候，因為這年以來，倫敦社會上盛行着於週末招待一個納粹客人的玩意。會記得因此且曾招致一位工黨黨員的疾呼，他認為所謂週末也者，亟應廢除，「因為週末不是給希特勒用來作一次驚人的突擊，便是給他們一些密使用來和我們的希特勒迷計議下一次的突擊。」

英國對付納粹德國的第一個首相麥唐納死了。張伯倫也死了。在德國納粹當權時三度出任英國首相的鮑爾溫，現在大致也早已被人家忘記了。然而這三位先生對於今日歐洲局面之釀成所應負的責任，確是太大了。同時，他們所採政策之結果，其使他們被從近十年來歐洲人物誌裏刷下去的程度，也確是驚人的。他們所遺留在歐洲史與世界史上的痕跡，是永遠不能磨滅的。

我於希特勒上台後幾個星期的時候，由巴黎到了倫敦。我想找幾個朋友談談，看反納粹運動有幾種沉下來的可能。

我從下議院的邊廂中看見麥唐納坐在第一排位子上。那時他正從巴黎和羅馬回來，似乎很有一副氣血可擊不可擊的神氣。他的身旁，一邊坐着頗大的樞密院長鮑爾溫，一邊坐着瘦長的財政大臣麥克唐納。

倫，正象徵着他是保衛黨的一個俘虜。鬼臉外相西門，靠近張伯倫身邊坐着。

在被問到時間時，有人提出了關於納粹德國殘暴情形的質詢，西門爵士刻板的回答說，「政府方面尚未接到正式報告。」西門及其他閣員中，似乎無人知道目下恐怖狀態在希特勒魔掌下的德國如何猖獗，和猶如已往德國國會放火焚燒了的事情。但到後來，當一個關於蘇聯的辯論開始時，西門爵士可沒這麼好的耐性了。該案關涉幾個京都威克軍火廠(Metropolitan Vickers)的工程師在莫斯科工作，被蘇聯當局控以怠工之罪，因而被捕的事情。英國政府不待蘇方傳訊入證，及公佈審判結果，立即停止與蘇聯政府正在進行的商約談判。——這是希特勒就職後剛剛七個禮拜的事情。

國會議員和各部大臣都毋須諱隱他們敵意的感覺了。外相對於蘇方的攻擊，引起了政府黨及大多數反對黨很大的歡愉。此種歡愉，幾時刻見之。西門爵士竭力運用着他的全副演說技巧——他的演說技巧是會使他在倫敦騎士團組織的所謂「廟堂」(Temple)享過盛名的。當他說到極為動人的那一霎那，他那嘹亮的聲音會提高到最高的限度。當他說到富有支使作用的幾段時，他的聲調又會很適時地顫動起來。為此緣故，納粹報紙後來稱他為大政治家。

在一次國聯大會中，我聽見麥唐納發表過一篇「爲人道而發」的慷慨激昂的演說。演說後數小時，他又接見一個代表團。這個代表團是由許多傑出的法國科學家組成，特地趕到日內瓦來，請求麥首相爲被納粹主義殘害的人主持正義的。我也就隨同在這個代表團裏面。

麥唐納在他的起居室裏接待我們。看上去他似乎很疲倦，很吃力。他所說的幾句話，似乎也不大能聽得進去。他沒有請我們坐下。他說他只能花很少一點時間和我們談話，因為他另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約會。代表團的發言人是一個有名的人類學者。麥唐納聽取代表團發言人的話大概有五分鐘光景，但他講到本國議會對流亡人處境表示同情的字眼，也沒有半點對接談感覺興趣的表示。他毫不客氣地打發我們走，只說是他可以研究這個問題。

又是幾分鐘之後，我看見他在旅館的客廳裏，和倫敦德萊侯爵夫人（*Marchioness of Londondery*）在一起。那就是他的重要約會！

麥唐納真正對納粹暴怒的一次，是在接得英國駐德大使的報告，說是戈林在其夏斐德私邸（*Schlösschen estate*）招待外賓，邀請客人觀看一頭歐洲野牛與一只母牛配合的事情時。對於這個，麥氏認為是倫理上的暴虐。至於納粹恐怖，那還不足以使他激動。

麥唐納的國民內閣派在議會中博得極大多數。先只保守黨一黨，即在六百個議席中佔據了四百五十多個。不過麥氏個人的擁護者還是僅够一打。保守黨議員的半數，過去都擁有許多重要的公司在手裏，現在也仍握着。在黨內起了分裂的時候，還有十六個銀行的董事，二十七個財務公司的經理，和一百〇九個煤礦，鐵礦，煉鋼廠，軍火廠，造船廠的老闆做着政府的客卿。總合起來，有兩百個保守黨議員愉快地捐負着七百個左右資本家的担子。

這的議會中的大商業代表，對於希特勒的觀感，與那些曾經把希特勒捧上高臺的德國大商業代表無二致。自從不景氣襲入歐洲和美國的經濟界後，世界各國的大商業皆大起恐慌。西班牙君主政體之崩潰，以及俄國內戰之慘劇，使他們惶惶已地，焦急地望著法國「左翼卡特爾」(Cartel of the Left) 的崩潰。他們正準備著準備地看著德國共產主義的幽靈抬頭。他們過去訕笑斯大林的第一個五年計劃，但現在他們已完全變為驚惶成爲一個事實了。不久以前，英倫銀行 (Bank of England) 的總裁諾爾曼 (Norman Belmont) 發出警告，謂「若不採取猛烈手段以資挽救，全世界資本主義制度在一年之內皆將毀滅。」這句話在他們耳朵裏不樂意地旋轉着。因此，當德國統治者採取一種極端猛烈的手段，而且起用納粹時，英國同僚自然認爲這是一種解救的表徵，自然不會去妨礙希特勒的事了。

有一句這樣的話，叫作「諾爾曼入侵英倫銀行」(The Norman Conquest of Bank of England) 這話的來源，幾乎要追溯到一百年以前去。因爲諾爾曼的祖父那一輩，有兩人做過英倫銀行的董事，他的父親也做過了。而他自己，把持這家世界數一具有權威的銀行機構，亦達二十一年之久。我看見過他一次，在麥唐納那倒臺的世界經濟會議裏。那時他已經六十多歲了，但還有一股青年人的英氣。他不能不表示他的一些事情，表示出衷心韻味的模樣。

也許是由於我聽到了不少關於他的傳說，故我認爲諾爾曼有很大的勢力。他的舉止像一個對自己極有把握的人。他的舉止和言論都有充分理由使他意志力量強大。伊頓 (Eton) 和劍橋兩個學校給他

的教育，支持了這國漫異的世系。他參與過波爾戰爭（Boer War），得到過優異服務獎狀。同時獲，任一家名譽顧問、喬治公司（Brown, Shiley and Co.）的重要財務商行的股東。一九一五年，專任英國銀行董事，其後五年，改任總裁。

他以鐵腕管理着英倫銀行。「切勿與鬍子總裁起衝突」一句話，成了行裏的不成文法。他有他自己的祕密事務，和他自己的外交政策。工黨政府時代的外相韓德森（Arthur Henderson），曾發過這樣的牢騷說：「許多重要事情，政府還不會曉得，大部分他就先曉得了。」

雖則諾爾曼處心積慮要想保全現制度，但他如高興時，也可以在什麼時候把這制度加以破壞。他因結了婚後又會離婚，所以有一次皇家請客便沒有請他，他馬上以辭職相威脅。傳聞英王喬治第五（George V）對這買賣只好屈服，連忙謝罪不迭，說是「我再經不起一次財政危機了。」

和其他許多隱在國王寶座背後的權勢人物一樣，七十歲的諾爾曼，成了許多掌故的中心，不問其為假的或是真的。外間都曉得，他極不喜歡政客，極不喜歡在羣衆中現身，但同時也曉得他那喜歡種花，喜歡穿戴稍嫌不合時宜的衣帽，和喜歡在地下道跑馬的怪癖。雖則有許多故事為衆所週知，然而他還是一個富有詭祕氣氛的人物。勞合·喬治有一次嘆道：「這人整個的一身就是一個神祕故事。」

但是諾爾曼對於那位滑溜的沙赫特博士（Dr. Schacht）之景佩，却不是一件祕密，因着這一景佩，英國人民真不知吃了多少虧。據諾爾曼的友人說，諾氏之景佩沙赫特純是因沙赫特對不景氣所發預言甚

爲正當的緣故。但是如果說他們的友誼是由於一種共同政治信仰的結合，似乎更較可嘉。諾爾曼和沙赫特一樣，掌握着建立和推翻一個政府的大權。一九三一年的財政危機，是諾爾曼串演的，其結果率使第二工黨政府垮台。又有人說，麥鮑合作之產生，諾氏也是收生的穩婆。

當選總裁的條件，是須具備四千鎊以上的股份。諾爾曼的股份，依目前市價折算，合美金六萬元左右，自然，這不過是他全部財產的極小一滴而已。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英倫銀行總裁改爲每兩年改選一次，諾爾曼就連續當選了十一次。一萬四千股中，出席開會的不過極少數人，這些人對於銀行業務，都極端滿意，因爲過去十八年中，雖然不景氣與繁榮迭相承替，而銀行始終能分給百分之十二的紅利。

諾爾曼，和他那一步步爬起來的副總裁卡吞斯（B. D. Carters）還有二十二個其他的董事，合組成一個英倫銀行董事會（Court of the Bank of England）。據說到這董事會上來的一些商人，比一個初次參加皇室宴會的人還要來得害怕，因爲正如一個寫小冊子的人所說，「諾爾曼這個董事會，其勢力之大，遠在白金漢宮庭（Court of Buckingham）加上下兩院之上。」

英倫銀行的董事，大部分爲銀行家及理財家，僅一小部分爲實業家。裴林兄弟公司（Barings Brothers）是一家經營銀行業務極有勢力的商號，自一八〇五年起，即爲董事會代表。此外有三家銀行，在董事會佔有一席，亦各達百年以上。此即漢布洛銀行（Hambro's Bank）、希羅德銀行（Schroeder's

Bank)，和拉查兄弟銀行 (Lazard Brothers)。此三家銀行之代表，囑與斯干底納維亞，德國，法的銀行界分別勾結。巴黎有他們一家聯號，牌名拉查·弗雷瑞 (Lazard Freres)，以其龐大的勢力和財富，竭力支持着龐萊的外交政策，並且還做着出賣捷克軍火廠與納粹的中間人。

實業家董事中最有地位的，是斯丹浦勳爵 (Lord Josiah Stamp)，這人兩頰通紅，爲張伯倫的好友，因此也是英國一個極著名的綏靖派分子。他一向做着倫敦內陸銀行 (London Midland) 和蘇格蘭鐵路銀行 (Scottish Railroad) 的主席，直到最近方在一次空襲中被炸身死，他是那不堪回首的英德協會 (Anglo-German Fellowship) 的一個會員。安得森爵士 (Sir Nalle Andeson) 爲下議院保守黨議員，以代表造船業利益而得出席董事會。此外，還有一位實業家董事，即鄧肯爵士 (Sir Andrew Duncan)，他後來做了邱吉爾內閣的供應大臣。

諾爾曼這個銀行，爲倫敦市「錢城牆」(Money-wall) 的中央峯塚。其一百五十個董事，掌有二千一百四十九個財務機關和企業公司的所有權。它與「五巨頭」——威斯敏斯特銀行 (Bank of Westminster)，[克萊銀行 (Barclay's)，勞合銀行 (Lloyd's)，內陸銀行 (Midland)，國家地方銀行 (National Provincial)]——及旁的幾個莊號合而形成英國財政實業界的無上龐大權力。據一本新發行的社所出的小冊子 (New Fabian Pamphlet) 說，「英國的財政實業大權，完全操在極少數人手里，

我們可以說，少是兩個，多也不過三百。」

新報專政一經成立，各工會組織一經摧毀，則德國重整軍備的步伐，必無遲延。無法保證秘密的程度。當時，必須與英國覓取諒解。德國國家銀行主席沙赫特博士與英國英倫銀行總裁諾爾曼氏，為這工作開闢了一條途徑。當一位美國大使詢問佛爾夫（Otto Wolf），謂依他的見解，希特勒之得以富強，誰的力量最大時，這位神采煥發的德國實業家毫不遲疑地答說，「沙赫特博士與諾爾曼。」

其次，諾爾曼在倫敦請客，沙赫特博士在席間見到了那些英國最重要的銀行家和實業家。當時，財相張伯倫也到了場。據沙赫特博士說，希特勒的計劃純為想重建德國的尊榮（廢除凡爾賽和約的好聽說法）和求得與列強地位的平等（重整軍備的好聽說法）。沙赫特向他那些一團高興的聽眾担保說：只要這些能够做到，希特勒準可和過去解決德國國內共產黨一樣，把俄國解決。據這位財政巫師說，希特勒認為使全世界從波爾塞維克主義的威脅之下獲得解放，是他的特殊使命。

法國新任駐英大使考賓（Charles Corbin），把這次會見的情形向法國外交部報告得很詳細。據說沙赫特博士曾獲得英國政府對希特勒重行武裝德國之諒解，謂只須不從事海軍或大空軍的擴張。考賓說，張伯倫之到場，係對沙赫特博士之光降予以一種出自官方的友好的面子，而諾爾曼之担保，更被認作沙赫特誠懇與善意的保證。

納粹軍裝軍備的工作日益增進，麥唐納經由議會和報紙發布的言論中，自然也不好再一一稱之為無稽之談了。政府雖更懸慮否認，但其在國會的宣稱仍是徘徊於用鄭重字樣於事後予以承認與重加保證之

間。政府對於納粹軍備的驚人擴充，從未全部承認。鮑爾溫答復邱吉爾的攻擊時，曾這樣說過：「本國政府力圖於不久以後造成我國空軍數量與威力不在任何可以侵及本國海岸之各國之下。」但他同時又復警告那些「毫無根據的龐大德國軍備觀。」麥唐納最親信的顧問倫敦德萊侯爵，亦作如是說法。

在此時期，政府竭盡心力，企圖以各種方法與納粹德國就此範圍訂立諒解。在裁軍會議尚未壽終正寢以前，英國人都希望這個會議可以成爲促使希特勒懂得理智的一個因素。但實際上，正如日後在邱吉爾內閣做經濟作戰大臣的達爾頓氏（Huzh Dalton）所說：「舉凡保守黨所作所爲，看上去無不好像都是爲裁軍會議的主要目的就是在替德國重整軍備一事尋找法律根據一樣。」

後來希特勒把對日內瓦的門堵上了。可是英國政府又另外找出了一些新的理由，表示仍有希望和可以樂觀。例如，希特勒的清黨屠殺，就是其一。希特勒保證「現在希特勒業已卸下過激主義的外衣，再不會一如往昔之喜聞殺伐了。」

在某一次宴會上，我聽見麥唐納內閣的作戰大臣赫爾申勳爵（Lord Halifax）發表過如下的意見，他說：「清黨運動，以及希特勒於興登堡死後爬上總統位置這一事實，使他變保守了。現在，他個人的野心滿足了，他一定高興保持他已有的，而絕不願再孤注一擲，輕易冒險。」我立即提醒他，不久前，納粹還在維也納把陶爾斐斯總理刺殺了，但他不大深論此事。

後來，薩爾區公民投票之期將屆。這又給樂觀派的預言來一個刺激。據說，只要這回通過了，希特

戰即各主權國。他可以與西歐各國訂立空軍協定，甚至還可望來一個東方羅卡諾會議（Racorn Loano Conference）。公民投票的結果，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票數主張歸回德國，這是出人意料之外的一件事，因為許多外國觀察家原來都希望有較多票數主張保持現狀的。

直到一九三四年十一月。鮑爾溫才不得已而承認「德國正在從事建立空軍，我相信這是不錯的。」但他立刻又補上一句道，「這並不是說德國的空軍馬上會趕上我們，德國空軍目前的實力，還不及我國現在歐洲力量之半。」

在保守黨內邱吉爾派的攻擊之下，政府不得已向希特勒提出了一次抗議的備忘錄，但這備忘錄着重在納粹擴軍對世界輿論的影響，而非着重在重整軍備一事的本身上。希特勒并未爲此備忘錄所感動。在此備忘錄送達之前六個禮拜的時候，威克軍火廠（Armstrong Vickers）還曾以現款賣給他價值數百萬鎊的軍火。他曉得英國大商業界正如巴爾富鋼鐵公司（Balfour Steel Company）總經理巴爾富爵士（Sir Arthur Balfour）所說一般，認爲「德國全不武裝，倒是和平的一大威脅。」因此，希特勒仍得以繼續整軍，而英國政府也仍然力爲德國整軍向本國人民作辯護。

希特勒在希特勒正式通知西門，說德國空軍數量業已與英國相等以前四日，航空部次官還在下院宣稱，「我們沒有正式統計。但根據我們最近所得的報告，德國空軍已較我國爲強之事殆不可信……現在我們所能估計者，即至本年年底時，我們的空軍力量仍可保持優勢。」

德國採取徵兵制這一消息，英國一般民衆聽了都爲之震駭，然英國政府不然。赫爾申勳爵不諱言此事，他在上議院會如此說，「說我怎樣驚訝，那是靠不住的。」他如何可以不驚訝呢？數週以前，西門向內閣報告，徵兵制度已經傳到德國，但他說他不知如何才可制止。他的同僚，也無一人知道如何而後可以制止。事實上，他們之間也并無人想要去制止。反之，他們決定派西門和艾登兩人同去詰晤德國元首。

外相在動身向柏林去之先，即已準備到希特勒跟前擦一鼻子灰的。訪問原定於徵兵制宣佈以前前往，不料元首因英國國防白皮書（British White Book on Defense）會將他的重整軍備之舉略予評議而大爲不滿，故西門雖已整裝待發，卒致還是把這訪問打銷了。

於是，英國外交部發佈一個消息，謂德國會向英國提出一個不利於法國的誘惑性建議，據說這建議被拒絕了，所以希特勒把兩位英國大臣的訪問延擱下去。雖然法國駐德大使彭塞（Francis-Poncet）被人說得相信了，但法國駐英大使考賓對這事則始終表示懷疑。然而，無論如何，這事對賴伐爾之積極想與德國訂立協定一舉，總算是攔阻了一個時期。

最後，英國大臣們終於還是與德國拉攏了，他們重向希特勒保證，英國政府決不以爲德國徵兵即是妨害兩國間之關係。他們要求希特勒同意那個他在數月之前即已答允了他們的空軍協定，以爲交換條件。爲這事，希特勒立即又加一次答允。他甚且還進而宣佈決不進攻奧大利。

會議結束以後，西門告知在外面等候的一羣新聞記者，謂希特勒之整軍可以促進和平。他隨後回至倫敦，出席開議——斯特萊沙會議（Stresa Conference）以前之最後一次開議——在這次開議上，他和麥唐納計議着如何去晤見墨索利尼和法國總理佛蘭亭（Flandin），外長賴伐爾。他們準備建立一個新的和平陣線，即所謂斯特萊沙陣線（Stresa Front）。有一家法國報紙趕這叫「反希特勒外交的馬奇諾防線」。後來經事實證明，這陣線確不比那真正的馬奇諾防線強多少。

開議的情況非常混沌。張伯倫不主張兩位大臣到斯特萊沙去，凡反對第一個公開破壞凡爾賽和約的，雖一紙決議，他也是憤恨的。後來經麥唐納與西門說明「將力使斯特萊沙會議不向德國關門」，他們始獲放行，而卒仍不免為羅慕米爾勳爵（Lord Rothermere）的每日郵報（Daily Mail）警告道：「毋忘蘇聯政府是陰謀工作者之一。」

德國人民觀察報（Völkischer Beobachter）認為英國代表此行，等於替納粹德國作代言人，因西門留在斯特萊沙期間，向報界發表談話，一直表示着隨時盼望德國對空軍協定的好音，然而始終沒有。

反之，據後來意大利駐法大使透露出來的消息，墨索利尼侵略阿比西尼亞的計劃，當時倒是獲得了各出席代表的默許。當墨相開始宣讀決議案的草稿時，第一句話就是「三國決保歐洲和平」，讀完，他停了一下，眼光向四圍掃視一週，然後又把「歐洲」兩字重唸一遍，見無人反對，才再繼續讀下去。草案內沒有提及阿比西尼亞，雖則各國政府都知道意大利進侵阿國的熱烈準備仍在加緊進行。

羅斯特萊沙會議之後，國聯又開大會。一羣新聞記者纏住了西門爵士，想從他身上打聽點什麼出來。我當時也是這羣記者中的一個。西門外相身材高大，頭髮盡白，下顎突出。他有一套特殊本事，即無一主題，也能够說得出許多話來。他滔滔不絕地只顧說着，致使我們絲毫無法提出那些令他傷神的問題來。後來，他把手搭在一個英國記者的肩上，就跟這個人一起走了。據曼徹斯特導報通訊員的記載，這次所得唯一的消息，便是西門曉得了那個記者的正確教名，因為他之老記錯人家的名字，是出了名的。

柏林會議，斯特萊沙會議，以及日內瓦大會的最後結果，便是一紙和西門本人一樣軟弱的反對德國採用徵兵制的決議。有一個巴爾幹的代表懊喪地計算着，說這張紙頭花了好幾十萬元。

納粹德國仍然繼續建造着他的軍備。

在麥唐納的國民內閣末期，德國業已重新建立了它的軍事力量。可是，希特勒於一九三五年五月廿二日的演說中，還把他那與西方諸國訂立空軍協定的香餌拿出來了一次。他嘲笑那些預言他將進攻奧國的人。但他公開說這小民主國「內部」倘發生若何事端，他不能負任何責任。這是他公開以第五縱隊從內部破壞為威脅的第一次。

倫敦泰晤士報又把這位納粹領袖力加頌揚。樞密院長總爾溫「歡迎希特勒先生助成一總解決的貢獻。」反對黨領袖阿特里勸政府「研究希特勒的演說，因為那裏面有為取消凡爾賽和約的新歐洲會議食盡的材料。」戰雲密密地籠罩着阿比西尼亞，空軍協定又永無實現之期。

在另一方面，鮑爾溫正預備在下議院承認他對德國空軍估計的錯誤。「我完全錯了，我們對這事情完全弄錯了」。他發布這一宣稱，無疑自認他很適宜於出任第三任首相。里賓特羅甫到倫敦來籌備海軍協定之事以後沒有多久，麥唐納辭職，鮑爾溫繼任首相。

麥唐納隱到後面做樞密院長去了。在這位一度成爲綏靖主義者執政的末期，歐洲各國競相從一種空前未有的大軍備競賽，這個競賽由納粹領先。話雖如此，然一九三五年一年之中，英國國家大軍火廠商的股份，亦已一躍而增加了百分之一四九，飛機工業的增加，價值七百萬鎊。

鮑爾溫後來管麥唐納當政的這段時期叫「被蝗虫吃了的歲月」，「其實，失去的時間何僅止此？鮑爾溫和麥唐納正易地相處，而希特勒「新秩序」——當然得重謝鮑麥二公及其同僚——的陰影早已投射到整個的歐洲了。

八、鮑爾溫：「不過丟點面子而已」

希特勒登台之後不久，我初次會到樂相助爵（Lord Lethian）。滿頭通紅，精神煥發的工黨議員版金遜（Ellen Wilkinson），後來會做到邱吉爾內閣的內政部政務次官的，和我一同驅車到他那美麗的鄉間住宅去，那住宅在諾福克（Norfolk）地方，叫做布利克林廳（Blickling Hall）。我們兩外，唯一的客人就是一個印度律師。樂相助爵雖已辭卸印度事務部次官之職，然而他對印度事務，仍極感興趣。

他最近到蘇聯去了一次回來。和亞斯特夫人（Lady Astor）、蕭伯納（Bernard Shaw）等一同去的。他相信資本主義世界已經到了末日。在一個長時間的談話中，他向我們說明，不久之後社會主義即可統治全歐洲。第二天早上，朝日初昇，花園平和而寧靜地躺在和煦的陽光底下，樂相助爵環繞着園子的四周給我們指點，並且說道：「三兩年之內，這裏就要成為蘇維埃蘇聯求之的勞工改造之家了。」他向我們發牢騷，說他已經在這裏付過七萬金鎊的稅了。他問我們：「還弄得好久呢？」他不相信希特勒的局面可以苟延多久，爲了這，他曾引用許多粗魯的字眼。他之憤慨，似乎完全是因爲相信現制度——我唯有在此極制度之下始能愉快地生活——即將消滅的緣故。

我第二次遇見樂相，是在佛朗哥剛剛叛變的時候。他希望佛朗哥勝利。他告訴我，「如若布爾喬亞克主義在伊伯利安半島（Iberian Peninsula）上立穩了腳，這將是歐洲一般社會及各大國國家的共同態度。他們說，「佛朗哥是一個君子，必須予以支持。」大多數的報紙都對佛朗哥派描寫成了一些製造恐怖的殘暴事件的刺客與匪徒。

究竟什麼事情造成了這一轉變？樂相助爵於一九三三年會因怕社會主義勝利而辭職，什麼事情又突然使得他變成一個虔誠的綏靖派，一個希特勒統治的捧場者的呢？看來他在一九三四年向希特勒所作首次拜訪似與此事不無關係。經過一個數小時長的談話之後，希特勒征服了樂相，謂社會主義非不是不可抗拒的，他的政策能把歐洲和英帝國從布爾喬亞主義之下拯救出來，而且只有他的政策才能夠。

樂相助爵訪晤希特勒回來之後，充滿了對德國元首具感召力量的人格及其計劃的熱忱，充滿了對德國元首計劃可望實行的樂觀態度。他以他的全副才智，力量，權勢為之後盾。依他的見解，納粹主義一無疑的把德國從通常字面的道德觀念中洗雪乾淨了。」

樂相在他的申辯中說，他之所以變成綏靖派，純是因爲他憎恨戰爭。但是，却有事實證明他并不憎恨納粹德國與蘇維埃俄國武裝衝突。都德大使（Ambassador Wilhelm Didd）在他的「日記」裏，曾提及樂相給他的一封信，在這封信裏，樂相主張予德國在東方任意行動的機會，并堅稱德國與蘇聯戰爭，無疑的於西歐各國有利。

樂相公開斥責法羅薩。在一次演講中，他兩者均為保證，英國決不會與奧國作戰。至於他，他說：「那根本不值得以打仗去阻止它重行加入德國。」他而且以加重的語氣聲稱：「我不相信我們因一些東歐的問題而準備打仗。」

納粹在他們討論戰爭罪惡的出處中，很辯變地引用了樂相另一次演說中的話道：「如果另一次大戰發生，而又一定與寫一部戰史時，我想德國縱先動手，恐百年之後，公正的史家仍不會說德國應單獨負此戰事之責，而必說此戰事之責應由一九一八到一九三七年間處理世界事務失當之諸人負其大部分。」

開戰以前不久，張伯倫派樂相為駐美大使。他却又把過去那一副十足縱靖派要角的派頭丟了，重來一次新的轉變。他再不宜希特勒是和平的天使了。他和後來哈里法克斯的作風一樣，聲稱希特勒主義是我們當前的大敵，并深悔一九一八年協約軍不該不開進柏林。他從這一極端倒到了那一極端。他認為使奧國和捷克獲得自由是我們的「一種職責」，數年以來，他就一直主張着希特勒把他們解放。

我已經把樂相助爵寫得够多了，其原因是因為樂相在鮑爾溫與張伯倫兩任內閣之內，頗有相當的後力量。他和倫敦德索助爵（Lord Londonderry），都是里賓特羅甫在美國社會上活動的保人。他又是克萊夫德爾（Cliveden set）及倫敦泰晤士報主筆道生（Cecil Gray）

及倫敦泰晤士報主筆道生（Cecil Gray）的保人。他對於這宗英國最重要的報紙者，着實不少。

正在紐約爲這排第一個新訂英美的聯誼節目之後一日，樂相則辭突然死了。「庸碌以終的人」(D. B. Robertson, *the Times*, Feb. 11) 在政治上已無毫無地位。樂相正是他自己所說處理世界事務失當，應負戰爭大部分責任之一人。

當鮑爾溫於一九三五年六月間三度出任聯合王國首相時，據說鮑夫人 (Mrs. Lucy Baldwin) 會向一個朋友說過一句這樣的話：「這次他做不久的。」結果，鮑氏內閣果然兩季完結。

鮑爾溫的第一步，即「建立德國艦隊。」鮑氏及其財相張伯倫，外相賈爾，皆爲與德國訂立海軍條約之重要担保人。而該海軍條約，却給希特勒以建立相當於英國海軍噸位百分之三十五的作戰艦隊之權。其中有一款蓋且確保希特勒可有與英國保持等量潛艇之權。

這次締約，實際上即等於英國對希特勒違反集體安全條約之與兩國訂約的政策予以默許。這是英國在破壞凡爾賽和約的文件上簽字的第一個內閣。

希特勒的蓋勒大使里賓特洛甫，到倫敦來爲這條約簽字。這是他到英國首都來的第四次。這位既高義德國元首，其代表一個大香菸公司的風格漂亮人物，很吸引了一般倫敦社會人士的心。一位孀居的聽齡公爵夫人說，「雖是一個德國人，倒還不失爲一君子。」這種品評，在倫敦各沙龍中到處可以代見。

里賓特洛甫的成爲並不爲德外長字額特所熱烈歡迎。牛氏另行派遣他一個密使叫萊斯雷 (Leslie)

John L. ... 男爵的到倫敦去偵察英人對德國元首信賴的程度。萊斯雷是外交部一個老跑腿人。我們看到萊斯雷力圖插入里賓特羅甫所活動的英國同一社會團體時，那真有趣極了。萊斯雷回到德國，他完全被那具有誘力的香檳酒販子與網球法螺所壓倒。

鮑爾溫內閣原祇望海軍條約可以填滿希特勒的慾壑。可是，這條約却毫不曾改善英國與法國賴伐爾黑炭團的政府間之關係，兩者間之緊張，仍一如往昔。賀爾簽定海約之先一日，法國還會提出嚴重抗議。賴伐爾覺得英國人大大地騙了他，在這競爭中，太偏袒希特勒了。一個納粹發言人勝利地向一些外國報紙的代表們宣佈道：「英國業已證明她不顧法國的反響為如何，這是最要緊的一點。」

張伯倫內閣的「姦小王子」艾登，被派到巴黎去緩和法人的反感。他的對手是一個最傲慢不恭的賴伐爾。他們的談判日漸趨於激烈。艾登說法國於一九三四年拒絕德國關於陸上軍備的提案，是鑄成了一個絕大的錯誤，他用「你趕場了車」一句話激得賴伐爾暴怒如雷。他最後還說，「你們與俄軍訂了一個約，恐怕就把和德國訂約的機會完全給割斷了呢。」賴伐爾很小心謹慎地讓全國報紙把這次談話的詳細情形公佈出去，各報當然都能替體其意。

艾登去羅馬之行也是如此。他原想去和墨索利尼就阿比西尼亞問題成立一個諒解，因為阿比西尼亞的問題已逐漸快要影響到歐洲政治了。十年以前，艾登的故主奧斯汀·張伯倫(Austen Chamberlain)也會為這問題和墨索利尼商談過。據墨氏事後語人，當年英國提議「實行瓜分阿比西尼亞」，奧斯汀。

張伯倫答應將阿國西部劃給墨索利尼，作為意大利的一勢力範圍，若允許意大利在阿國築築一條鐵道以聯絡意屬伊里達利亞 (Eritrea) 與索馬利蘭 (Somaliland) 兩殖民地。那時候阿比西尼亞業已加入國聯，提出抗議，於是事情就被擱下了。

現在，作過奧斯汀·張伯倫的政務次官的艾登，多少又重提到這個建議。這與賀爾頓伐爾計劃 (Hearl-Laval Plan) 極為相像，因賀爾計劃在六個月後亦會引起英國上下的極端忿懣。墨索利尼拒絕了艾登的辦法。據一個法國閣員告訴我，頓伐爾於痛恨那海軍條約之餘，特地勸墨索利尼不要接受英國的話，說是他還可以多得些兒。

於是，國聯跌入了它最大的危機。這個危機，勢須把一個獨立國家從地圖上塗去，把集體安全制度連根拔去，才了了結。

英國的民意全不贊成政府與希特勒所訂的條約，和想與墨索利尼設法接近的企圖。一九三五年中國聯同志會舉辦民意測驗之結果，很明顯地表示出了這種情形。蓋該次所謂「和平投票」，詢問英國民眾是否贊成國聯與集體安全制度，回答是一千一百萬人說贊成。

鮑爾溫不能忽視這種民意表示，英國歷史上無此前例，尤其是選舉將臨的時候。經過多次長期開會議之後，內閣決定俯順民意，擁護集體安全制度，而不予以反對，并對國聯，集體安全，甚至經濟制裁，都採取一種保護的態度。然因國聯之特別要求，在國聯開會前的最後一次會議上，明白決定不採軍事

勝義的辦法，其概括「不擇凡足以使本國與意大利發生戰爭或是以威脅意大利法西斯統治的辦法，因意大利為安定歐洲之一大因素。」

當考賓 (Charles Corbin) 大使把這些決議向法國外交部報告時，賴伐爾又非常感覺痛苦，立即將此事向其本國及全世界廣播。這當然是造成他自己和墨索利尼談判的一個極好藉口。他可以說，英國人對制裁工作不肯盡力以赴。完全不制裁不是還要好得多嗎？并且，因之，他知道墨索利尼和他的敵人攜手以前，僅有極有限的，而不怎樣危險的英國反對可以遇到了。

九月，國聯開會，眼巴巴地看着英國外相賀爾爵士對維護集體安全制度的工作冷然作壁上觀。賀爾在一次極笨拙的演說中，還重申英國政府「對國聯的堅貞始終不渝，且竭力共同維持盟約的完整性，尤竭力從事對一切無理侵略的共同堅決抵抗。」

可是，在他私人的談話中，賀爾却并不如此「始終不渝」了。陪閱賴伐爾出席國聯會議的兩個法國代表，一個是雷壯的赫里歐 (Edmond Herriot)，一個是溫和的彭士 (Joseph Paul-Boncour)，他們倆之來，原具有防止賴伐爾作「任何卑污花頭」的責任，孰知結果竟被賀爾的真正態度嚇倒了，他們知道英國對阿比西尼亞的事情完全靠不住了。

賀爾與雷壯兩方負責的損失敗之責者，且數月之久。墨索利尼的軍隊侵入阿比西尼亞「天深似一天，賀爾與雷壯兩方負責的損失敗之責者，且數月之久。墨索利尼的軍隊侵入阿比西尼亞」

荷蘭，倘若德俄進攻，英國是否擴大并支持集體安全制？雙方都堅稱維護國際聯盟，以為自己設法的憑藉。

意軍對裝備低劣的阿比西尼亞人之殺戮，引起英國人民震怒的呼聲，因英人對此種侵略的獸性行為，確實驚駭萬狀。英倫三島人民情緒正高漲時，鮑爾溫急忙舉行全國總選，政府在人民跟前仍然堂堂哉地擁護集體安全與抵抗侵略，總選宣言中說：「國聯迄今猶為英外交政策之樞石……故吾人將繼續竭力扶持盟約，維持并增進聯盟之効率。目前意阿兩國間令人不無遺憾之紛爭，并不足以改變吾人前此所循之政策。」

總選結果，政府派大獲全勝。雖則投鮑爾溫的票的只有一千一百萬人，而投反對黨的票的也有九百萬人，然而政府派在下議院仍以二百四十七票而佔多數。選舉過程中僅有三兩小疵，絕不足以使此次輝煌的勝利減色。麥唐納父子原同為內閣閣員，但此次完全被急遽的選舉團認為賣國而予以打擊，僅賴利用幾個選舉最早的區域舉行補選的機會，再度混入議會。西門爵士亦以獲得大多數而當選，四萬票中不選他的不過六百票左右。

選舉過後，英國報紙傳出種種謠言，謂制約若果擴大，墨索利尼決與英國開戰。擁有四千架俯衝轟炸機的意大利空軍，據說業已準備在頃刻之間集中轟炸包括胡特（H. A.），瑞隆（Renown）兩號鐵艦的英國地中海艦隊。這種宣佈，意在對日趨高漲的油類禁運等領發生反作用，應不值後生於意大利一

際，猶反對。下院聲稱，實出自政府要人圈中及倫敦著名銀行家間。

勢均力敵的兩派與賴伐爾，卒致成立所謂賀爾賴伐爾計劃。那時候，選舉期中的熱烈情緒業已完全消逝。賀爾計劃立即給予墨索利尼以阿比西尼亞的大部領土，至其餘部分之併吞，當然也只是遲早間事。

英國輿論爲之譁然，羣起攻擊這個計劃，並將外相賀爾推翻。外相的大部分官僚，連高首相在內，無不一一贊成這個計劃，然而鮑爾溫却隱身外相後面，說道：「我的話匣子還沒有打開，但我可以造成一種情勢，使得沒一個人要到議會客廳裏來反對我們。」

他永不會造成一種這樣的情勢。

於是，英國歷史上最丟人的一個時期算是混過去了。一個擁護政府的人，以一種傲慢的口調畫龍點睛地說道：「一言以蔽之，到底也不過丟點面子而已。」

後來，下議院與日內瓦又都發生過幾次辯論，然而不見有何行動繼之。輿論所要求的油類禁運，一如都德大使後來在其「日記」中所說：被幾家大煤油公司給阻止了。英伊油公司 (Anglo-Iranian Oil Company) 亦即供給法西斯軍隊以煤油者之一。

不久，樞密的事件起而把墨索利尼的侵略遮飾過去了。一九三六年初，歐洲各國政府都知道納粹政府在最短期間內即將進兵埃塞俄比亞 (Ethiopia)。中領特外長且會親口把德國政府的決議告訴一位在

國大使。

二月中旬，德國進兵萊茵蘭的事還不曾發生，倫敦市已為人民陣線在西班牙競選獲勝的消息所震駭。繼之，又傳來亞桑納（Don Manuel Azara）組閣的消息。於是，西班牙「人民陣線的惡行」幾乎就成了英國大多數報每天的大標題。

一九三六年三月初，希特勒召集其將領討論進兵萊茵蘭之最後細目時，即根據里賓特羅甫從英國得來的情報，將諸將領的反對擊破。蓋深知英國政府絕不會與法國成立軍事同盟，英國內閣大多數閣員均無心支持對德的軍事或經濟制裁也。樂祖勳爵且曾於其餐桌上向德大使何施男爵（Baron Von Helldorf）保證，英國無人擬為萊茵蘭而作戰。正如希特勒用半譏諷式的語吻所說：「英人已決定在明年接受非戰宣言。」

希特勒這一新事變發動時，一如往常，係在一週末日，且同時尚由希特勒發表一篇演說，答應與法國訂立互不侵犯協定，以二十五年為期。因之，西歐各國訂立空軍協定及限制軍備之議又復舊事重提。然而，當大家尚在做着未來的好夢時，殘酷的現實已把羅加諾公約（Locarno Treaty）撕毀。時距希特勒宣佈該約束縛德國自由時不及一年。

英國政府毫不驚惶，更不會為此召集緊急閣議，大臣們都在鄉間度着平靜的週末，直到星期一才陸續悠閒地回到倫敦。在回京的途中，他們即可在倫敦泰晤士報上看到希特勒的演說是一個「趣向重修的

機會」。自由黨的新聞記者告訴他們「希特勒的建議乃化歐洲危機為歐洲機會」。保守黨的晨郵報 (Morning Post) 勸他們「予德人的提議以冷靜的考慮，假定其係出自誠意。」倘他們懷疑工黨的態度，則強有力的職工同盟總書記席春 (Walter Citrine) 向他們保證：「職工同盟雖贊成集體制度，但那并不是叫我們打仗。因為希特勒現在對他自己的領土正能運用自如，同時他也護太利害，我們無法去傷他分毫。」

英國駐意大使獲來一電報，報告他們「墨索利尼在原則上決定接受國聯所提出與阿比西尼亞談判和平之邀請時，希特勒突來的消息恰好傳來，於是墨氏又把國聯的要求拒絕了。」

艾登把法大使找來，堅持謂應避免操急行動。當天下午，他又在議會裏說得很明白，說是如果法國欲圖重整旗鼓，對抗納粹德國，則英國不擬給予任何援助。艾登說這話時，法大使考賓正坐在外賓旁聽席上，艾登辭畢，考賓即倉皇離席，出門而去，坐在他身旁的德大使何施，則神采煥發，洋洋得意。

艾登隨後赴巴黎出席那些備受揶揄的羅加諾公約簽字國的會議，鮑爾溫命哈里法克斯陪同前往，藉以防止這位少年外相給予法人以任何鼓舞。對此工作，這位高貴的勳爵做得十分靈敏。在某次我偶然在場的一次餐席上，法國作戰部長彭古告訴我們：哈里法克斯曾與法外長佛蘭亭作過一次談話，據佛蘭亭向內閣報告，哈氏在談話中曾指出西班牙最近的選舉及法國未來的若干選舉，說道：「你們經過如許的選舉之後，倘仍走不和德國發生衝突，則是否不應感謝上蒼，你現在還說不定。」

繼而由公約簽訂國會議員，國聯行政院亦在倫敦開會，并邀請德國派代表參加。因之，里賓特羅甫又到了倫敦，今之羅漢公約選定愛德華第八，會者其甚，行之極爲客氣，與對蘇聯代表開口便問「你們俄國真非教那些多人不可嗎」的態度和兩相照比，實判若天淵。國聯會議的結果，又是一紙決議，譴責德國破壞羅漢公約。

紐約時報的倫敦通訊記者華氏 (E. Ferdinand Huin, Jr.)，綜合英國政府各派人物的態度，向其報館發電云：「衆信鮑爾溫所領導之內閣得勢派對懲罰德國仍持反對態度，且對援法不願給予任何保障。上下兩院之另一重要派系則對德國自下之危機表示同情，深惡與法國密切合作之說，在東歐方面，則傾向任希特勒自由行動，只要能爲英國獲得和平，犧牲蘇聯在所不惜。」

納粹因是得以屯兵萊茵蘭，并開始設防。

日趨迫近的法國選舉，使英國政府及倫敦一般人士極爲苦惱。一個法國商人於一九三六年四月底由倫敦回到巴黎，據他報告，英國大商業家大多相信法國已漸於社會主義的邊緣，人稱「法國消息最靈通的部長」的孟德爾 (Georges Mandel)，得到一個關於倫敦某會議的報告，據說在該次會議上，英國商界領袖會正式討論對於法日趨社會主義化一事應採之步驟。一個到法國來消度假日的工黨議員告訴我。倫敦一般人士望文生義，對社會主義一詞極爲恐懼。他說鮑爾溫內閣的航空大臣李斯德爵士 (Sir Philip Cunliffe Liston)，即後來的斯文迪勒爵 (Lord Sinton)，曾於海關選舉之難不久，在一政

餐席上宣稱希特勒為掃除法國及西班牙社會主義的之一救星。

一九三六年五月，法國人民投票擁護制止侵略的集體安全政策，這等於一紙反對任何協定，反對任何與希特勒墨索利尼談判的堅毅聖旨。選舉結果，共產黨與社會主義派增加票數極多。圍困罷工（*Down strikes*）發生時，英國報紙大多捏造一些關於罷工的恐怖故事，其實該項罷工大都確係以很好的紀律與秩序出之。

衆皆週知英國政府對希特勒突擊的反應極為遲緩，但其對法國人民陣綫勝利的反應，則快如反光，準如鐘表。法國選舉的次日，奧斯汀·張伯倫在一個駭人聽聞的演說中，即呼籲放棄對意制裁，并謂「英國的政策勢須由非洲回到歐洲。」無疑的，他是在為政府說話。他的異母兄弟奈維爾·張伯倫，不久之後亦接着宣稱繼續制裁無異於「仲夏之瘋狂」。因之，賀爾爵士乃得再度入閣。

於是，在下院一次激烈辯論中，政府正式宣佈擬結束制裁。政府的代言人艾登，在一次演說裏完全推翻他過去維護集體安全制度的諾言，紐約時報趕這篇演說叫做「徹頭徹尾一封向侵略者投降的降表。」外相的神態極為緊張。他為放棄制裁而辯護，但台下繼續不斷地有人喊着「不要臉！」「滾！」使他着了慌，滿臉漲得通紅。一個反對黨議員請他想想從前政府當局在競選時向人所提供的保證是什麼，却回答他說「這裏不是你說風涼話的地方！」

等到勞合·喬治發表一篇激烈的演說時，會場空氣之緊張已達於極點。勞氏湊集他那最負盛名的全

副本事，來對付這個場面。他說：「不見政府有半點真心從事制裁的表示。五十個國家信任我們，『絕非』信任這羣膿包！」他簡直叫囂起來了。隨後，他引用那允許不變集體安全政策的政府競選宣言，很侮慢地以手指着那些在上面簽了字的人說：「他們幾個人的名字，就是保證這個政策不變的信物」。於是他一個個地唸了出來；史丹尼·鮑爾溫，藍姆塞·麥唐納，和約翰·西門爵士。在極其煩燥的狀態之下，他以「他們坐在那邊，一羣懦夫！」一句話結束了他的演說。大臣們受此攻擊，臉皆爲之失色。下議院中對閣員們加以如此兇猛的攻擊者，實屬鮮見。

同時，綏靖派復力圖與納粹德國締結同盟，他們寄重望於里賓特羅甫。倫敦德萊侯爵請里賓特羅甫到他那鄉間的別墅去度威蒂遜假日（Whitsun holidays），其餘一同被邀去的客人，有空軍總指揮馬歇爾（Marshall）及其他航空部高級員司，和財政界商業界的一些重要人物。

一位參加了這次邀請的官吏後來告訴我，說希特勒的流動大使向那一羣人繪聲繪影地指述着德國空軍實力與陸軍軍備如何逐漸增強的情形，他說，希特勒政府希望空軍能於一九三六年底時達到與蘇聯空軍等量的程度，一九三七年時質的方面也可以趕上他們。這位官吏說，「我真爲我們同胞對這事所發生的反應害羞，過去我一向相信我們應永不讓任何大陸國家有強盛到可以真正威脅我們的一日，現在，我却親眼看見我們的要人或高級官吏在爲這種強盛捧場，尤以我們的要人亦竟如此，最爲使我駭然。」

馬賽特羅甫假日造訪之事，數日後輿論方面有了反響，倫敦泰晤士報的社論說：「納粹主義畢竟不過只是一國內部採納與否的問題，並沒有將其制度推廣到旁的國家來的使命（反之，布爾塞維克主義則有）。法蘇協定吾人不認之爲一可資贊助的外交收穫」。

多事的一九三三年的下半年，以德奧之開結立一個協定而開始，這協定表面上雖保證這個小多憐弱共和國的獨立，但實際上則等於其滅亡的發軔，因爲第一個納粹黨人業已踏入維也納政府了。舒斯尼格總理（Chancellor Schuschnigg）在簽字以前，曾向墨索利尼求援，圖藉意國力量以抗拒納粹的壓迫，但墨索利尼叫他簽字算了。這是法西斯意大利與納粹德國言歸於好的第一個公開明證，同時也是墨索利尼不再視奧國爲其領地而圖以武力保衛之的有次證明。倫敦泰晤士報對德奧協定備致頌揚，圖其「有補於中歐之穩定與綏靖。」

國聯在艾登領導之下，於七月十五日廢棄對意制裁。過了兩天，墨索利尼和希特勒的傀儡，西班牙佛朗哥將軍，發動他的叛變。

佛朗哥反動一發生，鮑爾溫政府遂大肆活躍，駐法大使受艾登之命，向勃倫政府採取高壓手段，不許其對共和派作任何援助。正如法國名外交評論家帕提那克（Patinet）所說：「如果法國人民陣線宣佈與西班牙人民陣線一致行動，則以勃倫大論爭無論在性質上，在形式上，都將改變。那麼一來，問題便成了：要阻止革命，挽救社會制度，沒有勃倫者的援助，那行嗎？」

與此，雷契了明謂不干涉說電，在這種困難的條件後，干涉仍在秘密地進行着，不過隱隱不露就是了。泰萊爾（Taitelrand）稱「不干涉」三字為好險的字眼。軸心國家干涉西戰的許多證據達達了英法政府，然而兩國皆不置信，不予接受。一個工黨議員考克斯（Cox），自由黨議員維柏斯（Winfred Roberts）和共產黨候補議員布朗（Isabel Brown）組成的代表團，從瑪德甲帶回來一些意大利的降落傘與德國的空軍用炸彈。英國作戰部原欲獲得各種樣品，尤其是德國燃燒彈，但英國政府總不肯承認這便足以證實納粹干涉西戰。西班牙外長梵雅，在國聯衆目睽睽之下，極誠懇地發表一篇演說，切實證明軸心國家確曾以飛機和飛行員供送佛朗哥方面，但艾登極力鎮壓可引起決議案中提及德意干涉西戰的一切企圖，學究式的法外長台爾伯（Yvon Delbos），從旁力加協助。艾登以絕大的壓力加諸梵雅，防止西班牙共和國乞援於盟約第十六條——依該條規定，聯盟會員國一國被侵略時，其他各會員國應予援助——而國聯祕書長愛文諾（Avenol），甚且禁止西班牙證實軸心國干戰的備忘錄在各會員國代表間流傳。

英國人民主張擴大對西班牙共和政府的援助，態度至為明顯，但英國工黨在運輸工人聯合會主席貝汝（Ernest Bevin）及職工同盟總書記席春（Walter Citrine）二人的領導之下，接受了主張不干涉的決議案。及至西班牙代表出席工黨代表大會，領導者因恐激起各級代表的反感，方始同意援助西班牙共和政府之建議。

倫敦不干涉委員會主席勃立茅斯勛爵(Lord Plymouth)一個身材高大，驕傲不堪的人物，他把報告意軍與納粹飛行員在佛朗哥治下的西班牙着陸的正確情報(由蘇聯代表送來)批上「查無實據」幾個大字，往旁邊一擲，儘管英國外交部也收到駐佛朗哥領地內許多領事同樣的情報。勃立茅斯反而責備俄國人不應干預西國內戰。英國一般報紙大多與他同一論調，他們很滿意地摘錄了希特勒在紐倫堡(Nuremberg)一篇演說辭中的一段，在那篇演說裏，希民隱約露出了他對蘇聯領土的野心，他說：「假如我有烏拉山那計算不清的資源富藏，我有了西伯利亞那偉大蒼鬱的森林，我有了烏克蘭那廣漠無際的麥田，那麼，德國與國社黨可就真够富足了。」一九三六年十月，蘇聯政府終於宣佈它與任何旁的國家一樣，將不再受不干涉協定多少約束了。英國官方與新聞界聞知此事，當即大表憤慨，倫敦泰晤士報且斥責俄國的行動為「百分之百的無理取鬧。」

心中既然存下了一種這樣的觀念，所以艾登再度去到巴黎，與法國政府商洽關於蘇聯這個宣言的事。有一個社會主義派的開員，會對西班牙共和派幫過不少忙的，他告訴我艾登的態度如下：艾登毫不含糊地聲明，如若法國轉入西班牙內戰的漩渦，則切莫打算英國的支持。英國外相毫不諱言其認為西班牙共和派即是布爾塞維克的見解。

馮德里守軍抵抗佛朗哥軍隊，互三十閱月之久，當佛朗哥宣佈該城指日可下時，防共協定立即在柏林簽字。英國保守黨讚頌這是百分之百地證明希特勒將向東方發展。

一九三七年年初，英意簽訂「君子協定」，保證維持地中海現狀。倫敦泰晤士報說：「從前侵略阿比西尼亞的根源已被置諸平安寧靜的歷史裏面去了。」但協定締結前雙方正進行談判時，甚至協定業已簽字後，意軍仍源源不絕地開入西班牙。截至二月底止，站在佛朗哥方面協同作戰的意軍，為數達數萬人。擊敗共和軍守軍於馬拉加港（Malaga）者，為意大利軍力，而助共和軍擊潰意軍於瓜達拉哈拉（Guadalajara）者，又適為國際聯隊之助力，與蘇聯飛機坦克為之後盾。

§ 一九三七年五月，差不多七十歲了的鮑爾溫氏，脫離了政治舞台。去徵他的柏德烈約鮑爾溫伯爵（Earl Baldwin of Bawdley）去了。在他退休以前不久，他還改派了一個駐德大使——韓德森爵士（Sir Neville Henderson）這人給法大使的印象，據法使向其本國外交部所作報告內云，「比納粹本身還要納粹化些。」

鮑爾溫獻身政府事務，先後計十七年，身任首相者八年。而上屆麥唐納內閣之四年，他又實為政府的實際主腦與英國的幕後首相。

鮑爾溫之取得保守黨與戰後英國國策的領導地位，全是糊裏糊塗得來。羣策羣不不多沒有人知道他的野心，奧斯汀·張伯倫的倨傲，或是邱吉爾那刁巧脾氣的生意人本領。一個保守黨的朋友叫鮑爾溫作「反應最易捉摸的人。」他說：「鮑爾溫一生所作所為，其震動全球者僅有兩次：一次是在一九三二

年。他與波羅德羅德說，政界聯合，喬治的聯合內閣，總是平使勞德德會。還有一次是波羅德羅德。

(Bacon Barrow) 退休以後，他被召喚國王之手。(那即是說，他後任爲首相。)

鮑爾溫出身於一個實業界的家庭，他自一九〇八年由劍橋的哈羅三一兩校 (Harrow and Trinity College) 混完出來以後，即承襲他父親那卜勢力極大的鮑爾溫有限責任鐵工廠 (Baldwin Limited Iron Works)，和下議院的一個議席。其後八年，財相波納。洛首先叫他做他的政務次官，隨後又叫他做國庫財務總管。後來因其種資緣，他又做到了貿易局局長，和短命的洛氏內閣的財相。鮑爾溫竟能繼續多病的洛氏而出任首相。那確是冠絕勳爵的莫大悲哀。寇松對這位新首相毫不假藉，直呼之爲「毫無用處，毫無經驗」，但是，他都用些絕無方法阻礙得住鮑爾溫的勝利。

鮑爾溫看上去去儘如人家想像中的標準英國人。態度沉着，身材高大，穿着不大講究，說話沒有多大口才，但有一點懇懇的神情，有時也有動人的情緒。但是，當一個工黨議員介紹我在下議院的納客廳裏見他時，我們面對着面，我看出他眼睛裏有一種狡詐的表情，這，告訴我這個人的反應并不如他的朋友所說那麼十分容易捉摸。實在的，他確是一個狡猾而且漫不經心的人物。在他歡愉與和藹——有時甚或這以上——的言談中，——的外表後面，他計算自己的行動很準確，他知道什麼時候應該離去。他有極高的才智，會領悟到每次內閣的改變：一次是各報紙辱他爲難，還有一次是「倒卸吉爾遜刺」的醜態發動。

一九二六年大罷工發生時，他擔任首相。他的史例，是自己向不徹實當英倫的榮事。因此，當他的

財相耶吉爾安全獲選，他於一九三三年，以其成爲勞工運動的大學第一號敵人時，鮑爾溫雖對其吉爾一切激烈的文字、言論、舉動一一同意。然他還不失爲「一個快樂的好人。」

替他寫傳的人，很費力地同後人介紹他爲「誠實的史丹尼·鮑爾溫，」但事實上，即以最低的政治水準來衡量，他的政治活動也還不是以當此。一九三五年秋季，他主持英國大選。他心中早已決定要重整軍備，但是他對選舉舉國却說，「吾不籌劃建立龐大軍備。」後來，他在「「驚惶誠篤」的演說中，對此事再加以解釋，說他向國人扯一次謊，爲的是爭取票數。他說，「自一九三三年以來，我自己，和我的朋友，都極爲歐洲的局勢擔憂……現在，假定我向國人去說，「德國人在重整軍備了，我們也應該重整軍備」。不是狂誰都會想到，我們這個愛好和平的民主國，在拿這句口號開玩笑嗎？因爲還不是時候。我不擬提出任何足以喪失選舉票數的變更來，依我的觀點，這種措置甚爲恰當。」他還有意地補上一句，說上次選舉確曾以絕大多數獲得勝利。

集體安全制度受到致命的打擊，是在鮑爾溫內閣時期。在若干次場合，首相很明白地說出他并不相信集體安全制度。一九三四年五月，他告訴下議院：「世界上沒有制裁這麼一件東西，可以行得通，而我們又不引起戰爭的。」墨索利尼僑阿之前十個月，鮑爾溫在格拉斯哥（Glasgow）發表一篇演說，說「我非當引爲遺憾，由於下院一二議員的錯誤，竟使你們不取相信德國人實誠語言的可能……」

德人理和我們訂立了這個合同（海軍條約），我相信動機是純由於彼此互相尊重。我很高興，我想他們定和我們一樣，贊成完全廢棄潛水艇。」當他說這話時，他必早已得悉納粹又在祕密建造十二艘潛艇的情報了。這事，各報在海軍協定還不會簽訂以前即已報道過。都德大使在他的「日記」裏也說，駐德各外國使節遠在一九三五年四月即已知悉此事。

在敦刻爾克海灘敗績的苦惱時期，和英格蘭遭受猛烈空襲的時候，英國一定又有許多人極痛楚地想起了鮑爾溫來，因為他曾經說過：「一個市民應該知道，世界上沒有一種力量可以保護他不被轟炸。」實際上他的作風確也是在遵照這個說法去做。他的內閣掌權之日，大量的錢都用在整軍上面，至於如何保護人民防備轟炸，幾乎毫無措置。在他的第三任內閣組成之前數日，他嚴肅地矢言：「我國空軍如較在進攻我國海岸距離以內之任何國家為劣時，我國即無一內閣可得存在一日。」但到他辭職時，英國空軍力量已墜落在納粹空軍力量之後了。

對意制裁放棄以後，反對黨領袖阿特里（Clement Attlee）叫鮑爾溫做「小小藍孩兒，躲在傑克（Churchill）鮑爾溫的鄉間田莊，」很快睡着了。羊犬滿地跑。「這個絕對不然，鮑爾溫不是笨伯，他的同僚也不是笨伯，那些主張妥協的英國大商業家也不是笨伯。他們的政策，并非如上所說，是由於愚昧無識所誤，也非由於誤信希特勒，或是一心要避免戰爭所誤。英國各領袖之所以堅持其政策者，實由於彼等相信那是保存那與他們不睦的社會制度不二法門。」

促成了軸心國家對西班牙內戰的干預。溫爾遜「這位大商人」對英國人民利益所造成的損失計，需要一個徹底改變外交政策的繼任人，同時也需要一個以聯合各被恫嚇國家共建和平陣綫為手段，來反對納粹及法西斯侵略計劃的政策。但是，繼鮑爾溫之任的，大英帝國的統治者又選上了另一位「大商人」——張伯倫。

張伯倫：「覓取當前的和平」

一九三八年春天，勞合·喬治爲請第二任勃倫 (Benn) 內閣援助西班牙共和政府而到了巴黎。我問他，依他的想法，英國統治階級爲什麼要把一個英國最高的政治地位獨獨給了張伯倫？這位前次世界大戰時期的老首相，精神仍極健強，懷着满腔怨忿，根據克里孟梭 (Clemenceau) 描寫潘加資 (Raymond Poincaré) 付潘加資曉得，什麼也不懂，描寫阿里安 (Aristide Briand) 什麼也不曉得，什麼都懂。我問他，張伯倫爲什麼什麼也不曉得，什麼也不懂，因此緣故，他們叫他作首相。」

在一個戰雲瀰漫的時期，把一個索然無味，了無生趣而又非常自大的，毫無處理國際事務經驗的生意人，一個柏根赫助爵 (Lord Birkenhead) 所謂在一亂世荒年可到伯明罕城 (Birmingham) 去做一個好錫事的人，來主持大英帝國的國政，這種令人費解的現象，勞合·喬治的答復，當然不是一個很完滿的解說。

一九三七年五月這次英國首相的任命，究竟是怎麼回事呢？我把這一題目向許多國會議員問過，結果，出自他的反對派口中的溫和答案，只有藍萊爾公爵夫人 (Duchess Atholl) 所謂張伯倫是「一個好辯論家」一語。其餘的，都是些極尖刻的批評。

反對黨領袖阿特里氏，有一次說：張伯倫「不是全國性的，而僅是內陸地方性的。」他告訴我，依他的意見，張伯倫之得到這把交椅，純因為他是英國中等階級的化身。辛克萊爵士（Sir Archibald Sinclair）是邱吉爾多年的老友，同時也是自由黨的領袖，他認為張伯倫之獲任首相，是由於他代表着保守黨內的大部分反動勢力。新聞記事報的外交通訊記者巴萊特（Vernon Bartlett），在重要的橋水（Bridgewater）補選中以反統緒獲勝的，稱張伯倫為「十足的飯桶。」還有一個英國新聞記者，戰事初起數月中在巴黎作着高級情報工作人員的，也如此說。工黨執行部中所謂「可怕的小子」威金遜，則以為他的事業是由於他極會說謊。

這些反對派客或為憎惡張伯倫之心理所蒙蔽，然而，即張氏自己在議會裏的黨羽，凡我所問過的，也都不能為他提起半點熱情來，他們叫他做「實際主義者」，「可靠的人」和「誠實的人」但是，當我問他們他用什麼方法掌握着議會裏的保守黨員時，他們不能解答，或許也是不願解答。

後來我和張伯倫本人作過一次不會有紀錄發表的談話，但也不會得到什麼較為滿意的解答。他之接見我，係由於法國財政部長雷諾（Paul Reynaud）的介紹。雷諾狡辯短小，是不幸的第三共和國最後一個戰時總理。張伯倫為什麼一定要堅持這次會見不能有紀錄發表，我至今還不明白，因為他所說的，沒一句不是早已在羣衆眼前或議會裏說過的。我見過很多政治家和政客，但我從事新聞事業以來，却從沒有見過一個像他這麼不說俗的人。

那次的會晤，給我一個仔細觀察這個人的面孔的機會。他臉上刻劃着一條條深刻的皺紋，那瘦如其人之身。但兩目却炯炯有光，臉上且浮出一股凜冽嚴峻的表情，顯見得那些罵他爲飯桶的人是完全錯誤了。他富有精明果斷的氣概，可是，却缺少一種吸力到了一位英國議員所謂「一個首相斷乎不可如此」的程度。我所獲主要印象，即他對自己的衛護時刻不忘，且極謹慎，他似乎總在防備着，好像害怕我把一個糾纏不清或是帶侮辱性的問題像開鎗般地打擊他一下似的。我覺得他深思熟慮的自保之道，實不過一種高度不安的掩飾而已。我懷疑他是否真能將對某種突擊的戒懼心理完全拋棄乾淨——譬如說，聽說他喜歡釣魚，他究竟是否能真享受到釣魚的樂趣？他是否能不時刻提防一條魚也許會給他一個突然的襲擊？

奈維爾·張伯倫 (Neville Chamberlain) 在少年時代，必有一種非他這樣繼續不斷，慣於防範不可的環境。他眼巴巴地看着吳毋兄弟奧斯汀 (Austin) 飽受父親和後來另一些大政界巨子的眷愛，而自己却被冷冷地拋在一邊，這種情形，使他後來成爲一個憎恨人類的人。在他生命的最後十年中，他力圖把他在六十歲以前所受各種委屈加倍償還給人家。保守黨的領袖，很少見像他這樣以鐵腕掌握其議會集團的。他和大刀闊斧的馬格森大佐 (Captain Magdon)，對保守黨內任何反對企圖的醞釀，一律毫不留情地予以壓抑。張氏作了首相以後，遂變成一個專制人乾，在各部大臣頭上，實施着他的威權。他惟有對議會質詢一事，才無可奈何地俯首貼耳。有一次，他在被質問的時候說道：「我不是到這裏來

專供你們發問的！」當挪威海岸的厄運降臨，張伯倫派赴斯下底納維亞的統率不良，裝備不全，缺乏飛機，冬衣，以及抵禦空軍及坦克軍的各種武器的英國遠征軍時，他對這種加諸他的行政的公正批評，唯一的答復便是：「我求助於我的朋友們，我不是有許多朋友在這屋子裏嗎？」

在英國人民處在這種悲慘情況的時期中，張伯倫所受輿論批評與攻擊的感動，實遠較受挪威敗績所感動者大。

一個反對他的人，描繪他的特性十分入骨，他說張伯倫不是一個血和肉構成的人，而是一種觀點化成的入型。不錯，一種生意人的觀點。他個人的背景和環境，使得他把生意經看得比什麼都高。和尋常的生意經一樣，這種觀念一搬到實際政治上來，即成了：同具商業觀點的，為友，攻擊既定商業利益的，為敵。自他踏入政治之第一日始，他是一個搖撼不動的勞工大敵，至以國際角逐而言，則他是蘇聯的死對頭。沒有人聽到他說起「社會主義」或「蘇俄」時能不帶出他那侮慢輕蔑的語句來的。

保守黨裏，有能力幹才比張伯倫大得多的人，他們比張伯倫具有吸引力，比張伯倫深入人心，他們的天地，也比張伯倫的大，可是他們的見解却也與張伯倫一樣。不過他們雖準備支持綏靖政策，却并不打算伸出頸子來負擔正式責任。因為那的確太危險了。自一九三七年鮑爾溫辭職以後，綏靖政策即成了一個很大的冒險辦法。納粹德國的軍器與機械化武器，遠出英國之上，它聯同法西斯意大利，仲足西班牙，開始其在歐洲大陸上之第一次大冒險。奧大利之併吞，只是時間上的問題，容或即是幾個月的問題

。捷克政府一再致送備忘錄，說納粹威脅其獨立日勝一日。很顯然的，各方面的事態都在加速地向著沸騰點發展。在這種情勢之下，要假定希特勒肯把他逐漸成長的力量轉向東方，而不擲向西方，去繼續實行經濟政策，確是一個不容再作的假定。然而，張伯倫決意冒險。他或許把萬一失敗後各方面集中他身上的實備與惱恨估計得太低，然而他確係沉迷於經濟政策成功以後可能帶給大英帝國些什麼的幻夢之中去了。他對一些朋友說，他企望一個由德國陸軍，英國海軍共同統治的世界，無布爾塞維克主義的威脅，商務繁榮，也不受他所謂「社會主義黑暗勢力」的恫嚇。

張伯倫一門的傳統，是與德國求妥協。剛由十九世紀進入二十世紀時，他的父親堅持三年餘之久，率與方興未艾的德帝國成立協定。其異母兄弟奧斯汀·張伯倫，復為羅加諾會議的主角。因此，張伯倫想，他自己應該成爲一個造成英國與納粹聯盟的人物才對。可是，奇怪得很，拘謹過甚，固步自封的奈維爾·張伯倫，從來少見爲其對希特勒的緩靖政策露出過半點聲息的，這次突然投身歷史上空濤的大賭博，甘於蹈冒過去得未曾有的最大危險了。如果他竟失敗，納粹軍隊竟爾從東方掉轉頭來繞視西方時，那麼，災難可就跟着來了。許多警告早已指示出來，到那時候，英倫三島將處於一種亘古未有的圍攻，即帝國的生存，也都危殆了。

張伯倫對於得失雙方的可能成分，自然事先都估算得很清楚。然而，他還是輕率地投身於這冒險了，跟着他走的，有三兩百無異皇帝式的富商巨賈。這班人平日對於每次生意機會，總得都極仔細，他們

踏足證券交易市場時，必須看得千變萬化，否則風險漸漸中遠趨近時，他們立即縮頭。他們爲自己已獲利益之損壞所蒙蔽，竟不惜把大英帝國送進一個結局不堪設想的危險中去。正如一個工黨議員告訴我的，「往日『對與不對。視吾國』的口號，現在已變成『對與不對，視吾生意』了。」

張伯倫就任首相以後不多幾日，我和孟德爾（George Macdonald）作過一次長談。孟氏爲克里孟梭一手提拔之人，頭腦極爲精明。那時他沒有得到部長位置，只在國會裏當一名議員。我奇怪地看着他忽然變了，因爲他一向是以有強大自制能力著稱的，而在某次場合——慕尼黑危機時——我竟親眼看着他極爲憤怒，那時他正收到一個法國駐德大使館館員的一件報告。一般人認爲孟德爾在政治發展上所處的地位，比法國任何其他的人都更有利，因爲他在全國各重要部會及法國駐外各大使館公使館中，都置有情報人員，他往往獲得一些有關外交政策的情報，雖或不免與外交部官方發言人所宣佈的大相逕庭，然而結果仍無一不經證實鑄鑿者。

孟德爾所獲報告，是關於英國新任駐德大使，靈活而傲慢的韓德森爵士在柏林活動的情形。韓德森和納粹各領袖交談時，他所提及的，不啻是主張英國與納粹德國締結一不容許任何旁的國家參加的同盟。報告裏面說，韓德森講過這樣的話：「兩國聯合，則可分治天下，兩國分離，則彼此滅亡。」他毫不躊躇，認爲法國正在極快地日趨崩潰。報告中并且還說，在與希特勒的御用哲學家康森堡討論某項事情時，英大使且劃分出了兩國的利益範圍，把東南歐及東歐完全交給納粹，據說當時韓德森爵士揮筆

道：「你們的殖民地是俄國，那比你們在非洲所能獲得的一切不知要強若干」。

我問起這個報告。我說：據我看來，這報告未免太過甚其辭了吧。但孟德爾堅稱他的情報人員從來未使他落空過，他說：「你不知道張伯倫，這個人是不贊成與納粹乾脆斷絕同盟關係的，反之，他正預備犧牲與我國的傳統同盟制度，去換取與德國的那個。他之出任首相，確係表示法國最黑暗的日子到了。我從極可貴的方面得到消息，韓德森并不是自作主張地在那裏幹，而是直接受命於張伯倫的。」

這個情報使我異常煩惱，我和我的編輯討論一番，結果決定向穆特（Marius Motet）去問個明白。穆特是勃倫內閣的殖民部長，第二天我可以在一次宴會上遇到他。穆特斥此事為「孟德爾的一種謾言。」他告訴我，張伯倫早已有信給法國政府，保證他對法國熱忱愛護。但是，穆特結果還是答應替我去把這件事情查一查。

數日之後，他告訴我們，說他并未獲得關於此事的任何實證。可是，不幸得很，這事倒真是千萬萬確的。差不多隔了四年之後，在穆德大使的「日記」裏，發現韓德森爵士早已把孟德爾所得報告中關於他的一切完全告知都德了。

新年開始，驚人的消息來了。一個法國駐德大使館的隨員，每選用假名字著我們報紙寫一篇關於納粹經濟的論文的，到了巴黎。他告訴我們，德京外交界人士時刻期待政變之事發生——牛頓特且會親自向一個外國外交官宣佈過此事。這位隨員把德京大工業家送給希特勒的密書原件原文拿給我

裏面對原料供應的情形，表示非常焦慮。他說現在德國情形之緊張，與清黨之前數日無異。據他說，各國駐柏林的外交官大多相信戰事爆發恐不出一年……事情發生，證明他們的猜想不過錯了幾個月。

二月裏發生驚人的事件特多。德軍一次肅軍，即使舉世胡猜，不知軍隊與納粹黨二者究竟孰為德國之決定力量。任命里賓特羅甫為外交部長一事，各方評論家多不敢置信。出任軍事方面最高位置的人，也是在國外無籍籍名者。新任總司令季特爾將軍，據說是一個「坐辦公廳的將軍」(Office General)，倒是新任參謀總長布魯齊區準將，聽說還是一個極具才幹的軍官。我們經過外交的公文綫，從我們的柏林通訊員處得到一個警告，叫我們不要為任何報告所蒙騙，這次肅軍的結果，確是象徵黨戰勝了軍。我們通訊員的見解，謂白倫堡元帥，弗立區準將以及其他許多高級將領之免職，并未真正變更軍隊與希特勒間之關係。後來各方面事實的確證明他的看法不錯。

隨後，又有舒斯尼格總理被迫來訪貝德斯伽登之事。過了兩天，我們即已得悉這回事的內幕。那裏面告訴我們，舒斯尼格如何地被弄在一間房子裏和希特勒相處達數小時之久，如何地不許吸煙，如何地不時看見季特爾那高大的身材在面前幌，如何地季特爾把進攻奧國的計劃告訴了他。正當我們還在談論這件事時，倫敦泰晤士報送了進來，那上面說：「哈里法克斯勳爵之訪德，其作用不僅止於一種普通儀禮上的酬答，或一種空洞的親善表示而已，那實是一種復活的友誼所明白規定的行動步驟。」

對於新尼格這女版人題詞處境，還有一個奇特的「交響曲」。我把泰晤士報的論文剪了下來，貼在桌前的牆上。過了幾日，我又從這老牌報紙上剪了另一篇貼上去，這一篇裏面，論阻止「因順應自身經濟需要及多瑙河流域經濟吸引力量而發生的變遷」，不在英國政策分內，又說阻止德奧聯合是一凡爾賽和約一種極不合理，極令人憤慨，極不得宜的處置。」到了成立慕尼黑協定時，我的牆上已貼滿了倫敦泰晤士報替希特勒打氣的剪報。那是每天向我示威的一個可悲的故事。

二月裏的事故，到艾登辭職時，遂緊張達於極點。因事先已得諺傳，故我特地避過了倫敦。我到時更是一個冷得令人發抖的星期日，也正是艾登脫離內閣的日子。據說此間空氣令他無法忍受，已達數月之久。有人說他曾向一個朋友問道：「你願意走到閣議席上去看那些像仇人般淫視着你的面孔嗎？」

——張伯倫與艾登之決裂，一則由於即將來臨的對奧進攻，再則由於張伯倫之決定提前與墨索利尼締結協定。因為艾登之意，主張將協定延至意大利自西班牙大舉撤兵時再行訂立。

我到的那天晚上，和艾登一個同志一塊喫着飯，他告訴我一個有趣的故事。他說：「艾登幾個月之前就已曉得張伯倫要去掉他了，他所得的第一次風聲，是一個意大利使館的反法西斯館員遞給他的。那館員告訴他，張伯倫曾向意大利使館第（Dino Grandi）示意，表示他將撤換他的外相，格蘭第已把這當作捷報報向墨索利尼去了。」

在下議院的辯論裏，格蘭第的聲明激說。看着他獨個兒跛進議院，揀一個角落裏保守黨的後此五排

樓下，不見有同事向他招手，也沒人走出來迎接他，那情形確有幾分淒涼。他的後面，坐着一位
 官克藍邦 (Viscount Cranborne)，也是一同辭了職的。

當艾登走上台時，幾乎一口針落到地下的聲音都可以聽到。艾登面容憔悴，臉色慘白，而且還顯見
 得無法控制他的手顫。那些希望藉他這個機會來對所有反紮培派勢力大加一頓諷刺者，看了這副模樣，
 也都淪然失望了。艾登沒有說什麼和保守黨永遠斷絕來往的話，他說他反對張伯倫的政策，然而說得很
 有分寸，直到說他與張伯倫的意見相左，不僅於意大利問題一事為然時，始略見有力。

克藍邦批評較多，而且極其敢說。他說他不願隨和一個「於和平無補益，於許索為降服」的政策。
 據一個熟悉英國政治內幕的人告訴我：克藍邦是薩利斯伯利勳爵 (Lord Salisbury) 的子孫，為西森爾
 族 (Cecil family) 之一員，說話縱再較艾登為硬，也無傷於他的政治前途。

張伯倫之能安然放落艾登辭職這回事，是早成定論了的。他站在一個公文櫃旁邊，臉上露出一絲
 譔諷的微笑。他并未打算敏藏他勝利的心理。他藉着這個機會發出一個暗示，并使此暗示飛渡萊茵河
 (Rhine)。他說：「國聯如果還是目前這個樣子，則斷不能給任何人以集體安全，我們切莫要再帶那
 些弱小國家去空想國聯可以為之抵抗侵略，保護他們，或叫他們循規蹈矩去做了吧，我們知道，不會有
 那麼回事的。」因此一來，置奧大利於死地的文契遂簽了字。希特勒聞艾登辭職，發表一篇表示勝利而
 且帶輕蔑態度的演說，并一任納粹報紙刊載。那演說盡讚張伯倫已完全了解納粹的用心。

德爾溫曾叫艾登不要做任何足以使保守黨產生割裂現象的事。假如艾登不接受這個勸告，竟降得極反張伯倫的大旗，他是否能遏止奧大利的慘酷命運呢？這問題頗難答覆。但有一點可以斷言的，即艾登絕不是一個能與保守黨階層決絕的人。艾登於一九二三年在德爾罕（Durham）競選時所說「我現在是一個保守黨員，過去也是一個保守黨員，我希望將來直到我死時還是一個保守黨員」的話，十分正確。那時候他纔二十七歲，一時候，許多稱譽都落到了他頭上。他的確沒有一般青年人那種無所憚忌的勇氣。每日雷訊報（Daily Telegraph）的政治通訊員說他「是一個骨氣稍欠的人，頗能卑躬折節。眼光煩厭沉倦，有如學者，不似攝人心魄的領袖人物之驚視」。這話說得頗有道理。

假如說他錯過了「一九二八年二月的機會，那是因為出身的學校關係畢竟比任何對強備倫政策的理解要來得強的緣故。艾登是一個從男爵的兒子，在伊頓（Eton）和牛津（Oxford）兩校受過教育，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得過十字軍功勳章，戰終，獲居少校階級。在牛津大學完成他對東方語言的學習後，即入國會為議員，代表薩威克（Warwick）及李明頓（Lymington）兩地穩靠得任的保守黨議席，時年不過二十七歲。艾登因某種關係，得約克州郵報（Yorkshire Post）主人的愛女，她貢獻於艾登個人那不算甚小的幸運者殊屬不少。

我常出席艾登在日內瓦接待新聞記者的會。記者們屢欲從他身上得到一些對某些具體問題的具體答復，但老不成功，因為他那面面週到的說話姿態，使人無從干犯。他在下議院的辯論中，常用極強詞

譯語語攻敵敵。一旦獲功，似乎還不足以表其歡欣者然，但一輪到能宣佈外交政策時，他也合會極端，帶詞敷衍了。

一般人認爲伯登之去職，由於其性情之燥急與過於浮誇者，實不亞於由其與張伯倫意見不合者，因艾張二人間所不同者非爲原則，而係手段。艾登之左袒賀爾頓伐爾計劃，一如張伯倫。英國與納粹訂立海軍條約時，艾登雖爲內閣閣員，亦并不見提出若何反對。並且，他還是一個支持不干涉西戰政策的人（邱吉爾在其論艾登辭職的演說中且歌頌不干涉政策爲艾登最大的成功之一）。（在私人談話中，艾登處處表示贊成佛朗哥，他認爲那個叛將是一個君子，而共和黨人則爲「赤匪」(Reds)。梵雅 (Alvarez-del Vayo) 到倫敦多次，希求購得艾登較爲友善的態度，結果一場空！西班牙共和國最好的外交家，駐英大使阿卡拉德 (Pablo Azcarate)，常和艾登談論西班牙的情形，結果等於白說！西班牙事件十足證明艾登在外交政策上也是把黨的利益放在國家利益之上。我記得亞索爾公爵夫人有一次會告訴我：「要想把艾登弄到西班牙共和派這邊來，那是白費氣力。所謂西班牙共和派這邊，她認爲亦即是英國民主政治這邊。這是很對的。」

艾登既已辭職，原諒大有機會，可以成爲一個反緩靖勢力的領袖，來向張伯倫內閣施以壓力。但艾登未敢担起此項重任，無疑地他覺得他的事業——據他的朋友們說，他有想做首相的野心——是與保守黨分拆不開的。正如最喜歡他的赫里歐 (Herriot) 有一次所說，他是「一個英國社會的廢兒，一個難

乎無法忘記的遺蹟。」

但是，這應該說是他的一種愛好，不管他的偏見如何，從德國整軍事務急切進展時起，他即企圖與蘇聯成立諒解。他是英國大臣中惟一到過蘇俄的人，據說他從俄國回來時，很受了斯大林人格的感動。然而因為他不是一個具有鬥爭性格的人，所以他不會竭其聲望及英國人民所賦予他的權力去促成一個對蘇諒解。不過，他不諱言他相信和戰關鍵繫於英蘇聯的一個協定上。在戰事爆發前不久時舉行的英蘇談判期間，他是站在邱吉爾這方面的，為成立英蘇協定而奔走著。芬蘭戰爭時期，他是極少數反對張伯倫計劃派遣遠征軍到芬蘭去的大臣中之一人。因派兵赴芬蘭，即等於與蘇聯開戰。

這五十六歲的樞密院長任德，即第三代世襲子爵哈里法克斯出任外相時，軸心國各報一致公認這是一項革命轉機外交的一個新勝利。哈里法克斯動身是一個徹頭徹尾的緩靖派外相，他被聯合通訊社（Associated Press）譽為「一個已被認可的納粹德國的友人。」他之受任為外相，軸心國家認為是無異於得到了一盞極其重要的指示行動的綠燈。各弱小國家又沮喪一次，相率紛紛向希特勒德國胡亂覓取聯繫。一個保加利亞駐法公使館的隨員告訴我，波利王（King Boris）批評哈里法克斯之受命為外相一事道：「到柏林去作最後一行的時候到了。」

巴黎方面認為英國新外相不是共和法國的友人。哈氏就任不久，法國外交部即陸續收到各方報告，謂張伯倫與希特勒之間，正互派密使，從事秘密談判，據報英方的密使是倫敦德萊頓爵。然而，對於法

國一般認為這是一場冒險，但希特勒計劃予以鼓勵的人，這些報告還是不足以消除他們心頭的憂疑。

與哈里法克斯出任外相相應的，是德意干涉西戰的軍隊發動，一個强有力的新企圖，以圖結束西班牙戰爭。他們以數百坦克車和飛機爲之前驅，從亞拉岡（Aragon）突破共和軍的防線，進迫地中海邊，因而把加達羅尼亞（Catalonia）從西班牙劃開了來。

這是所有西班牙共和政府的友人極端擔憂的幾個禮拜。他們有些認爲戰事業已失敗了。我記得好些美國通訊員及一些在巴塞隆納（Barcelona）工作的作家寄稿到巴黎來，都說西班牙共和政府頂多還有幾個禮拜的壽命。西國共和政府駐英大使阿卡拉特，這些時候大半都在巴黎，想設法得到幾尊大炮，幾架飛機。在這幾個禮拜裏，我常看到他。他堅決地再三勸說法國當局採取拯救西班牙共和政府亦即所以拯救法蘭西共和政府的唯一步驟，我眼見着他忍氣吞聲，不避人厭，然而無法幫他的忙，惟有衷心佩服不置而已。

三月初旬，里賓特羅甫到了倫敦，據謠傳，是爲協議一總解決而來的，實則，他之來訪，乃是爲希特勒計劃攻奧的準備放一障眼的煙幕。法國外交部對哈里法克斯與里賓特羅甫的談判雖多雜亂的觀感，但尙認爲這最低限度足以保證希特勒不會立刻動手。外長台爾伯對我說，「里賓特羅甫在倫敦一日，希特勒必讓奧大利苟安一日。」

里賓特羅甫與哈里法克斯新聞的談判，所涉及的對象至為廣泛，諸如建立西強公約問題，締結德奧殖民問題，經濟問題，以及其他許許多多問題，均皆談到。但有一個問題，却始終不曾提及，那就是奧大利問題。雖則人人心中都有此事，但里賓特羅甫與哈里法克斯都不會把他提出來。他們在這希特勒的鷹犬進向那多惱河古國之先一日，在一塊兒喫着飯，然而，他們的菜單上並沒有奧大利。

這箇強盜行爲既經發生，於是哈里法克斯乃大丟其臉。他的新聞司對外發表好些經過的情形，謂這位尊貴的勳爵如何地爲里賓特羅甫不會討論到奧大利問題而震驚。這些發表出來的經過情形，似乎忽略了一個事實，即哈里法克斯當初只須略一提出一個問題，即可使奧大利問題付諸討論。有一個傳說，描寫哈外相得到德軍侵奧的消息後的情形爲：「在他那外交部的大辦公廳裝走上走下，蹙眉蹙額，若不勝其苦者，口裏囁道『可怕呀，可怕，我絕未想到他們竟真個做了出來。』」假如這傳說可靠，則適足以證明哈里法克斯是全歐洲消息最不靈通的一個人，因爲恐怕只有他才是唯一不能預先看出納粹行動的人。法蘭海軍部長甘班希（Georg Canaris）告訴我：「英國大臣們想要表示他們愚蠢的那種努力，實在太嫌過火了，他們似乎很想把自己刻畫得像一羣不堪相信的蠢才與身躄目瞶的傢伙。」

奧國之事還未足以驚英竊的政治方針改變。英國政府對蘇聯召開會議應付未來捷聯之建議，乾脆予以拒絕。張伯倫仍然向着縱橫主義的大路邁進，他在下院說過：英國在捷克被侵時，依據聯盟約規定，並無自動援捷之義務。且如法國履行其援捷義務時，英國亦無援法之義務。他之不允予再受高壓之捷克

共和黨以握手者，自然以下面一語自負，當一談到和平與戰爭的問題時，所涉及者不僅法律義務一端，迨戰事爆發時，法律義務又未見能束縛有此義務之諸國。」納粹深知他們向布拉格進發時所遭遇的反對必不會比向維也納進發時所遭遇者多。他們也不會怎樣注意張伯倫所謂「英國正在建立之近似可怕的力量，世界輿論可發生一種使人知有所節制的影響」的話。

但是，英法兩國的人民對此話却極為注意。他們誤以為英國軍備正在作一日千里之進步。邱吉爾對張伯倫的演說，極為稱許，謂首相「去錯誤已遠」。法國新任外長彭古告訴我，張伯倫的演說只是叫納粹住手的一個表面警告，表示倫再不住手，將遇到英國的軍事力量。

可是，希特勒知道張伯倫的演說等於任其在捷克為所欲為。一般人因奧國被併吞而生出的騷動尚未平息，希特勒的鷹犬正在把成千的反納粹者和猶太人捉入奧大利集中營，而祕密警察却又忙着完成捷克共和國內應予逮捕人物的名單了。奧捷兩國流亡者差不多在同時逃到巴黎。捷克流亡者之中，有一個來自布拉格的銀行家，他對我說，「我們被英國政府寫漏了。」他不知道他所用的字眼幾乎和紐約時報的倫敦通訊員所用的完全一樣。

到了三月，我聽說勞合·喬治預備到法屬利維耶拉地方（Trench Riviera）去度一個假日。他曾經告訴過我，他對處於極端劣勢情形下之西班牙人民的英勇與堅忍萬分佩服。因此，我叫朋友們去請求他，看他可否不止於巴黎，而即以其聲望之所被，去為一般西班牙共和派友人的後盾，使之能替堅忍剛

續而遭痛擊的西班牙共和軍獲得較多之助力。他立予同意，並於其到達克利隆飯店（Hotel Clillon）之次晨，即與我一同早餐。克利隆飯店可以遠眺一九三四年二月法西斯蒂首次在該處公開襲擊共和派之功果德廣場（Place de la Concorde）。飯店前面，為雄偉的美國大使館，美大使蒲立德（William C. Bullitt），適為一對佛朗哥叛變表示絕對同情的人。

我到勞合·喬治飯店裏去時，臨時又拉着工黨議員威金遜同行。威氏係為強迫法國社會主義派立即援助西班牙共和政府而來巴黎者。早飯時候，勞合·喬治拿出一張地中海地圖給我們看，很引起我們一種新鮮感覺。這地圖是英國海軍部應勞氏之請為他畫的。上面有許多小黑點，表示佛朗哥得勝以後軸心國家可以利用的海軍和空軍基地。那與一九一四年時的情況判然不同。一九一四時西班牙還保守着中立，意大利還站在協約國這面，而一九三八年呢，西班牙方面，佛朗哥的勝利指日可期，意大利，也早已和德國打在一起。對於一般縱容事態演變到如此地步的人們，這張地圖確是一個有力的針砭。一張不能說話的地圖，却絲毫不爽地預言出了一個黑暗的將來。雖則他不能預先指出兩年多一點點之後地中海將在一個希特勒掌握下的貝當法國的海岸激蕩，但勞氏本人是預先見到了的。無論他過去在政治上如何顛仆，如何糟糕，但他於一個三月裏有太陽光的早晨在巴黎對未來局勢所作的分析，我現在看來，是不會有比之更正確的了。

勞合·喬治為協約國訂凡爾賽和約之一人，故他對歐洲從第一次世界大戰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之間所

發生的各種事故，負有極大責任。各協約國共同干涉蘇聯時，勞氏為英國首相，希特勒登台後，勞氏又去訪晤過他，并稱之為「愛好和平之人。」這些，在每個人的記憶裏，都是極其沉重難忘的污點。但是，勞氏只須一旦警覺綏靖主義的危險，——或許是被西班牙戰爭逼迫出來的——即能勇敢地更正他的觀念。

勞合·喬洽談話時，每每滔滔不絕，一若背誦其個人之行述。然追憶者以為他將永不放棄他的回味時，他又會突然中止，把他的過去和現在（或將來）作成一個一致的或是衝突的結論。因此，很顯然的，他之所以搜索他那五十年來寶貴的政治經驗，其唯一的目的只是在為燭破若干目前的，或是將來的問題。這是一個很具吸引力量的討好辦法——倘能多多穿插上人事掌故，及對現存或已故政治家政客的犀利觀察，則自尤能動人聽聞。

勞合·喬洽的預言在我的記憶中深深地刻下了一道印痕。雖則我的記錄早已遺失，然而我今日仍能把它節引出來，一如昨日才聽他說的：英國政府死抱住綏靖政策不放，決不變更其方針。他們把西班牙拋給了一羣虎狼。偷竄業的忿怒不阻止他們，他們亦將犧牲捷克。他們的計劃是想把英法同盟和德意軸心連結起來。

他望了威金遜一眼，又道：「工黨原有一個機會可以制止英國的綏靖政策，祇須他們肯在人民面前發動一次清除性質的競選。所不幸者，他們對一個超越敵人的可能勝利，還似乎更要來得害怕。」

隨即，又指着地圖道：「瑪德里是民主國家抵抗納粹主義的一個礎石，布拉格是其另一。如果其一或兩個全陷落了，那嗎，民主國家就很難得戰勝——幾乎簡直完全無法戰勝。如果兩個都陷落了，法國的民主政治就不能再偷生幾時。一邊布拉格到了希特勒的手裏，一邊瑪德里在佛朗哥的勢力之下，法蘭西自然不久即將成爲一個法西斯統治的戰利品。」

以下是他的結論：「民主國家只有一個阻遏納粹進攻的可能，那就是——一面保衛布拉格，同時保衛瑪德里。倘須保衛獲得勝利，則與軍力最大的蘇聯成立諒解，是勢所必須的。但我們當前的政府不之此圖，却寧可失敗在希特勒的手中。」

他說這幾句沉重的話時，雖則甚爲興奮，然而却還保持着平常的語調和態度，這似乎更能加重他那些話的重疊和擊力。這些話落進我的耳朵裏簡直像是鎚擊一般。自從挺進隊充塞全德國，和德帝國主義的卅字旗物向外伸出威脅旁人後，我感覺得希特勒的每一個勝利，和民主國家的每一次敗績，都不只是政治上的一種悲劇，而同時也是個人的一種悲劇。即以我而言，我從事反納粹活動的歷史如是之久，我的生命，幾乎與政治以外的一切完全編緣了。其實，豈止我一人如此？希特勒如此完全獨霸着許多和他立於反對地位的人的天下，那麼，那些人自然只能專心一致地設法去遏止他了。

那天早晨十點鐘左右，我辭別勞舍。約定正午時份再回頭來陪他一同到法國國務總理衙門去。我在附近一家小酒店坐下，想寫封一封信給我的話，但竟無法把信寫成。約定兩小時之後，我繼續

地又戰又殺。我從前頭到後頭，被這軍隊。勃倫及其外長保羅·彭古的那張大地圖。當攝影師來到我們面前時，我又幾次地到了行列的前面。

我們又驅車到馬提賽飯店 (Hotel Metzen)，因為國務總理在那兒設宴款待。當我正等候勞合·喬治時，我的內人打電話來告訴我，她剛才又和巴薩隆納通了話。消息又不好，真不敵衆的共和軍又敗退了。

勞合·喬治在和萊翁·勃倫與保羅·彭古談話中所提及的消息也都是壞消息。他說：「那些統治民主國家的人，都不是用法西斯必需原料做成的，這是我們這時代的一個最大悲劇。」勃倫很客氣地，然而也很正確地，講他瞭解法國的情形，確定再繼續大援助西班牙共和國政府的可能性。放在法國兵工廠裏的幾萬百老得可惜，滿蓋着廢埃的彈藥，就是法國當西班牙急需之時所能救助的唯一物件了。

從馬提賽飯店，我又把勞合·喬治給駕車送到一家巴黎最老的酒店，叫做拿音樂斯 (Laplace) ，那裏常有許多政客和大商業家在裏面舉行各種密會。約莫有十個到十二個右翼份子與極端右派的代表，在那兒等候着和勞氏一起就席。其中有一個是克利里 (Hirou de Kerillis)，他的政治見解尙未蒙蔽他對法蘇同盟和法捷同盟的真實性之認識。還有一個是巴斯格 (Basque) 的代表雅納斯雷 (Ydars-Begany)，後來做了貝當的第一任首相長的，是法西斯派「火十字社」 (Croix de Feu) 的副社長，是一個忠實的佛朗哥支持者。另人還未見。波萊 (Emile Borel)，一個臉寬寬的人，他是秩序報

(Fichte)的主筆，一個十足的享樂主義者。他每天以古典式的法文寫他的社論，他曾做過克里孟梭和白里安的幫手，許多人認為他是法國很傑出的法政學家。在過去，他常和勞合·喬治衝突，他罵勞合為大日耳曼主義者。現在，兩人為着顧慮各人自己國家的命運，便又弄到一塊兒來了。

波萊告訴我，勞合·喬治那天作了一篇極動人的演說，全場的人都為他那張地圖深深感動。看來他很可以動搖不少在場的佛朗哥支持者。可惜隨後不多幾時，經他們所代表的金錢利益一壓迫，他們仍復又落到原來的路上去了。

次日早晨，勞合·喬治走了。法國右翼報紙對他施以猛烈的攻擊，罵他為他們所謂的「拿普樂斯反和平的陰謀家。」他們說他的地圖是憑空杜撰。而英國大多數的報紙，也一如往常，對他加以一頓諷笑。

貝尼斯 (Dr. Eduard Benes) 現在倫敦領導着一個捷克國民會議 (Czech National Council)，我向那會議的會員詢問過哈里法克斯在慕尼黑危機時的態度為如何。結果，就對蘇古德 (Suteren) 問題而言，我竟找不出他的態度有半點與張伯倫不同的痕跡來。有一個捷克會議的會員告訴我，捷克駐英公使馬沙利克 (Jan Masaryk) 曾一再發出公文，埋怨哈里法克斯向他大施壓迫，迫他向納粹德國投降。

我親眼看見哈里法克斯做他那沒幾阿比西尼亞與西班牙共和政府的劊子手工作。沒有人能找出他與

他的首領之間有何不同來。一九三八年五月，哈里法克斯初以以外相資格出現於日內瓦的國聯行政院。他一下火車，立即一逕跑向禮拜堂，他從不弄錯地點的。幾日之後，當他再踏上火車時，國聯會員都紛紛自由承認意大利之侵略阿比西尼亞爲合法的了。而西班牙援引國聯盟約，請求實現共同援助的首次要求，也被斷然拒絕了。

國聯行政院閉會達週餘之久，其實真有需要的只是把阿比西尼亞從國聯會員錄上一腳踢出去的一次會議，和拒絕西班牙要求的三次會議而已。梵雅外長得阿卡拉特之力助，在行政院會議席上作首次之公開反擊，但正如一般西班牙共和政府的友人——那些主張共和政府應目被軸心侵略之旨始即堅持國聯盟約所賦與的權利的人——所擔心的一樣，太遲了。西班牙代表團所獲得惟一的支持，是蘇聯代表的，中國代表顧維鈞，放棄了投票權，新西蘭代表甲丹（Labourite Jordan），也棄了權。他和哈里法克斯談了一會之後，紅着臉坐的一邊，自然心裏有着不舒服的意念。至於其他各國代表呢，由哈里法克斯與龐萊二人率領，對西班牙的要求一致投反對票。

在這一個禮拜之內，我有密切觀察哈里法克斯勛爵的機會，因爲我住在卡爾登大飯店（Hotel Carlton），那裏正是英國代表團的總辦事處。但是，造物也未免太作弄人了，偏偏西班牙的代表團也住在這兒。

這是一件懷慘的事情：在旁邊看着被害者與劊子手每天在餐廳裏碰兩次面，彼此互相客氣地鞠躬致

禮與着同樣質料的食物，受着同樣懇動的招待——一切都好像他們是完全平等似的。一聯串的電話，西班牙代團陸續知道了哈里法克斯與龐萊的計劃。同樣的電話，也使英國代表團先期得知他們的建議。在和別國代表團交換意見時都極接受了。英國和西班牙共和政府的代表們，在餐廳裏彼此相隔不過幾張桌子；但是，他們之間，有着一道無法破除的鴻溝。

在整個哈里法克斯留此期內，我看見他微笑過不只一次。我研究他的面孔，我以為無論那一個人在他臉上所想看到的最後一件東西，必定就是那一微笑。他的臉，可以說是一個長形的僵硬面具，有些像幅馬臉，冷冰冰的毫無半點表情。我總覺得此面具一旦揭去時，所遺必空洞物。在此一週之內，哈里法克斯屢屢變換說他如何為其人民在德意彈雨下討生活的西班牙共和政府發愁，且申說次數之多，簡直空前未有。但是，另一方面，據一個工黨議員後來告訴我，哈里法克斯在日內瓦出席某次晏會時，却會即席坦率地表示他的厭煩。

這個議員現在是哈里法克斯在政府裏的同事了，有一次哈里法克斯想對他解釋他並不喜歡張伯倫的政策，甚至還暗諷他準備在不久之後辭職。這的確可算是一個聰明的手法；因為這件事馬上傳開去了，哈里法克斯乃得以藉此逃避輿論對他日內瓦一切行為的苛責批評。不過，這箇手法如果也算是一個手法的話，那對於我則完全不新鮮。四十年前，行止這等卑鄙陰險者曾使過這個戲法了。

哈里法克斯在日內瓦出席某次晏會時，曾即席坦率地表示他的厭煩。(Captain Filtz Wiedemann)

大開其談判。魏特曼是上次大戰時希特勒的老副隊長，後來做了納粹駐舊金山的領事。魏特曼之到倫敦，即在英王夫婦訪問巴黎之前不久。我看見考賓大使有一紙很焦急的公文向法國外交部報告，謂據報魏特曼此來攜有締結國德同盟的極接近之建議，作為讓與蘇台德區及允許滿是希特勒殖民地要求的交換條件。

政治的天空，佈滿了這黯淡的雲彩，而巴黎却在歡樂地晏請英王喬治和伊麗莎皇后，他們係由哈里法克斯陪同前來。正在這個慶典進行的當兒，置捷克共和國於死地的文契簽字了。據我的揣測，簽字應該是英王訪問之後最後一天的下午，當英法大員們決定派任錫曼勳爵（Lord Runciman）去担任「調解」時。那個決議決定以後一會兒，海軍部長甘班希就把這消息告訴了我。決議的用意何在，當然不難一索即得。

幾小時之後，我去那布置得極為華麗的法國外交部出席招待英國客人的盛會。當我站在一個角落裏，眼睛瞧着這巴黎政治，文學及藝術各界的上流分子的時候，一位法國的部長，現在隱匿在法國未淪陷區域的，把我扯到一旁，儘量傾洩他對於今日下午那個決議的怒氣，他指着正和一個外國大使談天的哈里法克斯，說道：「就是那傢伙的鬼主意，你看他！他看上去不活像一個民主國家的晦氣星（Olsen de Melheus）嗎？」

輝煌的燈光，歡樂的人羣，眩目的衣飾，在與政治情勢之陰暗面形成對照，其結果，幾至今人以為

一切都是假的。我偶然向蘇聯大使蘇利茲 (Jacob Suritz) 講起這話，他答道：「你難道還不知有所謂迴光返照嗎？」

哈里法克斯確係民主國家的晦氣星，兩個月後，我又看見他站在法國外交部明亮的燈光之下，那時候，捷克已被慕尼黑會議將其四肢割去，實際上，即已早喪失其獨立。拉斯基教授 (Professor Harold Laski) 有一次說得不錯：哈里法克斯對一切促使納粹成爲歐洲最大強權的投降與違約，應負完全責任。

哈里法克斯對於法國，并非一向如納粹當權以後般的恭順。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德國還是一個年青的共和國，那時英國有兩百個保守黨議員，不管德帝國已經傾覆，起而代之者乃係草馬共和國 (Weimar Republic)，仍一味篤惠勞合。喬治對戰敗的德國提出極苛刻的議和條件，哈里法克斯即是其中之一。

哈里法克斯一向是工黨的死對頭。他和故勞合勳爵 (Lord Lloyd) 及溫特敦伯爵 (Earl of Winter) 協同創建一羣青年死硬派，專以摧毀正在成長中的工黨勢力爲畢生職志。這段史實可在「偉大的機會」(The Great Opportunity) 一書內找到，在那本書內，伍德(即哈里法克斯)和勞合二人宣佈了他們的政治情條。

過了二十年，到一九三九年十一月，這兩位先生重又在另一本書上合作，這本書叫做「英國現勢論

1 (The British Case)。書為勞奇勳爵所著，哈里法克斯是時正任外相，為之寫了一篇引言。從那本書上，適足看出二十年來他的人既沒有學到什麼新的玩意，也不會把舊的什麼忘記。書中對西西斯意大利與墨索利尼，對集權主義的葡萄牙及其國政者沙拉查 (Salazar)，對佛朗哥及其領下的西班牙，一律囋囋不休地加以讚揚。而對有蘇聯的誣責，則遠遠過對於納粹德國的誣責。該書惟一好處，祇在率直和敢言。無可諱言的，這一次的戰爭，是一個民主國家對抗集權國家的戰爭。但勞奇的說法與英國官方的說法相反，他說：「歐洲的劃分，并不是如某些誑誕不經的說法所云，一定要分成民主國家與非民主國家兩類。」

哈里法克斯是英國上流社會的一分子，歷來賦有反動性格。為人極為虔敬，有英國政治中「最聖」之人與英國政治中之「聖狐」(Holy Fox)之稱。哈氏於許多招致不幸的事情，都有一部分，他做印度總督，就出米魯案件 (Meerut trials)，株連五萬多土著民族主義者入獄。做外相，則不直幫助希特勒獲得維也納，慕尼黑和布拉格三次不流血的大勝利，因而把兩千萬天主教徒送到納粹與教徒的統治之下過活，而且還幫助希特勒取得了不少攻英的重要戰略要地。因此，全然帝國主義式的哈里法克斯，以為綏靖主義於英國有利，而力主採用綏靖主義者，結果，反成了一個以綏靖主義禍英最烈的人。

哈氏少時在伊頓與牛津受學，前次世界大戰時，任約克洲 (Yorkshire) 騎兵中校，是一個性情暴燥的獵人，他可算得是一個十足的英國紳士了。但是，有一次赫里歐說過：「英國紳士四字」的定義，已

經幾經變易了。在我們這年代，這名詞應視其是否合乎下列條件以爲準，即：屬於大英帝國轄，用力拉牢，不屬於英國的，管他人民也好，國家也好，一律慷慨慨地拱手送與獨裁者。」

當一九三八年七月底張伯倫宣稱「整個大陸上緊張之情緒業已日見鬆弛」時，捷克的危機已快達頂點。這故事現在幾乎盡人皆知，故我只須略一簡括觸及，也就够了。我說這故事時，實際上我只是說出一點點表面的瑣事而已，因爲全部經過詳情，還有待人家來告訴我。有一位捷克政府的部長，爲貝奈斯博士一個極接近的同志，有一次告訴我道：「關於慕尼黑危機，全世界所知道的，實不過全部真象之極小一點皮毛而已。倘若一朝全盤經過被人知道了，那全世界對於英法兩國對我國負義之深，及其加於我國的壓迫與敲詐之甚，必震駭萬狀」。慕尼黑會議以後，全世界知道了許多關於這個駭人聽聞的故事之實情，所可悲者，就是直到慕尼黑會議以後才知道身。

事情發生以前不久，我適飛到倫敦去了一天。到時，一個工黨代表團剛嘗過哈里法克斯，與之談了關於捷克情勢的事。據人家告訴我，工黨議員們所遇到的哈外相，對他自已幫同安排的一千四百萬人民的命運。簡直漠然無動乎中。代表團中有一位達拉斯 (Carew Daines) 先生，驚駭得無法自持，他嚷道：「哈里法克斯則會，我們真羞爲英國人呀！外相根本一點也不羞，他仍幫着他的。」

幾百年來，捷克人都爲他們的自由而奮鬥。然而張伯倫只三度飛往柏林，就是以把這功績掃除盡淨。沒有什麼戲劇家能够佈置這三次飛往可產生更好的效果的。！能够把這三次飛行演出得更巧妙的

，或是能够含有一種很好的網刺意識的。

最後一幕，在觀衆前出現一個紊亂的局面。有法國局勢的動員，實行燈火管制。防務空襲，英國海軍的動員等等。大尾聲來到之前片刻，無線電傳出張伯倫講演：「好可怕呀，好奇怪呀，好令人難於置信呀，我們爲了一個毫無所知的遙遠國家人民間之爭吵，竟要在這裏掘起戰壕，並起碼毒面具來了。」

隨後，是尾聲的自身：英國議會的一個會議。正當張伯倫演講的時候，來了一封文書，邀請他出席慕尼黑會議的！接着，是議會發展史上一幕空前可恥的屈辱。盡人皆知此行結果必只一個，即投降。盡人皆知張伯倫早在貝德斯伽曾接受了希特勒的要求，應允把蘇台德蘭（Sudetenland）讓與德國。但是盡人都還相信慕尼黑會議或可產生一個公正決議，以奠定永久和平的基礎。反對黨首領阿特里願要伯倫「一颯風颯」，邱吉爾和首相握着手，喃喃地道：「願你全福，奈維爾。」

只有一個持異議者，一個小個子，孤獨的共產黨員介賴傑（William Gallacher），他喊道：「我反對割裂捷克，」那聲音被其餘六百個人同時一聲「嘿」壓落下去了。

後來我在法國外交部又看到一角公文，裏面報告說，里賓特羅甫在慕尼黑文件簽字以後，會勝利地對希特勒說：「張伯倫業已簽署了制大英帝國死命的文契，我們只須計日去完成它便了。」

慕尼黑會議之後四日，英國下議院舉行辯論。我在那裏聽着。假如想辯論證實了什麼時，那就是又

證實了英國人對於一切重要措置的反對都來得太遲。這辯論中許多公正和帶攻擊性質的批評，是早應該在張伯倫宣佈飛往慕尼黑去的那天發出的。然而，在那天，邱吉爾、艾登、阿特里、莫理遜、及辛克萊爵士等，都站在首相一旁。誰能在九月二十八那倒臺的日子採取一個反綏靖立場的，可算算得是具備幾分英雄氣質的了。在納粹軍隊早已鵝步式地開進蘇台德蘭以後，再來評論慕尼黑會議，對於捷克人民毫無用處，那只不過是叫英國議會的司事好編印報告書而已。一個暴怒的英國新聞界同業告訴我，說是一「現在倒是花頭來了，反對張伯倫的人希圖洗滌他們參加慕尼黑悲劇的手，我倒要看看他們究竟能否將全案推翻。」

隨後不久，張伯倫的議會宣稱：「西班牙戰爭已不復為歐洲和平之威脅。」因而策成了英意協定。然後他和哈罕法克斯勳爵同赴巴黎，與他們法國同僚商討如何到意大利去之事。

他們不擬空手跑去。他們準備把為法國所有的阿比西尼亞鐵路 (Abyssinian Railway) 送給暹羅，并預備把法屬索馬利蘭 (French Somaliland) 也慷慨地割出一條給他，其中還包括最有價值的港岡吉布底 (Gibuti)。他們還擬定這個計劃，而法國應向之敬致謝意的人，現在却被關在貝當的牢裏。

孟德爾把張伯倫和哈里法克斯兩人的主意告訴了一些法國著名的新聞記者。後來他提那瑟斯 (Petr Thax) ，塔布伊夫人 (Marie Genevieve Tabouis) 及波萊 (Emile Bore) 諸人將之一發表，這計劃於是便破產了。

英國大員們離法之次日，我見到孟德爾，他用嘲笑的口吻對我說道，「現在要輪到我們了。」於是他把英國大臣們的建議告訴我，他說龐萊業已準備接受，但達拉第還在躊躇。

我爲着另一件事又去看過他。我剛好收到一份新文件，裏面包括許多有關慕尼黑談判的新鮮資料。這就是所謂捷克白皮書（Czech White Book），爲捷克外交部在慕尼黑會議剛剛過後所編就，但始終不會發表過。我的一個朋友，在布拉格一個外交部工役手裏得到一本原稿。那工友不久即離開了捷克。這原稿在祕密警察的嚴密監視之下，由一個美國女記者把它由布拉格偷帶到了巴黎。我摘取了其中幾段，送到倫敦「新政治家與國家」（New Statesman and Nation）雜誌，結果都發表出來了。所發表的幾段中，有一位親眼在慕尼黑目睹其事的馬沙利克博士（Dr. Hubert Mazaruk）的報告，裏面敘述捷克被害者在巴維利亞（Bavaria）首府被西歐民主國家首相及總理之類輕視的情形甚爲明晰。那裏面說：「我們和張伯倫討論各種問題時，他不住地打呵欠，絲毫不加以抑制。我們再向達拉第詢問捷克政府是不需要對這協定作一答復，他根本不予置答，這位法國總統顯然煩燥起來了。」

一九三九年年初，這方面張伯倫與哈里法克斯正在羅馬，那方面諾爾曼也到了柏林。在巴薩隆納陷落到佛朗哥手裏的那個陰晦日子，我得到一個關於這事的祕密消息。共和軍因西歐民主國家斷絕經濟充分的武器供應，而對方佛朗哥方面又擁有居於壓倒優勢的軸心國作戰資源，故卒致彈盡力竭，於歷數年以俱來之攻勢到臨以前即告敗退。他們於一月三十日撤離巴薩隆納。

我：消息是打電話到拍比格南 (Paris) 西班牙領事館去向梵雅打聽得來的，梵雅正在那裏布署撤退的共和軍如何退入法境的事情。得到這個消息，我心上如同落下一塊沉重的鉛塊，我帶着這樣的心情，去應約與海軍部長甘班希及少年教育部長琴·澤 (Gean Zay) 一道喫飯，他們所得到的消息還要壞。

根據他們所說的，諾爾曼之去德國，曾允許對德國政府貸款五萬萬金鎊，并在原則上承認德國對於殖民地的權利，以爲交換一個堅固的固強公約之條件。法國之將繼起爲這麼一個公約吹打一番，那是毫無疑義的。兩位部長認爲英國所談的殖民地并非不是英國自己的。他們說，最近沙赫特博士的辭職，絲毫不影響德英兩國的談判。英德的談判仍然由雙方的中間工業家在照常進行。

似乎是要使得一腔愁怨更加火上添油，琴·澤告訴我承認佛朗哥政府只是時日問題。佛朗哥的軍隊只須一達到法國的邊界，便可以得到法國和平國的承認。

巴塞隆納既已陷落，軸心國家遂在地中海方面又得一最重要的新戰略基地。但是，英國保守黨却對其又予讚揚，一若過去之讚揚巴列利克羣島 (Balearic Islands)，馬拉加 (Malaga)，皮爾包 (Dillbao)，及撒丹德爾 (Sardinia) 諸地之陷落者然。墨索利尼寫給佛朗哥的信，其中有云：不偵共和軍而已，一卽吾人其他許多敵人，現在亦已大遭挫擊。一然而英國保守黨分子不爲此所動，他們以爲這些話不是直接對他們說的，因爲他們不是敵人，而是墨索利尼與佛朗哥兩人的友人。他們讚揚

英國華盛頓政府。辛克萊爵士對此事加以論列曰：「佛朗哥政府必不依這個政府，他對自己的老義與自己的友人必能持之以忠誠。英國政府的碑銘應寫：『喫灰未成 (We have eaten Dirt in Vain) 』。」

張伯倫顯然為佛朗哥的勝利所樂，他把英國各大報紙的政治記者找來，告訴他們前途是如何的光明。第二天，各報的第一版，自然都充滿了強調前途大可樂觀的文字。

各報在夾在許多不重要事情的報道之間的地方，也刊載了斯大林對民主國家的警告，那裏面說，蘇聯決不為別人去同火中取栗。并揭發民主國家促使納粹竭全力向蘇聯作戰，并圖之作「那將易於反掌」的諾言（「Promising them easy pickings」）之陰謀。後來我和自由黨議員羅伯斯（Wilfrid Roberts）談起這事時，他說他根本即懷疑張伯倫究竟是否看到了斯大林這篇演說。

三月十四日晚上，我的編輯情緒很煩燥地打電話給我，說是財政部長雷諾（Paul Reynaud）剛才對他說，叫他等着瞧最壞的事情發生，因為德國已向英法兩國的駐德大使保證不致採取激烈行動。數小時後，哈柴總統（President Hacha）抵達柏林的消息傳來了。次日早晨，捷京被納粹軍隊佔領。希特勒從馬沙利克（Thomas Masaryk）那住過十七年的拉恩慶古宮（Old Hradschin Palace）的洋台上俯瞰布拉格全城，說道：「我從未知此地有這麼美麗呀。」

蘇聯主權者所製造出的肥皂泡般的幻覺——希特勒嚴肅地允諾蘇合德蘭為其對歐洲最後一次之領土

要求張伯倫嚴肅地允諾保障被割裂以後的捷克之疆域完整——當納粹的坦克車滾進布拉格時，一股腦兒都破滅了。

歐洲的政治局勢業已到達最嚴重階段，張伯倫，哈里法克斯，伍德（Sir Hunsley Wood），賀爾之輩，果可信其能領導一個重建均勢，促進和平的工作——一個他們過去一致忽視破壞的政策嗎？那不只是一個以整軍答復希特勒整軍，以英法同盟答復德意軸心的事，而必須認真努力，重行規劃一個圖謀和平與集體安全的步驟，組成一個堅強的團結，有足以使納粹帝國主義在進行其新冒險時重加思考的力量。

但是張伯倫對納粹新冒險的答復，證明英國統治階級者心目中完全沒有這麼一回事。張伯倫除在布格陷落之日，以三兩句冷淡零碎的話語向全國發一頓牢騷而外，復於事後兩天，在其故鄉伯明罕城（Birmingham）發表演說，充分說明他自己的立場。這篇演說，為導人瞭解戰爭何由發生之最重要線索之一。

張伯倫公開拒絕對此事件作任何新的評論。但他宣佈倘若佔領捷克即是「以武力統治全世界之方略或企圖的一個步驟時……則此等挑戰一旦出現，英國必竭其最大之力量，共同抵拒之。」

過了幾個禮拜，他又自行推翻他那不在「無法預卜的情況之下」作任何評論的政策，而開始與波蘭談判。在他的面前，有着軍事專家貢獻他的意見，謂波蘭軍隊抵拒納粹攻擊，斷難超出二三星期。他也

知道波蘭外交部長培克 (Jozef Beck) 的詭詐活動。培克多年來站在納粹方面，慕尼黑會議時，還狼子虎心，趁火打劫，因被割裂的捷克身上分得一鱗。張伯倫并且也知道培克上校在二十年代的初期，曾任波蘭駐法武官，後因與一眾皆知為德國偵探的美婦人來往甚密，而被法政府請求撤回。

在布拉格陷落之前不到兩個月的時候，培克上校在貝德斯伽登宣佈他對於希特勒的友誼。隨後他去皮阿洛威卡森林 (Forest of Bialowieza) 與墨索利尼的外相齊亞諾 (Count Ciano) 一同狩獵。皮阿洛威卡森林為戈林最喜歡之獵場。這麼一個人，現在突然來到倫敦，搖身一變，而成為靠得住的反法西斯者了，而成為反納粹擴張勢力的可靠堡壘了，其誰相信？

我和培克上校有一次奇特的遭遇，其事頗值一談，藉作波蘭介長行爲不端的一個有趣旁證。約莫一九三九年年初的時候，我在法屬利維耶那 (French Riviera) 一個叫羅格蒲柳 (Rezebroune) 的美麗小村休養。一天晚上，我漫步到了蒙地·加羅 (Monte Carlo) 的附近，在一家小酒店裏，我看見培克上校和幾個人坐在裏邊。我固然於不久之前曾在日內瓦經人介紹與他見過面，但無論如何，當他隔着房子高聲叫喊，邀我參加他們一起時，我心裏總覺得很詫異，不禁自然而然地納罕起來，難道他是妻向我表白嗎？對於我最近所作一些攻擊他的文章無所芥蒂？但等我走進去時，我才發覺他自己根本不知道是在和誰說話，他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說些什麼。他簡直爛醉如泥了。他的同伴們顯見也很不安，其中一個便向我解釋，說是外長根本不會喝酒，他喝了他那一杯，已經受不住了。可是，我卻知道，培克

上校一向是以豪飲著稱的。他的夥伴們費了好一會工夫才把他弄出大門，他竭力掙扎，卒使他們不得不把他硬從酒店裏拖了出來。這一幕，給人一種極不愜意的印象。後來，戰爭起了，波蘭駐法武官告訴我：培克上校自戰爭發生時起，一直到他到達羅馬尼亞（Rumania）時止，還大醉未醒。

英國與波蘭締結互助協定，事先并未知會蘇聯，所對希臘及羅馬尼亞提供的保證，也未經蘇聯參加意見。張伯倫所極力拉攏的一些國家，全不是民主國，南斯拉夫與保加利亞被冷冷地丟在一旁，柯比西尼亞早已拋向了豺狼。當意大利於一九三九年復活節前的那個禮拜五（Good Friday）進攻阿爾巴尼亞時，張伯倫確實宣佈這侵略行為并不影響君子協定所規定的英意關係。

當張伯倫公佈對羅馬尼亞的保證時，我適亦在下議院內。直到最後一瞬間，羅馬尼亞公使都還不知道英國內閣究竟如何決定的。因此他排佈了一個接續傳遞的方法，叫一個館員坐在院內走廊的竈子近旁，而另外安置一個人在議院外邊，由一塊白手帕上，裏面的人便把羅馬尼亞獲得英國保證的消息傳給外面的了。

如果說英國與波蘭的談判及對希臘與羅馬尼亞的保證是以特別快速率進行的話，那麼，英國與蘇聯的談判必是以特別慢的速率在進行，因為英蘇談判是早在四月底左右便開始了的。關於英國戰前外交這方面，我在「法蘭西罪人」（The Frenchman）一書中說得相當詳細。蘇方雖曾一再發出警告，謂英國應具誠意，應決心放棄反蘇立場，但張伯倫與哈里法克斯對此都無具體表示。談判的延擱，對蘇聯建國之難

視，對警告之忽略，以及哈里法克斯之拒絕到莫斯科去等等，僅可解譯為英國政府視此種談判為加緊壓迫希特勒的一種手段，或如韓德森爵士所說，英國政府寧願促使德國在英國諒解尚未成立以前先與蘇聯成立一個德蘇諒解。

同時，即在與蘇聯進行談判的過程中，英方也有好幾次想回到綏靖政策路上的企圖。哈里法克斯在某次宣稱中，允許供給納粹德國以更多的「生存空間」，不過這又只是指東兩歐而已。張伯倫亦曾作如是聲稱。前駐日大使林得賽（Sir Francis Lindsey），向保守黨外交委員會報告，謂英國的威勢惟有這次對蘇協定不能成立，才可翻立。此語當時竟博得聽眾歡聲雷動。

當這些言論發表時，英國代表正在莫斯科與莫洛托夫開着談判。也正是在其中一次會談時，傳來了西門爵士以價值三千萬元的捷克黃金交給德國的消息。也正是在與莫洛托夫舉行另一次會議的當中，英國海外貿易大臣胡特生（Robert Spear Hudson）以五萬萬鎊之借款貸與希特勒的流動貿易大使佛爾哈博士（D. Hallinuh Whithart）的事，弄得盡人皆知了。這些，都是英蘇談判不成的朕兆。

就通常一般情形而論，戰事發生八閱月來，張伯倫政府（因有邱吉爾艾登加入，益為強固）當權，尙大出其全力從事反蘇，這事說來實頗難令人置信。張伯倫與哈里法克斯一方面把墨索利尼捧得上天，謂其有功於和平的維繫，一方面又對戰事開始之日起，即懷着敵意地壓迫蘇聯退出國聯。英法兩國的駐蘇大使都離開了莫斯科，所以當法國戰況危急，墨索利尼參戰時，英法在蘇聯的代表只是兩個代辦

而已。當德國參謀本部正訓練數萬傘兵，準備在挪威、比利時、荷蘭和法國各地降落時，英法政府却還在準備將十萬人的遠征軍開到芬蘭去抵抗蘇聯！相信蘇聯這隻一個強國可由十多萬人在芬蘭把他打敗，或由英法中東軍所準備并研究的轟炸巴庫之法把他擊潰，那真是一種愚不可及（除此而外別無其他好方法）的軍事觀念。日後英國挪威遠征軍之全盤經過情形公佈，法國參謀本部所領擁有光榮傳統與最大勇敢之陸軍也於三星期內即被德國統帥部以戰略敗之，足徵前述觀念之蠢昧可笑，實達於極點。

挪威之失敗與比荷之被佔，逼使張伯倫走出唐寧街十號，但他仍在政府中佔據一席——做着邱吉爾內閣的樞密院長——達數月之久。而哈里法克斯掌握英國外交事務，也直到一九四〇年底出使美國時始告一結束。

十、斯大林的閃擊戰

從希特勒對蘇的戰爭中，產生了一種極端矛盾的論調。許多政治家、專家、以及報人，過去對於蘇聯之呼籲建設，每每加以訕笑的，現在都承認這些確是當前要圖了。環境的力量，逼得他們也祈求這些事情早日完成。

讀者不妨設身處地，從一個蘇聯公民的地位，去設想自己對於三年前西歐及美國各報所競載蘇聯的情況反響為如何。略一調查，我便發覺這些傳說的來源，大都出自希特勒的機關報人民觀察報。據該報一九三八年十二月的報告，莫斯科的饑荒，已經到了一種這麼可怕的程度：即俄國的工人與農民，每天都有人被迫從庫茲尼茨基橋跳到莫斯科河的冰水中去自殺，以求喚起「克里姆宮的主子們」對他們的痛苦加以注意。無疑的，這種傳說被許多讀者團團吞棗地相信了。許多詳盡的描寫，如自殺的情狀如何，橋的名稱如何，自殺的目的是為什麼等等，都一本正經，像煞有介事。然而，這一切，對任何一個對莫斯科稍具常識的人，都是一種顯然的欺騙。因為庫茲尼茨基橋名雖為橋，而實際上並不是一整橋，乃是莫斯科市中心區一條街的名字，隨便誰，再跳得遠些，也只能從那兒跳到陰溝裏去。

如果這件事似乎還不够重要，那麼，雖說自一九一七年以來世界各地報紙幾無日不有類似的消息

查出，但讀者們都還不妨自出心裁，想像出許多更嚴重的消息來。巴黎時報可算是世界各地報紙中最正大的一種了，然而在蘇芬戰爭期間，對斯大林與日丹諾夫在共產黨內日趨重要的政治局某一次會議上的情形，却作了一次透澈得極的描寫。據該報說，日丹諾夫主張蘇聯應竭全力參加德國對英之戰，他用種種橫蠻手段恐嚇斯大林，他的話越來越暴躁，終至於怒不可遏，跳起腳來，給了斯大林一記耳光。

此外，有一個美國記者又傳出一段珍聞，說是一個蘇維埃政府的權威人物，很莊重地對那些受苦已久的羣衆說，希特蘇在動手襲擊之前，決不會向蘇聯政府提出任何要求，因為他怕斯大林會議接受這些要求而投降。換言之，他要蘇聯把一切血本都拿出來打仗，使其儘量消耗，消耗得和德國的軍隊一樣多。

讀者或許可以同意我的見解。如果他是以一個蘇聯公民的立場，從這種甚或更不堪的報告中得悉本國二十餘年來的建設成績竟是如此，他的反應一定是驚奇，氣餒，和厭煩。可是，德國的侵略一開始，我所說的這種矛盾論調便馬上撥雲見日，清白可鑑了。

怎麼說呢？首當納粹砲火之衝的蘇聯命運大家公認爲決定英、美、拉丁美洲，以及所有納粹估價諸國命運的因素。庫茲尼茨基橋的神話，及其他類似的一切怪誕不經之言，都成夢魘。正當蘇聯爲阻止德國侵蘇計劃而向芬蘭作戰時，一位蘇維埃前導領袖主張和納粹締結軍事同盟的見解，也早成了一個天大的笑話。而所謂希特勒最歡迎莫過於蘇聯試航之說，經紅軍作戰紀錄的澈底鑑試，也都成了一種瘋狂的

多年和平歲月中小心孕育出來的幻影，似乎不像一朝之間即被戰爭毀滅了的樣子。當希特勒的閃擊戰在北冰洋與黑海之間的苦鬥中失却閃擊作用時，一般人對於蘇聯的觀感變了，「以如此偉大的力量與勇敢的精神，擊潰納粹軍隊，并斬盡無算」，在邱吉爾這樣的話裏，紅軍同時也答覆了許多關於蘇聯工業的質的問題，因為坦克車，飛機，及其他交通器材等等，都莫不是蘇聯鍊鋼廠，鋁金工廠，鐵道，和技術工人的產物。大生產中心的原料，由烏拉爾高原，巴庫油田和頓巴斯煤礦運來，工人的食糧，由集體農場供給。蘇維埃士兵的士氣，是他們自己的生活方式，加他們對領袖的信任，和對自己目標的信仰的結果。

我認爲應作更進一步之探討，假如蘇聯人民作戰很勇敢，戰術亦頗高明，那麼，此中必有原因，這些原因與整個蘇維埃的生活結構俱有聯帶關係。德蘇戰事剛起時，英美一般高級軍事人物和外交人物間，都有一種可怕的預言，認爲紅軍經一個月或六個禮拜的戰鬥後，必然全被擊潰。退一步用最樂觀的估計說，也斷乎難出三個月，這班人認爲蘇聯工業落後，集體農場制度失敗，鐵路運輸率小，軍事方面缺乏人才，并且整個蘇維埃制度都是不健全的，本諸這種見解，所以他們會作那種短人志氣的預言。但是，如果紅軍給這種批判的答覆是力足擊敗資本主義國家所產生的任何最大軍備，那麼，便適足以證明蘇聯的工業并不落後，集體農場制度并未失敗，鐵道運輸效率是供軍事方面數倍之譜，軍事領袖對其本

身工作都勝任愉快，蘇維埃制度對人類氣質之影響，遠較一般懷疑派所能接受者爲佳。

紅軍的戰績證實了所有這一切，而且證實了另外一件事：即某一個人的生活與工作。蓋對於發展蘇聯工業，實施蘇聯集體耕種制度，決擇并發佈政策，訓練幹部，建立士氣等等，無人有如斯大林之貢獻者。一般人對斯大林建設成績的評價雖極不相同，然對其偉大事業之認可，則各地皆無二致。

我在蘇聯作過兩年新聞記者，一九三一和一九三二年。其後，又到蘇京作過兩次短期觀光。一次在一九三四年，爲倫敦星期週報去訪問德國國會縱火的英雄季米特洛夫，那時他剛從牢裏放了出來。還有一次在一九三五年，正值斯大林一個極親密的朋友與同志基羅夫被暗殺之後。

當我初到莫斯科去作通訊員時，我不以爲我是被派至烏克邦工作，我熱心地想抓住那看去雖很難實現，然而究竟還是可以實現的現實。我學習俄國的語言文字，我和俄國人住在一起。爲要從內層工作中觀察蘇維埃制度，我受國際工人救濟會影片公司之聘，充他們攝製以西方事物爲題材的影片時之諮詢。我常去參觀莫斯科區那些大大小小的工廠和集體農場，我也去訪問過許多政府的高級官吏和紅軍的高級軍官。我會見了國防委員會委員長伏羅希洛夫元帥，他是一個老布爾什維克黨員，內戰時期由一個修鐵道與罷工領袖而成名。我也會見了布丹尼元帥，內戰時代的神祕領袖，有名的騎兵統領，大文豪高爾基，告訴我他個人對於斯大林的印象。

在五月一日照例舉行的大會上，和十一月七日革命日的紀念會上，我看到斯大林許多次。黨的工

作就是在莫斯科大戲院用廣播報告我所看到的這種盛會的情形，採普魯在舞台的後面，台上坐著一長列蘇維埃政府與共產黨的領袖。在某一次這樣的會上，法國名小說家巴比塞是那晚上的貴客，他來遲了，當他走上台時，一個身穿灰中透綠的士兵模樣短衣的人，立了起來，讓給他一個座位。這人就是約瑟夫·斯大林。

還有一次，在集體農民第一屆全體代表大會上，我在同一會議所要看到了他。這次他是講演人。全國每個角落的人，各種種族不同的人，形像不同的人，面孔不同的人，穿著各種各色的服飾，都跑來討論集體農場的基本法規。主講人是卡岡諾維契，共產黨的一個書記，歷任交通委員會，重工業委員會，和油產委員會的委員長，為全國最成功的行政人員之一。

會議程序上原不會列入斯大林演說一項，會議將近散會時，那些未滿足的代表們嚷着鬧着，要斯大林出來說幾句話。顯然地有些出乎意外，他慢慢地立起來，說了幾分鐘。他的聲調溫和，明晰，而且動人。他好幾次提高了嗓子。他時時把右手的食指向身前指出去，作為一個簡單的手勢，以加重話句的語氣。

有人說「斯大林的講演滴水不舍」。他對於那些他想透澈說明的問題，不惜重複地一說再說，有時候甚且用一句現成話，不過把上下文掉換了一下。但當他覺得似乎無話可說了，便索性很快地停住，坐了下去，硬不去做作些無謂的惹人聽聞的言詞。在我所聽到的他那次簡短演說中，他穿插了一些最引人

發笑的幽默性格。集體農場的首領們受託提出一個對日常生活小有誤會的問題，爲要解釋清楚，他講了下面這個故事：

有一天，他接到一個農夫的寡婦寫給他一封信，埋怨集體農場拒絕收留她，當他寫信給那個農場的首領去查問這件事時，他得到報告，說是這個女人曾經侮辱一個集體農民的會議。她如何幹的呢？爲着要求加入集體農場，她把她的闊大襯衫脫了下來，高高舉在手裏，背朝着會議，怒吼道：「這是我的集體農場呀！」說到這裏，全堂哄然大笑，——俄國農民樸實渾厚，恣行無忌的大笑。

斯大林臉上浮起一絲明朗的，會心的微笑。他接着說，無疑的，這女人褻瀆了會議，但是，他又向聽衆道，你們能拒絕這麼一個寡婦嗎，當事情業已過去一年，她已經懺悔他的行動，承認他的錯誤，請求原恕的時候？斯大林沒有想過這種舉動是否平允，是否聰明，他又寫了一封信給那個集體農場。這次，婦人被收留了。結果呢？她現在是農場中極優秀的工人之一。

說到這裏，全場一致鼓掌歡呼。那班硬頭的，腦筋簡單的，只顧實際的羣衆，佔代表中絕大多數，他們懂得了這個故事的含義，即是說，拒絕一個人加入集體農場所應負的責任，與一個人被集體農場所接納時得到的光榮等量齊觀。

當許多懷疑集體制度的農民最後都被說服，加入成爲會員後，事情本只着如何去設法誘導一班時代的落伍者來參加了。上面所說這個事情，恰在這種時候出現。斯大林由這麼一個平凡的故事裏，推翻了

一個極偉大的政策。

還在「閃擊戰」(Blitzkrieg)還沒有成爲一個各國文字中通用的字眼以前，斯大林和他的同志們早已在實質上閃擊戰了。斯大林的閃擊戰是用以對付帝俄時代的，用以對付國家的一切落後現象的。斯大林的閃擊戰是連續的幾個五年計劃。在克服帝俄遺毒一項工作上，一二兩個五年計劃及第三個五年計劃之一部分（第三五年計劃因被戰事阻撓未克完成），真有如光芒萬丈的前驅。然而，外界對於五年計劃的批評却真不少，諸如期効太切，實現困難，以及全盤計劃都是幻想，都不切實際，都過於殘酷等等。但是，蘇維埃不顧這一切，決計把國家從速工業化起來，把集體耕種土地制度推進到一個無限的境界，並期於較他國少數倍之時間內完成。這是一個綿五十二年的閃擊，從一九二八年五年計劃的第一個廠開門起，一直到一九四一年六月希特勒決心冒險開關東戰線時止。

蘇聯閃擊的背景，在斯大林一篇有名的演說中解釋得很清楚。他說，蘇聯臨到一種遷蹙的情況，必須在下面兩種方法中選擇一種。一是先訓練技工人，然後再興建築，這個方法經濟風險較小，耗費亦極少，但需時較長。一是訓練與建築同時並進，雙管齊下，這個方法耗費較大，需時較短。機器可以重置，而時間不會再來，國家在訓練期間仍極脆弱，國外的敵人是否允許你達到建築的地步，這很難說。因此，蘇維埃政府決計採取第二個辦法。這顯然的是一種閃擊策略，不過是一種和平的就是了。這個策略，是集集中全國精力以赴的。

當時則能尊重，真是不容令人忘記。早年所謂「軍事共產主義」的心理，真是够冒險，够犧牲，够臨渴掘井的了。建築工廠的工程，全部工業，以及所有都市，在在需要同樣的質料。但如不經訓練，沒有計劃，沒有毅力，那就全都無用。羣衆的想像必須使之活潑，不僅要教他們如何使用機器，而且還須教他們懂得機器是社會機構之一種。樹立一種生產手段中廢除私有財產制的原則是一件事，創造社會主義財產制，土地公有制，工業生產品平均分配的特殊技能，是又一件事。如果俄國人民在這個試驗中失敗了，那末，他們的陸海空軍都不要想望成功。由一可以測其餘。

在紅軍還沒有開始作戰以前，建設方面已有了如下的雖屬平淡無奇，然而却够重要的數字：

煤的產量由一九二八年的三五、五兆噸增加到一九四〇年的一六五兆噸弱。

油的產量由一一、七兆噸增加到三四、二兆噸。

生鐵由三、三兆噸增加到近一五兆噸。

鋼由四、三兆噸增加到一八、四兆噸。

十年之內，電力增加十倍。

蘇維埃精於統計，所以，上面所未曾提及的其他各方面，也都有着着着統計。不過，統計并不足以表示出「東線的奇蹟」。羅斯福總統譽為「堅強抵抗」之基本因素的紅軍高度士氣，遠非統計數字所可能比擬。俄國人民固然求生，但也隨時準備誓死，因為他們的生存途徑，僅可沿一件東西得到：即他們

的建設能不顧犧牲抵抗一切的信心。

什麼東西在俄國人民心目中製造了這麼一種的信心？我從訪問高爾基的時候得到一部分回答，又從自己個人在國際工人救濟會影片公司的經驗中得到另一部分回答。

一九三二年我到莫斯科高爾基家中去看他的時候，他已經病得很利害。我的訪問延擱了兩次。當我向他說話時，我知道是怎麼回事了。他的臉上有着經過長期痛苦的痕跡。他坐在書房裏的一張圓椅上，蜷縮在一件溫暖的室內便衣裏面，膝上蓋着一條毛氈。他叫我早點走。但顯然的，我所提問題的內容迷住了他，使他忘記了原先的預定。我們的談話，大半轉落到斯大林的人品問題上去了。

我問他認為斯大林的最大特點是什麼。略略經過一會思索，這位花白鬍鬚的「下層」作者回答道：「我要稱斯大林為一個建設家，一個大建築師。」他又說：「斯大林有情感，有耐性。他喜歡去管一些旁人所不屑管的瑣碎小事。一個真正建築師往往就是一個開路的前鋒。他向着無限之境猛力邁進，他冒險。假如他有一不慎，忘掉了自己的立足點，驚訝與攻擊必定立即隨之而至。斯大林蹈着一切危險。然而他從沒有離開過他的立場。」

他接着道：「你永遠最困難的是什麼嗎？把人民導入計劃。譬如我吧，一個文學家，我就認為斯大林居然能抓住一般人民的理想，根本是件極有趣的事。我絕沒想到那幾個數目字便可以發生如此有力的意義。你注意，我們的人民沒有？他們看報時，總是先翻到最後一面，先看那些鋼鐵與煤的每日生產數

字。你看，這麼幾個符號，竟會比什麼偉大的文學作品還要來得易於激動我們的人民。我以一個文學家的身份來說，着實相當嫉羨。然而，以一個俄國人的立場來說，却又非常高興。」

稍微停了一下，又道：「只有那一個個人，確切相信他的職守可以完成那你能稱之曰五年計劃之奇蹟的偉業。」

高爾基申述着他的話：「供給全蘇工業大部分需要頓巴斯煤區，并不健全。政府決計設法提高它的產量，使之達到現代生產的最高水準。斯大林把這問題親自拿到手裏來辦，他把各煤井的管理人，工程師和工人都召集攏來。工人們有的來自生產率較高的煤井，有的生產率來自很低的煤井。斯大林當着奧爾強尼基茨和一些掌管煤產的高級官吏之前，對頓巴斯的工人及監督人員發出許多問題。幾天以來，他都在仔細研究着煤的生產方法，生產率，工作環境及生活情況等等問題。在出席會議之前，他完全埋首在一堆詳盡的報告裏，關於頓巴斯煤產情況的報告及關於世界最大產煤國家產煤情形的報告。」

卡岡諾維契也在另一方面講過一個類似的故事。他說，有一天，斯大林正和他的兒子談論他在學校裏的進步問題，他很驟然地發覺了那些教師對馬克斯主義的教育正予以一種奇怪的解說。那孩子說，他的書是活葉本，因為世界是常變動的，書頁可以隨時插進或抽出，便可保持最新的事實與學說。至於過去的智能遺產呢，老實不客氣，就輕輕巧巧地把它們全丟了。斯大林十分驚異，他馬上採取措施。他派了幾位年青同志到莫斯科及各省的校裏去視察，並且自己也花上好幾個鐘頭的時間，和莫斯科一班教師

們討論。他替他的兒子邀集了幾次小朋友的聚會。他想從這上面看看小孩子們究竟從現行教育制度中得到了些什麼。把這些研究的結果綜合起來，又給蘇維埃學校制度來了一個澈底的改革。

對芬戰事結束後，法國駐蘇武官傳出消息，說是斯大林偷偷地溜出莫斯科，去研究這次戰役的戰略和戰術問題去了。先聽取過損失最大的部隊士兵的報告，又聽取了損失最小的大隊士兵的報告，然後斯大林在最高國防會議發表一番議論，根據這次的直接經驗，採取各種新式軍事訓練。這些變更，在德蘇戰爭中，經證實極為重要。

必須親身經歷第一五年計劃中的那幾年，才能明瞭五年計劃的理論如何地抓住了人民的理想的。

在國際工人救濟會影片公司，我記得某一個月之內，工人為改善工作，向經理提出了二十三個建議。經理部不接受時，竟敢和它為難！在這個企業中，我參加過許多每月的常會，也參加過一些由經理部報告工作進度的會議。這些會大都嬌嬌虎虎，敷衍了事。然而，從一些發言人的批評中，使我相信工人可自由向經理發表自己內心的意見，使我得知蘇聯工人對於工廠的情況，機器的保護，及出品質量諸方面的問題，都認為與經理部負有同等責任。

我記得有一個典型的蘇聯少年工人，一個電工匠，向國際工人救濟會影片公司的製片人施以極猛烈的攻擊，因為他們沒有能够予名導演普特甫金以必須的技術上之方便。普氏曾導演「母親」，「亞洲風雲」，及「聖彼得堡之末日」等片。另外一個工人則要求開除一個助理製片人，因為那個人對於該次疏

忽應負直接責任。果然不多幾週，那人便被歇退了。

每年開始的時候，集體契約重加修訂，關於改善工作情況，必有一番熱烈討論。工人對於這點，每力加爭執。他們不僅繼續要求——更進一步，取得——增加工資，並且，就我所知，他們對於新的廠屋及廠中食品之改良，尤為關切，在這一方面，列寧夫人克魯普斯卡亞領導過一個改善食物的運動，我曾隨同影片公司工人派出的代表團去和她商量過這個特殊問題。

那時候克魯普斯卡亞是教育委員會的一個高級官吏，她在她那陳設適中，光線充足的房子裏接待我們。她坐在一個很大的櫥子後面，櫥子上堆滿了一堆堆的紙。聽這位蘇維埃共和國創始人的孀婦交談關於改進肉味和調理菜蔬方法的意見，着實是我生平的特經驗之一。代表團走後，我又單獨和她談了一陣。她給人的印象是一顆溫熱的心和一個敏銳的腦。她說她現在很難回到從前那種廚房裏度日子的生活去了。從前時候，她是列寧的最初的最親密的同志，無論他們是在起草一個章程，或是在開會，或是指導帝俄時代的祕密運動，她總得抽空去預備飯菜。她說她久已不作廚娘了，所以當現在這件工作落到頭上來時，先自己作了將近一個月的飯，試試看。她高興地笑着告訴我道：「我不想人家罵我連一碗白菜都作不來。」

當緊急的時候，要找出或是造出一些可以領導決定性鬥爭的人，在任何祕密運動，都是一個嚴重問題。這種情形，二十五年前的捷克「馬非亞」黨（Mafya）反奧大利帝國運動是如此，今日捷克反納

拜太上皇的運動也是如此，戴高樂將軍的「自由法國」運動是如此，希特勒統治下的歐洲各地共產主義或社會主義祕密組織也是如此。這一類的活動，都需要以一些具有經久決心，組織能力，與領導才具的人來組成一個工作網。這種工作網，有的地方佈得很稀薄，有的地方又佈得很廣闊，它們阻止了希特勒撲滅德國國內及其他佔領國家反抗力量的企圖。當初用以推翻帝俄，開闢布爾什維克革命之路的，也是這麼一個工作網。

無疑的，這些祕密組織中最大的一個，便是上面所說的最後一種。在列寧的領導之下，建立這個組織，開闢交通途徑，與俄國內外保持着接觸的，就是斯大林。

我知道，某些方面盛傳一種謠言，認為斯大林當列寧在日，曾挾天子令諸侯，借這位大領袖作為掩蔽，幹過一陣曖昧的統治，其實，事實絕非如此，斯大林當時是直接領導帝俄國內祕密運動的俄國局長。其地位之重要，照規定本僅次於列寧。斯大林原是布爾什維克黨機關報真理報的編輯，一九一七年帝俄傾覆，立即接充列寧所謂該機構中最重要的一個職位。斯大林又是在俄京彼得格勒發動暴動的軍事委員會委員長，擔任着十月革命極重要的工作。如果革命的狂潮不足以掃蕩彼得格勒的克倫斯基統治，那麼，其他各地也必聯帶失敗。

在列寧任主席的第一屆蘇維埃政府中，斯大林任民族委員會委員長。因此，他的職責就在調解帝俄所謂「非俄羅斯民族監獄」中各種不同民族間相互的仇視，尤其是各民族對從彼得格勒來到莫斯科之一

切事物的共同憎恨。從內戰的動亂中，產生了一個由好些共和國平等結合的聯邦。隨後，斯大林又提出
出
工業檢察委員會委員長，責在監督政府決議之執行。

當內戰高潮日見有利於蘇維埃時，列寧認為共產黨必須從事一種極大規模的戰後復興工作。軍事共產主義時期漸近結束，軍事領袖必須變成建築家，計劃家反實業家。散佈敵後專事滋擾的遊擊戰士，也都要變為經過訓練的技術工人，為儲備復興時期的共產黨員起見，斯大林又接受了一個重要任務：他被選為黨的總書記。

至於談到軍事經驗，斯大林得來確非易易，內戰的時候，南線情況着實相當糟糕。快要到絕望的時候了，斯大林受命趕起前線。當他被派到察里津，現名斯大林格勒去部署南俄食糧供應事宜時，他看到「一種無可形容的紊亂情狀。」白軍着着進逼，已經威脅到察里津本身。哥薩克反革命勢力在德國軍隊羽翼之下進佔烏克蘭蘇維埃的守軍本身既極脆弱，內部復有不堪救藥的叛賊，故力量極為單薄。斯大林打電報給列寧道：「我現正採取某些必要的措施，將來也還要採取，說不定要撤換軍中現役軍官及參謀人員——我明知有許多不可避免的困難要發生，但為事實需要計，我將不顧一切，斷然處置。」在另一個有名的場合之下，他命令察里津的統領們，對托洛斯基從紅軍總司令部發下來的指示，儘管「不予理會」，斯大林認為那些東西適足壞事。

卡爾諾維契是斯大林最親近的同志之一，他描寫斯大林在察里津的情形如下：

「我記得就好像是今天一樣，一九一九年的關頭，克拉斯諾夫的哥薩克軍進襲察里津，想用一種包圍陣式逼使紅軍向伏爾加河方面後退。這些紅軍，在大半係由頓內次工人組合的一個共產黨小組指揮之下，以一種不可形容的精力抗拒裝備極為完善的哥薩克軍隊，且數日之久。那真是些可怕的日子。你可以看到那時候的斯大林是個什麼樣子。他靜靜地，和平時一樣，老是在轉着念頭。他時常徹夜不眠，他似乎永不知倦，時而在火線上工作，時而在軍司令部工作。陣線的形勢看來是沒有多少希望了。克拉斯諾夫的軍隊由哈羅諾夫，馬門托夫及一些旁的人率領，緊緊地向我們這接盡力竭的軍隊壓迫過來，我們蒙受了極大的損失。敵人的陣式，成爲一個馬蹄形，兩翼伸到伏爾加河上，一天一天逼近來了。我們已經全無出路。但斯大林毫不爲這着急，他只有一個意念：我們必須戰勝。斯大林這種頑強的願望，傳達到了他身旁的幕僚身上，於是，雖在一種走頭無路的局勢之下，却沒一個人失錯對勝利發生過懷疑。」

察里津之役結果，仍歸紅軍得勝。紅軍將克拉斯諾夫將軍的哥薩克軍隊擊退兩百餘哩，取得了供應北方的兩俄糧食。

在彼得格勒的保衛戰中，斯大林又照樣地表演過一套，他把尤琴尼支將軍的第一次攻擊全部擊潰。事實上，今日德蘇戰線上一再出現的幾個城市，過去無不有過斯大林不可磨滅的功績。他曾帶同守衛斯摩棱斯克，抵抗波蘭軍隊，那是一個光輝的守禦戰，作戰計劃完全由斯大林一手擬定，結果在比特希夫

和日托米諾爾地一舉將波蘭第三軍全部殲滅。後來，他在莫里津收編了鄧尼金將軍的全副雜牌軍隊。一九二〇到一九二三年，他除旁的一切任務之外，還兼着蘇維埃軍事會議的委員，得過兩次紅旗勳章。一九一七年十月，所謂政治局者成立，他又是其中一個重要角色。

有一次，我向布丹尼元帥問關於斯大林在內戰時指揮軍事的情形，他答道：「似乎每每到了最危急的時候，列寧總命令說『派斯大林去。』」

關於斯大林的私生活，很少見諸文字描寫，主要原因是蘇聯人民悉能尊重他們領袖的祕密。

斯大林部分時間都消磨在他那克里姆林宮的大書齋裏。工作之餘，便返到宮中三間房子的住房裏去休息。在這住房裏，他會接待過幾個和他談話過的外國作家及新聞記者。我和巴比塞與福契萬格都談起過他們和斯大林談話時的情形。他們對斯大林那種樸實輕快的舉止，和極力想使客人安適的熱情，都非常稱道。斯大林的煙癮原來極大，但當福契萬格偶一表示他反對吸煙時，斯大林便馬上把他那有名的煙斗藏進了衣袋。一個西班牙政府軍的將官和他的太太來看斯大林，據說斯大林會爲他們親手用俄國法子煮了一條魚。他很詫異，爲什麼他對西班牙戰線的情形，政府軍困難的狀況，尤其是製造軍火的困難，以及他們種種壯烈的戰績，會那麼熟悉。斯大林會見外國客人的紀錄，發表過幾篇，如會見威爾斯的，會見魯德偉希的（Emil Ludewig）的等等，從這些紀錄裏面，我們可以看出斯大林是一個口若懸河的雄辯家，一個諄諄善誘的教師，同時，其高興發問的程度，也不下於其歡喜作答的程度。

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他的續妻愛麗露耶娃（Nadyezhda Alitayeva）逝世。遺下一個男孩，名叫華西里，一個女孩，名叫斯維特拉娜。外交衙門的新聞司打電話告知她的死訊。自然，我極想獲得一些關於她的資料。得知她曾在工業專科學校讀過書後，我便馬上跑到那個學校去找她的先生和同學們談論，使我非常驚訝的是全校竟僅校長一人知道斯大林的夫人是這裏的學生之一。因為校長當時被要求將這件事嚴守祕密，於是他就真個把它瞞得天衣無縫，以致沒一個人會注意到愛麗露耶娃的丈夫是誰。當那些學生從報上看到斯大林的夫人會和他們一起念過書時，簡直有如晴天霹靂。她每天坐着衙車到學校裏來，喫着學校裏的普通伙食，她也參與學校裏的小範圍交際。和她同一個教室，坐在她旁邊一個座位的，是一個從前在伊凡諾夫·佛茲涅遜斯克當過紡織工人的婦人，她告訴我說，斯大林夫人是一個富於同情心的明智敏決的女人，她希望能成爲一個光學廠的廠長。

斯大林一生事業的幾個時期，是衆所週知的。一八七九年出生於喬治亞底夫里斯城附近的哥察地方，父親是一個補鞋匠，名叫特若加什維利。他的家裏，尤其是他的母親，費了很大的氣力，才使他受到國民學校的教育。他在底夫里斯的正教神學院（Seminary）過四年，但到十九歲時，因爲有人檢舉他相信馬克斯主義，并參加過一些動輒失敗的活動，乃斷然離開了那裏。在神學院的宿舍裏，他領導着一個馬克斯主義的小集團，一個學派裏面的學派。被開除後，他馬上投身政治，加入了新組成的俄國社會民主工人黨底夫里斯支部。他以前還用過許多不同名字，到最後才鑑定叫做斯大林（鋼人之意）。他用這

個名字，創造着歷史。在被神學院開除到蘇維埃革命之間，他先後被捕過五次，從獄中及充軍的地方脫逃，也不下四次。

他初參加革命的幾年，過着動蕩的生活。剛進入二十世紀的時候，他在底夫里斯領導第一次罷工，他在巴統及巴庫油城，開始從軍祕密工作。一九〇五年，他被題兒第一遭地編輯了一種報紙，叫做「無產階級的鬥爭」，同年，他第一次遇見列寧，正值一九〇五年俄國革命的前夜。斯大林對這次定命的遇見，作了如下的描寫：「我第一次遇見他（列寧）時，是在一九〇五年十二月，在坦麥菲斯（在芬蘭）的布爾什維克會議席上，我原希望看到的我們黨裏首屈一指的大人物，不僅應在政治意義上偉大，而且體質上也應該偉大。因為依我的想像，列寧應該是一個魁梧奇偉的巨人，既能引人注目，又能爲人表率。但當我看見立在我前面的是一個體高不及中材，一切與常人無異的人物時，我是如何的驚駭呀！

「一個要人出席會議，通常總是遲到，因此全場要很焦灼地等候他一個人。同時當一個要人在會場出現時，事先總有人喊：『噓！……靜些！……』來了！」但是，我看見列寧却比這旁人到得早，他坐在一個角落裏和一個毫不重要的代表談天，談一些極尋常的家常話。他的行動顯見不爲一般普通種習所囿。

「列寧有一種簡單樸實，中庸適度的風度，這是我初見他時，卽已發覺的。他那避免旁人注意的心理，至少也是不願炫耀他的尊貴的心理，是他這種新羣衆——人類最偉大的淳樸基層羣衆——的新領袖

的 最 特 出 之 處……

過了一年，斯大林又出國，去出席在斯托哥爾摩召開的俄國社會民主黨會議。其時，該黨無法避免的左右派之爭，即布爾什維克與孟什維克之爭，業已尖銳化，次年，在倫敦的會議上，卒致完全決裂。倫敦會議閉幕後，斯大林又到巴庫，在那裏煽動「巴庫無產階級」報。其間經過一度被捕與脫逃，復於一九一一年到了聖彼得堡。在沙皇這個京城裏，他又被捕兩次，但都和以前各次一樣，逃了出來。在聖彼得堡，他於編輯着星報之外，還創設了真理報，該報至今猶為黨的最大機關報。在布格拉召開的布爾什維克會議上，他被缺席選舉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之一，中央執行委員會即黨的統治機構。因此，斯大林於一九一二年，在波蘭的克捷考城又與列寧相遇。他從克拉考到奧京維也納，去研究這個古老帝國的多民族問題，研究結果輯成一本書，名曰「馬克斯主義與多民族問題」。一九一三年，他又落到了警察的手裏，被充軍到西伯利亞，在西伯利亞度過四年，一直到革命把他釋放出來。

帝俄警察局的紀錄，革命以後曾發現許多，關於斯大林的，極有意思，那上面這樣寫着：「姓，特若加什維利。名，約西夫。維沙梁諾維契……身體強壯……聲音沉重……左身上有一小胎記……頭形正常……一望而知為一尋常之人。」沙皇的警察真是一些極尋常的心理學家呀！

當代其他的政治家，如有斯大林那樣的成就，他一定老早就被崇為現代最大最大成功的英雄了。但是，斯大林不然，他雖做成了諾大的事業，但對眾口一詞承認他的成功，却至今不敢接受。

五年計劃把蘇聯造成了一個世界頭等工業國家。這，在某些人方面，便叫作破產——不僅那些後來成爲農民階級的人如此，即那些在反納粹意義上不能抓住，或不肯承認，將來一旦與希特勒發生衝突時蘇聯工業化與土地集體耕作之重要性的人，也都作如是觀。

蘇聯於十年代把失業的現象掃除淨盡，這叫作奴役。

過去十五年中，蘇維埃人民生活享受逐漸提高，這叫作饑饉。

斯大林的政網勝過了托洛斯基的，這原是一種堅強與不斷進步的政策戰勝了一種冒險政策。但是，蘇有人把這叫做竊權。

當蘇聯的外交政策正採取普遍縮軍主義，極力擁護集體安全制度，以求建立世界和平時，這又叫做克里姆林宮想把全世界陷入戰爭的陰險計劃。

蘇聯是以武器，軍事人才與貸款幫助西班牙共和政府的唯一大國，這又被叫作布爾什維克希圖毀滅西歐。

蘇聯又是遠在援華成爲一種時髦運動以前幫助中國抗日的唯一大國，於是這又被叫做蘇維埃想在遠東擴張領土。

斯大林的外交政策阻止了全世界聯合一致對付蘇聯的企圖，那，現在大多數人都承認的，原是和平政策的基本理想，但又被叫做斯大林的外交政策慘遭失敗。

與德國訂立互不侵犯協定，使蘇聯得到將近兩年的時間，以加緊準備抵抗不可或免的納粹突擊，這個緩兵之計，已在東戰場收到效果，但這又被叫做向希特勒投降。

由於相當重視曼納林成爲納粹帝國主義的外圍這件事，卒致釀成蘇芬戰爭，這又被叫做比任何納粹襲擊還要罪過的侵略。

紅軍已建立成爲「希特勒」國防雜誌「所認爲的最可怕的敵人，」但這又成爲全世界談笑的資料。在那一方面：

貝當元帥把法國人民送給納粹統治，在法蘭西建立了法西斯制度，成爲希特勒的「同志。」他被叫做愛國者。

佛朗哥將軍反叛合法政府，以一些納粹和法西斯的外籍雇傭兵打自己同胞，把西班牙弄成一個軸心國的小夥計，他被叫作君子。

曼納林把他的國家弄得站在納粹一邊和人打仗，把芬蘭變成第三帝國的一個「支部」，他被稱作英雄。

墨索里尼在不到五年的工夫內，驅使他的國家打了三次大仗，自己變成希特勒的亞平寧半島總督，他被稱爲天才。

至於希特勒呢？他以德意志帝國主義軍隊統帥的資格，予全世界人以歷史上無人能及的痛苦。他以

惡嚇和欺騙的手段，把二萬萬五千萬歐洲人置於納粹暴政的鐵蹄之下。但是，在反納粹方面所編他的傳記上，又稱他爲真誠。

斯大林本人及工作，却不會有過這般受人憐惜的命運，甚至根本沒被人家當做一回事過，世人給他的公平估量，不過如此。和他以前的列寧同一情形，他被称为亞洲魔王與德國代理人。

戰爭的製造者泯沒了許多可憐的錯誤觀念。馬奇諾防綫，馬奇諾精神，「你可以和希特勒談生意」與「照常生意」等幻念，一九一四年的戰略，以及對一九一四年的追懷等等，統統被希特勒的坦克師團掃蕩了。但是，當這些坦克師團轉身東向時，却給予希特勒不可戰勝的神話以一致命的打擊。

雖然，關於清除對斯大林誤解的觀念，至今仍有極大阻力。這種無稽的觀念，現在仍極流行，而且還由一班苟安派拿在手裏玩弄。

邱吉爾有一次曾這麼說過，檢討過去可以策勵現在，正因為存着這種心思，我才寫出了上面這一聯串。過去對於蘇聯的仇恨與漠視，及不肯承認她的真正地位，給全世界帶來不少的痛苦，戰事未爆發前，民主國家領袖的反蘇政策，促成了希特勒併吞奧、捷，墨索里尼劫奪阿爾巴尼亞，和佛朗哥統治西班牙的事實。戰爭初期之「共產——納粹主義」并稱的辦法，以及菲希（Louis Fischer）「助斯大林者即助希特勒」的口號，對希特勒勝利的幫助，實可謂不小。納粹與蘇維埃的戰爭開始後，同樣的把戲又在別的口號與說法之下玩着。紅軍凜凜的陣容既得不到人們的讚譽，斯大林的政策也得不到人們的信任

，而他的領袖才能也便永遠被人窺視了。

關於不願承認斯大林治下的蘇聯這一舉動，不問其爲受了納粹強烈反宣傳之毒，還是自身認識不夠的緣故，其對擊敗納粹，總是一個絕大障礙。一九四一年八月中旬，羅斯福總統和邱吉爾首相致電斯大林，內稱：「蘇聯英勇堅強的抗戰，對於擊敗希特勒主義，實極爲重要」。既然斯大林這個人，在蘇聯之過去與現在均有如此之重要，且又與這英勇堅強的抗戰分拆不開，那末，民主國方面就再也不容對於他的本身及其工作加以任何污蔑或詆譏，無論你喜歡不喜歡，事實總歸是事實。事實是什麼？斯大林是蘇聯士氣與抗戰的建造者。

十一、溫斯頓·邱吉爾：「血、汗、和淚」

一九四〇年的五月，是「奧國之舟」正處在風雨飄搖的境況中的一個月，溫斯頓·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在這時候被叫到這船的舵樓上來，他的最大本錢，就是他過去的判斷已被一年鐵樣的戰事證實無誤，人們對他起了一種普遍的信仰。在某一方面，他對希特勒主義的估計，是確實證明完全不錯。但他並不是處處如此目光如炯的。當他做了大不列顛帝國的首相的那一刹那，原本是他圖報復的時候到了，但是，頃刻之間，他畢生夢想的希望被粉碎了，他計算好的一些國家，現在都已到了苦難的邊緣，他所信任的政治家，結果都像草芥的人兒一般。

邱吉爾一生相信英國海軍的力量，認為英國海軍必有給予任何敵人或任何許多敵人的聯合陣綫一個猛烈打擊的力量。但當他剛一獲收到他的領袖權時，他立刻失望了。僅在他接受組閣詔命以前一個月的時候，他還會向人民保證，必將德國海軍驅出動蕩紛擾的斯喀基拉克（Skagerrak）海面。他諷笑希特勒進攻挪威之舉是會破潰進攻西班牙以來最大的一個戰略錯誤。他很有把握地打算在斯干底納維亞給納粹一個致命的打擊，但結果幾乎適得其反。僅在他吻國王的手之前兩天，他向議院報告了英國遠征軍的悲慘遭遇及其從挪威方面撤退的經過。

就對付德國的獨裁武爾登，邱吉爾認為法國陸軍是英國在大陸上最強大而且可靠的護手。在他看來，法國的陸軍和英國的海軍與空軍，必是所向無敵的當然戰友。遺憾，他又失望了。他擔任首相以後不過數週，雖他自己毫無過失，然而法國陸軍却被法國政府與法國將領們賣了。法軍一敗塗地，不可收拾，兩百萬人，就此含羞忍垢地落到了納粹手裏。英國速征軍以精忠果敢之奇蹟，於將近全軍覆滅的時候獲救，得獨免於同樣的命運。然而，即以事實已足表示關係驚人慘敗了。

邱吉爾曾以最大努力希圖把法西斯意大利從納粹德國身邊拆散開來。就對意政策而言，他同意他的前任，張伯倫首相的綏靖政策。在他就任首相之「前」一年，他贊成張伯倫拒絕外間以侵略亞爾巴尼亞（Albania）為理由而責難英意「君子協定」之舉，但在他就任首相之「後」一月，意大利報之以宣戰。他對墨索利尼的優容，并未獲得報酬。

身材短小，詭譎多詐的雷諾，是邱吉爾的朋友，并且是邱吉爾多年來心目中唯一的法國總理繼任人。當雷諾後來終竟爬上了那把交椅時，邱吉爾鬆了一口氣，認為他找到了一個強有力的人作為同盟。他倆之間，至少有一個共通之點，即兩人的政治事業，均須到戰時才有發展到頂點的希望。這是多麼公平的一件事啊，他倆幾乎恰在同一時候達到了他們的理想。然而，事實上，雷諾未邱吉爾對他的期望甚遠。邱吉爾的首相剛做了五個禮拜，雷諾就慘然坍台，把他的第一個支持者陷入了危險的境遇。

邱吉爾對於聯軍最高統帥甘末林元帥的能力，也十分信賴。雷諾有一次對我說，邱吉爾認為甘末林

是當代各國將領中最能幹的，邱氏并且盛讚法人的頭腦清醒、聰智多識，富於自信力，堪居反納粹主義堡壘之列。然而甘末林的夥伴對甘却頗多不敬，且無人敢保證他究竟是否能名符其實，即令是邱吉爾自己。甘末林認為德軍突破色當 (Sedan) 爲使西歐各國蒙受法境一役重大犧牲之主要原因，即是其失敗處。

若不是邱吉爾，有了這許多失着，恐怕早已坍台了，納粹得勢以後，斯千底維維理之敗績，敦刻爾克之慘敗，貝當的背約，墨索利尼的欺詐等等，紛至沓來，要克服這些，實不只是爛於辭令，空談堅苦精神，和預言不幸便够了的。邱吉爾這個人，有一副堅忍不拔的脾氣，這是他的敵人都承認的。但要说他在這樣的危難之中還能屹立不動，則雖是他的朋友，也都不大敢於相信。事實上，強弱懸殊的情況確是苦了他。

他自己過去的歷史和他作對，他的性情，和他所受過的訓練，也都和他作對。馬沙力克 (Thomas-Garsigne Inasaryk) 有一次這麼說過：「一個人成爲大器的條件，就是要有能從自己成見的根基上站立起來的本領。拿這個標準來說，邱吉爾確實够格而有餘。」

溫斯頓·邱吉爾爲英國歷史上名將馬爾波羅公爵 (Duke of Marlborough) 的嫡系後裔，他可算是這個氏系之下第一個可以比擬那個大偉人的了。他們這氏族裏面，自從出了那位公爵之後，就衰微了，公爵之後的七代，都是些中庸之材料，甚或連中庸都還够不上。溫斯頓的父親，蘭道夫·邱吉爾勳爵

(Dord Randolph Churchill)，原本極負盛名，但結果他自己又把他弄糟了。他的先期發跡確是不錯，四十歲不到的年紀，即已做到財相和下院首領，但是，突然又一敗塗地，卒致抑鬱以終，受人嘲弄，成爲一個身敗名裂的人。他和溫斯頓父子之間，很不和諧。溫斯頓是一個桀驁不馴的孩子，蘭道夫勛爵很不喜歡他。

蘭道夫·邱吉爾一生，除在政治舞台上頃刻的光榮外，其唯一得意的事，就是和一位正走鴻運的美國標準人物的聰明而且美麗的女兒珍妮·吉蘿梅 (Jennie Jerome) 結婚。因此，溫斯頓便成了兩大英語國家的一個活的聯繫。由於他母親的關係，他得到了做國外通訊記者的初次職業（她利用她的力量，向一個倫敦編輯人活動得來），得到了對於實際政治學習的機會（她是一個老活動分子，她指導着他第一次企圖側身國會的活動），也得到了不與人苟同的乖戾脾氣（她永遠污蔑喬治治下的英倫 (Georgian England)，所以她畢竟操縱了它）。有一個時期，她在倫敦創設了一個極爲重要的政治沙龍，一個人的聲譽能否顯揚，一個內閣的地位是否穩固，都可以在那裏決定。她又編輯過一種每本售價五元的雜誌，寫過戲劇，演過大場面的伊麗莎白的戲，結過三次婚，而且一直到六十多歲的時候，還保持着她青年時代的美麗的風姿。

溫斯頓·邱吉爾的一生，對於人家對他的任何期望，可說是在繼續不斷地予以侮慢。他的父親希望他長大了可以去進牛津大學，但溫斯頓却偏偏成了一個極不行的拉丁文學生，而且後來還轉入了撒赫新

特 (Sandhurst) 的軍官學校。進撒赫斯特軍校時，經過四次考試，始得及格。他在吃飯的時候，立起來痛論他自己和他的同班同學都應在二十年內掌握大英帝國的命運。他很少學習騎兵戰術的精髓。

他首次與一個真正的敵人作戰，却不是爲了大英帝國。廿一歲的時候，地跟着許多西班牙貴族去參加古巴獨立之戰 (Cuban War of Independence)。在印度，他把打仗與寫報告弄成了一件小事。在非洲，他被波爾人 (Boers) 捉了過去，後來又逃了回來，造成他一生最大的紀錄。一九〇〇年，他二十五歲的時候，競選國會議員不成，却於作戰上創造了極高的紀錄。八年之後，他已作到貿易局長，成爲內閣裏面風頭很勁的一分子。一九一四年戰事初起時，他正任海軍大臣，外間還不會放過一槍時，他就擅自下令海軍動員，當他把這件事向同僚報告時，衆皆爲駭然。達蘭尼爾 (Darlan) 海峽鬧過一次大笑話之後，他指揮英國海軍的豐功偉業就此壽終正寢。但是後來勞合·喬治又把他找回來，先任軍需大臣，繼之又作作戰大臣。總之，邱吉爾與戰爭，成了二個二而一，一而二的东西。

一九一八年的和議，給了他一個改造社會經濟問題的機會，在這個實驗當中，他簡直毫無成績表現。從大戰休戰一直到希特勒進攻波蘭之間的那些不景氣年頭中，他總是立在錯誤的一邊。在協約國一致干涉少年蘇維埃共和國的历史掌故中，邱吉爾曾作極陰險的貢獻。他對於蘇維埃國家的說法，很遺憾地，極易令人聯想到希特勒對於同一對象的某種蓄謀。德國戰敗以後，邱吉爾不知如何着了魔，竟以爲德意志共和國的命運會拋到許多蘇維埃國家的手裏去。似乎是一種綏靖主義者的先見之明，他去張對戰敗

的德國予以和緩的和平條款，并給以經濟上的讓步，只要它答應參加反對蘇俄之戰。邱吉爾這種想頭，有一個極重要的假定，即德國必須是一個「弱國」，如果是一個「強國」，那他這個計劃實將貽無窮之威。

一九二六年廣大的總罷工發生，那時邱吉爾正任財相。他力言罷工的目的極不單純，不惜以全國的力量來鎮壓。工潮結果之後，更進而將整個勞工運動加以摧殘。有一個替邱吉爾寫傳的人。說他曾問邱吉爾一個最親密的朋友道：「假如上次總罷工時他是保守黨的首相，那將會鬧成一個怎樣的情形呢？」那人毫不猶豫地答道：「全城流血」。這話也許并不足以十分代表事實，但當時幾百萬英國人却確都作如是想。大罷工時期，邱吉爾親自編輯着「英國官報」(British Gazette)，這位大主筆把一個專為公佈政府功令的平和小型報紙弄成了一種膚淺，叫囂，而極端反赤的東西。勞合，喬治打趣這個報紙，譏之為「第三流的新聞紙」。邱吉爾在這內部動亂時期中的一切行動與言論，對於一九二九年普選時工黨在下議院中幾乎獲得絕對多數的勝利這件事，確實幫助不少。其後十年，邱吉爾縱不能說與權勢無緣，但與官職却是確實無緣了。

他的生活史確是非常偉大的。母親遺留給他二筆現成的財產，他本無須去講什麼自立，但他一定要自己去謀生。他成了一個多產的作家，在這個過渡時期，他出了許多言論激烈的書，寫了很多言論激烈的文章。還許許多多的文字，無論在量上在質上，都引起那些專在文化圈子裏面撥弄的人的無限嫉忌。他

的文體，成了當代一種最有力，然而又極富韌性的散文體。他記載人家的言談時，最能摘取話中的新穎成分。他的文筆之長處，在造句圓熟，暗示得宜，有着英國文學史上最豐肥，最成熟時期的筆調。

就口才而論，議會裏沒有他的敵手。每當邱吉爾要發言時，各議員都很快地跑到自己座位上去，走廊邊的喁喁私話消失了，空氣像觸電似地變成了只有屏息等候。下議院原是一個平凡思想與平凡論調的大貯藏室，但邱吉爾對於這個大貯藏室卻不會貯藏過什麼，雖則儘管有時候也有人罵他賣力討好，然而他賣力容或有之，可是好也確是討了。一九三一年以後，他在議院裏坐在政府派遺邊，雖則他的意見和他所擁護的這黨領袖們之意見相左之時也不啻於相同之時。他容許他自己跨越黨籍，竟達三次之多，這種未之前聞的政治浪費，想一般大員們當不難記憶及之。

我在下議院聽他講演比聽任何英國政治家爲多。雖則我對於他的政策不盡一同意，但我對他的演講總是非常傾服的。他站起來的時候總是慢慢地。他的演說，總是先由鬆弛然後漸趨緊張，到了一定的時候，必定達到最熱烈的頂點，全院都覺知他這種脾氣，故都能很有耐性地等待。對於演說，他還有些不利的條件。他口吃，并且也略有吐字音嫌不清楚的毛病，而他那沙沙的喉嚨，尤爲人加熟悉。他從不見有如演說時那麼固執過，這是我所最不喜歡的一種特性。但據我聽來，他那種緊張却確是具有一種吸引力。整個的人羣全浸滲到話句中去了，紛歧的思想，因竭力傳達意旨的結果而得以交流。當我在議會的客廳中被人向他介紹時，我注意了他眼光中那種不平凡的黯淡，和他面容上那種充滿戰鬥生活，煙酒生

滑的皺紋。

有好幾年，邱吉爾簡直爲意大利法西斯主義及黑衣宰相墨索利尼所迷。以此之故，他在阿比西尼亞危急時候所採取的態度，頗爲曖昧。他一方面表示對於阿比西尼亞人民十分同情，另一方面却又聲稱阿比西尼亞不配在國聯作爲與其他文明國家同等的會員國。對於日本之侵略滿洲，他同樣地予以優容，并且宣稱：「我們不必和美國一般見識，美國以許多不合理的條件束縛着我們的海軍，迫使我們去和另一個島國爭吵，而遣鳥國，我們雖有時也不能贊同，但對於它，我們是永遠表示好感的。」因此，他助長了兩個獨裁國家的暴行。而這兩個獨裁國家終究與他所深惡痛絕，反對到底的納粹德國締結了同盟。

至於說到希特勒的獨裁，則自納粹當權以後，邱吉爾一切行動的紀錄，都可算是其一種最可靠的查考資料。邱吉爾雖具有對於英雄的偏愛，具有自身階級的偏見，原可令人希望他像賞識墨索利尼一樣地賞識希特勒——因爲希特勒總算是反布爾維克十字軍的一員。但事實上這次邱吉爾的意見和大多數英國真正統治者的意見者不同了。他極力主張對墨索利尼姑息，但却極力反對對希特勒加以寬容。這種非常的好惡之感，似可用一種這樣的事情來解釋，即在希特勒這方面，他認爲有一種增長的威脅，於英國分而治之的大陸政策頗爲不利，且終結必危及整個大英帝國。在墨索利尼這方面，他認爲是一個勇敢，自私，然而勢所必需的盟友。在邱吉爾看來，這只是獨裁者與大英帝國其附庸之間的一種關係的

測驗，而不是以法西斯主義的好惡作爲一種社會秩序的測驗。

在他對希特勒主義的非難中，他和他的後台老闆一般恣言無忌。他一再指陳英國軍火生產力的脆弱。勞合·喬治發明了「太遲而且太少」(Too late and too little) 這句話。幾年以前，邱吉爾更拿事實和數字來支持了這句話。這一點，他認爲是生死關頭，所以他不惜與任何當權的政府決裂。他警告他孫子，他斥責，他咆哮。在一次有名的講演中，他這麼說道：「我眼見着這有名的島國立刻沒落，悄然無聲地沒落，沒落到日近黑暗深淵的階梯上去。」他認爲英國去一個「由愚笨政策而致孤立」的不幸地位日近一日了。經過一陣躊躇後，他並沒有放棄他認爲慕尼黑會議是一個不幸場面的論調。

結成堅實的作戰體不是他的長處。他把西班牙共和國對佛朗哥反叛的鬥爭與他自己對希特勒主義的鬥爭聯起來的企圖失敗，是他個人的一大失着。西班牙內戰的頭二年，他站在支持佛朗哥這方面。對於這個問題，他最初的發言，是直接反對共和政府的，他反對共和政府「在法律上道德上名爲服從各個階級，但實際上却一天天傾向甚至投到共產主義的懷抱裏去了。」他甚至對自己是否真正憎恨希特勒也發生了若干疑問。在他關於西班牙戰事的另一次演說中，他公開承認：「我絕不至於假心假意地說，如果我必得在共產主義與法西斯主義二者之間擇取一種時，我必擇取共產主義。」

他的兒子蘭道夫(Randolph)，是一個極虔誠的佛朗哥的宣傳者，大家認爲這大足以反映他老子的態度。一九三七年時，我見過亞索爾公爵夫人(Duchess of Atholl)，究竟邱吉爾對西班牙戰事還可

否用一種較為客觀的看法，庶幾對於自己本國的利益也偶然可以爲力。公爵夫人的答復說是絕不可能。但她却指出邱吉爾在一篇演說中曾表示過這樣的希望：「所有愛國的西班牙人，由危急情勢中發出的第一個想頭，就是把這些救星（納粹）護送到最近的海口來。」他雖不相信希特勒，但却相信希特勒的嘍囉。

邱吉爾對較弱的法西斯獨裁國家之容忍確與反強大法西斯獨裁國家的奮鬥妥協了。他在議會裏甚至因此而感受痛苦，因爲議會一些一向擁護他的入都因他這次政策的矛盾，轉而贊成政府派對所有各法西斯獨裁國家一律姑息的辦法了。下議院中，邱吉爾的人從不滿二十五或三十個，這些人有時候被叫作邱吉爾的「便衣保鏢」（Grenadier Guards），但是矛盾也有其另一面，即健全的一面。戰機日迫，邱吉爾因着極力反對最強大的獨裁國家，聯帶地把他對弱小獨裁國家的愛好也消失了，這種轉變雖是逐漸而來的，但却也是至決不移的。這就是他對結成堅實作戰體所關的特殊蹊徑。

造成他這種轉變的，是慕尼黑黑的悲劇。至少，慕尼黑會議使他把這種轉變公開了。自由黨瀟灑透達的領袖辛克萊爵士（Sir Archibald Sinclair），爲黨中的左派，告訴我慕尼黑協定對於邱吉爾確是一個重大打擊。辛克萊說，他是天生的一副軍人脾氣。他無法排除他親手放棄一個友好小國的恥辱。他知道不列顛的名字在布拉格（Prague）備受別人的揶揄和侮辱，他深深地感受痛苦。因爲他學過戰術，他對於俾士麥所認爲統治歐洲之要津的波希米亞稜堡（Bohemian bastion）之失，極爲震驚。布拉

格羅維以後，瑪德里和莫斯科顯然地在他心目中立見重要起來。

因此，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三十日，全世界驚異地從邱吉爾口中聽到了這麼一段話：「首相之獲得中產階級社會的強大支持，最顯著之理由似莫過於相信他對佛朗哥及西班牙國民軍表示好感。現在看來，西班牙政府獲得勝利，英帝國所受的危險似乎遠比佛朗哥得到勝利時為少。」

在這次演說之前，我已得到消息，說是邱吉爾可能轉向。他的女婿撒提斯 (Duncan Sandis) 及其夫人蒂愛娜·邱吉爾 (Diana Churchill) 一同到了被炸得破破爛爛，飢饉成災的巴薩隆納 (Barcelona)。撒提斯回來時，深為西班牙人民那危險可怕的命運和崇高堅毅的精神所感動。看來他似乎至少把他的同情分了一部分給邱吉爾。有一個和邱吉爾一道喫過飯的美國記者告訴我，說是邱吉爾談到佛朗哥時，雖然語氣很友善，但邱夫人却極為關切，勸他莫把這事看得太嚴重了；她并且說，她的丈夫對於共和軍的戰績，非常感動。

至於蘇聯，一直到布拉格陷落以後，邱吉爾才對之表示充分好感。他說，蘇聯的力量與影響最好不估計過高。但蘇聯覓取和平的態度之忠誠，及其阻遏納粹向黑海伸足的顯然興趣，實可給予目前受柏林迷夢所威脅的東方各國一種激勵的感覺。」

從此以後，他千方百計地設法跟蘇聯訂約。事態尚未發生之前四個月的時候，他即已發表他那有先見之明的預言，謂：「如無俄國的積極幫助，則決無法保持一個能阻止納粹侵略的東綫。一果然，這話

閃擊，並建立一條北起北冰洋，南迄黑海的東線一再再度證明了。邱吉爾甚至極想把波蘭的統治是從他們自己手中拯救出來，因為想在波蘭國家還未被逐逃亡以前締結一個蘇波協定，他警告萊茲政府（Government of Smolty-Brydz）和塔克上校（Colonel Beck）「不要阻礙公共遠程」。但這話被當作耳邊風。華沙的幻夢終於成了不幸的悲劇。

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邱吉爾又回到了他的老崗位海軍部。因為張伯倫極端被人厭棄，所以邱吉爾乃能得到很好的榮譽。邱吉爾原想很忠心的服務，然而這也就適是他的困難所在。張伯倫政府完全沒有認清目前的情勢是以一種新式戰爭法和一個不尋常的敵人鬥爭，而究竟想仍以「尋常生意經」（Business Usual）的方式去取勝，卒不成功。邱吉爾只願埋頭建造海軍，顯然地他並沒有理會他那些同事的愚妄辦法。他等待着他自己時機，攫取領導權，然後希圖能達成通常一般英國人心中所謂政治家的標準。這一切都成功了，但所付的代價，却是英國人在敦刻爾克一役的英勇犧牲。

有一個時期，他對於蘇聯在戰爭中的作用沒有把握得牢。但不久他馬上發覺了紅軍佔領波蘭的白俄羅斯部分和烏克蘭部分是給納粹的一個打擊。基於這種認識，他在一次偉大的演說當中表示了他的信仰，認為「爲保持我國對抗納粹威脅之安全計……俄軍必須駐防此線。」但是，不幸得很，他在同時却又容許張伯倫政府中的激烈反蘇集團策劃反蘇運動，和容許他們繼續拉第政府合作，計議在魏剛將軍領

導之下，成立所謂中東軍，以圖染指巴庫油田。他站在一旁，聽任此種團體日漸恣行無忌，因之，在芬蘭之戰時，英國舉兵蜂起一塵這類的紛擾，而邱吉爾本人却反一若爲種氣氛所包圍者然。一九四〇年一月，邱吉爾爲一時權宜之計，作過一次於他的威望并無多少幫助的演說。他說，「芬人讓全世界知道了紅軍陸軍與紅軍空軍之無能。」

難道原來的邱吉爾又復活了？難道他又被他那憎恨蘇維埃的陳腐心理所制服了？難道他退步如是之遠，竟以爲一個反希特勒德國的戰爭還不够他受的，硬要自找麻煩地去肩起一個反紅軍戰爭的重担到身上來？

他似乎確是如此。據法國一位部長告訴我，邱吉爾在同盟國最高作戰會議幾次會議席上，表示贊成英國立即派遣遠征軍到芬蘭去，至少是并不表示反對。幾個禮拜之後，英國遠征軍在挪威潰敗，由其裝備之不全，必需之空中接濟斷絕，不足適明其在芬蘭僅倖免於大難而已。挪威錯誤得可笑的結果，恰是西歐一局慘劇。

邱吉爾即在此時被召來竭盡所能，以收拾殘局，諸如拾取碎片，醫療傷殘，挽回頹勢等等。這不是一個普通人所能擔當得了的工作，但他却樂觀而且堅決地接受了。沒有人有他這麼的軍人才具，最適宜於應付危急。於是，邱吉爾由大評論家搖身一變，而爲大作戰領袖了。

邱吉爾在就任首相以後的頭幾次演說裏，曾表示他深知輕易樂觀之無用與有害。拿破崙遠征西班牙

的掃面子事跡，至今仍赫然存留在圖書館裏。「希特勒趕場了車」(Hitler-hasmisad-the-hp) (ak-eh-peace-hu-vel)的話已經不對了。危險的是英國搭錯了車。大部分軍人都認為英國確已搭錯了車，然而邱吉爾不然，并且，尤為重要者，英國的人民也都不作如是想。因此，大家又開始向希特勒作索取他前此從民主國方面竊取去的時間之競爭。可是，希特勒仍舊佔上風，他越過了布爾格萊德(Belgrade) 雅典，克里特，和利比亞。但他不能跳過最重要的一道藩籬，因為他無法取得英倫三島上空的制空權。

邱吉爾最重大的新使命，迫使他對自己過去不會顯見成效的事務不得予以檢討。他對於一切關難，慣於粗率從事，總愛衆炮齊發，迎頭一擊。他常陷自身於進退維谷之境，直到戰煙吹散，方才引退。然在他就任首相的第一年中，他對於彈性，確已表現長足的進步。他原是一個絕對的，無法克制的反對派中心人物，現在也被奉為領袖，驅之從事聯絡，懷柔，救治等工作了。過去，因為他樹敵的本領太大，他的許多朋友都失望了。現在，他的朋友雖已多得無數，然而他却還得防範着他們。他還要鬥爭，不過現在的鬥爭是為要防止其他各黨各派由他這個政府中溜出去而已。在這一點上，他很少成功。他在內閣會議中的不能忍耐，往往隨冷嘲熱諷以俱出，這些，他倘肯為大眾的幸福着想，未嘗是不可予以抑止的。但是，無論如何，他總前進得很遠了，縱令他還有很遠須得前進。

一個工黨的大臣說，邱吉爾現在較能容物了，還可以說是敦刻爾克一役所換得的一個小奇蹟。一因為慕尼黑會議告知了他馮德里奧斯對他的價值，所以敦刻爾克之役也就使他認識了人力的價值。他再不

能隨隨囑囑德德人，以這樣不行，那樣不行了。他奉命組閣，可以取償三十年來因居寂寞的代價了。他的私人智囊團，是由三數無黨派的智客湊成，而不是一個由一羣有經驗的政客組成的機構。

智囊團裏的人物，有^一位^是清道紅雲的布達傑(B. Peter Brocken)，爲財政時報(Tin Royal Financier)

的老闆，同時也^是聖約翰黨的人，以「新清派之牛」而聞名的紅旗者稱。邱吉爾把他找來，先叫他充當政務次官，隨後又^是他^在混亂大政。有經驗多者，而聲望不隆的尼柯爾遜(Harold Nicolson)，他知道如何寫一本書，但不知道如何去估測一個議會裏的情勢。有人這麼說：「尼柯爾遜對於歐洲每個角落都很

熟悉，惟獨於英國下議院則不然」。邱吉爾首相先叫他當情報部次官，然後又叫他作英國廣播公司總管。

。老愛穿一身黑衣服的辛克萊爵士，是一個自由黨員，爲蘇格蘭的騎士(Squire)，一個肝胆照人的朋友，極有學問，而且議表極爲堂皇，但却不是一個能作閃擊戰的戰士。邱吉爾把他做了航空大臣。再有就是爲一般女性奉爲偶像的艾登海軍大佐，他是一個由智囊團分子一躍而成爲王太子一流人物的人。他做着外相。因着這個職務，他得以建立他和首相間的關係。他們倆彼此之間甚爲親熱，一着君主之於其世子亦然，但也僅止於此而已。還有勞力則爵(Lord Lloyd)和愛麥蒙(Leopold Emery)，這兩人都^是極端^的保守黨分子，對於一個正從事反法西斯鬥爭的政府，他們不會有何貢獻，其所以得與邱氏親近者，^是因爲^他們^是保守黨^的領袖而已。最後一個，是^在維也納^的博克勒博(Lord Bouverie)，是^在維也納^的博克勒博^的角兒，他^有組織能力，所有^的博克勒博，皆^是加^入博克勒博^的博克勒博不少年級。

在上述諸人之外，邱吉爾又加上工黨所指定的幾個大臣。他給阿特里一個副首相的尊號，因為，正如他自己所說，「阿特里極易籠絡。」工黨人物之較爲出色的，僅有兩人：一是貝汶，爲職工同盟的獨裁者，就任勞工大臣。一是莫利遜 (Herbert Morrison)，爲倫敦行政長官。就任內政大臣。二人都是很能幹的組織人才，並且也都是很努力的工作者，但兩人都似乎爲他們平日恣言無忌的皮薩成見所累，尤其是當英國政策擬與蘇聯人民及其領袖覓取一個協調的時候所發的言論。就英蘇關係上錯綜複雜的問題而言，政府中僅極少數人有能爲力，艾登是其中之一，駐蘇大使克利浦斯博士，因主張親露而被工黨放逐出來的，是其另一。但當邱吉爾擊破其自身的障固，而與蘇聯接近時，他等於擊破了英國一個很大的障礙。

當邱吉爾沉思於他的理想時，他常常想像英國未來救主的神態，他以爲那應該是一個獨裁者，一個集權的至尊者。他在他的「當代聞人錄」(Portraits of Great Contemporaries)裏說：「一個國家，當無國運搖搖欲墜之際，能產生出一個像克星孟梭 (Clémenceau) 那樣的稱主，那樣的戰士，確是幸運。」但到了失望的時候，當他認爲很大的不幸一定會降臨到大英帝國時，他又說，「一個人可以不喜歡希特勒的制度，但對其愛國的成就還是得讚賞。如若我國戰敗，我希望我們能找出一個那樣的戰士，有不可抗拒的能力，可以恢復我們的勇氣，可以領導我們回復原來的國際地位。」

但是當他的人民將近戰敗，將近成爲一個侵略鐵蹄下的必然犧牲者時，邱吉爾又不得不承認他們并

不是總算取一個霸主，一個希特勒了。確實的，自從張伯倫那驚人的失敗以後，他們便希望有一個戰爭領袖出現，但是却拒絕所謂必須以法西斯主義自身的武器去打擊法西斯主義的那種失敗主義者的思想。漸漸地，一般大臣們都只能採取類似法西斯主義的措置，白白地曠着自己的聲望逐漸下落，連首相也都無法例外。但是，當政府向人民的意志力與創制權申訴，并以人民的意志力與創制權作為憑藉時，那結果却是非常可觀的。

我不知道邱吉爾是否已把他從前對反動作風與法西斯首相墨索利尼及高希洛（Goebbels）等的歌頌毅然地永久擱置一旁，但是我相信他一定已經認清了如果採用希特勒的方法，不但英國的抗戰崩潰，而且他自己也就完了。由他的政府聲譽之日趨上升而言，則足徵他已把握住了人民的心境。他把他的造船大臣克羅斯（Rosalind Hibbert Cross）打發到澳洲去，是減少了英蘇協定一個可怕的對頭。他把外相哈里法克斯調任駐美大使，然而不幸得很，哈氏居於這個位置，仍然不是完全無害的。他又勸告在倫敦的各國流亡政府，尤其是波蘭政府，放棄或至少暫時收起他們的反蘇態度。

我并不堅持說是邱吉爾已經完全棄絕了他過去的一切，我也不說他已非復當年那個本從國教的保守黨員與放浪不羈的貴族，他過去老是一個反動派與前進鬥爭的戰場，現在也仍然是。但是，我以為他對於自己那些貽國家人民以無窮之感的偏見，必已力求克服。無論如何，他對過去業已嘗到滋味的大寶驗，必不敢再去領教。我所以引證他對希特勒陰險突擊蘇聯的反對以為證。在侵略初期，要他呼籲援蘇

，得費多大的氣力！要他肯把國家利益置於他個人對布爾塞維克的憎恨之上，得花多少手腳！然而他畢竟做了。由於他這一決定，他遂由一個偉大的戰時領袖更進而成為全世界極卓絕的政治家了。

至於他究竟要弄成一個什麼樣的結局，那可只有他自己才能夠回答。在他的面前，有無數測驗他的性格與判斷的難題，但最難的一個，却須待至戰爭結束以後。以後他如果仍是英國政府的首長，則他不僅要解決其本國的社會復興問題，同時也得負責解決全歐洲的社會復興問題。他將站在那一種立場？一個戰士是否適宜於担当和平時期的工作？邱吉爾將回復他過去的聲望，抑將為建立一種永不以戰爭作為解決問題的手段的新社會而呼號？如果他竟為這種理想而努力了，那他將較他以前所崇拜的那些霸主偉大得多。

結尾：歐洲的無名人物

一九四一年七月和八月間，希特勒雖然宣稱紅軍已被「全部擊潰」，「決定性的勝利業已獲得」，和「歷史上空前大戰已經勝利結束」等豪語，但實際上他已踏上了一個爲他所最痛恨的人——魯登道夫 (General Erich Ludendorff) ——的覆轍。在一九一八年的春季進攻中，這位德帝國的軍事首腦人物，也曾宣佈過聯軍業已遭遇重大敗績，將永無規復之日。聖昆丁 (St. Quentin)，哈茲勃魯克 (Hazebrouk)，及瑟芒堤 (Chemin des Dames) 各地之攻克，已經「決定了西線的命運」，「現在呢，只須把地名換成貝里斯多克 (Bilivisok)，什托米爾 (Zimmert)，和烏爾 (Ursen)，再相上閃擊戰術，坦克師團，和德國飛機，希特勒抄襲魯登道夫的戰爭便全備了。

魯登道夫的戰爭與希特勒的戰爭二者之間，其相同之點，實遠較兩人在戰報上所公佈者爲多。事實上，納粹軍隊在東綫所用的戰略，根本就是模仿魯登道夫的，魯登道夫的幕僚，作戰組長懷慈爾中校 (Lieutenant Colonel Wetzel)，曾說過這樣的話，「唯有巧妙地把許多突擊接一連二地聯綿起來，我們才可大獲全勝」，這話聽下了魯氏日後支付代價以求勝利的基本概念。到今日，這話又確切地描寫出了希特勒的參謀總長霍爾德准將 (Colonel General Franz Halder) 在東戰場所採取的戰略。總之

之，就是說，當一次猛攻還不足以取得東線的勝利時，他就準備以不斷的突擊來摧毀敵人的作戰能力，以求達到目的。

依登道夫自己所說，一九一八年德國的攻勢，實在是「孤注一擲」。他不得已而運用着這個戰略，因為他要爭取時間。那時候，他的眼光注視着大西洋的對岸，因為那兒有幾百萬美國人正在受着訓練，準備來填補聯軍行列的空缺。而反觀自己這方面，盟邦如奧大利，保加利亞，土耳其等，都惴惴不安，有着要折夥的表示，在這緊急的當兒，他不得不採取這種戰略。

這方面登道夫正在孤注一擲，那方面焦灼與不安却在帝德境內滋長起來。德人經過三年多戰爭的操勞，早已國窮民困，無不渴望戰事早日結束。登道夫看準了這個士氣消沉的原因，知道只有用這最後的，最大的努力，去求得速勝的効果，才能把它克服，他清楚極了，如果他一失敗，整個德意志帝國也必就此在苦難中了結。

希特勒也是如此，當他在東戰場採取這個孤注一擲的戰略時，他感受着時間的鞭撻。他也是焦急地注視着大西洋的對岸，不知那些飛機，坦克車，與大量軍火是否真能在他獲得決定性的勝利之前，適時地由「民主國的軍火廠」運到英國與蘇聯，致使他們的機械化軍備加強，成爲己敵。同時，他也被他因已那些脆弱的盟邦與傀儡糾纏個不清，他們無聲無息地，然而又極堅決地渴望着停戰，並且認爲停得愈早愈好。蹣跚的意大利，廢缺的羅馬尼亞，喘不過氣來的匈牙利，內訌迭起的哥羅西亞（Croatia），

九死一生的斯洛夫克，以及爲飢饉所威脅的芬蘭，無不隱隱不斷地給他警告：時機不單了。

焦慮與不安在德國及希特勒統治的其他歐洲各地滋長。九年的劫難之後，繼之以一個初嘗爲短場而結果竟成長期的消耗戰，使得納粹德國的民氣極爲沮喪。在這種漫長的征途中，只要勝利仍一日能展翅奪平衡，德國人民畏懼戰敗的心理仍一日能勝過於畏懼希特勒勝利的心理，元首的大戰是一日還要打下去的。不過，如果一旦一個足以共來的變動來到，破壞了這種平衡，那麼，很可能把他拋向不幸的深淵，而目的仍屬遙不可期。

這裏，就是戰爭目的與魯登道夫相似的地方。希特勒在東線的攻擊，不惟是爲達成最後勝利的目的，抑且是爲達成一個新慕尼黑協定目的。同時，也是一種最大的努力，希求以反消耗戰來鏖壓歐洲佔領區中對他在慕尼黑會議所提意見的反抗。希特勒如果得到了蘇聯豐富的農產和鐵礦，握住了蘇聯鉅大的工業生產力量，那麼，他就可以平衡歐洲的局面了。他有了原料供應工廠，就可以對抗英美兩國的生產力量。一旦擁有俄羅斯，他便可以與他的盟邦日本直接碰頭，便可以威脅印度，便可以更直接指回半球。一旦擁有俄羅斯，希特勒很自然地又更直接擁有全世界。

因此，問題來了。現在，東戰線的仗在打，持久消耗戰路，對於同盟國家，究竟是否仍屬至上海門呢？在法國潰敗，意大利參戰，和斯干底納維亞及巴爾幹諸國，繼而陷落以後，英美除採取其常戰爭外，別無辦法。在這種境況之下，此兩大民主國家唯一之戰略，只有暫且坐視使希特勒繼續的歐洲各地受苦

，以採取時間來生產軍需資源從事建軍。爭取三比一的空中優勢，補充英國兩艘被納粹擊沉的噸位，建造足食渡送遠征軍到歐洲大陸上去的船隻，完成一百個坦克師團，以之制服納粹的那五十個，最後，但非最少，還要訓練些人出來，以備攻奪全世界最大的軍備之用。諸如此類，無不需要時間，耐性，和可怕的人命犧牲與城市毀滅。

但當希特勒把他的坦克師團驅向東方，卒致開闢東戰場時，紅軍初期雖也不免遭些小挫，但終歸成了希特勒軍隊的一個勁敵。因此一來，局勢完全變更，希特勒要求速勝的迷夢，早被拋到九霄雲外去了。

在大陸上有一個陸軍來抵抗希特勒，自開戰以來，這還是破天荒第一回。這個陸軍，對於閃擊戰術訓練有素，率領的軍官，也都精幹異常，機械化武器的裝備，也很齊全，而且全軍都具有必勝的信念。現在，自然毋須再假以歲月，先去訓練一個陸軍，然後把它運到歐洲大陸上來了。這個陸軍已經有了在這裏。在這個陸軍後面，並且還有着蘇聯偉大無窮的人力與資源作為後盾。

紅軍獨力支持着希特勒二百五十個師團大兵力的攻擊，說不定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中只能採取守勢。因此，進攻的力量便被迫而消滅在專為應付納粹的攻擊當中。假如德國國防軍的壓迫可以設法解除一部分，假如納粹被迫而不得不把軍力分散到東西兩面，那麼，紅軍便可很快地站在主動地位，由各同盟國加以撐持，開始向納粹作這次戰爭中的首次大規模猛攻。

要解除東戰場的壓迫，并改守勢為攻勢，必須另闢一個戰場，即在戰場。西戰場不僅要在空中作戰，而且也須在地面作戰。要能够把希特勒的軍隊從東戰場吸引一部分過來，把希特勒「兩綫作戰」的夢囈實現。希特勒的黨羽和朋友，都很懂得這個危險，他們都提出「西綫無戰事」的口號。戰事刻正絞繞着這句口號瘋狂地進行。是故我寫本書末一章的重要，也實不亞於目下的斯摩棱斯克之戰。

關於戰爭局勢的全貌，我們必須認清。在這次大戰中，德帝國的陸軍，在西綫上，要與英法聯合的兵力作戰，在東綫上，又要和帝俄的軍隊搏鬥。不盡此，且尚時還要和各協約國佔絕對優勢的生產力量鬥爭。協約國包括美，意，日，比，葡諸國，因為這些國家都已加入反對德國驕武的陣容了。但在那時候，德軍還是有力量重創敵人，以滅除東綫的威脅，幾使西綫協約國瀕於敗績。

在這次大戰中，不消說，納粹德國毋論在西歐，中歐，或是部分的東歐，都是佔着優勢。被它佔領的各國的資源人力，都由它支配，意大利是它活躍的軍事盟友，日本和它訂有軍事同盟，西班牙是三國協定 (Tripartite Agreement) 非交戰國的簽字者，波蘭，法國，斯干底納維亞，以及巴爾幹諸國，更都是在它的踐踏之下。

兩年以來，納粹德國得以遂其所欲，將敵人逐一個別解決。兇焰未殺，更自一九四一年六月廿二日起開始向一個在東方的巨人進攻，想把那最強大的，最危險的，而且德國國防軍遲早要碰到的陸上和空中軍隊消滅。希特勒的計劃雖然錯亂了，但東綫開戰後的第三個月，他似乎還敢肯定西綫絕不會發動

戰事，來威脅他的後方。因此，他得以從歐洲佔領區內抽調一部分軍隊來作為後備軍，并加派許多新的師團到東綫上去。在極為不利的環境之下，魯登道夫還能夠支持他的春季攻勢，直到這攻勢變成了一個夏季攻勢——這就是說，支持了足足四個多月，現在，即令西綫仍然不生出什麼新的威脅，東戰場上德國國防軍的攻擊力量究能延長到什麼時候才會涸竭，殊難逆料。無疑的，在蘇境戰場上，冬季之來臨對於德軍是一個很大的不利。但是，開闢一個西戰場，却比這個不利還要不利。西戰場將給希特勒帶來災難。

西戰場不能毫無險阻地建立起來，那是無疑的。但是這種險阻，比起同盟國任希特勒集中兵力到東戰場活動這件事來，究竟危險還要小得多。

英國人民，在兩年的戰爭中，表現了極為驚人的精神和毅力。他們必將興盛，因為他們認識了這個立致希特勒戰敗的新的的大好機會。單憑他們企求美滿的觀念，就足以逼使他們不讓東綫盟邦獨着先鞭。因此之故，英國人民與英國報紙之中，就發出了一種聲浪，要求發動一個勇猛的大攻勢，以支持紅軍對希特勒國防軍的堅強抵抗。

有趣得很，這個運動竟由一度是妥協派的卑維勃魯克勛爵的兩家報紙領導着。一九四一年七月廿日的星期快報(Sunday Express)說，「開闢第二戰場，不僅對於俄國是一個最大的解救，而且也可燃起一把烽火，惹動大體的狼烟。我們現在對於戰事，好像完全居於一個旁觀者的地位，這究竟是怎麼回事

呢？」一九四一年七月廿九日，標準晚報 (Evening Standard) 也說，「我們必須在西綫發動一個大勢戰爭，以牽制敵人。」

這是左右兩派一致的論調。自由黨的新聞紀事報 (News Chronicle) 且質問政府，究竟懂不懂得下面這種心理，即「現在羣衆心目中最大的問題，就是看我們能給俄國以何種援助，且須到何時方才可給？很顯明的，英國各階層，各不同境况，各不同黨派的人，所整天談論的，無非都是關於這個新戰爭的事。大家愈來愈感覺煩悶了，爲什麼我們的參謀本部竟那麼熟視無睹？」居於反對地位的右派報紙，每日郵報 (Daily Mail) 也說，「很顯見的，國人對於援俄一事，漸有追不及待之勢。許多人認爲皇家空軍猛襲德境及德軍佔領區域，固極有力，然仍感不够。」即穩健如一向被認爲倫敦喉舌的泰晤士報 (Times)，也不肯放棄此種論調，該報在一九四一年七月廿九日說道：「最要緊的，就是要把英國全副力量加緊使用到下面這兩件事上去：一是立即進攻德國。二是努力生產，以應付未來的戰爭。這是爲俄國，也是爲我們自己。毋須多少時日，敗績誰屬，就可以判明了的。」

當然的，英國政府諸公的見解遠落在這種民意後面。他們對於這軍大陸，牽制德國一舉，分成兩派意見。據可靠方面報告，說是一小派人主張開闢西戰綫，此派以艾登爲首，一大派人反對開闢西綫，以伍德 (Kingsley Wood) 爲首。衆信邱吉爾既於一九四一年秋天與羅斯福總統作過了劃時代的舟中晤見，究應如何，他會要作「最後決定的」。

大國方面，也有同樣的表示，尤其是自東歐開始接觸以後，一般人對於開闢西戰場一議，簡直認為刻不容緩。各被壓迫民族企圖推翻絕粹暴政及其傀儡的熱望，在個人的行動及許多的小集團裏，隨處反映了出來。

職是之故，一般從事秘密工作的戰士，即歐洲的無名人物，始克獲得了他們的榮譽：

在法國，他們散佈着戴高樂的祕密報紙「自由法國」(La France Libre)，和共產黨的「人類報」(L'Humanité)。

在比利時，儘管有佔領者的警察組織，「自由比國」(La Libre Belgique)還是暢銷無阻。

即在納粹德國本身境內，祕密警察也還是無法阻止「紅旗報」(Die Rote Tonne)的流傳。德的反納粹者在軍車上寫着「我們遲一天上火線，希特勒便早一天被打擊」的口號，在工廠的牆上壁上寫着「我們工作愈慢，希特勒便蛋愈快」的鬥爭語句。

在南斯拉夫，「傑尼克」黨人(Chećnici)極力破壞電話綫，電報綫，鐵道，橋樑，公路以及行將收割的農作物。

保加利亞愛好自由的人們，在一九四一年八月的上旬，就一連設法使火車出了三次軌。

哥羅西亞的反納粹者，使這傀儡國的警察和伯夫利支(Ante Pavellich)統率的民團個個感到生命的危險。單只一九四一年八月五號這一天，他們一顆炸彈就斷送了希特勒廿八個衛兵約命。

希特勒派駐斯洛伐克的行政長官衙門的建築，很神秘地着了火。

匈牙利憲兵巡邏隊喀爾巴阡到烏克蘭（Carpatho-Ukraine）的公路，成了賭命的玩意。

納粹佔領一區比爾森（Pilsen）的斯柯達（Skoda）兵工廠，在捷克工人的操縱之下，生產率僅在百分之六十以下。一九四一年七月的下半月，捷境火車碰頭及傾覆者，達十一次之多。

吉斯林（Quisling）的挪威，是反納粹騷擾與怠工運動的策源地。挪威最大的三家工廠，在一月之內，因怠工而致損失十六天的工作。

在波蘭，納粹的官吏離奇地失蹤了。國家的秘密文件，也往往發生同樣的情形，而結果却都在倫敦和莫斯科的報紙上登載了出來。

荷蘭的十二個工廠，在一九四一年六月的時候，竟因怠工而致完全停頓。英國的飛行員，因得當地民衆的協助，乃能在勞蘭斯（Lowlands）降落，在納粹航空巡察隊的監視之下，收集不少有價值的情報。

英國皇家空軍的飛行員在布勒塔涅（Brittany）降落，納粹的鄉村警察拿着全無辦法。怠工的結果，使得一九四一年七月出產的西屈安（Citroen）手車一律只用到兩個禮拜就破裂了。怠工在席雷德、克羅梭（Schneider-Creusot）的各兵工廠中，在布洛什（Blois）的航空製造廠中，甚至在巴黎的航空工廠中，悄悄地喧鬧着。它激發得那麼利害，致使巴黎的官廳在八月裏撥賞一百萬佛郎，徵求破獲怠

王聯總的願望。

所有納粹統治下的歐洲各地的無名人物，共同舉起了一面大旗，旗上寫着一個可怕的「V」字，表示着「勝利」(Victory)。

是的，「V」字表示勝利。但勝利究竟即到來，還是要在若干年以後才來到，那就要看各軍事領袖是否英明果敢，能否毅然冒險應付的危險，和能否正確把握住大好時機了。在這戰爭正進入第三年的當兒，把納粹鉗制在兩戰俘戰線夾攻之中，給它一個致命打擊的大好時機到了。大部分納粹軍隊都集中到東戰場去了，建立一個西戰場自然是很可能的。而且，為迅速得到勝利起見，西戰場之建立更是刻不容緩。假如這個良機失去，以後要想再有一個這麼的有利情勢，必得又過若干年載。

納粹在東線的進展，已付出了很大的人力與物力的代價，為彌補這些損失，它不得不從佔領區中抽調些軍隊出來。紅軍表現了他們高度的勇武，驚人的士氣，強大的技術裝備，與優秀的指揮才具。皇家空軍的力量也增強了。漸漸地，英國艦隊也可以從大西洋的海戰中把戰事的局勢挽回了。美國的軍火製造，雖出貨不快，但工料優良，絕對可靠。英國與蘇聯的人民，更都早已準備為他們的生存而犧牲，而受苦。

陰鬱籠罩着納粹德國。在那裏，勝利的文告既不能驅除羣衆對於失敗的恐懼，也不足以增強他們對於勝利的信念。

數萬無名人物，在歐洲各海洋統治地域活動着，他們到處滋擾，鼓動反納粹空氣，主持生產機關和交通綫上的怠工。在他們後邊，更有數百萬人在渴望着從納粹暴政之下獲得解放。被佔領各國到處醞釀着暴動，倘若一旦西戰場建立了，這些馬上可成爲一個大的力量。

在這次戰爭中，我們雖則冒了不少非冒不可的危險，但結果之美滿，仍大有足多者。魏菲爾將軍在非洲以極劣勢的兵力去進攻意軍，那是冒險。敘利亞戰場揭幕，那是冒險。但結果卒能使納粹無法達到蘇伊士。反之，英國海軍部不願拿一隻大點的兵艦在那麼之微冒一次險，結果卒召安邊爾思奈（Ankelsnes）和南薩斯（Namsos）的悲慘撤軍（Generalissimo Gamelin）不肯在戰事初起時進攻意大利，終於向軸心方面開了一個缺口。而因失掉這次機會，法人乃遭法蘭德斯（Flanders）與法境兩次戰役之大敗。

東戰場的經驗告訴我們：納粹駕馭坦克車的，并不是天神，構成納粹師團的，也不是鋼筋鐵骨的機械之類，指揮納粹軍隊的，也不是如何特殊非凡的神仙頭腦。納粹德國并不是不可擊敗的。反之，它是必定會要戰敗的。而且當它忙於在東線作戰時，只須把一支兵攻入它的西側，整個的戰事便決定了。

假如「V」字是代表「勝利」，那麼，它也應該是代表「活力」（Vigor），代表「警覺」（Vigilance）。

譯後記

本書原名 [Men of Europe]，去年年底美國現代圖書公司 (Modern Age Books, Inc.) 出版。書中敘述近十年來歐洲政局遽變遷的情形，極有條理，記述各大小國家彼此間錯綜複雜的關係，也甚詳盡，而作者許多親身經歷的事跡，和一些未曾被人發覺的掌故，尤為珍重可貴。書雖以「人物」名，章目雖以人名名，然內容所及，實不止此。

作者安得列·西蒙 (Andre Simons)，是法國一個老新聞記者的筆名。他在寫本書之前，還出版了一本相類似的書，叫做 [L'Acense] (有羅吟閣譯本，名「法蘭西罪人」，大時代書局出版)，裏面專講法國潰敗的前因後果，所以在本書裏，法國的事就很少被提及了。

譯者自本年一月起，即開始譯這本書，但因本身職務的關係始終時作時輟，遷延達半年以上，直到最近才把它全部完成。其中第二、第三、第五三章為梅耶所譯，餘均進楷譯。

周競中女士給譯者幫過不少的忙，我們非常感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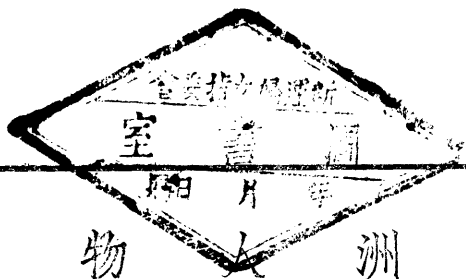
譯者 卅一年中秋，重慶。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22 4376B

單期日



物 人 洲 歐

每冊定價國幣廿六元

代售處	印刷者	發行所	發行人	譯者	原著者
全國各大書店	五十年代出版社	五十年代出版社	金長佑	周梅楷	法國·西蒙
		重慶新生路四十號 成都陝西街一六二號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四月出版

廣東省立第一中學
廣東省立第一中學
廣東省立第一中學
廣東省立第一中學
廣東省立第一中學



Co. 00